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

周致仁 著



2024年6月 · 昆明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

周孜仁 著

二〇二四年六月



作者的话

本书内容最早以《红卫兵小报和我》为总题，在2002年2月12日出版的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121）》（华夏文摘增刊282期）至2002年12月30日出版的《文革博物馆通讯（157）》（华夏文摘增刊320期）分33次连载（这也就是本书各章序号的来历）。随后于2006年以《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为书名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2012年以《一个红卫兵小报主编的文革记忆》为书名由台湾新锐文创出版。这次对全书做了再次修订。

2024年6月·昆明

目 录

作者的话.....	3
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	6
楔子 本书缘起	9
第一章 加盟.....	16
第二章 战报创刊和“一二·四血案”.....	25
第三章 罗广斌其人	35
第四章 话说工人造反.....	44
第五章 关于红岩机器厂	53
第六章 新年的花絮	59
第七章 革联会的诞生和罗广斌之死.....	70
第八章 复刊：一场虚惊	83
第九章 四川大镇反	93
第十章 创办《山城战报》	102
第十一章 迷惘与动摇.....	111
第十二章 陷入动荡的重大校园.....	120
第十三章 革联会，从迷乱走向明朗	129
第十四章 沙市纱厂历险记.....	140
第十五章 中央单独解决重庆问题	151
第十六章 我所亲历的“六五”大血案	166

第十七章 施家梁兵败和熊代富脱险	181
第十八章 《横眉》和《8·15 战报》成都版	188
第十九章 七月，血火初起的山城	196
第二十章 毫无意义的插曲：钦差大臣重庆行	203
第二十一章 我记忆中的死者	209
第二十二章 战火中沙坪坝的社会生活、人和事	221
第二十三章 八一五周年印象	229
第二十四章 内战无胜者	238
第二十五章 军事根据地的喜剧	248
第二十六章 无法重归的私人生活	258
第二十七章 “必胜”出炉前后	268
第二十八章 校革委会成立和吴庆举出走	277
第二十九章 一九六八新年，散淡的印象	287
第三十章 “三一五”：四川的政治地震	293
第三十一章 如此中央学习班	301
第三十二章 从武汉到重庆	308
第三十三章 走边疆	313
附文 1：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	320
附文 2：郑思群之死和重庆的八一五运动	340

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

徐友渔

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我读过很多文革亲历者写的自传，作者有的只是普通的旁观者，多数是有来头的角色，甚至风云人物；作品有的是正式出版的书籍，有的只是尚未发表的文稿；有中文写成的，也有用英文出版的。周孜仁先生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是我读得全神贯注、兴味盎然的一部，也是我愿意推荐给所有想了解文革历史的人们的一部。这部书写得有激情、有文采，而我最为看重的，是它的真实。

周先生文革时期是四川重庆地区一大派“重大八一五”的头号理论家，并担任《8·15战报》的主编，他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曾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自然也带给他长期的厄运。这种经历化成了本书的气质：书中所记叙的决非琐屑小事，作者的思想和文字仍然张扬和充满力度。

重庆地区的文革历史曾经是我研究的重点之一，该地区运动的以下特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派性斗争异常严重，不但造反派和保守派势不两立，而且造反派内部的两派彼此视若寇仇；第二、武斗特别厉害，尤其是因为兵工厂集中，交战中死伤严重；第三、军队的介入和主导作用十分突出，军队和一派组织的结合相当紧密，而军队在文革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周孜仁先生以其在文革时期的年龄、文化程度、介入程度，以及作用、地位，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重庆文革有始有终的、较全面准确的、点面结合的画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既有各种事件的描写，又有个人内心情感刻画的故事，这是一个可信的故事，也是一个感人的，令人掩卷深思的故事。

在文革中陷入很深，感情投入很多的人，特别是自以为革命的动机是理想和道义而非私利的人，难于以客观的态度、冷静的心态对待

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这几乎是文革中当过头头、积极分子的过来人的通病。他们中大多数是诚实的，但他们讲述的文革故事未必可信，不一定是有意撒谎或歪曲，而是没有从具体是非恩怨中彻底摆脱出来。我无意说周孜仁先生对历史已经大彻大悟——事实上，我认为本书对过去距离拉得还不够，但书中透露出来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说明作者追求历史真实的诚意是充分的。与某些文革头面人物的回忆录不同，周孜仁先生在书中没有为自己辩护，甚至也不屑于辩诬，相反地，倒是有不少自我揭露、自嘲和批判性反省，我想，这是因为近 40 年之后他的见识大大增进了，思想大大拓宽了，而且，在道义上他始终是自信的。

作者在书的开始说：“写下后面的文字，我只有一个念头：真实地，负责任地，为那页可怕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我以为，本书的全部文字证明作者是努力作到这一点，忠实记录自己的经历、感情，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不掩饰当时本人、朋友、战友、自己派别的缺陷和阴暗面。

比如，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作者作了如下解剖和总结：“正是这种宗教狂和年轻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很容易结合，于是就有了畸形的表现欲和献身狂。与此同时发生的，却是家庭出生先天不足带来的自卑感，让我必须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激进，同时又会在每一关键时刻裹足不前。渴望创造功勋却又忧心忡忡以求自保，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之所在了。”据我自己的经验，这样的剖析是诚实的、深刻的。

又如，当毛泽东表态反对激进造反派对军队的攻击后，作者所在的“重大八一五”可以非常骄傲于它的一贯正确，他在《8·15 战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歌颂本派，抨击对立派“反军乱军”的文章，对于某些文革积极分子来说，它们可以证明自己做的好事，这是至今也站得住脚的，但作者却这么评价：“从这些文字，当然可以看出一个小报主编心中再次唤醒的廉价、虚妄甚至有些无耻的愉悦。”我以为，这么严格的自省，是难能可贵的。

我是既卷入文革又研究文革的人，“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问世不久，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和注意，2000年得以结识此文作者，我颇感荣幸。我们只在北京见过一次面，交往基本上是通过邮件。老实说，我认识不少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与周孜仁先生接触是给我感觉最好者之一。他尽管有才华有能力，却没有因为命运不公、生活不顺、报国无门而自怨自艾；没有因为过去的风云和辉煌而愤世嫉俗、鄙薄现世、一味沉湎于过去；没有因为被无情的政治欺骗、玩弄而看穿一切，放弃理想和热情；而我最为看重的是，他没有因为自己一生的高峰体验发生在文革而留恋它、歌颂它，没有因为自己遭遇的不公和落魄而对历史性转折与进步格格不入；他也不满和批评现实，但丝毫不带文革余孽的左派情绪。对于那些状态不是这么好的昔日英雄，我毫无责备之意，只有同情和痛心，我理解他们的遭遇，知道他们为自己的理想和热情（无可讳言，也为自己的幼稚、轻信）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但是，我更为周兄的精神状态高兴，我希望有同样经历的人能够坚持理想、自强不息，我愿意用这句话与大家共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哪怕我们无奈地卑微。

楔子 本书缘起

人家都说我是《8·15 战报》主编。

文革动乱，耿耿十年，红卫兵小报多如恒河沙数。从没听说谁给谁封过什么主编的。我也是。那年月乱世英雄起四方，任何事都一哄而起，能者为之。我之所以认可为该报主编，皆因这份小报曾闯了一个大祸，其大也，以至于忤达了圣聪，惹怒了龙颜——上面追究太紧了，谁都招架不住也不想再招架，总得有人出来承担一下罪责吧？就这样，我认了。本来，从筹建到编辑，这份小报许多具体工作都由我做，说我主编也不冤。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七年秋。其时，四川七千万百姓分成两大派，一本正经地为一对北方夫妇的政治命运闹得不可开交。一派旦旦立誓护驾：“刘张坐牢我坐牢，刘张杀头我杀头。”另一派则杀气腾腾宣称：“刘张坐牢我把门，刘张杀头我提刀！”

这一对来自山东、河南的中年夫妇全名刘结挺、张西挺，原分别在四川宜宾地区和宜宾市担任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两派群众的政治诉求不约而同提到“坐牢”二字，皆因刘张在文革前确因开罪了中央西南局高官而蒙冤，据说还身陷囹圄，后巧遇文革风雨大作，乃告状不止，最后终得东山再起。从此后二人便和贵州李再含、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黑龙江潘复生等炙手可热的左派新贵一样，快捷登上了权力顶峰。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结挺被钦点为革筹组副组长；张西挺亦入阁且成为革筹组具体负责人，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办公厅主任，权力很大的。保刘张派的口号提坐牢，是表示要与这两个政治新贵荣辱与共，生死相许。反对派提坐牢，则因刘张的上台使自己处境尴尬万分，发誓要收回深蒙侵害的政治权益。

我属于反对派。

文革期间群众组织有两种命名法，一是采用数码，以造反时间为徽记。如“天大八一三”、“云南八二三”、“西师八三一”等等。另一种以字符命名，多标识其革命誓言。如“冲派”、“砸派”、“钢派”等等。我参加的是数码派：“重庆八一五”。造反时间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故名。保刘张派的核心组织也名以数码，叫“四川八二六”：造反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从名字便可看出反刘张派比保刘张派资格更老，但后起之秀思潮则更加新锐，力挺刘张翻案，奔走呼号，立下汗马功劳，刘张既已上台，自然身价百倍。一贯以正确路线自居的“重庆八一五”眼见造反资格比自己嫩了许多的“八二六”一朝发达，大有整个儿并吞巴蜀之势，于是冲冠一怒，起而拼死相争。本已剑拔弩张的川内形势因省革筹组的成立而火上加油，愈演愈烈。

六月，重庆大武斗拉开帷幕，一场武斗动辄数十数百甚至数万人参加，从半自动步枪到三七高炮，从水陆两用坦克到炮舰——除飞机外的所有轻重火炮全部登场撕杀；

七月，刘张发祥之地宜宾地区，由地革筹领导亲自调兵谴将，发动“武装支泸”，进攻古城泸州，死2000余、伤16000余、8000多人致残；大小规模不等的“武斗”在万县、涪陵、永川全面开花……巴蜀大地，一时血雨腥风：这已不是武斗，完全是旷日持久的战争。

同年九月五日，权倾国中的文革大员王力、关锋、林杰三人意外倒台。全国、从而四川的政治格局再次来了个大逆转。

刘张政治声望如日中天，可是要彻底荡平全川却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驻节四川的四野嫡系五十四军，还有他们背后的、同为四野系的成都军区司令员、外号人称“梁大牙”的虎将梁兴初。四川省革筹备组成立，梁同时被钦点为副组长，权势绝不让于咄咄逼人的刘张两挺。八一五派敢于与之抗衡，正是有强硬的军方背景。王、关、林倒台的公开原因恰恰是所谓煽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反军乱军”“毁我长城”一类涉军话题，他们的倒台对于刘张二人及跟随其后的八二六派，无疑是一记狠狠闷棒。盛气凌人的重庆八一

五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又正确了一回。胜券在握，需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了。

八一五派的“理论权威”、重大《8·15战报》这回该来点大块文章了。头脑发热的编辑后生在办公室墙壁上画了一张非常可笑的全国地图，用铅笔在上面画满红圈、蓝圈、红箭头、蓝箭头——像走火入魔的战争狂人一样经天纬地，舞文弄墨，仿佛只要小试锋芒，全中国就都是他们的了——这就有了上面提到的那篇忤逆圣聪、惹怒龙颜的“大毒草”，题曰：《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

文章由四个同学分头执笔，最后由我统一润色定稿。文毕感觉不错，想增加一点份量，于是找当时八一大派的机关媒体《山城战报》商量，并当即达成共识：以两报编辑部名义联合发表，有点像文革期间凡旨意恢宏的指导性文章都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袂推出。《必胜》问世，反响果然巨大，当天便有学生游行欢呼，称该文章是“投向刘张独立王国的一颗重磅炸弹”，“敲响了刘张独立王国的丧钟”，云云。游行我没有看见，标语倒是看见了——接下来，整个四川八一五派的小报几乎同时转载，一派“齐步走，向前进”的豪迈激越之势，效果大超原来想象。事后《山城战报》编辑部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该报主编、平时不苟言笑的重庆石油校语文老师李乃如，那天站在一堆破破烂烂的沙发中间，用安徽音浓重的普通话，不无得意地说了：

“真没想到一文既出，洛阳纸贵呀！”

文章有一副标题，叫“一评四川时局”。有一评当然得有二评、有三评、有四评……就如当年流行说法，中共中央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来一个“九评”，谈笑间就让苏修头目赫鲁晓夫灰飞烟灭。我们当时已走火入魔，坚信只要再来几篇文章就足以把权倾巴蜀的刘、张二人也评成“历史的狗屎堆”。《山城战报》把我“关”进报社一间偏僻小屋，让我续写“二评”：《从王力的倒台到新独立王国的破产》、“三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轮到“四评”，我正好出差海南，遂恭请四川外语学院一个中文老师续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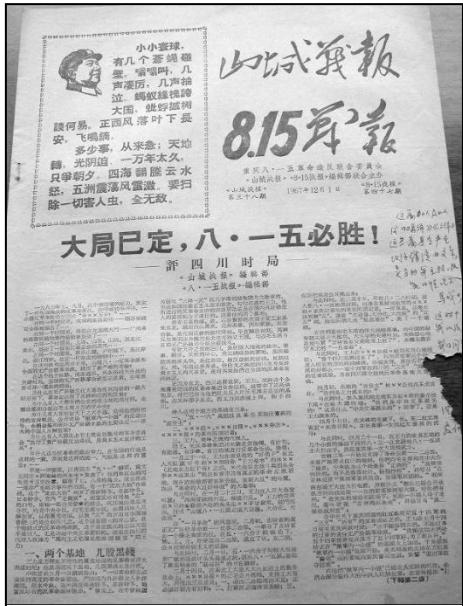
海南归来，我非常敬重地拜读了那篇大作——可惜一直无缘与作者谋面——写过那篇文章，他似乎就再没来过报社，以后也再没听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心目中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学老师，成了来无影去无踪的文林江湖豪侠。该文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写了一场子虚乌有的婚礼，单道重庆反到底派——“反到底派”是八二六派在重庆的政治盟友——首领黄廉，在潘家坪高级宾馆如何尽享婚宴豪华，其中一句话如下：“新郎乜斜着醉意阑珊的眼睛”对新娘如此这般。我当时不认识“乜”字，还查了一下字典。还有，按当时语境，这段描写有点儿色情，所以我记得清楚。

熟料黄粱未熟，好梦骤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再次召见四川各路诸侯，周恩来以降全体文革操盘手到会并发表讲话。现在，我已找不到那次讲话的原文了，但我记得绝对清楚，在这个有名的“三一五”指示中，周传达说：《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这篇文章，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此语传回四川，马上被演化为：周××（指笔者）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反动文人，必须抓起来。虽然仅就字面而言，毛的指示十分中性，但联系会议批判八一五“右倾翻案”的整体基调，把这段“最高指示”演绎为对《必胜》直截了当的批判是有充分理由的。上面那段把我定性为“反动文人”的首长指示，就是张西挺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和八月十四日在四川省大学生分配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张西挺其时兼任四川省大学生“分办”主任，掌管着川内所有大学生的生杀大权。她有足够的权力对任何一个普通学子的人生抉择作出判决。在仅有三个选项的分配自愿表上，我曾非常痛快地填写了如下自愿：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三：“西藏”。对此，张组长同样非常痛快地在会上宣布了：

通知西藏，“退货！”

大字报上的说法就更多了。

那时就有了全国五大毒草之说。五大毒草分别是：清华大学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广西“四二二”派钱文军、萧普云的《今日



图为我给《8·15 战报》写的那篇闯下大祸文章的旧报留影。

哥达纲领》、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及《我们的纲领》、重庆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记得《四》文是被毛点的名，《今》文是被康生点的名，湖南两文被中央谁点名记不起了，而《必胜》被点名的“规格”等同《四》文，很高。除了自撰的拙文，笔者还读过其中三篇，它们对于文化革命许多本原性问题所表现的大胆质疑，充分展示了作者敏锐的理论独创和大无畏的战斗勇气，而《必胜》充其量不过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了一些毫无意义

的煽动技巧而已。但不管怎样，既然它已经被锁定为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它的作者就必然得放上政治砧板让斧钺任加宰割。

我在劫难逃了。

文革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我发配来云南边疆所受的折腾也够充分了。个人窃以为，我力图远离政治，靠一个工科学生的诚实劳动，为社会兢兢业业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在事实上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然而红卫兵小报的生活经历却始终如阴影一般笼罩头顶，挥之不去。一九八四年，我在一个大型共用事业公司担任了技术科长、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某天，一位后来在中国最大的炸药厂担任总工程师的同学、亦曾做过《8·15 战报》编辑的黄肇炎，专程从山区赶来找我——炸药厂在一片荒



《8·15 战报》编辑部散伙之前的剩余人员合影。前排右周孜仁，后排右黄肇炎。

野山地的山顶，离昆明很远的。山地里同时还摆布着许多属于机密、绝密级别的国防工厂。按理说，去那儿工作政治上都必须绝对可靠，可政治可靠的人都嫌那儿太偏僻。主管大学生分配的人无可奈何，只好把出身可疑、甚至“阶级敌人”的子女分去了一大堆——黄就是其中之一。炸药厂经常出事，一出事就死人。和黄同分该厂一位清华高才生刚去不久就被炸死了。他一死了之，女朋友可苦坏了：成天六神无主、晕晕叨叨。某日上班，她对黄说昨晚她又梦见了爱人了：他在天堂里向她招手呢！说天堂里挺好玩儿的，要她赶快去：就在这天，她又被炸死了。事后黄给我来过一封信，说他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可现在，他开始迷信了。

炸药厂未来的总工程师那天来昆明不是要说厂里的故事，而是专程告诉我，说母校来人啦！来调查你、还有战报其他人员的情况。“你准备准备。小心啊！”他说。黄耳朵背，听人说话很吃力，自己也就寡言，他说的每句话都显得极认真，像深思熟虑之后推导出来的、勿庸质疑的结论。可那一天，听他忧心忡忡的提醒，不知为什么，我心境非常平静。我说，反正国民党的战犯全都特赦了，国家总需要一些反面教员吧。让他们来，我认了。

后来，重庆大学的外调人员果然来了。我知道，国家正在开始启用知识分子，我的许多同学已经或者正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所有上岗人员都需要通过“文革表现”一关，所以——我现在承认——当时我恶作剧地嘲弄了一番远道而来的外调人员，此外，除了为“亲者讳”，我对他们想了解的同学一律“评功摆好”。此外，我给他们提供的，全是毫无用处的垃圾信息，和伪证。

现在，又过去二十年了，《8·15 战报》和我共过事的、在文革中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学都已年迈，有些已经作古。该退休的也已退下来了。该当官的也已当到头了。他们都已经走完或者即将走完自己的仕途，把这些经历如实记录下来，应该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了，我想。写下后面的文字，我只有一个念头：真实地，负责任地，为那页可怕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

现在我开始写。

第一章 加盟

文革运动中群众组织要办一份报纸，它的出版发行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本身要有足够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二是要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第一个条件，应该说重庆大学的八一五派自八月十五日造反伊始便已基本具备。文革起事，一般学校都是从少数派开始的，重大的情况却十分特别：工科学生天然的吃苦、肯干、认死理和团队精神，使这个战斗团一成立就具备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和政治上的相对主动（关于这个，我们在下面的章节将有补述）。上面说到的第二个条件，则是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才具备的。在此之前，学校的所有物质，从电话机房到广播站、从印刷厂到汽车队，全都在校当局及他们幕后操纵的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掌控之中。

那时的造反派实在可怜。单说传单，只能用最次的毛边纸誊印。油印机则只能像原始人一样土法制造：用几根木条钉一个框，再蒙一层纱网，再用胶皮把油墨在纱网上来来回回地刮——传单就印出来了。土办法印出的传单质量差则差矣，可本身就极具宣传效果。人类生而心多测隐，尤其莘莘市民，尤其从来不惹事生非的“和平老太婆”，最是同情弱者。一看见可怜巴巴的毛边纸，他们就恨不得马上高呼“八一五好得很”。一九六六年“十一”国庆，重大八一五学生故意把自制的油印机木框作为道具参加游行，当场赢得无数同情之泪。相比之下，保守派的道林纸传单美则美矣，可市民一看就反感。更何况每次进城开会他们都坐车，还派发点心，这就更让人难以接受。重庆地区中秋节喜吃麻饼，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准，麻饼实属高档消费品了，因此听说“思想兵”开会免费派发点心、麻饼，市民便义愤填膺，将保守派一律蔑称为“麻子兵”。该提法在重庆乃至四川广为流传。以后编撰文革专用语辞典，这一条目绝不可遗漏。我姐姐的大女儿当时十一岁，就读于重庆南岸区雷锋小学，报名参加“八一五小闯将”组织，

口试便有如下一题，问“思想兵”开会吃不吃麻饼？如果回答：吃。马上OK！否则有保皇倾向。“思想兵”是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简称。

其时，重庆流传所谓“革命童谣”若干，其一如下：

保皇有功，
麻饼两封；
保皇有赏，
麻饼二两；
铁杆保皇，
铺盖两床。

所谓铺盖两床，其意盖云造反派干革命加夜班只能和衣而睡，保守派加夜班则不但有被子好盖，而且一盖就是两床，足见两者物质待遇之悬殊。笔者存疑：这些“童谣”很可能是大人编造的，只不过客观反应了当时的市民心理罢了。

还有一副对联反映上述心理倾向，亦表达初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们天真烂漫的革命雄心：

想当年，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
看今朝，造反派毛边加油印打败保皇派。

事情到了同年十月下旬，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胜利结束，全国各地开始清算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寒碜得忍无可忍的造反派终于理直气壮地喊出口号：“物质条件必须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接着便对当局掌控的“物质条件”实施了冠冕堂皇的打、砸、抢、抄。

重大八一五的大规模抢夺行为组织得十分周密。事情发生在十一月十九日这一天上午十时。袭击者把一切布置就绪，校当局和“思想兵”对即将发生的灾难还一无所知。那天早上，宁静的重大校园依旧

宁静，只是校园小路上出奇地多了许多闲游浪荡的学生，平时，他们应该呆在教室或者寝室里写大字报学领袖语录什么的，这一天却不，他们三三两两，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很像地下党在白区组织飞行集会。十点正，突然一阵号响，游荡的学生闻声而动，顷刻间从四面八方涌来，潮水一般将校长室、电话总机房、广播站、汽车队、印刷厂等各要害目标团团包围。造反男女手挽手肩靠肩，里三层外三层组成人墙实施警戒，接着勇敢分子或破门、或逾墙、或砸窗，很快将公章钥匙之类象征权力的器物，以及各色各样具体的物质：从纸张到食品，一网打尽。习惯于循规蹈矩的保守学生还没回过神来，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瞬间易手。原校长生活秘书曹某，四十开外的大块头，眼见得公章和钥匙被学生一抢而去，委屈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作小儿哭天状，高呼右派翻天啦！右派翻天啦！

钞票、食品、广播器材、交通工具、印刷厂抢过来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印刷厂，原来印讲义印教材什么的，共四台四开机、一台石印机，还有几台圆盘机，按当时水准设备算是不差了，工人也不算少。可工人阶级全是对共产党感情很深、或者深怕别人认为不深而遭受迫害者，所以运动一来，理所当然全都参加了保守组织。造反派把厂子抢了，“工人阶级”们干脆名正言顺回家休息以示对党组织的耿耿忠心。只剩了一个干瘦老头儿没走。

干瘦老头儿姓名已不详，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成天穿一件脏兮兮的长围腰，两只袖套更脏不堪言，像是已被生活折磨得万念俱灰。老东西一见人就低三下四地笑，对任何人的吩咐都一律非常谦卑地答：“好！马上！”，似乎任何学生都是他的顶头上司。听人说，这厮历史有点问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什么的，怕造反派整他，这才无可奈何留了下来——不管怎么说，他成了“造反印刷厂”唯一的、不可或缺的技术权威。

排字间字架密密麻麻，铅字千千万万，要一个个拣出来拼成文章，还要印成报纸，光老头儿一根独苗苗当然不成，我们就想出一个笨办法：叫来同学若干“分兵把口”，在字架前分头站好，一人盯看几个

字架，再由一人高声朗读待排文稿，一个字一个标点地逐个念来。字架前站位的同学一旦发现某字某标点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立马胜利地高呼“在这儿！”，接着将铅字拣出，交由专人统一集中。铅字收集者对自己的工作很惬意，整日价蜂蝶采花一样在密密字架间穿梭不息。铅字集中好随即交“独苗苗”排版。

有如此众多大学生围着一根“独苗苗”转，让瘦老家伙很有成就感。他的表情和心情逐日放松，眼神里偶尔流露的高深莫测甚至让我产生了一份好奇心：说不准他真有过一番不凡来历呢！虽然我一直没问过他。每拼好一篇文章，打出小样，老家伙都要逐字逐句阅读，后来还尤其喜欢对文章来一番评头论足。他的评论常常一语中的，让人感觉醣老头果然满腹经纶，有点儿怀才不遇的冤情。他的评论虽然有失卖弄，但他对当权派、保皇派的愤怒和对造反派的同情溢于言表，绝属肺腑之言。这时我就断定了，排印造反小报对于这家伙肯定是很愉快的事。原来在印刷厂他一定很受欺负。

《8·15 战报》最初的发起人是动力系五年级同学刘福。刘福，四川中江人，好书画且热心公益活动。他在大二担任级会主席期间曾主持办过一次画展。其时，笔者在校业余文工团美术队任队长，故而被他一张大红帖子请去“光临指导”：二人从此相识并结为知己。坦率说吧，那次画展实在算不得什么画展。参展者辛辛苦苦弄出的书呀画的——这些粗糙非常的作品水平虽不敢恭维，但毕竟敝帚自珍啊！一一没承想落到级会主席手上全变了废书废报一般，被刘福非常敬业地用浆糊一张紧挨一张将墙壁裱糊得满满宕宕，像是棚户人家的陋墙破壁。几十年后，这位级会主席官至贵州瓮福磷矿党委书记。短短几年间，国家对矿山的投资动辄几十、上百个亿，足见该矿规格不低，刘的官位也不低了：这是同学们意料之中的事。

刘书记一贯办事认真，还有，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我这人运气特别好”。文革后他分配的第一个单位是贵州某县一个只能用放大镜才能发现的小化工厂，当锅炉工。锅炉实在太老牙，每日里烟薰火燎，还三班倒——他忍无可忍，于是给领导报告请求换一台新机。领导哈

哈大笑，说咱们社会主义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没政府计划，你哪儿弄去？简直外行之见！领导笑过了，顺便开一句玩笑，说你有本事搞来新锅炉，马上免你烧锅炉的差事。孰料到刘福真有本事回重庆轻而易举就把一台崭新的锅炉搞了回去，而且没花钱——废金属回收公司一位校友大笔一挥——“报损”！八吨钢材指标就免费划出去了。刘用这八吨指标去钢材紧缺的锅炉厂顺顺当当换来一台新锅炉。“空手出门，抱财归家”的奇迹延伸下来，刘福很快成了贵州省化工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那年月，任何成果，从政治成果到鸡毛蒜皮，理论上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接下来，入党；再接下来：提干……总而言之，一路蹿红。最后，刘还有一个优点：为人和气，一见人就嘻嘻地笑，笑得十分认真，由于太认真，嘴里总像吹气不止，作可爱的嘻嘻声，让人和他一见面就觉得欠了他八辈子的情。

八一五战斗团成立前，刘福在北京办事处当头儿。后来办事处撤消，学校已经夺权，他就回来筹办小报。我的文章在学校已颇有名气，他自然邀我加盟。我一直推辞，皆因经不住他百般笑容，终于在最后一刻就了范。我说这样吧：你总揽全局，我只做具体文字工作。出了问题由你顶着。

他同意了。

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小将”一个个牛气冲天，动辄就“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而如我这般胆大妄为之徒，却偏偏出此低调窝囊之语，皆因一个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的原因：

文革一开始我一直跳得高，甚至成了轰动四川的“八一五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事件第二天还被秘密推为代表上北京告状。秘密推出的告状代表原本五人。五人之一的周家喻（本名周家瑜，文革中均被写作周家喻，本书中仍按当时写法），后来成为名满天下的八一五派代表人物；另一位叫吴庆举的，也一直担任八派主要“勤务员”。周、吴二人因滞留重庆组建“八一五战斗团”未能成行，先行出发的我、

还有重庆师专造反派“一号”唐宗明、我校业余舞蹈明星王太康，顺利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首都北京，分别于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两次受到当时中国四号人物陶铸的接见，无上光荣地进了中南海——恰恰因为那一段时间我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贵族红卫兵在京城实施“红色恐怖”的无法无天和血腥惨状，我突然彻底失却了底气。

到北京那天正好是八月十八日、所谓“红卫兵节”。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所谓红卫兵百万大军。毛在天安门城楼对敬献袖标的一位文质彬彬的女学生煞有介事地发出最高指示：“要武嘛！”从第二天起，我们去北大、去清华，就看见到处已贴满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身着旧军装，手提铜头皮带的干部子女满街里歇斯底里狂叫。我清楚记得有一天，几个红卫兵杀气腾腾地冲上公交车，抡着皮带大喊大叫，其势如杀人越货的狂魔凶汉，他们高呼：狗崽子搞阶级报复啦！狗崽子翻天啦！瞧老子抓住你！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挑出你的五脏六腑！然后满车里搜索。我记得很清楚：吼叫得最疯狂的是一个女孩，相貌娇媚可人，如果换一个时代，她完全应该成为迷倒万人的电影明星。又一天晚上，我步行回住地兵马司胡同的地质部招待所，已是深夜，身后骇然一片杂踏之声，回头看，一队中学生，一律旧军装，一律铜头皮带，怒呼口号，疯叉叉向什么地方狂跑。那一刹那我心里陡然发怵：不知哪一个家庭又会惨遭不幸，血溅静夜，尸横街衢了。

几十年后的一九八五年春天，我第一次去刚刚开放的“国家窗口”深圳公差，在人民桥小商品市场，我正选购物品，突然听见旁边摊位传过一阵清脆的、字正腔圆的京腔，蓦然回首，几位珠光宝气的贵妇，正在非常专业、甚至有些居高临下地和老板讨价还价。为首“徐娘”年已半老而风韵犹盛，年轻时一定很美的。按年龄和神态推断，当年定是盛气凌人的老红卫兵了。久久侧目，我莫名其妙将她和一九六六年八月抡着皮带冲上公共汽车那位美少女联系在一起。那一刻，我才真正发觉：那个着了魔的时代，是被彻底地颠覆了。

在北京呆了六天便匆匆返校，我断然决定“隐退”。其时，和我

一起发动八一五造反行动的吴庆举曾力邀我去总团工作，被我坚辞，依旧回文工团美术队战斗组去作起了一般成员。如此固执地激流勇退，因为我确信自己家庭



在被誉为“三步一个林青霞，五步一个张曼玉”的美女城市，文革中的重庆女孩，却都喜欢穿上丑陋的赝品军装满世界闹事。

出身十分可疑。所谓可疑，是因为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到底干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干的？我浑然不知。大学五年，每次面对各种各样的登记表我都准发愁，我搞不清楚父亲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动力”？我该是继承他“革命阶级的优秀品质”？还是该和“他的反动本性划清界限”？是该将他作为“楷模”还是视为“仇敌”？我们兄弟姐妹十一个，每人填写的家庭成分都不一样。大姐工作最早，解放之初。她填写的是：“民族资本家”，据说国旗上那四颗小星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后来参加工作的，随着阶级政策风声日紧，成分也就依次递减，有的填“工商”；接下来：“商人”；再下来：“小商”；再下：“城市贫民”。我忝居中庸，填的是倒数第二种。填是填了，心里却一直不踏实。北京“红八月”的淋淋鲜血，“黑五类”被纳粹党徒驱赶追杀犹太人一样迫害打杀的惨景让我脆弱的神经不能不对我的家、我个人的命运忧心忡忡。事实是，我在成都的老家在事后三个月果然被抄，年迈的父母被斗得死去活来。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穷经皓首，就喜欢研究这样一个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十多年的革命教育，曾让我坚信自己是未来的英雄，我将毫无疑义地去承担大任，拯救这个正在日益堕落的世界。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北京之行却让我意外地、恐惧万端地把自

己迷失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是什么人？是“狗崽子”、还是革命小将？我无所适从。刘福相邀太急，他的笑容实在让我难以拒绝，只好勉强应承，再作冯妇了。

我查阅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全部日记，认真回忆了当时每一个思维细节：在我的疯狂的宗教狂热中间，确实没有觉察到任何属于个人的欲念。这种宗教狂和年轻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很容易结合，于是就有了畸形的表现欲和献身狂。与此同时发生的，却是家庭出生先天不足带来的自卑感，让我必须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激进，同时又会在每一关键时刻裹足不前。渴望创造功勋却又忧心忡忡以求自保，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之所在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回到成都被抄得狼藉不堪的老家。空荡荡的屋里已一无所有，连地板都撬得精光，冰凉的泥地上仅扔了几捆稻草。年过七旬的父母亲蜷在杂乱的草堆中。无处藏身的饥鼠在稻草中穿来穿去。灶台被彻底夷平，爸爸妈妈只能用三块砖头围起来，像开野炊一样做饭。面对如此凄伤的场面，我记得我公然表现得十分超然。我以为我没有因他们的过失影响我而责东怪西，就非常大度了。我将重庆姐姐委托我稍回的一床旧棉被交给他们便匆匆离去。以后几天，我都到外地学生接待站过夜。我查阅了当天日记，上面只有短短一行：

家被抄了，很冷落。也没什么了不起。大革命嘛，不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怎么行呢？

理论家们总是告知我们，共产主义要培养最无私的一代新人。而在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所表露的极端自私，却让人匪夷所思。几十年后，当父母的坟头早已衰草离离，当我千里归扫，跪倒在家乡潮湿的泥土和散发着刺鼻腐臭的落叶之上，我默默祝祷老人的亡灵在远方安息，我总要痛彻诅咒自己的自私与卑贱。

除了刘福和我，编辑部还有一位张姓同学，动力系学生，原在市文联住点，眼镜儿，也和刘福一样，永远对人微笑着。动力系四年级

有位生得很体面的女生，吴秋仙，原先在《收租院》演出队帮忙，后来退出来，对我说没事情好干，也就聘来了编辑部。张、吴二人没有干多久就离开了。战报最兴旺时，编辑多达十几人，但开始就是这么拼拼凑凑起家的。

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的事。



《8·15 战报》散伙前的纪念照。笔者为后排右 1，前排右 4 为刘福，紧靠刘福身后便是最后一任主编王益富

第二章 战报创刊和“一二·四血案”

《8·15 战报》共出刊六十多期(笔者保留的合订本共收六十期,其后报纸已无收集,故不知准确数字),前后历时一年多。创刊号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

该报出版前五天,即十二月四日,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了届时全国最大规模的一场武斗血案。血案直接导致了官办保守组织的全面瓦解,同时也暗中点燃了造反派内部分裂的导火线,引爆了长达数年的、真正意义上的“内战”。刚刚在报刊编辑襁褓中牙牙学语的我,对事件的发生是猝不及防的,面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只好胡乱收集了几篇现成的发言稿、大字报,再加点按语、评论,再加上一个发刊词,加上一个稿约,这就匆匆发稿了。

血案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以刘少奇无可奈何的检讨服罪而告结束——以后,各级党委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极不情愿又不得不给运动初期因“造反”而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平反,销毁“黑材料”。一直以誓死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为宗旨的保守派组织,眼见得被他们捍卫的对象纷纷认错,自尊心遭到极大伤害,顿时陷入了万分尴尬的困境。他们有必要迅速做出姿态,表明心迹:对



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他们同样是一片耿耿赤诚。

十一月二十八日，雾都重庆飞传一张《海报》，声称一周后的十二月四日，将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议主持不知为何方神圣，落款只道是：“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

重庆的文革组织阵线很分明，造反派几乎无一例外都在自己的名号前加上“八一五”三字；官办组织也有名有姓，就四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兵”和“工人纠察队”。“思想兵”和“赤卫军”是大中学校的组织。前者为纯种“红五类”专属；“赤卫军”则为“思想兵”之外围组织，如三青团之于国民党，成员均为出身成分较差，达不到前者的入围标准者。“文艺兵”成员当然限于文艺圈。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基地，所以工人组织虽然只一个，但“纠察队”人多势众，绝对主力，最不可小觑者。以上组织俗称“保皇四军”。前述海报所称“重庆工人战斗军”——重庆百姓很快弄清楚了——其实不过是“工人纠察队”改头换面而已。“战斗军”总司令不是别人，正是“纠察队”总队长、重庆大学汽车队工人楚光辉。

几十年后，这位显赫一时的湘楚汉子垂垂老矣，谈及当年旧事，除了无奈和茫然，他似乎很不愿意再记起什么，只说那个雄心勃勃的大会一流产，他随即回老家湘潭避风许久。一九六六年秋天的楚光辉肯定是雄心勃发的。普普通通的转业军人、重庆大学的汽车班班长，文革一来就因为保卫党委而一夜暴发，当上了校革筹成员（相当于现在的校董），很快又当上了泱泱重庆拥有数十万人马的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那一年不过三十出头，年纪轻轻，他能顶得住如此诱惑吗？关于“一二·四”血案，他还能记得的是：“我们成立组织部、宣传部、安全部、交通部，还向全市各工矿企事业单位派发了十万张入场票，但还是远远不够。”“工纠”企图改头换面以摆脱困境重整旗鼓：在造反派气势如虹而保守派江河日下的局势下出此臭招，政治用意实在太明显不过。

好不容易走出困境的造反派当然不允许摇摇欲坠的“老保”东山再起。“誓师大会”消息既出，重庆造反派，还有外地、尤其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的红卫兵毫不犹豫认定：“颤抖军”的誓师大会是“黑市委及其保皇狗”策划的“大阴谋”，是“周瑜打黄盖”，是“假批判、真包庇”，是“假批判，真反扑”，是“假革命，真保皇”……必须坚决造反之。

大会造反是非常时髦的革命行为，程序盖为：纠集人员——冲击会场——抢夺话筒——发表造反声明——占领主席台，最后取而代之。此种捣乱行动的结果，轻则大会流产，重则大打出手，双方一场混战。武斗一开，接下来的必然就是：闹事者“强烈抗议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强烈要求严惩毒打革命群众的一小撮凶手”等等，接下来事情闹大。事情一闹大就正中下怀：你走资派必然进退两难、无法交代。事情闹得再大一点，让北京来说几句话就更漂亮了——要把各地局面搞乱、当权派搞垮，中央文革现在事事都得靠着造反派。娘疼的孩子不嫌闹。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在纳粹史研究专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谈到希特勒冲锋队的任务曾如此定义：“保护纳粹党举行的会议，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古往今来，社会动乱的种种政治行为，总是如此雷同。

重庆市委对大会可能导致的武力冲突忧心忡忡。一周之内，他们先后在潘家坪、小泉等地紧急召见楚光辉诸人，劝其取消大会均无果而终。接着通过党委系统的条条块块：各部、委和各区委，紧急通知所属各单位工人纠察队不要参会，同样无果而终。工人纠察队本来就是党委窜唆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御林军，现在却对主子们的苦口婆心置若罔闻了。一九六六年秋的中国实在邪了门，造反派的脾气像传染病一样弥漫于整个中国，重庆市委几个蹩脚的政治庸医焉能妙手回春？政治社会和金钱社会一样，所有活动总有一种终极推动力。后者是物质利益，前者是政治需求。政治需求对于处在社会金字塔尖的极少数人，是权力；而对于最广大的老百姓，仅仅是虚无缥缈的信仰和微不足道的荣誉。后者的英雄往往是见利忘义的“小人”，而前者的

英雄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君子”。工纠急于要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这顶不光彩的帽子，急于和造反派一样充任忠于伟大领袖的时代英雄，大会不开，岂不授人以柄？几个月来，他们绝对迷信的市委首长总是让他们招致失败和耻笑，他们还能让这帮昏庸无能的婆婆来指手画脚吗？不能了。他们下决心要自己来一回了。箭已在弦，他们不能不发。

造反派的捣乱计划紧锣密鼓进行。十二月三日上午，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专门会议，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首先，强冲主席台要求发言，揭露对方阴谋，刺激老保们脆弱的神经中枢以造成会场混乱；此举不成，立即将八一五的队伍拉至市中心解放碑另开大会，堵塞游行通道，与战斗军大会分庭抗礼。该计划很快遭到更为激进者的斥责，称该方案太“右”太“温良恭俭让”。同日下午及晚上，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立即抛出另外两套方案，除安排谁冲主席台、谁控制两侧看台、谁卡住大门外，还特别安排在主席台后边马路摆放救护车三辆以运送伤员。某头目称，就是要以血唤起山城人民的觉悟！要准备死人！要血战一场！

这些情况是几十年后从文革史家和亲历者的资料上读到的，当时我并不清楚。我正忙于报纸的出版。我亲历的情况是：十二月四日上午十时许，我从沙坪坝匆匆赶赴大会时，人山人海的大田湾体育场内已经开始人潮骚动，主席台上已经开始人推声嚷。高音喇叭将不知所云的杂乱之声肆意放大，满场一派刺耳的啸叫。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周家喻本是作为嘉宾请上台的。他一上台就抢夺话筒，强行要求发言。客人的无理自然遭到东道主阻拦，双方于是开打。

周家喻，重庆大学无线电三年级学生。精力充沛，伶牙俐齿，典型的“重庆崽儿”。一九七八年二月获“‘四人帮’在四川的代理人、帮派头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逮捕监禁。一九八二年一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判决书上都是些大得吓人的罪名：“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九十年代初

出狱，他曾给远在深圳的我寄来一封信，并夹寄彩照一张，照片上的他依旧一幅桀傲不驯模样，而且竟然和当年在重大羽毛球队当运动员时一样年轻帅气——这让我有些纳闷：莫非他在用十多年前的老照片蒙我？只是上大学那会儿是绝没彩照的，让我不能不相信照片的实时性。半年后回重庆，我特意和他在母校见了面，地点是当年重庆文革内战的主战场：松林坡。一九六七年八月，三七高炮炮弹夜夜都拽着长长的火舌飞越天空，往这山坡和坡后广阔的校园砸过来，炸起惊天动地的鸣响，在那儿重逢容易让我们想起人生的局促和岁月的沧凉。多年的铁窗生涯果然没在甫出监狱的周的脸上留下沧桑痕迹，我愈发纳闷了。他解释说：关进去了，也就没有了任何欲念，也没有任何争斗了。心静如水。“有点像进度假村”——他说。

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那场争斗，他的记忆是：“我冲上主席台，就被工纠抓走了。我围了条围巾，几个工纠就抓住我的围巾往后勒，把我拖出会场，差点拖憋了气。”

八一五领袖的无礼取闹激怒了满场“老保”，偌大体育场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八一五，暴徒！”“八一五，坏得很！”“八一五，滚出去！”

造反派要的就是这个。你一吼、一闹，我动手就有出师有名了。早已潜入会场的八一五从四面八方举出旗幡，潮水一般向主席台发起冲击。整个会场完全乱了套，如有万水争流，狂涛激荡，霍霍咆哮之声震耳欲聋。末日降临时的等待、焦虑、愤怒、恐慌、惧怕和不知所措——全世界所有得灾难性表情，都在我身边汹涌澎湃——我已进入会场，置身于混乱之中——我看清楚了，举着红旗冲在最前边的，是重庆大学体育队的亡命之徒，我一时没想起名字。

重大的亡命徒冲上主席台，等待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便狂潮一般从甬道发起冲击，混战就此开始。台上台下，通道内外，数万群众始而嘶叫谩骂；骂不解恨，就拳头；拳头不够，就旗杆、就标语牌、就鞋子、就砖头：武器五花八门，满场里哭喊喧嚣，不亦乱乎。刚入场时，打斗尚未开场，我仅被数十与会“老保”团团包围。他们见我

胸前配有“八一五”徽章，始而口诛舌伐，大骂“暴徒”“土匪”，继而砸来许多太平拳。我忙不迭抱头躲避劈头盖脑的撕打，完全不知整个会场发生了什么——正岌岌乎殆哉，击打我头部得拳头竟然莫名其妙悄然遁走了——这时我才看见主席台已被八一五的弟兄们完全占领。高音喇叭正在气急败坏地通知：“工人战斗军的同志快快撤出会场！快快撤出会场！快快撤出会场！……”出炉伊始的工人战斗军和三区八县前来助阵的“保皇”学生、老师、大人、娃娃，扔一地狼藉旗杆、旗帜、标语牌、鞋帽，山倾雪崩一般稀里哗啦败退而去——我发现自己已经自由，造反派已经占领了整个会场，并且很快把整个城市都占领了。

笔者当天的日记有如下记录：

……人们抬着伤员在街上游行。人们举着血衣在街上游行。宣传车的广播员跳上车顶，把缴来的凶器、袖章高高挑起，大喊大叫。工人们用白纸缠额，像电影上的日本示威者。白纸上写着：以血还血！手里拿着大纸板，写着：这才是真正的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他们在街上冲过去，冲过来，把工人纠察队的标语统统撕个精光！在血的教训面前，纠察队员认清了，退出了，他们把袖章摘下来，扔到宣传车上，一个北京女孩把这些袖章穿成一串，挂起来，向群众高呼：工人纠察队中要革命的同志，好样的，就站过来！

目睹这样的热闹场面，如果有人告诉你会场上死了多少多少人，你绝对不会半点怀疑。我也这样。当我怒气冲冲地从市中区步行十多公里返回沙坪坝，一路听得街传路议，“死人”已由几人迅速增至几十人！走回寝室，我悲愤难遏，邀约两三个同学，抱一捆纸、提一桶墨汁便跑出校门，把沙坪坝窄窄的街道刷满了标语，都是“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之类的诅咒，完全像杀红了眼的暴徒。

当天晚上，我们又冲上学校松林坡头，一口气把设在那儿的“工纠”总部砸了。来犯者不过十来人，而总部保卫人员数倍于敌。我们之所以砸得轻而易举，没有遭遇半点反抗——我想——大概盛怒者

的凶相一定非常可怕。既然死了人，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工纠自觉理亏，怕我们拼命，心里先软了一大截。我们砸柜子，砸桌子，砸凳子，把油印机、点心、纸张（印过的和没印过的）通通抱走，纠察队员只敢乖乖地让去一边，站门口或路边傻乎乎地发呆，嘴里可怜巴巴地小声骂：“八一五，暴徒！”“八点一刻，暴徒！”傻看着我们扬长而去。

等将“战利品”搬回到寝室，我才庆幸却又后怕：如果工人纠察队员们稍微有一点勇气，我们当晚的遭遇将不堪设想。

死了人，文章就很好做了。“血”哪“命”哪这一类汉字是极具张力的，用这些词汇炮制出来的口号，如“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之类，轻而易举便将山城重庆的仇恨煽动到了极致。事件第二天，八一五派就在事发地大田湾体育场开了一场异常隆重的追悼会。关于会场气氛，笔者当天的日记有如下记录：

我们用旗杆举着长长的挽联入场。群众对我们热烈鼓掌：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碧血溅山城，喜红岩史诗又添新页/风暴扫迷雾，看文化革命谁敢阻挡……人们自觉地从各地来到大田湾，一朵朵白花、一个个花环、一幅幅挽联，为烈士堆成了一座小山。

学生首领周家喻、还有著名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共同领衔作煽动性发言。发言称：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赤膊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钎、木棍、铁锤、铁矛（就当时社会环境而论，说使用了上述三种



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一二·四血案声讨会。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重庆“保皇”势力的迅速瓦解，同时催生了造反派内部的生死搏斗。

金属器械实在有点夸张，尤其铁锤——笔者注）、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打伤‘八一五’派二百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发言者号召大家“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第三天，即十二月七日，在同一地点又举办了陈放有五具尸体的“烈士遗体展”，前往悼念者凡数万，花圈祭品无数。市歌舞团造反派以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连夜谱写挽歌一首，题曰：《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词如下：

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
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
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
我们的好兄弟！
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
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
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
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歌词凡四段，每段都以“干什么？”开头继而“想起了你”。“干什么？”包括“唱起了语录歌”“唱起了造反歌”云云。曲调凄婉悠扬，催人泪下。那年代硬梆梆的革命歌曲大行其道，两相对比，这首煽情之歌果然大受追捧，一时间，重庆大街小巷、码头车站，到处张贴歌单，好事者高踞桌凳义务教唱，学唱者唱会一批又来一批，情切切而意深深，当今卡拉OK发烧友无法与之比肩，其势大有一夜楚歌，唱散十万雄兵之概。

保守派被气势汹汹的反击吓破了胆，一直躲在屋里不敢露面，几乎半个月以后才又开始畏畏缩缩溜出门。害怕挨揍，都是一群一党地集体活动。他们列队走来街上，先选好一块地儿，然后手拉手围成弧形实施保卫，集体颂读毛泽东语录，俨如念咒诵符一般以为掩护，接着派员入圈内张贴大字报，对造反派的夸大不实之词实施小心翼翼的

反击，其景凄惶寒碜，让人望而垂怜。即使这样，得理不让人的造反派也决不给他们半点好脸色。笔者亲见如后一幕：重大的“思想兵”正在沙坪坝正街供电局门口的墙壁上张贴大字报，一位怒气冲冲的老头不问青红皂白，粗暴撞开阅读语录的人墙，冲上前三把两爪就将还没贴完的大字报撕个精光，“思想兵”竟毫无反抗之意！小伙子小姑娘们面面相觑，好像眼前发生的羞辱与他们毫不相干，接下来又排成两行纵队，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寻找下一个张贴点。

一二·四事件确实打伤不少人。事发当天，笔者曾去医院采访过，鼻青脸肿者有之，腿瘸臂折者有之，更有甚者，不能动弹、躺在床上输液者也不乏其人。文革史家何蜀在《首开大规模武斗先例的重庆“一二·四”事件》一文披露：“仅据造反派最后一次公布的单方面统计的数字，就有 405 人（基本上是造反派一方的伤员），若加上工人纠察队一方的伤员人数，则至少会比这个数字多出一倍。”但是，说死了多少多少人，却纯系子虚乌有。那个所谓的“烈士遗体展”，很快被证明是一场骗局。五具尸体，其中四具是从火葬场强行弄去的，另一位叫李天敏的死者，则刚刚因心脏病于医院辞世，遗体草草展出后即被家属运走火化了。最可怜剩下四位假烈士，在体育场暴尸多日尚不能安宁。十二月八日再次被喜欢折腾的造反派抬进市委办公厅机要室停放，威逼市委交出“黑材料”。事情闹得过于荒唐了，以至造反派内部也开始发出歧议甚至抗议；北大南下学生不得不著文一则《为什么要进行尸展》进行辩解；辩文公示前还专请小说《红岩》的另一位作者、大作家杨益言亲自修改润色；有好好先生则认为大敌当前，大局为重，干脆把“烈士尸体展览”改为“可疑尸体展览”吧——总之，几个死人把整个重庆搅得很热闹。

真相已经不重要了。“死人”给了造反派一张克敌制胜的王牌，并且事实上已经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再讨论王牌真假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保守派确曾试图从“尸体”问题打开缺口，作最后一逞——他们惊魂甫定后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主题就一个：你们“亲爱的战友

在哪里？在火葬场！”——可惜大势已去，这种反击完全徒劳。

当王朝和保王党最终覆灭，就轮到革命党人来打得头破血流了。“一二·四事件”将市委和“保皇四军”逼下了重庆的政治舞台，接下来就该轮到造反派内部来捉对儿撕杀了。“一二·四事件”中所表现的同仇敌忾，只是造反派内部最后的蜜月。作为重庆地区第一张造反派小报主编，我非常敬业地沉湎于忙忙碌碌的事务之中。我们庆幸“一二·四事件”给了创刊伊始的小报以绝佳的题材。从十二月九日创刊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报纸共出刊七期，平均六天一期，非常准时，其中还加出了两期“增刊”、一期“画刊”。文稿标题都是杀气腾腾的“必须制裁反动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了血写的事”、“重庆黑市委是‘一二·四血案’的元凶”一类凶信，满纸豪言壮语，对保守派穷追猛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作为主编的我，根本不知道造反阵容内的两派政治势力，已经在暗地里霍霍磨刀。在匆匆付印的《8·15 战报》创刊号的第四版，我们对等刊载了周家喻和罗广斌在十二月五日追悼会上的发言全文。而仅仅不到一个月，作为两种势力的代表，二人便分道扬镳，开始了公开的、剑拔弩张的生死对决。

第三章 罗广斌其人

在当时的小报上，文章作者一般都不做个人署名，而直接标以“××战斗组”或“××编辑部”。之所以如此，一是避突出个人之嫌。当时的中国，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只能突出一个人：毛泽东；二则出了问题责任可由组织集体承担。《8·15战报》刊登“一二·五追悼会”的发言，连八一五总团的“勤务员”代表周家喻也只敢署名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代表”，而偏偏罗广斌是直书其名了，曰“《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之所以如此称谓，一是不清楚他属什么组织代表；二则因为他因写过一本小说《红岩》而名满天下，作者个人的名气实属超重量级。把他的真名实姓抬出来，可以大大加重造反派的政治砝码。

罗广斌在“一二·五追悼会”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一二·四”一个星期前，正好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陆政权易手前夕国民党制造著名“渣滓洞”大屠杀的死难日。由于《红岩》这部小说、以及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年轻人心目中印象太深，位于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一直成为了中国青年一代向往的先烈献祭的圣洁之地。“一一·二七”，成了凭悼先贤英烈的庄严忌日。罗广斌作为小说作者和大屠杀的幸存者，理当成了中国青年顶礼膜拜的英雄。

几十年后，笔者见到年逾花甲的王大宾，即当年名震天下的北京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号人物。他向我说起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一件旧事：在周恩来主持的一次会议上，王莫名其妙就小说《红岩》评价问题和中国第一夫人非常激烈地抬起杠来。这位来自于川西山区的小伙子一旦激动，连周恩来的的眼神劝阻也全然

不顾，不依不饶地向江青叫板：“如果《红岩》算不得革命小说，中国的小说就没有革命的了！”四川小子的桀骜不驯吓得公安部长谢富治一散会就把他弄去部里规劝许久，以至外间很快传出流言：王某某顶撞江青，被公安部抓了。《红岩》对中国年轻一代影响之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这个，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全国各地赴渝红卫兵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举行规模盛大的纪念大会，就尤其热烈火爆。罗广斌在会场出现，更引起了全场青年汹涌澎湃的欢呼。罗以凯旋者的身份进入体育场，并且绕场一周接受崇拜者们疯狂的敬意。那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接受红卫兵朝觐的场面。在全国只允许一个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存在的年代，罗广斌在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娃娃中煽起的偶像崇拜，实在有点离谱，难怪事后社会上立即传出微词，说罗的做法太过分了，甚至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当然不知道罗广斌自己的肚子疼。他虽然因一本《红岩》而名满天下，据说在日本诸国的青年中曾引起巨大反响，均欲一睹风采而后快，但他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恰恰因为他竟然在“渣滓洞”那场著名的大屠杀中幸存，那么，在阶级斗争“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这就很容易为该员构成让人放心不下的最大历史疑点。不是那么多革命志士都壮烈牺牲了吗？为什么你罗广斌偏偏溜掉了？肯定你经不住国民党特务的酷刑和利诱，你投降了。共产党最讲气节，对于变节者一律“杀无赦”。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戚本禹，就因为考证出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晚节不忠，武断宣称：“假投降就是真投降”，马上就一路窜红，被钦点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相当于如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南开大学几个学生在几十年前的故纸堆中偶然发



罗广斌遗像

现了六十一位共产党人的“自首书”，马上被中央文革高度首肯，成了驰名遐迩的“揪叛徒”专业户。罗广斌在他自己小说里创造的艺术形象甫志高，和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王连举一样，成了全中国妇孺皆知的反面典型，只配让双枪老太婆之流“代表党，代表人民”一枪崩掉。顺理成章，只需给刘少奇戴一顶“叛徒”的帽子，要让全中国人民恨之入骨并“永远开除出党”就轻而易举了。那岁月要收拾一个异教徒实在太简单。不管多大名气，都不可能成为你继续存在的理由。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搞掉的重量级人物够多了吧？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搞掉的也没一个是小不点儿！罗广斌一介书生，不过出了一本小说书罢了，算老几？该查的问题，查！该写的交代，写！一九六三年，罗的名气如日中天，共青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全国青联访日代表，被“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一句话便轻易否决。一九六四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安排罗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又遭同样原因否决。后，日共邀请罗渡海东访，再次被有关方面婉拒，罗终未能越雷池半步。广阔社会的显赫名声和局部环境的重重质疑、不信任和压抑结合得如此完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偏居西南一隅的大作家，就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之中。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猜测，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泰山巨石一样压得罗广斌喘不过气的重庆市委大人物突然间被称为“八一五”的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

他确实和重庆大学八一五的负责人秘密见过面。这位负责人叫黄顺义。电机系四年级学生。外号人称“老黄牛”。为人耿介，做事勤恳，仗义执言而从不转弯抹角。黄的性格注定他只能在社会舞台充任本色演员。面对更多需要谋略甚至需要阴谋诡计的政治斗争，他的表现常常那么激情有余却又幼稚无知。他出身血统工人，“三代红”，文革一开始就被市委工作组钦点为校文革成员，可天然的正义感却使他很快倒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造反派，并被群众推举为了八一五总团“勤务员”。

罗是通过在文联驻点的重大同学为中介和黄见面的，接头地点是两路口至菜园坝半山坡上那柱苔痕斑驳的纪念碑前面。时年四十一岁的大作家很有节制地对黄表示了他对八一五的支持，同时躲躲闪闪地向年少无知的大学生谈到了市委内部若干恩怨是非。“老黄牛”非常认真地在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通报了这次秘密会见，最后的结论，定然是冒着风险向学生崽儿表忠心的大作家始料不及的：

“听说罗广斌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重大的孩子们对党的感情太深。工科生慎密的逻辑思维让他们把抽象的“党”和具体的重庆市委区分得清清楚楚。八月十五日重庆大学学生造反炮轰市委，直接的导火线，就是校长郑思群被市委工作组以莫须有罪名无端加害，最后至于含冤自尽。

郑思群，广东潮汕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中共，曾任著名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秘书，抗战期间在延安任“抗大”某分校教务长，解放后则一直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行政七级，算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了。他不苟言笑，身材瘦而且高，爬满额头的皱纹记录着令年轻人羡慕不已的光荣历史，一典型老革命家的形象。问题在于，这位身居高位的老人对自己的学生恰恰非常平易，嘘寒问暖，和老父亲一样和蔼可亲。这就给大学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正宗的共产党就应该是这样的形象，而不该像市委工作组那样横不讲理，以势压人。

六月份工作组点名批郑，七月份紧接将郑隔离松林坡进行内部批斗——时值山城酷暑，路面焦烫灼人，同学目睹老头乱发覆额，被人押解赤足而行——消息传来，全校学生尽皆愤慨，敢怒而不敢言。更糟糕的是：就在毛泽东下令撤消工作组的第八天，即八月二日凌晨，郑在监护地用半片剃须刀割喉自尽，颈动脉血喷如注，将雪白的墙壁涂染得鲜红狼藉。事发，工作组草草验尸、清洗现场并火化，重庆市



重大校长郑思群

委立即宣布该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将其开除党籍……一连串的事变让工科学生确信：如此胡作非为的重庆市委绝对不能代表共产党！而且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留下了太多让人疑虑重重的蛛丝马迹，其中定然暗藏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阴谋，大学生们甚至不排除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凶杀案。年轻人一腔浩然之气喷泻而出，如水之决堤、火之燎原，愈演愈烈，最终闹出了一个“八一五”造反派。

重庆大学的学生们不愿意让不干不净的罗广斌掺合进来玷污“八一五”对共产党最纯正的忠诚。

工科学生们只懂得如何将机械的旋转运动变成往复运动，只善于用计算尺计算节点电流和环路电压，对于著名作家这个品牌、以及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干部的政治含金量，他们一无所知。重大八一五娃娃们的冷漠显然让罗广斌非常失望。文科学生就不一样了。充沛的激情和多愁善感使他们和罗广斌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更何况他们毕其一生的梦想，就是作一位像罗这样的名人呢！于是罗广斌顺理成章地受到重庆另一个有实力的造反派组织：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的青睐。该院中文系教师、后来被视为罗广斌“反革命同伙”的杨向东，这样回忆了两者的政治初恋：“杨益言（小说《红岩》的另一位作者）派人到人民小学……邀我去市文联会晤。很快杨请我牵线，与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见了面，从此西师造反派与罗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其时，西师八三一和首都三司等组织的驻渝联络站已结成联盟，后者的通天手眼和全国性工作网络，必然使罗的政治胆量和社会欲望迅速膨胀，从而有了“一一·二七”纪念会上那场招来非议的检阅表演。

当时流行一种说法：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事实远非如此。所有期待改变命运的人，都把革命当成了自己的盛大节日。罗广斌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六六年的秋天他确实很愉快。“一一·二七”纪念大会刚刚过去七天，“一二·四血案”又为他的政治记分薄狠狠进账一分。

在“一二·四血案”第二天举行的大会上，造反派真诚地让罗广斌

出了一把风头。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大作家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界混迹多年，敏锐的嗅觉让他很快发现一张绝好的政治王牌：死人。他对人说：“牺牲十四个人，这是重庆学运以来都没有过的，国民党时期都没有过的。”这张王牌一出，重庆市委必死无疑，罗本人的地位将再也无可置疑。他跃跃欲试。对于重庆大学学生领袖们的无知和麻木，他已经显得有些不耐烦。在十二月五日那个同仇敌忾的主席台上，他便迫不及待地提议搞“抬尸游行”，并介绍说火葬场现成就有十四具尸体可用。重大八一五坚持认为事情未调查清楚，这样做不合适的，将他的动议断然否决了。

这样就出现了让情绪激动的与会群众十分费解的蹊跷事。事前通知，十二月五日大会八点钟开会，群众从四方八方连夜赶来，可大会就是迟迟不开，从八点推到八点半，又推到九点，又推到九点半、到十点：实在不能再拖了，主席台这才宣布说烈士遗体暂时未运来，会就先开吧。大会的第一个议程是全体人员对着主席台方向低头，为死难烈士默哀。与会者注意到了：默哀前特别让人把主席台上那幅硕大无朋的毛泽东画像移开到了一边去。

罗广斌那么固执地要打烈士牌，有两种解释，一是作家的职业习惯，丰富的想象力很容易让他把幻觉变成连自己都坚信不移的事实；二，从政客的角度考虑，他急需一件尽快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他确信现在唾手可得的法宝不是别的，就是亦真亦幻的死尸。罗广斌非常清楚，只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政敌打翻在地，即便手中武器真是谎言你也毫无办法。反正历史总是胜利者在书写……总之，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罗广斌是不愿坐失良机了。政治场和生意场一回事，机会总是稍纵即逝。一二·五大会当晚，他马上召集北大南下学生等在市文联开会，宣布早上的大会没把尸体抢出来游行，定然是“右”了。当夜他便赶去火葬场现场查勘，以防“黑市委”“毁尸灭迹”。接着通知工人造反军、二七战斗团等接管火葬场，停止火化尸体。次日，罗再次到火葬场视查，再次提出要抬尸游行而不要死守尸体。接着又到一个刚刚组建的所谓“八一五联合指挥部”，强调马上抬尸游行，并接着

把尸体抬去市委、搞尸展、要求市委建烈士纪念碑……

一切安排就绪，十二月九日，胜券在握的罗参加由外地赴渝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他一人独掏腰包为十多个控告团成员购买了全部车票。同月十七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由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起，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要员全体出席，大会规格之高可想而知。罗广斌作为发言代表中唯一的外地代表登台控诉重庆市委制造“一二·四血案”。得以面对如此众多顶级高官一趁口舌之能，罗广斌可谓备享殊荣了。据《首都红卫兵报》报道：“重庆代表”在长达四十分钟的发言中，“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一二·四’血案的滔天罪行”，并称此次血案有革命群众被打死。他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这个“重庆代表”，就是罗广斌。在激动人心的会场上，罗颤巍巍地将“控告”材料通过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庄严呈送周恩来、江青。

正当罗像一颗政治明星在北京的天空冉冉上升，重庆八一五对于对内部悄然出现的反对派活动已经有些不耐烦。当时，除了那个“赴京控告团”到处抢镜头，更有一个前面提到的、名叫“八一五联合指挥部”的组织正式挂牌运作。“指挥部”成立伊始便开始狂批重大八一五“右”了、“修”了。组织者的意图实在太明显不过，就是要用它取代由重大八一五在造反派组织中事实上的主导地位。重大当然不高兴。某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松林坡礼堂召开全团辩论大会，快结束了，教工领袖赵云生突然站起来，将一只手指高高举起，像举一面旗帜，直指天空，说：“我说一个问题！我就说一个问题！”赵老师身材干瘦，永远穿一件黑色的灯芯绒。小胡子。精力极端充沛。他的每句话都斩钉截铁，让人感到极具份量。他说，关于“八一五联合指挥部”，我们的意见是：

“框烂！”

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动辄就“砸烂”这个，“砸烂”那个，堂堂大学老师公然糊涂如斯，把司空见惯的“砸”念成了“框”，顿时惹得满堂大笑。赵不知出了什么事了，把高举的手指头又挥了挥，再次重复：“对！就是要框烂！”

其实同学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联合指挥部”是什么的。只是听说后来确实被砸烂了。罗广斌也肯定是知道的，只是他远在北京——造反派内部的争斗和罗的厄运，注定延期了。

一九六七年新年即至。新年前五天，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救世主耶稣诞降次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七十三岁华诞。生日那天，他对前来中南海朝贺的中央文革秀才们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话：“祝贺全国全面内战！”这句偶然流露的“最高指示”顿时把摸头不着脑的秀才们吓了一跳。全中国八亿革命群众，更是几十年后在叶永烈的纪实文章里才读到该条圣喻，当时谁曾听闻呢？我们只管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除了继续揭露重庆市委和保守派制造“一二·四血案”之外，战斗团开始忙着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开赴工厂、农村、专县，去“向工农兵学习”。这段时间《8·15 战报》发表的文章多属这一类，如：“《为人民服务》学习辅导材料”、“《纪念白求恩》学习辅导材料”、“《愚公移山》学习辅导材料”、“学习‘老三篇’，狠触灵魂”、“对目前重庆工人运动的几点参考意见”、“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榜样”、“像红岩八三一那样抓革命促生产”、“红岩机器厂提前七天跨进一九六七年”、“关于重庆红岩机器厂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二封信”，等等。

这些题目已经没有什么少火药味了。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把关于重庆红岩机器厂的第二个调查报告“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新事物”完成，接着发排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出版的稿件，写完元旦献词：“而今迈步从头越”，就近岁末了。除夕夜，“风雨操场”举行演出。风雨操场就在印刷厂前面，跨出院门就到了。舞台上全是些张牙舞爪的红卫兵舞蹈，再加一些毛的语录歌，觉得无甚意思，又回厂赶印贺年片。

贺年片上同样是红卫兵，同样张牙舞爪，作“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状。如果说晚会给我有什么印象，那就是：校业余体育队（而不是文工团）那位身材高挑的摩托车手陈淑月，她表演的独唱“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扮相、嗓音、动作都出人意表的美丽动人。但是后来她疯了。

第四章 话说工人造反

仔细浏览从创刊到全市夺权之间的几期《8·15 战报》，很容易发现，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内容就是：“红岩机器厂八三一”造反派如何如何、通过他们的行动，真正的工人造反派应当如何如何，等等。

要说清红岩八三一，必须从重庆的工人造反风潮说起。

重庆大学的社会造反口号一开始就是“杀出校门，走向社会”，具体做法就是到各区、各县驻点办联络站，和当地中学娃娃一起表演造反舞、开演讲会、搞辩论、印发传单……如此等等。少男少女们在一起，没老师、家长管束，爱怎么造反就怎么造反，很是快活的。谈情说爱之类的风流快事当然有，但是很少，珠胎暗结更没有听说过。笔者所在的电机五年级三班同学在重庆南岸三十九中驻点，一次放电影，有位仁兄忽然春情难抑，憋不住动起手来，摸了该中学一“女战友”大腿。该女生颇具理性，没当场惊诧呼救，而在电影散场之后才投诉于我班战斗组长黎某。黎某性格善良平和，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从事政治活动与钻研电路原理同样一丝不苟。这一回他怒不可遏了，立即组织全班同学群起而批之。先是颂读毛语录几页几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某条某款：“不准调戏妇女”，接着就定性了。结论：为正八一五战斗队法纪，将此一念之差的登徒子断然清洗出团。春心初萌的可怜虫无地自容了。从此后至毕业分配，再也无人与之搭理，只能孤魂野鬼般四处游荡。两年后毕业分配，全班同学一致决定将他发配边疆，他半个“不”字也不敢哼。

那年月年轻人都以为自己从事的事业是属于未来的，属于未来的事业都是很神圣的，它需要献身、禁欲和死亡，而不是尘世的欢乐。亚里斯多德评价柏拉图《理想国》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共产制度将人民投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密切联系之中；它使阴私或个性没有容留之地；它假设人人都具有只有少数圣人才具有的耐心和合作的美德。文革那

会儿，年轻人都以为自己是圣人——这是另一个话题。

下面继续说工人运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后，重庆市委马上诚惶诚恐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北京意图进行贯彻，情愿或者不情愿地认真检讨前一阶段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开始被“平反”，整理、搜集的“黑材料”开始被清退或销毁。这一回，聪明智慧的国人算是搞清楚了：伟大领袖显然不准备老计新用：什么“引蛇出洞”、什么“阳谋”、什么“乱了敌人，锻炼自己”，他统统不用了。副统帅林彪不是说过吗，毛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他的招数多得很。

静观、徘徊了好几个月的“工人阶级”终于蠢蠢欲动。

笔者查阅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写的一篇文章《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新任务》。在“伟大的转折”小标题下，对当时的形势有如下描述：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了真理，明白了真相，于是便起来革命、起来造反了！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成立了！红工八一五战斗团成立了！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军成立了！居民八一五战斗团、供电 830、红岩 831 战斗团、重纺八一五战斗团……都在革命的喊杀声中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这是一支顶天立地的队伍！他们一登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就以无产阶级特有的高度民主觉悟、政治远见和坚强斗志表现了无穷的力量。所有这一切，标志着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转向了新阶段，这就是，由八一五所掀起的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向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上面提到这篇文章是笔者根据总团“勤务员”吴庆举授意写成的。在此之前，吴曾亲自操笔写过同样意思的文章以指导运动，题目是：《杀出校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只是意犹未尽，文本欠煽动性，要我根据他的立意再写一篇，其后故有斯文。这儿说写文章“指导运

动”，并非像政府机关那样将文章印成“红头文件”下发。造反派不需要“红头文件”。除了毛泽东以及其所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极少数寡头，泱泱中华当时已没有任何权威。红卫兵娃娃连国家主席都想怎么羞辱就怎么羞辱，遑论区区总团“勤务员”？重庆大学八一五这样的群众组织，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召开全体队员的辩论大会以作出决定。

重庆大学八一五这种辩论大会一般都在风雨操场或者松林坡礼堂召开。松林坡礼堂比较古旧仄逼，常常无法承受辩论会上乱哄哄的呐喊、诅咒、谩骂、喧哗与愤怒，于是大会常在风雨操场举行。风雨操场位于一个半圆形的山凹，酷似颓圮的古罗马斗兽场。宽广的空间足够让所有角色来肆意表演和发布预言：无论英雄和懦夫、天真烂漫的乌托邦主义者和思维慎密的现实主义者、急于出鞘的行动和正在酝酿的谋略……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舞台，任何人都能在这种集会上一瞬间成为政治天才、智者和辩手。可是，只要你有一句话不对众人胃口，满场嘘声也会马上将你哄下台。吴庆举虽为八一五主要发起人，贵为造反元老，因为口舌不利索，也照样曾被灰溜溜地哄下台。

吴庆举，四川遂宁人。从小穷乡野地长大，自然不似华街闹市长大的学生（如周家喻）那般伶牙俐齿，却比城里孩子多了许多务实、坚韧和老成持重，另外，还相信宿命。他曾一点不带笑容地向我说起唯一的一次算命经历：出发来重庆上大学前夕，母亲曾让他前去拜别父墓。同行的乡里“半仙”惊诧地发现圆形墓茔及两旁葳蕤的柏树酷似一顶乌纱帽，遂非常明确地向他示意将来封侯拜相的美好愿景——这个细节是若干年后他告诉我的。当时他没来得及说。当时我们交谈的主题和交换的信息，都是关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还有重庆大学校园内勃然肇起的革命风潮。我俩多年邻室而居。吴在文工团乐队当队长，我在美术队当队长。“五十天白色恐怖”时期我俩同被工作组内定为“右派学生”。共同的遭遇让我们是成莫逆。那段时间我俩的见面常常安排在熄灯以后。同学们酣然如梦，二人便鬼鬼祟祟来到走廊上，或者宿舍外的地坝，有时甚至在厕所。我们一本正经佯装大便，

然后蹲在熏天臭气中庄重地讨论党、国家、学校和自己的命运。我一贯理想主义，满脑子的革命狂热，吴的务实和精明便让我尤感钦佩。还有很要命的一点：他出身贫农，根正苗红，一出娘胎就具备了脱颖而出的优越条件，不似我身份可疑，事事都得瞻前顾后——关于这个，我在下面还有记述。

还说十月中央工作会后，重庆地区保守组织处境日蹙，加之工人造反风潮日盛一日，保守派更显出兵败山倒的颓势来。各地办点的同学们觉得无事可干，开始不耐烦，对总团过于刻板正统的管理模式开始提出质疑，甚至斥责八一五总团成了“新的工作组”，主张“八一五必须大乱！”，扬言重庆文革要深入，首先“必须砸烂八一五总团！”云云。作为总团“勤务员”的吴庆举是有足够耐心的。此人的特点就是成天忧心忡忡，一付城府很深的模样。恭维他的人说他“小诸葛”；小视他的人则讥他“多谋不善断”……不论褒贬，反正大学期间他便一头“少年白”：就凭这个，你就得对他的鬼点子服气。造反派内部已然出现上面那些混乱认识，吴就大会小会宣传他的“工人运动好得很！”，宣传他的“走一二九道路”，宣传他的“杀出校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全民狂热、惶惶不可终日的迷乱年代，一个有蛊惑力的提法，一个动人的口号往往就是一面旗帜，足以将无数人召来麾下冲锋陷阵，甚至从容赴死。吴的这一提法真灵，很快获得了闷在校园、闲得难受的大学生的共识。

“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这一命题毛泽东早已教导多年，对一代青年学生，可说是刻骨铭心，已然固化成一种潜意识、甚至本能。文革前夕，笔者曾去达县，即著名画家罗中立悉心描绘过的川北山区，参加了七个月的农村“四清”。在异常贫苦艰难环境里生存的世代山民，他们所表现的坚韧、朴直和厚道，确实让人感动有加。同时，作为穷乡野地的小生产者，他们的狭隘、偏见乃至于让人深感可笑的自私，亦让人记忆尤深。但我们当时却不愿意想这些，即使看到了，想到了，也必然立马自警刹车：这是知识分子的偏见作祟！毛主席教导我们：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还是“比知识分子干净

得多”。文革之初，毛确曾热情洋溢地鼓动红卫兵造反，可此后不过两年，随即怒气冲冲将工、军宣队开进大学去教训不听招呼的娃娃兵了，还降旨“无产阶级金棍子”姚文元著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知识分子及“那些患了近视症但还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称，一起加以“奉劝”：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全体蒙冤，当了整整十多年的“臭老九”。毛非常清楚知识和精神的力量是十分可怕的。读书人一旦较起劲来，坐牢、杀头、满门抄斩，甚至诛灭十族都面不改色。毛不能让你翘尾巴。大学的党史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反复讲过延安整风，讲过知识分子要“当众脱裤子，忍痛割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在毛的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尚未进化完全的脊椎动物，必须随时随地让工匠或者农妇进行圈养驯化。重庆无线电三厂一个叫黄仲勤的女工，派到重庆大学当工宣队员，天天把教授、学者召集起来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那年她刚满十六岁。几十年后，我在深圳一间公司作总经理，将她聘来作出纳员。说起当年她到重庆大学当工宣队员的尴尬往事，她一直十分汗颜。

一九六六年的吴庆举绝对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八一五的所有同学也绝对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一听说要“和工农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大家二话不说，背起书包就出发：下厂去、下乡去、下专县去——只是这回的情况有点见诡异：如今的大学生和原来不同了，毛泽东已经把他们宠坏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傻乎乎的、只能任人教训的“没头脑”，他们已经见了大世面、经了大风雨，已经是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的革命闯将。凭着几个月的“革命经验”，他们发现这些开始造反的所谓“工人”，尤其某些响当当的“工人领袖”，其实并非毛告知的那样“最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恰恰相反，保守派骂他们“社会渣滓”、“牛鬼蛇神”、“三教九流”，还真有点那个意思。问题很简单，劳动模范、先进份子、共产党员……这些人呆在厂里好吃好在，备享尊荣，他干吗造反？想造反的，全是那些受过或者正在受压制、冤枉或者正在被冤枉、平时吊儿郎当、经常被领导数落的主儿，按十多年根深蒂固的观点看来，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我四姐夫就是重庆最先的工人造反派，按当时的说法，他对社会从来就有“不满倾向”。姐夫出身于重庆一个银行世家，大约家境优裕，因此性格洒脱不羁，火爆任性。重庆刚一解放，他立马投考“革大”，草草训练数周，便派赴川西藏区“开辟”工作。出发前回银行告别，他一身皱巴巴的“列宁装”让昔日的同事们惊羡不置：哟！没想到你老余原来是个地下党呀！我姐夫姓余。重庆南岸海棠溪，就数他们家族最大。

他满怀豪情去了。到了雪山深处一个叫杂谷垴的蛮荒野地当了一名小小的财会人员。姐姐告诉我，说雪山中那个镇子不过十来户人家，买米打油需要骑马向山外跑整整两天！其地荒远可想而知。不久就开始“三反”了。共产党的中央集权政府效率很高的，北京一个喷嚏，杂谷垴这样的地方也免不了感冒。“三反”有一反是“反贪污”。山窝子加上我姐姐这样的小学教员，吃官饭的不过就十来号人。去哪儿找清洗对象？绝顶聪明的小镇领导左思右想：小旮旯不有个姓余的小子成天和钱打交道吗？这家伙自以为来自重庆大码头，孤高自傲，有一回领导去信用社找他借用电话他也公然断然拒绝。他不贪污谁贪污？于是抓起来。于是开会斗争。你小子不承认啊？好办。捆起来：打！打不服？行，跪玻璃渣！跪你个双膝血淋淋。还不承认？好咧，吊起来，吊你个七窍断生气！那时候姐夫十八九岁，年轻气盛，可毕竟肉身凡胎，实在受不了，只好认账：我贪了。贪了多少？胡乱报个数字。数字达不到领导期望值，于是又打、又跪，又吊。只好自我加码，一直加到领导满意为止。又问：你贪的钱放哪儿了？能放哪儿呢？他的行李就一口箱子，早翻来覆去抄过许多遍。那时候，由杂谷垴到重庆远如极地探险，巨额贪污款想送回老家都不可能。他只好说：都送土匪了。行，有来龙，有去脉，证据链清楚，案犯供认不讳：运动于是胜利结束。姐夫被投进了大牢。他不是说钱都送土匪了吗？就把他和土匪关一起吧。小伙子是大都会来的白领呢，被查抄的皮箱里，傻乎乎地还装进好几套平时舍不得穿的西装和舍不得系的领带呢。他压根儿不知道在这儿是不需要穿西装系领带的，更不知道他如此向往的新

社会还需要让他和土匪一道领略雪山深处的铁窗风景。十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还心有余悸。他对我说，那些土匪真可怕呀！一个个斜眉愣眼，满脸横肉，原来只是在美国西部电影见过！关了半年，查无实据，落实政策——我党是很喜欢落实政策的——于是，放了。于是发回原籍，到重庆南岸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煤窑：涂山煤矿当了矿工。原本在重庆银行写字楼过得悠闲自在的小白领，现在绕一大圈回来，只能天天提一盏矿灯下井，黑不溜秋的，过着人称“埋了还没死”的日子。又过了二十年，“四人帮”终于倒台，改革开放了，他接到一纸通知：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县政府寄来的。感谢党，好歹算是寄来了。政府告诉他，说解放初那一回是搞错了，特此平反，并补发损失费200元。那一年，姐夫已两鬓花发，年逾半百。他用那200元钱去买了一把当时特时髦的“鸿运电扇”。他对我说：看！你姐夫一辈子，就值得这一把电扇呢。

文革开始时他还不老，但生活早把它折磨得万念俱灰。夫妻分居，他只能常年住煤矿集体宿舍。那不叫宿舍，是上百人群居的大窝棚。上大学时，隔几个星期我总会去南岸看看他，而他总是沉默寡言，从井下省一个大号加班馒头让我吃，然后把我带到乱七八糟的铺位间绕去绕来，拣一个干净点的地方让我囫囵过夜。那时候有部阶级教育片叫《燎原》，描写旧社会安源矿工日子如何之凄惨。每次恶卧涂山煤矿肮脏杂乱的集体宿舍，我都会想起电影里的布景。文化革命真够伟大的，不过短短数月，公然把我姐夫这样的人也鼓动起来了，成了最早的造反派。

我们家族中还有一位工人造反派，我的表哥。他是舅舅的儿子。两房单传，从小受到的溺爱无以复加。小学时我曾和他同班，娃娃中间，他不待说是称王称霸的，闯了祸，反正有爹妈给他赔礼摆平。有时我去外婆家找他玩，稍有不悦，他向大人告一状，结果总是舅母不问青红皂白将我训斥一通，继而“金生长、金生短”地将宝贝小子诳慰不止。“金生”是表兄的小名。如此任性娇惯的孩子学习成绩自然好不起来，和我同班一期便理所当然留级下去，而且后来还继续留，

留得不能再留了，只好参加工作。先在砖瓦厂和泥巴，后又去建筑队当小工。文革来了，好得很！“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他没上九重，却当了个很实惠的小头头，腰杆上还别一柄盒子炮，神气十足。有一次我和他偶尔相遇——他属于我的对立派“八二六”——只是他全不像当时很多革命同志那样“亲不亲，阶级分”，为一个政治观点，一家人反目成仇。他根本不和我探讨政治问题。他对政治问题毫无兴趣。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说那位原本耀武扬威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如今见了他变得如何之毕恭毕敬低三下四；他还告诉我说，某次，他神气活现带着队伍去“端”某街道据点，仗刚打响，突然发现对方也有真家伙：他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跑。

家族中所有工人当中，只有成都的五姐夫是唯一的先知先觉。他是驾驶员，一辈子江湖上走南闯北，见识广，在全中国人民都被搞得如痴如狂的一九六六年秋天，他公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红卫兵跳什么跳？全给人家当官的垫背。不信走着瞧，运动完了，鸡还是鸡，凤还是凤。五姐夫的自信和固执简直让我瞠目结舌。

下面还是说在涂山煤矿当矿工的四姐夫。

十二月某天，他突然来到报社找我，我在重庆上大学五年，这是他第一次来重大。他告诉我说他们造反了，要成立战斗队。工友们知道他的妻弟在重大，还是战报编辑，特地要他来邀请我前去参会。听到这消息，我当时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四姐夫不是坏人，但理论上却属于社会另类。我担心他的造反对于他，对于我，甚至对于整个八一五，都不是好事。但我不能把这些都说出来。见我嗯嗯难决，四姐夫又讨好地怂恿说：不要紧的，你只要去主席台坐一坐就行了，什么话都不要你说。只要坐在那儿，保皇派一见“重大八一五”，心里就发怵。我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让另一个同学——就是“八一五事件”第二天和我一同秘密北京告状的舞蹈队员王泰康代劳，跟我姐夫去了——开会回来，王对我说，你姐夫：亚克西（行）！

王不知道，两年后，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十二级台风”里，我姐夫又被作为“牛鬼蛇神翻天”的典型被揪出来，游了街，再关进

煤矿私设的监狱里，一关又是好几年，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平反”。

这只是发生在我小小家族里的故事，社会上工人造反者状况的形形色色有多精彩可想而知了。对于在类似修道院环境长大的大学生来说，这些蜂拥而至的社会风景便显得那么陌生而猝不及防。他们理论上可以接受所谓“工人阶级伟大”、“工人运动好得很”的结论，但面对千奇百怪的个案，他们只能不知所措。就在上面两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十二月二十一日，《8·15 战报》便急不可待地出版特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关于重庆工人运动的几点参考意见》。该文是笔者所写，但其中观点并非报社自作主张，同样是在全团大会一片呐喊和嚎叫中通过的，代表了同学们共同的忡忡忧心。文章煞有介事提出什么“必须纯洁组织”，“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钻入我们的阵营把我们从内部冲跨”，提出什么“司令部要革命化”；提出什么“应该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设备”，文章甚至还书生气十足地搬出了政治辅导员曾经的危言聳听训示：“现在，我们应当看到国家还不富裕，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受苦，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做牛马的时代，千万不要忘记世界上的阶级兄弟，一定不要贪图享受，要把世界革命的大旗扛下去，要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走到底。”这些喋喋不休的说教，不仅现在看来，就是在当时也显得太过天真。难怪人家要骂重大八一五“右”了，成了“变相的工作组”了。客观地说，学生们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他们是真诚的。

面对这种局势，作为领头羊的重大八一五，当然急于要按图索骥，寻找工人阶级造反派的先进典型了。这个典型必须由真正的大工厂产业工人组成，要有很多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所有成员必须历史清白……总之，他们必须完全符合毛泽东所制定的无产阶级的技术标准，一如当今日界的 ISO9000、ISO9001 之类。这样，他们找到了红岩机器厂。

第五章 关于红岩机器厂

重庆红岩机器厂是六十年代搞“大三线”时新建的内迁厂，位于远离市区的北碚歇马场。生产船用柴油机。工厂人员由两个地方迁来：一部分来自无锡某厂，另一部分来自洛阳某厂，两个派系的工人由此组成一个“双民族”社会，两个派系的代表亦相应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中国人的家乡观念是很要命的，古代启蒙读物《增广贤文》有云：“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之谓也。如果说老百姓为生活计，从五湖四海走一起来了，只用磨合磨合，最终并不难彼此融汇。麻烦是当官的，权力所诱，两帮人却很难尿进一把壶。退一步说，如果上级协调得当，问题也不难解决，反正大家都姓“共”嘛。问题恰恰在于，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偏偏把屁股坐歪了，坐到了洛阳派一边，事情就越搅越麻烦了。时间是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市委工作组本是来搞所谓工厂“四清”的。厂里还没“清”，市里的文革运动已闹得风生水响。心里憋了一肚子气没处发泄的无锡帮眼见得满重庆已洪水滔天，学生娃娃又提供了现成样板，他们焉能不闹？

这样，八三一事件作为重庆最早的群体工人闹事，便发生了。

关于这一事件，《8·15 战报》是这样描述的：

由于工作队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了群众革命热情……几个月来，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八月十五日发生的“八一五事件”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

在这种情况下，市委下禁令、封消息……忠实执行市委反动路线的红岩工作队更是把该厂封锁得铁桶一般！

工人们迫切要求关心国家大事，纷纷要求到市里看大字报。在他们和工作队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斗争之后，终于在八月三十一日，1000多人一起到市里来了……在市里，他们与总工会的一小撮保皇分子做

了两天两夜顽强的斗争，并于九月一日胜利返厂了。这就是轰动山城的八三一事件。

和当时发生的所有故事一样，“市委工作队”“急急忙忙在厂里拼凑了一个‘无产阶级红卫兵’（后改编成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利用围攻、斗争、盯梢、调职等手法，对‘八三一’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和其他工厂发生的故事不一样的是，在造反派连连得手之时，市委支持的一派工人干脆撂摊子，拍屁股走人了。“工人纠察队在离厂的时候，把厂里的生产工具、保管室钥匙、技术资料等都统统拿走了，给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比如：……车辆被全部开走了……变电所走了四分之三，锅炉房有一个中班走光了，水泵站人也走光，阀门也给锁上了。总机、机要室、武装部的护厂民兵等差不多走光，公章、公函、采购证等也统统锁上或带走……食堂炊事员走了 40%……托儿所的炊事员走光……”

那年头发生的故事都是造反派快快活活地满世界捣乱而保守派忍辱负重呆在家里搞生产，红岩机器厂恰恰反过来。保守派心安理得出去上访串联，而把双倍的生产任务留下来让无锡帮的造反派们慢慢享用。“八三一造反派”们确实蛮争气，他们不但把生产坚持下来，而且还干得不错，据《8·15 战报》载，“提前七天跨进一九六七年”。

继续大段摘引关于造反派弟兄“抓革命促生产”的事迹显然太乏味。当年的虚妄与偏见早已冷却，被时间的泥土深埋为一堆化石，那么现在，当我们重新扒开那些空泛、华丽的政治外壳，该怎样解释他们让人感动的劳动激情呢？

群体的荣誉感。

我以为，这种群体荣誉感，实际上就是常言所说的爱国主义、民族情结这一类概念的微缩版。这是一种超越了物质和功利的心理现象。当经济的发展让千差万别的民族文化走向全球性的沟通与融合，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中国阶级斗争却让本已相当狭隘的国粹文化变得愈益狭隘和畸形。这种文化一旦直接地投影到社会群体，其中每一个体

生命的实际利益都将遭遇幸运或者灾难。只要被定义为对“革命”不顺从，对毛泽东“不忠”，胜利的一方就可以像掐一只虱子一样，名正言顺地将你掐死。为了战胜洛阳来的对手，无锡人必须表现得非常革命。

根据笔者的日记，我曾前后两次到红岩厂调查。第一次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日记有如下一行：“到红岩机器厂作了两天多的工厂调查，受益不小，写了关于该厂抓革命促生产的调查报告一份，拟送中央文革”“送中央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不清楚，只记得吴庆举让我去，我就去了。造反派都喜欢把自己的事情说得非常神圣，有点像生意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广告做得响亮，喜欢炫耀自己有某跨国集团背景一样。吴作为总团“勤务员”尤其如此。大学毕业后



造反派工人夺权后，在《山城战报》记者指导下摆拍的学毛选场景。

一九七三年，他不知为什么突然受到市委领导青睐，派去南桐矿区当一个“工作组”的负责人。他从矿区兴冲冲地写信告诉我，说他正在读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谈到当年列宁在维堡区从事工运，列宁夫人说：正是那段经历，“使依里奇成长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足见吴庆举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想象得有多神圣。

我只是个事务主义者，不管当时或者现在，我都料定八一五总团没本事和中央文革搭上热线，让这样的破文章也能直达天听。作为小报文章宣传宣传当然不成问题，反正印刷厂就在自己手上，于是毛泽东生日那天，我们将文章发在了《8·15 战报》第三期，题曰：“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榜样”。本文前面那些表述就摘自该文。

第二次去红岩厂就在第一篇文章发表当天。那天的日记也是一行：“我和吴庆举到红岩厂去了，中央要求我们再写一个红岩厂的调查报

告”次日，二十七日的日记也是一行：“把第二个调查报告完成了，题目是：《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新事物》，由红岩厂的五名代表带上北京去了。”这里的“中央”绝对又属于虚乌有。如果说沾一点谱，估计让我们写这篇文章是新华社重庆记者站某人出的招，因为后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新华社播发的一则消息，确实用了约四百字的篇幅介绍“红岩机器厂革命造反派职工”提前完成生产任务一事。发表此则消息，是为了配合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贺电”，反对经济主义、打退所谓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虽然消息长度不足我写文稿的十分之一，但我们依然大受鼓舞，毕竟新华社啊！毕竟我们抓的典型啊！为显示我们对此事拥有“专利”，第二天，我们马上以特刊形式，全文刊登了上面那篇据说是“中央”让写的调查报告。

几十年后，我有机会调查了更多的工人造反个案。七十年代，我本身就因为一桩莫名其妙的反革命案件牵连而被弄去正儿八经当过多年工人。这个工厂在云南文革中闹得特别起劲。我有了条件完全零距离了解工人们的造反生涯——对比之下，我以为重庆红岩厂的情况实在没有太多典型意义，更有代表性的，恰恰倒是我那位当矿工的四姐夫和那位从小调皮倒蛋的表哥，还有我在云南这个有名的“老大难”厂了解到的若干个案。比如，厂部造反头目何某，原来在车间当维修电工，一次，因机床限位开关质量出问题，机头从床身上冲了出来，厂保卫部门立即认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对何拘押待审，百般盘查，折腾个没完没了。还有一位钳工，文姓，五十年代一次班前会，他和团支书发生口角继而踢了对方一脚，团支书不依不饶，一状告到厂党委，文某立即被划为“右派分子”——政策不是规定工人不能划“右”吗？——那就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吧！总而言之，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被送去农场劳教了近二十年。“改正”后和我在同一车间干活，下班返家，我俩常骑车同行。某次，我揶揄问他：踢人一脚就劳教你二十年，觉得冤么？不料文师傅豁达一笑，回答：“我踢团支书一脚，就等于踢了共青团一脚；共青团属共产党领导，

我就等于踢了共产党一脚；踢共产党一脚，就等于踢了共产党主席一脚：踢毛主席一脚才劳教十多年，有什么冤？值！”类似的个案我还可以说出许多。

文革开始，这个厂的工人们理所当然把威风八面的保卫科长揪出来批斗，戴高帽，挂黑牌——这黑牌可不是用纸板制作，而是重达几十公斤的气缸盖！用细铁丝挂起来，往科长脖子上一套，细细的铁丝便像刀锋剑刃一般直往保卫科长的肉里嵌，顿时嵌得鲜血淋淋！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红岩厂成为造反派典型，让人费解的还有一点是：无锡作为著名的江南水乡，民风素温婉娟秀，为何偏偏让他们和“造反”这个往往意味着刁民枭雄的概念搅到一起？而不是同一个厂的、来自北方的洛阳汉子？这一回，红岩厂的文化大革命偏偏让强悍剽勇的北人反串了一回保守派的角色。历史真是开了一回玩笑。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红岩厂作调查的情景。在那个远离城市的工厂，活动于那些热情有加的造反工人中间，我没有感到过半点火药味，他们全都操着动听的、

丝竹音乐般的吴侬软语。接待我的工人，有一位姓过，叫过文南，除了戏剧《十五贯》里那位叫“过于执”的昏官，我是第二次遇到这个姓。过师傅精力充沛，一看而知具有南方人的精明。另一位是女工，我记不起名字了，只记得她眉目清秀，让人想起六十年代名噪一时的风俗画家徐启雄笔下的江南采莲女。她把我安排在不知谁的寝室过夜，事前将卧具全都换洗得干干净净，还能闻到淡淡的香皂味。刚刚钻进被窝，我突然发现：在雪白的



当年《8·15 战报》上对红岩机器厂的报道与评论。

被单上，她事前用圆珠笔认认真真写了一行字：“向重大八一五小将学习、致敬！”——此情我记忆尤深，在后来的一篇小说里，我曾把这个细节写了进去。

这样，红岩八三一理所当然成了八一五派的死硬分子，用当时的术语说，就是“铁杆”、“钢杆”。几个月后，武斗战火燃遍山城。一九六七年“六五惨案”（这个惨案后面还有详细记述）发生后，根据两派协议，八一五的武装力量暂时撤出北碚区，让给对立派“反到底”。这样，红岩机器厂就成为了孤岛，习惯于坚守生产岗位的八三一工人，不幸就成了对方的瓮中之鳖。小报记载，该年七月八日，“反到底”武斗组织“猛虎团”、西师八三一等数千人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炸药等，对红岩机器厂发动突然袭击，红岩八三一惨遭败绩。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8·15 战报》成都版，在“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文章中刊出了该次武斗的死者名单，红岩机器厂计有四人：黄习琨、吴华明、徐秋林、余春保。听到消息，扼腕咨嗟之余，我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名单中没有过文南，以及那位像采莲女一样美丽的女工。

许多年后，一九八三年的深秋，我有机会第一次去无锡，参加一个关于交流电机无级变速的技术研讨会。我曾利用会余闲暇时，独自去旧城的寻常巷陌和寂静的锡惠山麓低徊漫步，寻访神往多年的二泉夜月，还有瞎子阿炳悠远的旋律带给我的种种遐想与幽思。那一刻，我突然又想起了远在重庆北碚的歇马场，想起那一座孤独的内迁厂，想起那儿曾经发生过的激情、疯狂和血案，一刹那间，心中突然深萌自责。我对自己说：如果当初我不去那个工厂，不写那几篇大可不必的破文章，不将他们树成典型，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会成为八一五的死党了。他们旁边，北碚区，不现成就有一个反到底派的主力“西师八三一”吗？他们完全可能与他们结盟。这样，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烽火连天的重庆北碚，他们就不会沦为孤岛，也不会被忽然降临的兵燹血洗而死去。

于是我在心里诅咒：该死的《8·15 战报》！

第六章 新年的花絮

历史上任何震撼世界的大革命必定都有它的华彩段。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有他们的一七九三年，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有他们的一九一八。在这种史诗年代，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必然格外复杂和惨烈，这样年代的故事必然异常悲壮动人，这样的年代必然英雄辈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本质上说，和法国大革命及苏俄十月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动乱的先驱：学生，仅仅是奉旨造反而已，只不过从若干社会活动的表象来看，中国文革与前面两场革命有若干相似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年轻人所表现出的机敏才智和勇敢无畏确也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必须指出：催生这些英雄故事的政治产房，即人们曾经短暂拥有过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都是最高统帅钦赐的。只要哪一天最高统帅不高兴了，将这些东西一旦收回，不可一世的“天兵天将”们便什么事也办不成了。一九六七年最高统帅还高兴着哩，他还需要娃娃们继续大闹天宫，还想让他们锻炼锻炼，哪怕动刀动枪动炮。他很轻松地说过一句话：你们要打，就像重庆那样，双方几万人，开大炮！伟大领袖赐给了这么大的自由，一九六七年还能不精彩吗？一九六七，是中国文革的华彩段。

在一月一日出版的《8·15 战报》上，我撰写的“元旦献词”记录了重庆大学造反学生新年伊始的洋洋自得：“一九六七年，我们要砸烂黑市委，直捣西南局，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我们要清算八二八的老账，讨还一二·四的血债……一九六七年，我们在大破李井泉、黑市委的修正主义统治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们要踏遍蜀水巴山……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西南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同一天的《8·15 战报》还破例同步出版了一期画刊。画刊上的几幅木刻版画，均为四川美术学院两位学生的大作。其时该二同学被我

们礼聘为美术编辑。一名邹昌义，现为“川美”绘画系教授。他在文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绘画才能，而是有一天他全副戎装来找我。时间是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他气喘犹急，却很是开心地对我说，他们刚刚开着坦克去“敌占区”示威回来。他头戴钢盔，腰间挂一柄枪：像是手枪，可枪口粗硕惊人。我正奇怪，他得意地快活一笑，爽快地将枪递过来，说：是打信号弹的哩！没手枪，只好用这个对付对付。几十年后久别重逢，见到我，他还像当年那样亲热地大呼：“狗×的周孜仁！”。另一位叫毛世勋，文革造反，名字也就革成了“毛峰”并一直沿用至今。不同的只是，多彩的人生已经在他的名字前面堆积了许多让人惊羡的头衔：报社副主编、大学客座教授、书协副主席……等等。

文革那会儿俩画家都刚出世道，极朴拙忠厚的。为了方便他们创作，我们报社专门开车去四川美术家协会免费弄来了许多梨木板。梨木板纹理细腻，刻版画的上好材料，对于两位穷学生来说，绝对是梦寐难求的极品。这事让邹、毛二生非常开心。木板原来的所有者、美协的版画大师们极不情愿地看着我们把宝贝木板一块一块搬上吉普车，心里肯定极端难受。画家们守在汽车面前认真地叮嘱我们小心，别把板子碰坏了，还一再说明这些板子是去川西山区一个叫大树公社的地方搞什么政治宣传时弄来的，来得十分不易。有的木板上甚至已经用铅笔起好了草稿。于是我想：如果不是文革，板上的这些线条和块面肯定已经印上全国一流报刊的显著版面而备受爱好者追捧。

六十年代，四川美协的版画水平在全国是首屈一指。还上中学、我还做着画家梦的时候，李焕民、吴凡、牛文、徐匡、吴强年……这些显赫的名字都是我心中的泰山北斗。到重庆上大学次年，某次参加沙坪坝区文化馆的美术活动，馆领导曾专程恭请徐匡先生前来指导。我记得非常清楚，坐在他面前，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但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我们开车前去强拉木板那天，看见画家们一个个只能可怜巴巴地站在车下，眼睁睁看着臂箍红卫兵袖套的陌生娃娃把心爱的宝贝拖走，那一刻，我没有把他们和上面那些名字一一对应。我已经不

关心他们谁是谁。还有，看见画家们悲悯的表情，我有点做贼心虚。木板装车完毕便一溜烟开走了——我想，艺术家们的眼中，我们当时一定很像保守派传单上骂的“土匪”和“暴徒”：虽然我以为我们很客气。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保皇四军”已经因为一个月前发生的“一二·四血案”而被搞得狼狈不堪。重庆市委事实上已经瘫痪。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而事实上也什么都不能干了。面对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他们虽然还想做最后一搏，但已经毫无意义，无非是尴尬政治使命结束前的回光反照而已。

下面摘抄的是一位同学当时的日记。日记主人叫侯念平，重庆大学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毕业后曾分配云南边疆工作。七十年代初他调回老家重庆，临行前在昆明把保存完好的日记本珍重地送了我，他说周，“您留下吧，以后写文化革命历史，您用得上的。”侯念平身材修长而精瘦，沉思的眼里总有一种忧郁的神情，让人想起苏联电影里随时准备为壮丽事业献身的青年布尔什维克：瓦西里、安德烈或者谢尔盖什么的。事实上，在一九六七年的重庆内战，他真地扛起半自动步枪到枪林弹雨中去检验了自己崇高而荒唐的信念，这使我非常敬佩。侯的日记书写得整洁规范，而且叙事论理严密、严谨而且严肃，一看而知出自于一位工科学生之手。日记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对领袖、共产党的崇拜，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还有于人于事鲜明的爱憎，都和数学推导一样精确。从日记里我还知道他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妹妹，正就学于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专业，叫小莎。从名字和她的专业准能让人猜想到她的美丽和可爱。侯在日记里说他参加一九六六年九月绝食和徒步上京告状行动，曾和小莎有过一次难忘的会面。兄妹俩极其认真商量的一件事就是：用何种方式、恰当地向父母亲传达京城信息，要他们尽快把家里属于“四旧”的物品主动处理掉，别等红卫兵上门找麻烦——从日记叙述的口吻，我完全猜想到他的家庭一定很有教养，令人羡慕。边疆辞别时分留下的日记和嘱托显得那么宝贵而沉重，我珍重地保留了下来，直到几十年后，我真地开始用自己的笔记录那一段

恶梦般的年代。

一九六七年初，侯念平所在的班被派往长安机器厂“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该厂就是现在制造“长安”牌汽车的著名企业。很大，文革那会儿，它专业制造武器。这些日记，算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段实录：

一月三日：今天下午长安厂举行干部大会，学习《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黄顺义代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上去讲了一些话，谈得挺尖锐，但不怎么突出重点，信口开河，有一些赤卫军派人物感到难受就退场了。

一月四日：……从一月三日起我调换了工作岗位，并且开始实行半天劳动半天搞文化革命的时间制。原来的八小组群众动得比较好，现又调到一小组去……现在时间很紧，上午劳动，下午搞传单、大字报。今日又帮助《九一》钢铁战斗队整理材料……生活紧张，但是愉快。

一月五日：今天上午学习《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小组要我读，于是我边读边讲，结合自己通过几个月文化革命的感受，及了解的情况，讲了一下。这篇社论写得好极了，无处不谈出了我们心里话，特别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再次明确地指出了出路。对受蒙蔽的群众给予了很大的教育。现在来厂劳动的学生越来越多，有造反派也有老保……联络站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进厂区看大字报……

一月十日：……近几日，重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即原工人纠察队开始大肆活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继续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企图为之保驾。……九日晚厂里发生由于一辆可疑宣传车被扣而调动大量战斗军企图制造冲突，一小撮垂死挣扎的混蛋企图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煽动部分工人罢工。昨日、今日，好几处地方停工。我厂战斗军今日也进城去了，聚集了上万人在两路口一带堵断交通。想抄造反军总部，至今而返。（注：笔者当天日记也有“罢工达到高潮。几十万工纠在市内包围造反军总部，我们发出呼吁书并奔赴最前线宣传抓革命促生产”诸语，但具体情况已无记忆。）

一月十二日：今天与另一同学参加了24车间的批判大会。车间指导员死顽固，在铁的事实面前大出洋相，给保守派极好教育。一个前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在铁的事实面前觉醒了，揭发了许多问题……

一月十三日：我们车间今日也开批判大会，会开得比较好……

一月十四日：今日全厂召开批判厂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开得较成功，会后，造反派一举接管了电台（广播站）、印刷所，让这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的工具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一切权利归左派。……今日我们车间一些人去红岩八三一参观，我和刘云生作八一五代表前往。同行的有车间主任、管理员、老师傅及造反派共20余人。

一月十六日……今天，我八一五战斗团采取了革命行动，一举接管和砸烂了设在重大的一切保皇机构……战果辉煌。我参与了砸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行动。我们挤开了用床、沙发等物抵着的原专家招待所的门，冲入房内，又把挡在楼梯上的工人战斗军拉下来，冲上了楼，一举攻占了他们的司令部……我们总共缴获了黑材料、数十万张纸、油印机、油墨、喇叭、电子管、麻饼、香蕉、造谣传单、广播机……。这个行动，大长革命造反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晚上我们通过了对重庆黑市委的通令，勒令以鲁大东为首的黑市委十八日晚十二点以前到我校报到，二十三日公开向全市人民做检讨，否则格抓格斗勿论，并勒令解散市文革（笔者注：“通令”发出后，副市长段大明、候补书记丁长河、书记处书记廖苏华、书记处书记鲁大东确实均次第按时报到，分别安排在各学生寝室住宿，由专人监管。事后检点，只有书记处书记岳林缺席，据说已被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的造反派们提走了。）

“交院九一五”擅自抓走岳林这件事，显然是对重大八一五权威地位的公然蔑视。事实是：事情发展到一九六七年初，蔑视重大八一五权威地位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交院九一五，而是整整一股暗中崛起的政治势力。他们雄心勃勃、摩拳擦掌，下决心要在即将开始的全市夺权中重新洗牌，和重大八一五及其附庸一决雌雄。这股力量的代表是：黄廉为首的工人造反军总部、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纵队和交院九一五战斗团。他们背后，则是来自天子脚下的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和第三司令部的驻渝联络站。

重大八一五凭自己的本事造反起家，仅按时间早晚排序，在全国也算名列前茅，而且人多势众。他们从来不把这些来自皇城根儿的御

林军看在眼里，对他们的指手画脚从来置若罔闻。这让京片子们无法忍受。他们下决心要让这帮“土老财”尝尝“北京来人”的厉害。还有，后来几乎主宰了整个四川命运的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对于重庆大八一五这个山城地头蛇公然跑去自己的地盘——省会成都招摇过市，也甚感愤慨。他们毫不犹豫站在反对派一边。最后，大名鼎鼎的罗广斌，不正带领“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坚守北京吗，在十二月十七日北京工体的大会上他已经出足了风头，正信心十足地等待中央首长再次接见，面授锦囊呢。

只是没有时间了。全国全面夺权已经进入倒计时。罗广斌实在太缺乏耐心。和他同样落泊的“受迫害干部”而后来险些儿当上“四川王”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当时的境况其实和他大同小异，可人家就老道得多。老婆带几个随从呆在北京做报告、造舆论、拉关系，老公则留在四川与造反派接应周旋。权威材料介绍：张留京期间，共作“控诉”报告五六十次，听众三十多万人。报告会的主办单位包括：中央办公厅下属某单位、中央监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等等。还特别出版张西挺《狱中日记》，细说李井泉、西南局对夫妇俩的迫害之如何残酷，以及夫妇二人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高风亮节：虽然事后许多人都对“日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其实，即便该“日记”千真万确，其名气和影响与《红岩》相比，也差着好几个数量级！刘氏夫妻的优点就是能等——这很要命——而他们确实等到了舆论造足，等到了上层关系攀附得很可以，等到了杀气腾腾的“二月镇反”不仅结束而且挨了中央狠狠一顿剋，时来运转，二人这才风光无限地得胜凯旋。政治斗争是极需耐心的。王莽谦恭下士，刘玄德后园学圃：中国古代的政治家、阴谋家早就在韬光养晦方面提供了许多经典范式。再来看罗广斌，文人一个，连起码的政治常识都没搞通透，能成什么气候？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罗广斌的个人命运而言，算是不幸言中了。一月十一日，罗等人从北京匆匆忙忙回到重庆，其时，所谓“一二·四烈士”这一要害情节已被证明纯属虚构。再说，离开重庆一个月，文革闹剧又交给了山城百

姓许多更为精彩的话题，罗广斌押上巨大赌注的“一二·四惨案”这个题材已很难再炒出什么轰动效应。还有，企图取代重大八一五地位的所谓“联合指挥部”也无可质疑地被人砸掉……可以猜想，出现在罗广斌面前的一九六七年的岁初重庆，让他心里实在有点郁闷。好在没有回来之前，弟兄们都沒闲着，还做了几样事让他感到心里爽快：一月六日，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等代表，在牛角沱客运站急会密商，统一了斗争策略：就让重大八一五去对付老保好了，我们就集中力量反反他们的“右倾”。在中国，反右总不会错的，而且注定很愉快。三天后，川大八二六战斗团驻渝办先行发难，召开大会批重大八一五右倾：初试啼声，虽未一鸣惊人，甚至被蛮不讲理的重大学生造了反，但毕竟在老虎窝里摸了一回“老虎屁股”，表示了自己的存在，胜利就不小了。罗广斌回渝当晚，立即在市文联召集上述各弟兄聚会，商议继续“反右倾”、“踢开重大八一五”、由工人造反军主持全市夺权诸事宜。

造反派内部的“倒八”程序由此正式启动。

对于这些活动，重大八一五压根儿没看在眼里，无非几个苍蝇碰壁罢了。仔细检看一月二十七日以前的所有报纸，看不到任何关于反对派活动的消息、以及以总团名义对此的表态，只是在一月十四日“关于山城八一五派中一些问题《8·15 战报》答群众问”中轻描淡写地说了如下一段话：“有的人，他们俨然以‘当然左派’自居，瞧不起群众，到处指手画脚：这个组织‘右’，那个组织‘修’，惟独老子最革命，以‘永远的少数派’为自豪，孤家寡人，个人突出；有的人，他们热衷于仅仅拼刺刀，猛冲猛打，但是到运动深入到了要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今天，他们却不愿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严肃的政治斗争，只想冲个痛快，闹个舒服。”

尤其蹊跷的是，不管反对势力已经搞得多么热闹，到一月二十七日《8·15 战报》第八期出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之后，却突然宣布终刊了。这有点像古代将军在得胜凯旋路上，偶遇几个打家劫舍的绿林

小勇，根本不屑一顾，虚晃一枪，便绝尘而去。

《8·15 战报》为什么突然停刊？具体细节现在已经想不全了。就我个人而言，至少对于停刊是很乐意的，说明革命马上就该成功了。我应该赶快躬身其中去直接感受胜利的欢乐，而不能老呆坐在静悄悄的编辑部舞文弄墨。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记录了这种急不可耐的情绪：

满街都是老保们戴高帽游街。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已经展开/毛主席指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八一五的同志们还有什么心思坐下来整风？不行了，杀出去，夺权！夺权！夺权！我们革命造反派想的是夺权，说的是夺权，干的，也是夺权！/整风暂停，大家又杀出去了。/我真不想坐在编辑室里，人都憋死了！

此前两天，即北京正式号召全国夺权的二十二日，日记记录了我在重庆夺权狂潮中的所见所闻，那天我“到八一印刷厂去(笔者注：报纸创刊后发行量增加很快。开始约为 2000 至 3000，不久便增至 10000 多甚至 20000。重大印刷厂的生产能力远远不够，从第五期起就改在八一印刷厂这个正规厂家印刷了。印刷质量看得出来，第五期及以后的报纸明显比前四期好得多)，顺着去南岸(看望姐姐)，今天在城里逗留一会，晚上回来了。”日记写道：“解放碑又是水泄不通。正在开大会。什么大会呢？老题目，新内容，就是那个八·二八。现在很多所谓的受害者都出来倒戈了，成立了‘八·二八兵团’，到解放碑开



一九六六年十月群众造反运动掀起高潮时的解放碑。

控诉大会。所谓神医季开阳等等，均被抓上台挂以黑牌，冠以高帽，实在狼狈不堪。”

所谓“八·二八惨案”，是重庆市委为对付造反伊始的八一五而编造的一个大谎言，说是重大学生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那天，围攻了江北区下横街小学，把女教师的衣服拔光、头发拔光，游街示众。还有，他们用两块门板，把一个驼背老师夹在中间施压整型。还有，有个老师被打成“脾破裂”，应该是不治之症了，后经江北红会医院季开阳大夫救治得以劫后余生。在民风朴拙的当时，这些夸张过渡的恐怖故事本来就很容易不攻自破，可八一五毕竟刚刚出道，面对重庆市委精心策划的大围攻，和保守派铺天盖地的传单流言，一时间确被搞得惊慌失措，甚至不得不数千人星夜北上，去首都求救。时间是九月三日，学生们绝食两天，无果，以困乏难耐之身，徒步行走数十里方得上车。其情其景，很有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的悲壮与凄沧。没承想仅仅几个月工夫，事情就完全翻了个个儿——八一五的得意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在那一天的日记里，我惊异地发现了一段极为仓促的记录：

在大街上，人的海洋里，我看到一双特别熟悉的眼睛和那张白皙的面孔，是她——就是过去“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的那位姑娘。她正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很久没见了。久别重逢，砰然一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心里老不平静。真的，太不平静了！

在满纸激言奋辞的日记中突然跳出这些纯属私人情绪的话语，实在显得唐突，也说明这个女孩在我心中曾经多么重要。请读者原谅我需要费些笔墨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既然无可回避地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产儿，我所有的生活理念、行为方式甚至最隐密的私人情感，都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胎记。我是把自己也作为一具标本的。我解剖自己，也是对我们曾赖以生存的时代的剖析。

在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里，我这样记录了我那一段无言而无望的

初恋：

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大一。大学一年级下期。夹竹桃鲜花盛开的季节。那年我十八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校园里夹竹桃极多。花开时节,红白相间的花枝就蓬蓬勃勃,洪水一样往道路中间汹涌,本来就拥挤的校园小路,就越发拥挤了。

命运注定我要和她窄路相逢。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在哪个系哪个班,尤其糟糕的是,在比肩接踵的人群里,我们每天相逢,匆匆邂逅刹那,我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偏偏要向我微笑?目光如电,总让我心跳难平。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寂寞的夏日的午后,我记得我曾在长满青稻的平原上踽踽独行,倏忽间初雷乍起,我蓦然回首:在遥远又漫长的地平线的上头,在充塞天际的浩瀚云团中间赫然跳出一道白亮亮的闪电,将整个平原照耀得一派辉煌。我欣喜万分又恐惧万分。我以为我偷窥了宇宙的秘密。我渴望辉煌的奇迹再次出现却又畏惧上苍的惩罚。如今,走在长满夹竹桃的小路上,我和她的眼睛天天相逢又倏然离去,我总会想起那一条遥远的地平线和那一道辉照宇宙的闪电,我总会渴望,又惴惴不安。

那时候我刚刚读到了泰戈尔一首无题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
当我们的目光在路上相遇的时候
但是她走过去了,而这句话
却像空船,在时间的每一阵波涛上摇荡
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

诗句的朦胧和准确让我震撼不已,从此后日日都强烈地催动我甜美而陌生的心跳。我确信我爱上她了。这种情绪如此强烈,难以抑止,但是却我不敢承认它。大学整整五年,我甚至连和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日复一日的反修大辩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时都在告知我们,整个世界正在堕落并等待拯救,伟大的党所赋予的使命那么神圣而激动人心。任何儿女私情都是不可宽恕的罪

愆。我只巴望着为党作一个“驯服工具”和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漫长的大学时代，整整五年，“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只能“像萤火般在我心头闪烁/在绝望的朦胧里/寻找它自己的意义”。三十年后，我去了深圳，按照习惯的说法，我“下海”了。我和我的过去彻底告别：“铁饭碗”、几十年工龄、高级职称和公房，开始真正以独立的个体面对整个社会的挑战。这时候，我才确信多年来我被扭曲、异化和泯灭了的个人自信和尊严已经得以涅槃，于是我回到重庆，大胆约会了她，并且向她表白了郁积几十年的情怀。我对她说，我想对你讲一个漫长的、无言而又绝望的爱情故事，要听吗？她点点头，还是用大学时代我熟悉的眼睛微笑。

这是一个七月的雨后，沙区公园满目青葱。隔着围墙，便是埋葬有四百三十三具冤魂的著名文革死难者公墓。公墓旁边那座尖塔高耸的基督教堂正在修建中，还听不到庄严的赞美诗和徐缓的晚钟。静静的湖水里只有我们一只小舟。我给她背颂了泰戈尔的朦胧诗。她突然问我：当初，你为什么不向我表白啊？

那一年，她已经儿女成行，我也年届半百。

一九六七年一月那个黄昏，当我得意洋洋地从解放碑走回学校，我觉得我是一个胜利的征服者，我觉得整个城市很快就会因为我们而得救。因此，当看见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同行（这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我觉得是在班师凯旋时刻，突然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尴尬。我不愿意承认这个失败，因此只敢在日记上草草记了上面几行文字。如果需要补充，那就是：那一刻——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滑稽地想起了革命小说、当年我的生活教科书：《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风雪筑路工地上，保尔·柯察金突然遇到了冬妮娅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我连招呼都没给她打一个，便高傲地擦肩而过。

第七章 革联会的诞生和罗广斌之死

《8·15 战报》出刊总是很准时的，平均每周一刊。但第八期和第九期却间隔了将近一个月。前面说了，这绝不是疏忽，而确属停刊。因为二月十八日出版的第九期明白标上了“复刊号”三字。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天的生活，和《8·15 战报》没有太多关系。而夺权作为文革的重要一节，我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

重庆造反派零零散散的基层夺权早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则是从一月二十一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次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称：自下而上夺党内走资派的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为了让虚荣的年轻人萌生类乎于“十月革命”的神圣联想，社论故意把上海造反派的夺权称之为“一月革命”。唯一让年轻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只是：这儿没有围困冬宫的呐喊、没有阿芙乐尔战舰的隆隆炮响，也没有波罗的海水兵在大街嚓嚓走过，没有穿皮夹克的卫队长，一边用梳子刮着头发，一边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员说：先生们，你们的工作结束了，从现在，直到永远。

重庆市的政权机构：市委和市人委及下属部门事实上早就瘫痪。重庆夺权，无非按照中央意图走走过场罢了，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冲突和值得让人记忆的精彩情节。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邹昌义——就是上面曾经提到的四川美院聘来《8·15 战报》的美编——告诉我，说他们学院那一帮前卫派小子对参加夺权这一历史时刻非常珍惜，在顺利收缴了各种印章后，均站在市委机关宽大的办公桌前，模仿宣传画上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流行动作，左手握毛语录本护胸，右手则作天王托塔状，举印章一枚，逐一拍照留念。当时满街都是鼓动夺权的宣传画，画上代表政权的印章都硕大如斗，而市委的大印直径只有三十六毫米，

举在手上一定很滑稽。

山城重庆连日连晚地游行欢呼。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却正在设于少年宫的总部忙于分配权利。社论发表次日，总部紧急召集各种组织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进行夺权部署。当时，虽然学生、尤其是重大八一五事实上一直高踞于整个重庆政治的主导位置，但理论上却必须就如何体现工农兵为主体进行夺权作出解释和安排。这样，应邀参会的组织就不能光是些学生娃了，它应当确保工、农、商等各种行业的代表，以免授异见者以柄。次日，学生代表和应邀参会的二七战团、红农八一五、财贸八一五等工、农、商界代表在同一地点再次开会协商夺权诸事宜。两次会议后来均被反对派称为重大八一五一一手操控的“分封诸侯”会议。

对于学生娃娃一哄而起的夺权行动，毛泽东肯定是不放心的。夺权号召发布的第二天，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马上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传达毛的指示。《决定》称：“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找解放军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又称：“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驻节重庆的五十四军闻风而动，军长韦统泰、政委谢家详及蓝亦农、刘润泉、唐兴盛等高级将校，迅速召见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组周家喻、黄顺义、吴庆举、秦安全、熊代富、查正理等十余人。这支四野铁军作风严谨，纪律严明。军长韦统泰将军，山东好汉，在衡宝战役、朝鲜战争和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战功赫赫。韦时年五十，肩宽腰圆，威仪棣棣，典型虎将风范。韦军长在接见中毫不含糊地指称重大八一五是“左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同时要求重大八一五主动联合其他造反组织联合夺权。会上，军长还向学生领袖推荐了一大堆上佳合作伙伴，包括财贸系统造反派头王绍川、军工系统阳增泰，老干部段大明、甚至还有八一五造反第一时间就坚决要打倒的“镇压革命运动的刽子手”、市委书记辛易之。三天后，二十六日，重庆地区七所军事院校学生武装游行，十六辆军车在山城街头隆隆驶过，年

轻军人一路高呼：“八一五好得很！”“坚决支持八一五的革命行动！”再一日，军事院校学生在集会，重申立场。再一日，驻军两千指战员武装示威，对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组织及其夺权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夺得天下的。毛让军队出面干预，这就定义了事实的合法性。从驻渝部队表态的递进过程可以看出来，五十四军向群众陈述自己政治立场很讲究技巧也很有层次。事情已无任何悬念。

“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迅速组成，正式接管了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二十九日，重庆三十余万八一五派群众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的夺权行为已经胜利并且合法。原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鲁大东、廖苏华及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全部被揪到会场批斗，按惯例，一律高帽、黑牌、“喷气式”侍候，而后游街示众，游行结束，还当众焚烧了刘少奇、邓小平像——盛典圆满结束。



重庆革联会“129 ‘夺权大会’ 现场照

笔者有幸保留下来的一张老照片真实记录了那天大会的现场。层层叠叠的主席台前立满了层层叠叠的高帽。高帽尖如古塔，高约一米许至于几米，远望去，尖帽如林，仿佛剑锋之直指

长天，红卫兵一声断喝：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如林高帽即哗啦啦一齐倾斜前倒，有怒射天狼之概——场面蔚为壮观，颇有电影国师张艺谋镜头之风，很具视觉冲击力。

大规模戴高帽游街活动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所谓“红卫兵

节”后，百万小将在天安门广场朝覲既毕，就开始在全中国大干了。史料记载，重庆的“破四旧”自八月二十二日始，由市委统一布置，公安机关配合，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具体实施，大规模地对“专政”对象进行抄家、封门、体罚、殴打，辅之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以长革命志气，以灭敌人威风。自此此后，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高帽水平也越做越专业，尺寸越做越大。既然走资派可恨如斯，批斗会的高帽就不仅高而且大了，大得常把脸面全掩了，这就须看黑牌上的名字方知道挨批者为谁。笔者有幸保留下来的那张老照片即是如此：骇然第一位是“黑帮分子刘文珍”，其余任某某、鲁某某、辛某某及廖某某诸人名号仅依稀可辨，需和文字资料对照，方知被戴帽者身份。

粗略一算，台上这些受辱者从教唆年轻人给别人戴高帽到自己被戴高帽，前后不过半年功夫，真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思。又查资料，任白戈一九零六年生，一九六七年正好为花甲次年；鲁大东一九一五年生，应为 52 岁；廖苏华最大，降诞年月暂未查得，但任白戈都管她叫大姐；再有，据《杨尚昆回忆录》载：一九二六年杨初到上海，“四川进步青年”廖苏华已先期在那儿从事革命活动了，年龄当比杨大许多，如此算来，那天挨斗，她确系奔 70 的老太太了。以风烛残年之身而让年轻人反剪双臂，硬压头顶，勉做“牛不饮水强摁头”之状，当是很残忍的一件事。

帮助我回忆这次大会的 KEYWORD 还有这样一件事：当天深夜，突然有人来学生宿舍敲门，接着用吉普车把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拉去《重庆日报》，接着由总编室一位中年女士给我交代任务。女士戴着一副很酷的眼镜，仪态优雅，典型贵族气质。我早就听说过她：报社名记者沈世鸣。沈要我马上写一篇欢呼文章并说当即就要发稿。她的语调轻缓柔曼，指令却不可动摇。我就在她旁边胡乱检一张桌子坐了。我想当时我的写作状态一定极佳，稀里哗啦一气呵成，自觉有“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感觉，非常得意。文章题目俗套至极：“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署名“红锋”，文题和笔名现在看来都很恶心。很有风度的女记者异常平静地看过我的文章，很快 PASS 了。

她什么话都没有说，不管赞扬的还是批评的，像有心事重重——后来很快知道了，就在全市夺权不久，她断然参加了我们的对立派：这消息让我莫名其妙有些怅然。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重庆的所有夺权活动，几乎都是在重大八一五、或者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重庆红造司主导下进行的。平心而论，重大八一五的权威确实不是谁封的，而是几个月文革动乱造就的一个客观事实。支左驻军首先接见他们，与他们取得共识，这无疑又大大加重了他的政治砝码。一般说来，作为工科高校的重大，它的学生与追求浪漫、创造、从而更加情绪化的文科学生相比，要更多一些理性、务实、逻辑性和秩序感。对于最讲究纪律的军人，要选择重庆大学而不选择西南师范学院，当是一拍即合的情理中事。

西师八三一当然不高兴了。不高兴就要耍点娃娃脾气。二十四日下午一时，根据二十二、二十三日“分封诸侯”会议的决定，重大八一五主持对市委机关的夺权，他们的人马如期来了，而主持市人委(即后来指称的市政府)夺权的西师八三一偏偏不按时就位，最后根本不来。主持人缺席，只好匆匆忙忙调集其他造反派前来将收缴的印鉴、钥匙、文档等封存，待处。

政治斗争中耍点小孩子脾气、患点“政治感冒”之类的“小病”，有时不失为一种要挟对手的手段。袁世凯不是谎称“脚疾”，和急于要他出山的清王朝讨价还价吗？文革后期，因为不满政局而“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老干部，不是大有人在吗？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做后盾，方能待价而沽。重庆八一五对立派的实力不过五月的黄瓜刚起蒂儿，嫩着呢！你要娃娃脾气有什么用？权利的诱惑大得很，你不干，反正有人干。按当时的话说，就是“地球照样转动”，就是“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

生米马上就要煮成熟饭，“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在即，反对派这才开始作慌，感到有必要采取实质性行动了。一月二十九日“革联会”筹备大会召开，把反对派逼向绝境。第二天，一月三十日，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四十多个造反

组织旋即在人民小学的“联络站”聚会，联署了一个给中央的“急电”——邮局拒发，我们只能在二月九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重庆版创刊号上读到这则文本。电文主要内容如下：

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周家喻为首的一些群众性组织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客观上迎合了黑市委的需要，于一月二十四日，以重庆十二所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单方面的接管了黑市委和重庆市的全部市一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大权，为了使这种非法接管合法化，他们于一月二十六日拼凑了一个“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筹备处”，这个处的周家喻等结党营私，拉拢一批工人组织的领导人，排斥大多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拉拢一些追随右倾路线的外地学生，排斥与之作斗争的来渝串连革命师生。一月二十九日这个誓师大会发表的紧急通告，竟宣布由大会主席团组成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这个由周家喻等一手炮制的、排斥了大多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的、根本违反巴黎公社原则的联络总站，接管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这一系列行为，激起了全市广大工人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抵制。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这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在搞分裂。其实质是欺骗群众，使黑市委窃据的各种大权名存实亡，使我市文化大革命流产。

因广彬同志姓“罗”，工人造反军总部司令叫黄廉，该联络站后来被八一五派戏称为“廉罗栈”。

“急电”联署了，西师八三一等迫不及待又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口号：“革联会是大杂烩”、“踢开重大八一五，自己闹革命”，等等。这些口号中最不明智的，是公开指责革联会是“枪口下的大联合”，把矛头直指毛泽东亦不敢轻易动作的政权柱石：军队——这实在犯了大忌，其时大学生政治智慧之稚嫩，可见一斑。重庆反对派政治主张的核心是：“砸烂革联会”，因此他们便有了一个文辞不雅但音节却响亮的名

字“砸派”。因文辞不雅，几个月后，位居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之尊的刘结挺来重庆视察时，亲自给改了个新名字，叫“反到底”。

“砸派”在联络站联署的“急电”尚未发表，二月一日，便有与会者到重庆大学告密。八一五总团闻之大惊，当即决定还以颜色。时间是中午，总团突然派人赶来报社，要我以最快速度起草一份文稿揭露对方的阴谋。紧接着全团动员。地点还是在松林坡礼堂。会场气氛十分激愤。我走上讲台宣读文稿，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那一天我成了真正的主角。我的文稿一定写得很快而且很棒，我的朗诵也一定铿锵有致，宣读刚刚完毕，风暴一般掌声顿时响起来：通过！

我再次说到自己“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写作状态，并非是要为廉价的成功——如果算是成功的话——沾沾自喜。绝不是这样。俄罗斯哲人赫尔岑曾这样描述过农奴制度下的“下等人”，说他们“有一半的孩子气：一点小事情就会使他们高兴，一点小事情也会使他们伤心；他们的欲望也很有限。这些欲望与其说是不道德的，倒不如说是天真的、合乎人情的。”我们不是“一半”而是“整个儿的孩子气”。我们刚刚被送进政治幼儿园，掌声和诅咒是我们的摇篮曲。

我需要补充的是，为了论战需要，压根儿未做过作家梦的我，对文学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有这么一个观点，说战争的需要曾有力刺激并推动了科技进步。文革也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年轻人的潜能和智慧在文革期间被最大限度地调动，甚至透支——我就是这样。那段时间，我是那么贪婪地阅读《斯大林时代》，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阅读杨朔的散文，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诗歌，还有《古文观止》、《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半年前开始的文革，曾在“破四旧”蛊惑下疯狂地焚书毁籍，而同一场革命却很快让我这个狂热分子像田鼠一样在文化荒漠中贪婪地找寻残留物喂养自己。这真是奇怪的现象。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正是因为这一段生活让我受到了太多惩罚，甚至整个人生命运轨迹都为此而改变。但我并不后悔。是的，我以为我理该为自己的荒唐付出代价，同时我也以为，正是从那时开始的文字训练，使我有可能像刑余的史臣，以时代书记员和见证人的名义，忠实地写

下那段不幸而又有幸遭遇的历史。我为此窃感欣慰。

文稿紧接印发各战斗组抄写成大字报若干。几千人倾刻出动，一个下午便将全市七区三县大街小巷覆了个密不透风。

现在轮到罗广斌了。八一五决定擒贼先擒王。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历史可以重新书写，罗广斌当初真不该从白公馆里逃跑出来。事到如今，那个现成的称谓就足以把他碾为齑粉：“叛徒”。更何况他在文艺界混迹日久：那本来就是毛最不放心、最想要打理的角落。三十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首先发难。散发传单并张贴大字报，明确定义罗“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是“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是“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二月一日上午，砸派战友看到罗广斌故作镇静的谈笑风生，当是这位大作家最后的微笑了。时间是上午九时许，罗来到设于人民小学后楼的联络站，代表重庆文联“红卫兵战斗组”参加联署那个给中央的“急电”。西师中文系教师杨向东笑着问他：“老罗，有人说你是埋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你好久爆炸？”罗哈哈大笑道：“黔驴技穷，不屑一顾！”又问：“人家说你想当市委书记，有野心。”他依旧笑道：“我还嫌市委书记太小了哩！”

这是密友对他的最后印象。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已经发出“通令”：抓捕罗广斌。砸派的力量实在太小了。自顾不暇呢，谁还能保得住本身就有软肋的作家？二月五日，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军队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等派出的人员，轻而易举将罗广斌从市文联的家中带走了。

精神领袖被抓，砸派的大学生领头羊西师八三一更加怒不可遏，向重大八一五下帖挑战：二月六日，在重庆市中区的标志性建筑解放碑前，举行公开辩论会。

这是两派大学首领进行的最后一次仅仅用语言的平等较量——以后的较量完全就用暴力、甚至枪炮发言了。八派主辩为重庆大学周家喻、秦安全、熊代富，砸派主辩为西师周荣及其他成员。重庆的早

春总是阴晦的，而那一天偏偏淫雨霏霏，寒意就显得特别浓重。性格火爆的重庆人没有让解放碑冷场。辐条四射的街道上人山人海，连楼房上都人头攒动。平心而论，文科高材生周荣是极具辩才的，纵横捭阖，妙语连珠，一招一式都很具煽动性。只是面对工科学生逻辑严谨、推理缜密、不紧不慢的防守反击，他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开始，以主席台为轴心辐射而出的四条大街上一直阒无人语，所有市民都屏息静听。辩论至一半，周围大楼的窗口便陆续挂出大标语：“砸派毫无道理！”“革联会好得很！”“八一五好得很！”继而听众开始向砸派辩手起哄——文革期间的这类辩论是不需要评委和仲裁人的，听众山呼海啸一般超高分贝的喊叫便宣布辩论会了谁是辩论会的赢家。

文革中重大八一五有个专业辩论组，代号为“101 部队”。组长柴天祺，动力系五年级学生，一九七六年死于唐山大地震。柴也是校文工团团员，在合唱队唱歌。他的歌喉实在教人难以恭维，入团五年，一直只能在大合唱队伍里担当可有可无的小勇，谁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来，他的口才竟大展头角。他曾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一个诀窍，说辩论成败其实并非在你能侃不能侃，甚至也不在乎你在理不在理，最重要是你得把握好会场气氛——而把握会场气氛最重要的，就是事前组织好听众：一定要让本派听众坐前面，辩论过程中让他们不停给对方辩手提问题、递条子、甚至起哄，千方百计破坏对方情绪，扰乱对方思路。柴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某天他和首都三司一位女辩手辩论，题目是关于“以周家喻为首”的重大八一五右倾机会主义诸问题。辩论时女辩手模仿毛泽东一贯口吻，说了一句气吞山河的话：“周家喻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因为被台下精心组织的听众搅晕了头，女生一急，把“老虎”二字说漏了，上面的话就成：“周家喻的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柴马上提醒女辩手说：

“周家喻是个男生，你摸他的屁股不合适吧？”

满堂大笑顿时把京妞哄下了讲台。

二月六日解放碑大辩论，重庆大学是否使用了上述技巧不得而知。

我是以一个普通听众身份站在台下听完全部辩论的。我感觉那天的气氛挺正常。

下面的事情就流水下滩一样顺理成章了：

二月八日，“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

二月十一日，革联派宣布市文联三个反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二月十二日，大田湾体育场举行革联会成立大会，欢呼“新山城”的诞生。砸派到场造反未遂，是夜又去《重庆日报》抄砸大会报道铅版。公安机关以砸坏有毛泽东照片的铅版为由抓捕为首人员。军队旋即开入报社实施警卫。“新生红色政权”已经建立，整个社会需要秩序，再由不得任人胡闹了。革联会发布《公告》。《公告》第四条称：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同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被革联会一派群众砸抄。

接下来，十四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驻重庆分点、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等，被革联派砸抄……

尘埃似乎已经落定，一切皆成定局。被囚禁在马家堡某军事院校的罗广斌深感大

势已去，遂于十日早上八时许坠楼自尽。

他是从三楼的窗口跳下来的。离地距离为一千零七十三厘米。头先触地，头颅从鼻梁起向上，正好裂为两瓣，很像美国科幻电影里机



罗广斌自杀的后军 242 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八一楼外观(罗是从靠里的那面跳楼的)。

器人被砸开的外壳，碎脑荦荦可辨。朝上的半个脸，大眼犹愕然圆瞪，蹦之欲出，另一只眼则紧闭着，半个脸乱血纵横，脑浆、头发、碎皮……像机器人头壳里崩出的散碎零件，绽得满阶满地，其状恐怖万端。据笔者保存的资料，现将整个过程的介绍照录如下：“从二月五日叛徒罗广斌被抓到畏罪自杀，一直由建院八一八等革命组织的三位战士看守”，“二月九日，某院校广播了罗广斌的罪恶历史，叛徒罗广斌十分恐慌，情绪反常。九日，罗广斌开始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当晚十二点后才睡觉，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十日晨八点，罗到三楼卫生间洗脸和解便，看守人员小张（重庆建院八一八战士）在厕所外面等候，约两分钟，小张不见罗出来，回头看时，罗已趁机爬上窗台，张急忙喊了一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却从窗口跳了下去”……



罗广斌坠楼自杀现场，其景让人多感不适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自杀？还是他杀？事后曾被两派、尤其是替他打抱不平的砸派炒得沸沸扬扬。尤其引人

注目的是：专门喜欢为“受迫害干部”翻案、并翻案成功的中央文革嫡系宠儿：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在罗广斌身亡后的第一时间，很快就将为大作家翻案作为重头戏列入议事议程，雄心勃勃地开始运作——事情一直折腾到第二年三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的会议上，口含天宪的江青一锤定音，曰：“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两派从此哑然，谁也不愿、也确实再没有在由主席夫人铁板钉钉的事情上继续浪费口舌。

一代才子罗广斌，就这样悄没声儿地成为了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第一道祭品。

重庆文革，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开始，吵吵嚷嚷闹过许多回惨案。“八二八”：被市委和保守派渲染得天昏地黑，没有死人；“一二·四”：被造反派、包括罗广斌本人，渲染得天昏地黑，也没有死人。夺权了，一切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却死人了。正是曾经为莫须有的“文革烈士”大喊大叫的罗广斌自己，反倒成了重庆造反的第一位殉道者。他太性急了，连扑向死神的怀抱也那么急急匆匆。

上面提到的照片，共十五张，除了关于尸体不同角度的照片外，还有这样两张图片和说明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猜测罗自戕前夕的悲楚和犹豫。图片十四：“二月九日（自杀的头一天），罗就在语录本内的一张照片（‘渣滓洞监狱’）的背面留下了遗言‘这本毛主席语录和这张照片是胡蜀兴（注：胡为罗广斌夫人）的’”。还有图十五：“叛徒罗广斌进厕所时，把围巾、呢帽、华达呢皮袄一件挂在厕所内。皮袄内有手表、钱、粮、毛主席语录本、照片等物。叛徒罗广斌把名贵的皮袄（貂皮领）、手表、照片等物留下来，正是他自杀前的准备”。

我的这些资料是因一个偶然原因保存下来的：一九六七年六月，重大八一五为了反击砸派攻击，在我们印刷厂印了一份对开幅面的宣传材料。前面提到的照片和相应的说明文字，就印在那上面。纸质不错。印数太多，没发完，一直就堆在报社角落。冬天了，闲来无事，我想钉一个本子抄些二胡曲谱，就检来一摞，裁成八开大小订成一大本。几十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才忽然想起这本乐谱，于是翻找出来，一页页撤开：那些可怕的镜头重又由几十年前跳到我的眼前。照片的背后，全是我手抄的、年青时候倾心钟爱的乐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山村变了样》《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金珠玛米赞》……将纸页的两面对照检看，我觉得真是对那个年代绝好的嘲讽。

罗广斌一生向往革命，为此不惜背弃优裕的权贵家庭。国民党把他投进黑牢，共产党对他却并不宽容。他曾用横溢的文学才华抗争，成功了，是令人羡慕的巨大成功，但丝毫没有改变尴尬的处境。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儿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确信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抗争——这

恰恰是他的弱项。他想重登彼岸，却被一脚踹进了没顶的惊涛骇浪。他是一只扑灯蛾，一次又一次扑向光明，最后却被无情的火焰整个儿烧毁：这就是罗广斌的故事。

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不是的。而是：我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化革命的悲剧性逻辑。

第八章 复刊：一场虚惊

《8·15 战报》自一月二十七日休刊仅仅二十天，很快又复刊了。

重庆八一五派一月二十四日顺利夺权，二月十二日正式成立“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应该说大功告成了。什么是政权？按林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习惯语言”，就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既然八一五已经拥有了重庆市的“镇压之权”，报纸的作用本来就可有可无、可大可小了。事实上问题却并非这样简单。去年八月那会儿，重庆市委不也拥有绝对的镇压之权吗？重大八一五照反不误！年轻人、尤其读了点儿书的年轻人，捣起乱来从来认死理，更何况他们确信背后有最高权威撑腰呢。现在砸派的情况也一样，他们也确信背后有北京撑腰，何怕之有？革联会“新生红色政权”初裹襁褓，弱不禁风呢！重大八一五对刚刚到手的权力忧心忡忡呢！舆论阵地怎敢轻言放弃？这就有了停刊二十天匆匆忙忙又复刊一节。

复刊启事“告读者”煞有介事地说了：“从《8·15 战报》休刊以来，某些人利用报纸这一阵地，歪曲事实，借题发挥，向重大八一五和‘革联会’发起进攻。他们这样作，严重地破坏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运动的大方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应广大工农群众的强烈要求，我报决定从本期起暂行复刊。”

我查看了日记，复刊决定是在二月十五日作出的，离革联会成立仅过三天。虽然精神领袖罗广斌已经自杀，砸派的几次行动都受挫败，但捣乱活动却从来就没停止过。即使“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如此隆重庄严的事——就是我那篇挺恶心的文章“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大肆讴歌的那次大会，他们也捣乱。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关于那次捣乱，引用侯念平同学的日记的描述就够了：

二月十二日。今日全市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欢庆重庆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宣告新山城诞生。但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策划、操纵下，造反军、西师八三一等，借大反重大八一五右倾为名，妄想破坏革联会，他们昨日晚冲进了大田湾会场，赶走了守卫的解放军，几千人占住了主席台，破坏我们的会场布置，撕毁标语……。我们团担任会场服务，我们到时，气氛很不对，有一些人动摇了，问我们会还开不开，我们坚定地宣布，会一定要开，而且要开好！在红号兵带动下，我们冲上了主席台。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奋勇向上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我们冲上去了，红旗插上去了，在一片欢呼声和歌声中我们冲上了主席台，经过艰苦的斗争冲进了广播室，抓住了打人的几个凶手。我们胜利了，大会顺利召开了，阻力排除了。这对那些妄想搞垮革联会的混蛋们是多么沉重的一棒啊！

砸派脾气之倔强，不撞南墙不回头，由此可见一斑。八一五不敢掉以轻心了。

那一期报纸基本上就没有咒骂走资派和保守派的东西了。除了第四版，其余三个版面全都一哄而上，对砸派大批特批。头版顶头通栏，是毛泽东那首挖苦帝、修、反的著名诗词：“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接下来是装腔作势的编辑部文章：“一唱雄鸡天下白”，接下来是“树立革联会的革命权威”“紧紧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再接下来，三版整版，刊登了二月六日重庆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辩论会上周家喻发言全文：“铁的事实，不容歪曲”。周的发言就事论事，介绍了夺权前后的许多内幕，编辑部文章则耸人听闻地宣称：“无产阶级要夺权，资产阶级要反夺权，这就是当前斗争的焦点，也就是当前这场内战的实质。”文章非常轻松地栽赃“走资派”说——反正人倒了霉，你怎么泼脏水都不会有风险——过去“拼揍一些保皇组织，操纵这些保守派的群众去斗造反派的群众。而到了今天，在保皇组织纷纷垮台、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新形势下，这些老爷为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苟延残喘，保护自己过关，他们便采用更阴险、更狡猾的手段，纠集一些社会上的牛鬼蛇

神，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利用革命队伍中的个人野心家欺骗一些‘热情高涨’的群众，挑起造反派群众斗造反派群众……我们必须透过造反派打内战这个现象，看到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继续的实质。我们也必须透过这场内战中大量的内部矛盾这个现象，看到我们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敌我矛盾的实质”。

说句公道话，一九六七年二月那会儿，当权派们一个个早被搞得焦头烂额，哪有条件幕后指挥？他们已经成了代表邪恶的政治标签，只用将此标签往其身上一贴，那厮必死无疑。正如几日前“血统论”大行其道，只要说你爹你妈七大姑八大姨祖宗十八代有何种红疤黑迹，立刻你就成了“狗崽子”，只能乖乖地让贵族崽儿来打你个七窍流血遍体鳞伤。中世纪的宗教审判有一个最简单、轻而易举便致人死命的罪状，叫：“魔鬼附身”。文革定人死罪的附身“魔鬼”名目似乎更为繁多：“黑五类”、“走资派”、“恶攻”“反对毛泽东思想”……比中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

复刊号发排完毕，吴庆举和另外一位同学匆匆忙忙来编辑部找我。这位同学名何国光，电机系五年级学生，瘦高个儿。何同学生性耿介、愤世妒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愤青”典型，虽为工科生，却对政治和文学兴趣最甚。文革风潮过去了许多年，我每回重庆与他见面，或乘车、或步行，他依旧喜欢在公众场合大声疾呼地针砭时政，包括对现任领导评头论足，像建筑工程师在脚手架上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他太关注政治了，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辞世，政治理所当然就开始关注他。收拾他的一个流行罪名：四人帮“黑打手”“黑爪牙”之类，此后他才慢慢收敛些。再后来他开始用全部心力来从事收集活动：从收集作家签名、到邮票、到首日封、到实寄封……总而言之，极其微薄的工资和精力全被他耗在了那些破玩艺儿上，因而越发清贫超然，老婆也越发不高兴——某社会杂志撰文介绍何先生无怨无悔的集邮生涯，专门描写了夫妻之间的这段龃龉，以说明何为人为事的执着。破邮票把他精力消耗得所剩无几，针砭时政这才反而变得了十分业余。

文革那会儿何国光针砭时政当是极端专业的。吴庆举自不待说。两人一起来找我，肯定是关于时政文章写作的事。吴递给我一沓信签纸，写得密密麻麻的，果然大块文章。造反派的文章一律越写越长，皆因深受中共大骂苏共的所谓“九评”影响，总以为掌握真理多寡和文章长短具有线性比例关系。吴告诉我说该篇文章已和何同学推敲三天。马上要送松林坡礼堂的辩论大会发布。吴对该文到会上一炮打响信心十足，一如当初他的“走一二·九道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样将革命再掀高潮。这回吴文的长度恰恰让我深感不安。我认为需要理性却更需要刺激、不是接受喝彩就是遭遇喝倒彩的群众大会，恰恰该是斩钉截铁的煽动，而不是拖泥带水的长度。革命时期需要舌头比头脑跑得快些、更快些。不幸的是，吴的舌头和头脑相比，总显得慢慢吞吞。我的看法给他俩兜头泼了一瓢冷水。时间实在来不及了，二人不得已拿着厚厚的文稿，心存侥幸去了松林坡礼堂。果然不出所料，还没过半小时，吴何二人便灰溜溜回到编辑部，一脸无奈苦笑，说是刚上台就给哄了下来。他们要我马上救场。

我抓紧按他们的观点重写了一则短文上阵。所谓短，也是相对而已，实际也有好几千字。文章一开始就来了三个咄咄逼人的排比：“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谁谁谁，他们如何如何；“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牛鬼蛇神，不是别人，”正是谁谁谁，他们如何如何；“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个人野心家，不是别人，”正是——当然就是首都三司、西师八三一、川大八二六之类了。一阵满堂彩。文章接下来挖苦：“他们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时代，躲在个人主义的蜗壳里气都不敢吭一声，现在，革命快要胜利了，他们于是跃跃然蹦出‘峨眉山’，摘桃子来了，”话犹未了，全场又是鼓掌。骂过之后，很快来一段假惺惺的自谦之词：“重大八一五有没有缺点错误？有。可不可以批判？完全可以，非但可以，而且热烈欢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更不是什么‘老虎’……我们要恭恭敬敬地永远作劳动人民的儿子，永远作革命人民的小学生。我们愿化为革命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子，让时代的列车在我们的脊背上滚滚地通

过！”此时已掌声雷动了，继续念完，又是掌声：PASS！我又一次比谁都更陶醉。

这就是发表在《8·15 战报》第十期的编辑部文章：《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永远当革命人民的小学生》”。该文和前一期的编辑部文章相比，没有任何新内容，无非更加煽情而已。复刊后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也几乎全是一哄而上的论辩文章。无非砸派如何如何的不是。除了《我们》一文外，其他文章题目分别是：“就《首都红卫兵报》造谣攻击我山城革命造反派一事，《8·15 战报》发表严正声明”，以及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标题下，加编者按转载的《首都红卫兵》报三篇文章，还有“革联会必胜”，还有“廉罗站丑态百出，分裂会呜呼哀哉”，等等。

八一五对自己的胜利太在意了，以至于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灾难竟然全然漠不关心。其时，一件即将从根本上改变四川政治格局的、非常要命的事情正在降临，并且很快就波及到八一五自身的命运：对此我们竟毫无知觉。如此重要的事件被我们放在了极不起眼的、只有几十个字的《简讯》栏目。一条是：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的一封信，信件指出：“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并严重警告川大八二六：‘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不知此时，川大八二六的难兄难弟西师八三一和三司驻渝联络总站作何感想？”另一条是：“二月十九日，‘左’得可爱的川大八二六，全团辩论结束后，确认大方向错了。并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请罪；向全国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请罪。”消息证实了文革期间著名的四川“二月镇反”开始，十万人被抓被关。巴蜀大地，冤狱遍于域中。

在行政区划尚属于四川省的重庆，得五十四军荫庇，这儿的八一五侥幸躲过了此一厄运，风雨不动安如山，而与川大八二六结为同盟的西师八三一，显然在劫难逃。他们真的要完了。

《8·15 战报》迫不及待的复刊，看来确实只是一场虚惊。到了三

月三日出版的第十一期，一切都已风平浪静。几乎和《人民日报》一样，通版大好形势，全是莺歌燕舞了。第一版是“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其余几版也都是些什么“关于全团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草案）”“坚决按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办事”“砸烂私字，树立公字”等等。看来真是有点“革命成功”的意思了。

必须一提的是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战报第十期还有一则纪念碑性质的消息，这就是对所谓西南地区“最大走资派”李井泉的批判，二月十九日打出了一个高潮。

这一天，正式以重庆市最高临时权力机



重庆批斗李井泉大会主席台

构革联会的名义召开了批斗这位西南局前书记的大会。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及重庆市委领导鲁大东、廖苏华诸人陪绑。他们一律被年轻人以手摁顶，反剪双手、弯腰、低头、挂黑牌。会毕，以毛泽东大幅油画像为前导，驻军部队开路，将李、鲁一行武装押解游街示众。画幅上的毛笑容可掬，对于这帮当年忠心耿耿跟他打天下，而如今低头受辱的的蒙难者，毛的笑容显得有些幸灾乐祸。

批斗大会的地点是珊瑚坝。这是长江水道上一片江心岛，水枯时节便和北岸连一起了，坝中还一直保留着抗战时期修建的飞机跑道，整个儿就一天然的大会场。小报的消息称参加批斗会的人数达六十万，估计不会有太多水分。笔者当时在场，亲眼所见，整个坝子一早就被人群和红旗挤得满满当当，我去时稍晚，只能远远站着看，以我非常好的视力而尚无法看清台上情况，堆积在我前面的人群应该有若干公里的范围了。重庆的雾是有名的。初春的雾霭把江两边的石岸和层层叠叠的城市建筑全都隐去，眼前这无边无际、满是喧哗与骚动的小岛

成了我眼中的全部世界。消息称：“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深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镇压和迫害的山城广大革命造反派，早就对李井泉恨之入骨，直欲将这个土皇帝千刀万剐而后快。”故而“砸烂李井泉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之类的口号在长江河谷萧萧风雾间显特别震撼人心。我所保留的那一期报纸已经存放得很古旧了，但从第三版上共五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上，仍能清晰感受到批斗现场的肃杀之气。其中有一张李井泉的大特写，面部已很不甚然，只看见他的头被一只大手死死摁下，嘴吃力地微微张开，痛苦地向前咻咻喘气。头发掉光了，更显出一番特殊的凄苍老迈。后来我查过了：李，江西临川人，一九零五年生，算来当时不过六十一岁。六十一岁而显如此苍老，定然是平时用脑过了度。看见这幅尊容，实在说吧，我有些同情他——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太老了。

八一五造反不久就开始“打倒西南土皇帝李井泉”，在我看来，当时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已，说到底，也就是因为他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他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个“路线”和“道路”，本身也很模糊。让我真正对这个大人物憎恨并且不愿原谅他是在后来，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我看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先生的一份揭发材料。揭发材料非常肯定地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六零年，自古丰饶富庶的四川大地饥荒满地、饿殍盈野，这时的李井泉仍然强令农村实行高指标高征购，将濒临绝境的农民们的救命粮送去北京邀功。当年的一次会议上，这个珊瑚坝批斗会上显得可怜巴巴的老家伙，咬牙切齿地说了：

“你们说四川饿死人好？还是北京饿死人好？我看四川饿死人好。”

揭发材料很自然地勾起了我对长达三年之久的饥饿漉漉的刻骨回忆。一九六零年秋，饥荒像瘟疫一样从农村向人心惶惶的城里蔓延，城里人开始省吃俭用，攒粮食攒粮票备荒——就在当年的九月一日，一个官方“通知”让四川百姓全体震惊：省府当局突然袭击，宣布省粮票全部作废！政府出此臭招，直教四川父老茹苦含辛积攒下来的“四

千八百万公斤地方粮票”顷刻间灰飞烟灭！此举对百姓、还有政府公信度的打击，不啻雪上加霜！此举对四川省的社会生活影响如此深刻，难以回避，以至四川省委在文革后编写《大事记》时，将上述事实和数据明确地载入了史册。

这还不够。作为中学生，让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当局接着发下话来，号召所有人等一律“自觉要求”减低定量，为国家节约粮食。事实当然是你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反正都得减。大会动员，小会表态，吃饭一旦上升为政治问题，谁人敢说半个“不”字？中学娃娃标准定量三十二，一律“自愿”减为十九斤。粮食的紧张本来就意味着副食品全面消失。少年人正长身体，正需要营养，每月吃十九斤食物意味什么不言自明了。课间聚于走道，睡前躲进被窝，少年人谈说的、争论的、渴望的永恒热门话题都是什么时候吃过什么好东西。任何一种食物品名、原材料、调味品，包括每一个加工细节，全都如实道来，说得津津有味，无一遗漏，直说到馋涎欲滴、无法忍受便戛然而止，最后总是一声长叹：

“这辈子啥时能再吃到一嘴红烧肉就好了！”

一九六一年我进了大学，继续被饥饿折磨得夜夜无眠，恶卧床榻，来自巴蜀各地的同学依旧只能做着关于红烧肉的梦。还有就是喜欢攀比“你吃过的最糟糕的食品是什么？”。我这个城里孩子算是幸运了，最多只吃过枸树叶，吃后三天没有拉出大便。其他的农村同学则全如神农尝百草，树皮、草根、土茯苓、芭蕉根、干猪草，死老鼠……什么都吃。包括神农氏绝对没有为人类尝过的观音土。只是吃了以后，必需用竹棍子到屁股眼儿去一点点把大便抠出来。

几十年后，有关的历史记录已经很多了，近读《姚依林百夕谈》，其文证实说，当时“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一九六零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

地。”我对明朗先生的揭发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他作为地方官员，毕竟第一个站出来说明了真相啊！有点像安徒生笔下那个勇敢的孩子，向皇帝说了：你身上什么也没有穿呀！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三年，我去四川南充市参加一个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的笔会，市委领导曾举办酒会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我与一位市委老干部邻座。席间，我突然想起：该市不正是文革前李井泉长期蹲点的地方吗？老干部回答说是的。对方在文革中定然也是受过冲击的。出于礼貌，我说，李井泉在文革中搞得也够惨了，老婆肖里上吊，儿子李明清被打死，算是家破人亡了。

不料老干部非常肯定地打断我，说：你只看见他家破人亡，你不知道在四川，他把多少人搞得家破人亡！

下面是我一九六七年的日记：

三月一日

春天来到了嘉陵江。

在那温暖的阳光下，在淡淡的蓝雾里，山格外秀丽，路格外明亮，而那一片片洁白的沙滩中间，瓦蓝瓦蓝的江水托着一只一只的木船，慢慢地流向远方。江边，树在发芽，鸟在喧噪……

经过一个冬天风寒考验的山城，在春天，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我们的战斗，不也这样么？

三月四日

春天来了（不是吗？不知不觉，已是三月了）春天，对于我，总是这样使人感到快慰。我们要不了多久就要分配了，我非常渴望到一个很边远很边远的地方去，干一辈子革命……过去那些雄壮威武的幻想，缠绵悱恻的私情，化为飞灰，飘然遁走了。留下的，就是作一个勤勤恳恳的人，作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民勤务员。这就是我一生的理想。”

三月六日

下午，原准备去参加段大明的检讨会，去晚了，都散会了，一个人跑进大礼堂转了一圈。这是我到山城五年多来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

当我踏进这个雄伟壮丽的宫殿般的大厅的时候，心潮起伏，激情汹涌。我想起了一幅画：十月革命攻打冬宫后，两个水兵正在安静的大厅里吸烟。华丽的大厅在战斗之后，弹痕斑驳，满地狼藉。这时候，我自己不也在走进一幅历史的画卷么？看一看几个月来大字报和标语的废迹，我觉得，这些不就是一场激战后留下的弹痕么？

我非常高兴。我沿高高的石梯奔跑，我真想迎着满城的东风豪迈地歌唱：“我们献身过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这些日记于现在读来，我觉得自己整个儿就像一个傻 B！

说什么大好形势呢？说什么暗藏杀机呢？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些偏居西南一隅的娃娃们的功劳或者过错，而仅仅是八一五感觉最迟钝的高层斗争的投影而已。

第九章 四川大镇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国最为震撼的事件，当数几个老师老将的所谓“大闹怀仁堂”。

关于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老百姓是在一年多以后，即一九六八年十月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即把国家主席正式定义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那次盛会之后，才极有限度地得知。此前大家只听说有个“二月逆流”。

正式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是在风雨操场进行的。那时时候大学生对于文革、甚至对政治整个儿都厌倦透顶。大家懒洋洋地到操场来，只不过闲得不耐烦了，想来听点儿域外传闻散散心罢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队长在台上，且不管盆地状的操场里如何一片乱哄哄，只管对着笔记本照本宣科。大队长姓戴，来自重庆中梁山煤矿，由一个普通煤矿干部而莫名其妙派来管理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他是不是有点力不从心？总之，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永远穿一身颜色暧昧的灯芯绒，成天忙忙碌碌，像是随时准备出席什么重要的、或可有可无的会议，总是一脸随遇而安、但求无过的含糊之情。大队长危言耸听地告诉大家，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有人大闹怀仁堂。某某某如何如何，某某某又如何如何，某某某大拍桌子，以至拍断了手骨，云云。传达中只有谭震林是直呼其名了，而且谭对党发起进攻火色最足，说他一不该革命，二不该入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四不该活到六十四岁。说他跟毛革命四十年，到四十一年不跟了。说罢拿起皮包拂袖而去。某某某忍无可忍，断然一拍桌子，让他回来。接着某某叫嚷：“不要走！留在这里跟他们干！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总之，原来在年轻人心目中无比神圣的高级干部，一个个都肝火甚旺，都喜欢拍桌子。某某某也是拍着桌子发言的。他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传达完毕，我的印象就是一堆

不知所云的“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我算过，老帅中除了陈毅的姓名字数为二，其余都是三个，因此，除了晓得哪几句话是陈老总所言，晓得有人敢于和毛公然唱对台戏，剩下的就莫名其妙了。这个传达给八亿百姓一体周知的大会文件有点像高僧们打坐于古屋青灯之下唱偈说禪，故弄玄虚，局外人只能于五里雾猜哑谜。此不能不谓现代政治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不知是在军方气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暂时让步？还是毛本来就喜欢翻云覆云？总之，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显然对造反派大大的不利。“八条”开宗明义便宣布：“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这样一个在造反派看来很不顺眼的文本，毛泽东却非常痛快地当天便批了：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既然最高统帅签了字，对于刚刚介入地方工作、被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搞得晕头转向的军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桩深感鼓舞的利好消息。四川文革史上有名的“二·一七信件”，即所谓“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的信件”，就是在怀仁堂事件第二天、即二月十七日发出的。那封信如此霸道和毋庸置疑，以致于“兵团”和“八二六”这两头四川犟牛不得不马上低头认罪、并“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请罪；向全国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请罪”。来自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的信件毫不客气地警告军区门前围坐了六天七夜、看来还不打算离开的群众，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种只该出现在交战国之间、或者两个对立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恫吓威胁之语，出现在中央最高军事当局给群众的信中，实在太不相称。

信件肇因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对成都军区的围攻，而关于围攻军区的起因却有点儿含糊不清。按八二六的对立派“红卫兵成都部队”（俗称“红成”）所写《暴风雨中的成都》的说法，情况是这样的：一月二十九日，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成都市公安局查

抄“黑材料”，被成都军区派员逮捕。三十日，兵团、八二六发表第一号声明，支持成都市人民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对此事件发表的《最紧急呼吁》；支持解放军成都部队镇压这次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动。《呼吁》称“这一行动干得及时，干得坚决，干得好。”第二天情况变了：兵团、八二六发表第二号声明，宣布“一二九”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被捕七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兵团中坚，基层骨干。接着就组织人员对军区实施围堵冲击。著名文革学者徐友渔的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谈及成都军区被围一事，起因则是军区机关造反派（名字好像叫“红纵”和“千钧棒”——笔者按）被镇压而引起。八二六为了支持军内造反派，遂组织人员前往静坐示威。川大八二六带人围堵成都军区南营门，北地东方红带人围堵成都军区东营门。

政治事件从来不关心原因，对道德评价也从不过问，它只关心结果。围攻成都军区的起因到底是什么？中间有什么更为微妙的东西？中央军委信件的用语是否有失身份？这些都不重要，反正信来了，是冲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来的。这是问题的实质。

信件以电报形式发来。其时成都已近午夜，春寒料峭。成都军区一位青年参谋拿着电文来到营门口，像外交发言人一样干巴巴地向目无王法的造反派宣读，而后扬长而去。晕头转向的示威者们始而不知所措，继而如四川歇后语所说：“鸭子死了嘴巴硬”，继续不依不饶地大喊大叫，诅咒成都军区领导“韦杰、甘渭汉之流”伪造假文件“罪该万死！”；继续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继续威胁军人“镇压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而脑瓜机灵者、包括一些头头，已经暗中开溜。中国的权力当局有时候说话是很算数的，一旦动起真格来，嘴巴再硬的勇士也得怵着三分。

事实是，发言人宣读信件的同时，整个成都已在调兵遣将。独立师的子弟兵们已把所有路口围困得铁桶一般。我一位中学同学，军区子弟，上大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其时正随该校声名显赫的“东方红”驻成都机构“红色堡垒”成员一起静坐，见势不妙，率先跟学院的宣传车撤了。伯母是个老军医，惊吓连连地要儿子速速逃离军区大院。

路口已封，整个成都已是兵城一座。诗人何其芳在《夜歌和白天的歌》里曾这样写过：“成都/又荒凉又小/像度过了无数荒唐的夜的人/在睡着觉”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成都，已度过好几个荒唐的夜了，这一夜却无法入睡。像是在寒夜里等待奸杀，不敢惊呼也不敢挣扎，只能战战兢兢等着厄运降临。我的北地同学不敢坐车，徒步出城，夤夜翻过了冬寒凄紧的龙泉驿山脊，远远避祸他乡。后来知道，军区门口没撤走的人全部落网。

面对军人铁腕，川大八二六的造反秀才除了投降，还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下面的情况，是笔者从当时成都一份叫《八三一战报》上摘抄的。小报系八二六对立派所办，现照抄如下实，无大出入。我抄下它们，是想见证六十年代真诚追随革命的大学生是多么可怜、可悲！如今读来，犹让人想替他们痛哭一场：

二一七信件下达以后，八二六到处写巨幅标语：“二一七信件是党和毛主席对八二六战士的最大关怀！”“欢迎解放军进驻川大镇压反革命！”等等；

二月十九日下午，中文系分团在校内游行请罪，化学系到军区门口请罪；

二月二十日上午，八二六勤务组发出给毛主席的请罪电；

二月二十一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上街请罪。他们到人民南路（即现在的天府广场——笔者注），一声口令，全体下跪，去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以示请罪。

.....

“二一七信件”印成万千传单，由空军驾机在全川散发。传单凌空飘飞，如乱雪骤至。锋锐凌厉的四川大镇反顷刻间寒流急卷，横扫巴山蜀水。据有关资料介绍，短短十余天，全省逮捕“人犯”已达十万。

重庆大学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还有纵队同学多名亦被抓捕——虽然他们是重庆军方的铁杆拥趸，虽然不久前，他们“智

擒李井泉”的故事广受赞誉，这毫不影响成都军方的无差别镇压。他们被投进了临时监舍：大慈寺——其余正规监狱早已人满为患。

郑全体，采矿系六六级学生。为人处事都激情奔放，干劲十足。大学毕业后他分配粤北平石矿务局挖煤，多次刷新日掘进尺新纪录，颇得领导、群众赞誉，于是很快入党，接着还决定把他升任为矿务局局长：就在此时，重庆大学的一纸公函到了，历数他文革中多种罪愆——尤其是该郑公然在“一月革命”期间带着中央办公厅电报，秘密去上海缉拿躲在市委瑞金街招待所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要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回四川接受批判。这段历史过错实在太严重。局长自然当不成了，不仅如此，连党籍也顺便取缔，从此后他心灰意懒，稀里糊涂地混呗——直至退休归家。

几十年后，我去佛山看他——他已经调那儿一间中等专业学校教书——五十左右的他已脸面松弛，神色萧索。无言相对许久，我真诚地对他说：不管怎样，咱们曾经真诚地努力过吧？咱们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过去吧？别让人看我们的笑话不是？他平静地淡淡一笑，对我说，他根本不想回忆过去，现在他只想做一件事：怎么多挣钱？那一刻，我莫名其妙想起了辛弃疾的一句诗：“还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心中暗暗有些苍凉。

关押郑全体等人犯的大慈寺系千年古刹，唐代高僧玄奘曾于此修行过十余年，不承想文化大革命偏偏让此佛门净地客串了一回“渣滓洞”角色——洞里动静一时成了全城舆情关注的热点。“二月镇反”被否，牵肠挂肚的庶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整天围堵在监狱兼古刹门口看热闹，一旦有人出狱，四周便一片鼓掌欢呼，凑热闹的三轮车夫动作麻利地一蹬而上，得意洋洋地免费接送受难者回家。郑全体等所有重大同学也释放归来，回校后笑谈中共的土牢生涯，很骄傲地以为自己的表现很有“渣滓洞”英烈遗风。历史真会开玩笑。

不光成都，重大八一五在川内各地县串联的学生也多有被抓捕、捆绑、刑讯者。资料介绍，江津军分区支左领导小组主持，由永川专区公安处造反派组织出面开始“镇反运动”，先后共逮捕二百三十七

人，刑事拘留七百四十六人。二十二日，万县军分区宣布“主力军”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重大学生和当地造反派骨干多人落网……还是回到重庆。

如果说“二月镇反”是以四川省范围内以军人为代表的反文革势力对造反派一次大规模报复，那末，公正地说，重庆的情况确有些特殊。以重庆大学为首的八一五派，确实是名正言顺的主流造反派，重庆驻军确实是真心实意支持他们的。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还有工人造反军，这些组织也是造反派，但只是支流。就人数、名气和资历（中国人很喜欢讲资历）而言，当时他们和八一五尚不在一个档次上。既然八一五、从而重庆驻军如此稳健地控制着局势，大规模镇压反对派就没有必要了。这儿说的是“大规模”。因为反对派不多，镇压起来相对简单，而且常常压根儿就不需要荷枪实弹的大兵出面，窜唆几个八派的群众，让他们自己斗斗就够了。他们互相之间不是已经仇恨得咬牙切齿、像乌眼鸡一样吗？重庆的镇反规模大不起来。下面是具体情况：

二月二十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再次遭到八一五派砸抄。三司人员上街做毫无实际意义的游行以示抗议；

二十日，“联络站”被八一五派砸抄；

二十二日，重大八一五及沙坪坝区大专院校、中学学生及工人造反派，出动宣传车及卡车二十多辆，满载人员前往北碚大闹西师校园，实施所谓“会战西师”。八三一纵队被迫“开门整风”；

二十三日晚，革联会组织人员砸抄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多人被抓捕、打伤；

二十四日，革联会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按照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紧急通知，部署镇反，决定由市革联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联合组成“打击现行反革命指挥部”，随即自上而下，建立各级镇反领导小组及“打鬼队”专事抓捕“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

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等组织还有过几次比较大的活动，但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无非让老百姓感觉他们的倔犟和革联会的宽容，为政敌最终翦除他们提供一些借口而已。二月二十七日下午，革联会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一个的斗争鲁大东、解放辛易之的大会（关于这次非常滑稽的大会，笔者下面还另有记述），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进城示威，扬言要到大会造反。革联会早有布防，令军队在上清寺一带戒严，游行队伍被拦截于嘉陵江大桥至上清寺一带动弹不得。还有，三月八日，联络站及北京南下红卫兵数千人以纪念“十六条”发表八周月为由举行游行，同样在嘉陵江桥一带遭遇阻截，由八一五中坚：六中 32111 战斗团及八一兵团出战，两方冲突至深夜乃止。

嘉陵江桥头遭遇战前一天晚上，八三一头目周荣北京归来，预感气数将尽，意图出奇兵绝路求生，突然宣布接管西师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发表声明“支持”革联会、拥护驻军决定。此举旋遭“春雷”战斗兵团造反。

“春雷”是从八三一分裂出去的温和派组织，铁定投靠八一五。因为政治立场温和，作为师范院校，学生本多女性，所以在反对派的漫画中，“春雷”总是被描绘成娇滴滴窈窕浪女；与之配套的重大八一五，工科大学多赳赳须眉，总是被状为厚颜无耻的莽汉。莽汉总喜欢在漫画上搂着浪女淫狎调情。在全国都纯洁无疵的革命年代，这类漫画很吸引眼球。娇滴滴的“春雷”向八三一造反，肯定是与军队串通一气的。事变甫定，北碚驻军立即宣布西师八三一为“右派组织”，勒令解散。第二日晚上，革联会所属的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四川外语学院“星火燎原”战斗团，还有喜欢凑热闹的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几十年后，“星火燎原”的头领金某某谈起当年在网球场接受失败者“破旗受降”，仍旧兴奋不已——该场景显然定格成他生命的高峰体验。是夜，周荣等七人被捕。

九日，驻军对后字 242 部队（后勤工程学院）实行戒严，宣布取

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拘捕三十多人，同时抓走驻该院的其他反革联红卫兵二十九人。

十日，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砸烂该院九一五战斗团团部。头头八人被捕。

十一日。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开除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河运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联络站各成员组织纷纷落马。大街小巷，到处一派请罪声。偌大山城，除了“革联会好得很”，已无戚戚杂音。街上已看不到大字报，亦没有了铺天盖地的标语。天下太平了。

在这种背景下，我正式离开了《8·15 战报》。总团通知我，说八一五已经掌权了，原来市委的机关报《重庆日报》就算是咱们自己的报纸了。革联会决定从主要院校各抽一人到报社参加工作，共八个人，组成新的言论班子。我被封为“言论组”组长。《重庆日报》于二月二十四日正式改版为《新重庆报》，邓小平题写的报头当然不能再用，从鲁迅手迹中集字，拼出了新的报头。

离开《8·15 战报》，刘福一再挽留我，舍不得。他说你走了，我也不想再呆，说得动感情，差一点哭起来，这使我十分感动。事实是：如果不是后来的七月大武斗，我说不准也就再也不会回到《8·15 战报》了，也不可能有后来那一篇倒霉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我的此生际遇，注定将是另外一番人生风景。从一九六七年二月末到七月初，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足以让我有理由和报纸彻底绝缘。问题是性格使然，让我在离开了刘福和报社四个月后，再作冯妇，又回《8·15 战报》重新组阁。而远比我更为人情练达的刘福再没回来过，直到过了很久，他才通知我说他已与一位女士确认了“关系”。那时说“确认关系”，即指男女双边关系已同结为正式夫妻没什么区别了，只是尚未举行仪式和搬到一张床上生活罢了。女方是嘉陵江对面一个化工研究所的技术员，胖，待人热情得让你难以招架。我过江去看了

他们俩。小两口在仅可容身的小屋里煮了一碗很可口的面条招待我。那时候我对于政治我已心冷如灰。又到春天了，走出小两口的斗室，我看见江北的田野满目青翠，太阳在薄薄的云霭上面懒洋洋地播洒光辉。绿色的麦田那边，远远地，不知谁在播放乐曲：《苗岭的早晨》。我记得还在读中学时候听过这曲子。歌词的第一句是：“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悠扬的旋律突然把我拉回到只有许多好梦却对社会全然无知的少年时代——我渡江看望刘福这件事发生在一年以后，《大局已定》已被北京点名，它可能带给我的厄运已经让我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第十章 创办《山城战报》

现在需要建立秩序了。

作为舆论喉舌，《新重庆报》当然不允许乱发杂音，“言论组”也就形同虚设。组内七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成天便无所事事。报社招待所藏身于高楼间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雾重庆的天气本来阴暗，花台里初绽的新芽寂寞地报告着春天的消息，大家越发焦躁不安了。八一五派的“笔杆子”们成天呆在这儿，有点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寂寞与焦虑。当现实社会已经没有让人关心的事情，抑或人们压根儿就不再关心社会，剩下的事情就只有清谈。“言论组”成了地道的“清谈组”。来了好些天，任何实际工作都没干。

唯一的例外是来自重庆建工学院的张国祯。鲁迅挖苦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张国祯偏偏是北方人。老家甘肃张掖。北人“憨厚之弊也愚”。张从不参加清谈，他戴一付深度近视镜，成天只管扑在桌上笔耕不辍。他非常习惯按上面的意图执笔，只要有参考模板，他写起文章来也是个“日试万言，依马可待”的主儿。有他前台抵挡，其余七名调皮捣乱、最不喜欢按规矩出牌的才子干脆落得清闲，让他一个“劳动模范”埋头苦干好了——大家还一致同意给他起个浑名“张言论”，真名倒忘记了。

几十年后，我去贵阳公差，突然想起了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任劳任怨的北方小子已荣任贵阳铁路分局党委书记，于是趋前拜会，他竟热情有加，在火车站前那栋高档酒楼设宴款待我一人。贵州酒乡，他专开了一瓶或多瓶（记不起了）绝对正宗的“茅台”，谈笑间大展惊人海量，“饮似长鲸吞百川”。和我印象中那个沉默寡言的“张言论”完全判若两人。

实在闲极无聊，笔杆子们便今儿一个明儿一个地悄悄蒸发。我亦想趁机开溜，突然接到了一项新任务：要我去创办《山城战报》。

日记记录，创办《山城战报》是革联会三月五日会议决定的。日记还记录，鉴于如下三个原因，革联会要求各学校和组织的小报一律停办：“一，机器困难：全市今年印刷毛著任务大，一切印刷都得开道让路；二，纸张困难；三，《新重庆报》暂不能为革联会大喊大叫，因此按系统归口，只办《山城红卫兵》和《工农兵战报》”。日记中说的《山城红卫兵》是原来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机关报，一直办着的；《工农兵战报》则在创刊时改成了《山城战报》。三月八日，我奉命搬进市委大院住宿，正式开始了该份报纸的筹办。

《山城战报》社长是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简称总后渝办）的一位中年军官，慈眉善眼，为人宽容厚道。估计他从没接触过办报这行当，更缺乏和造反派打交道的经验，也不想为此粘惹麻烦，于是对我们非常放手。此外，他还明确确定编辑部由重庆大学和重庆师专的人员为主——这无需解释，四川群体造反最早的标志性事件“八一五事件”，始作俑者就是重大和师专。自家的孩子最心疼。两校的人绝对不会背叛自己、背叛革联会、背叛军队。

一年前的一九六六年七月，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出了两个很小、又很有名气的战斗队“排炮”和“轻骑”。他们的故事和名满天下的清华蒯大富、还有所有高校造反的故事一样，出名皆因惨遭工作组压制。一个月前的“六一”之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文革开始了。可文革到底怎么回事？如何搞法？除了毛泽东，全体中国人几乎都是白痴。而毛毛泽东翩然一只云中鹤，只管去西湖、滴水洞、黄鹤楼四方云游，故意把傻乎乎的国家主席留在京城瞎折腾。毛不是什么也不说吗？那就老一套吧：派工作组、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刘少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大专院校的运动搞得下不了台，毛又去武汉长江心情极好地游一把，向刘少奇宣示自己身体非常棒，这才回京收拾残局来了。重庆大学、包括笔者在内的“右派学生”如获救星，再次壮起胆来向工作组叫板，发誓“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重新搞得风生水响。“排炮”“轻骑”两个小不点儿早已不堪重压，忽听得胆大妄为的重大学生已

冲出校门去社会上大唱“造反歌”，“排炮”组长唐忠明遂带队来重大文工团找到吴庆举和我，要求声援。唐忠明口才极好，据说重庆著名评书艺人徐勍曾多次劝他：你何不改学评书？你干这一行绝对前途无量——这是后来的事。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那天下午，唐铁嘴直说得爱好虚荣的重大学生一个个义愤填膺，第二天就开出几千人马大闹师专校园，果然搞出个“轰动山城第一炮”——“八一五事件”。

重大造反人数数千，一出门就铺天盖地，前面还有军乐队开道，气势蔚为大观。而师专全部学生加起来不过数百，造反派就一百多。他们自诩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重大当然就成“中国”了。那年头据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修”完“修”尽，整个人类有幸只剩两个中流砥柱，关系绝对是铁定了……总而言之，中阿关系有多铁，重大、师专的关系就有多铁。

重大的代表当然我算一个。刘福——就是后来在贵州省当了一个正厅级磷矿党委书记的——也来了。刘办事认真，面面俱到，绝对一流的外交天才。能和他再度共事，我非常高兴。可惜几十年后，因为



写这篇文章，我兴致勃勃打电话向他咨询当年报社情况，却遭到非常友善又非常负责任的规劝，他说政治和历史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堆乱麻，要我千万别自找麻烦。后来我去贵州，面对面地再次向他谈起文革，双方竟差一点儿红了脸。他不仅断然拒绝了我的要求，而且干脆对我说：“还讨论这些干什么？你应该把文化大革命整个儿忘掉！”——这使我深感遗憾。参与编辑还有一个电机系叫胡潮正的同学，他

性格豁达，心气和平——主角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只要军代表发话，我马上就三板斧，而且通通大包大揽。“创刊宣言”《新山城是我们的》——我写。第二期大块文章，评西师八三一机关报《红岩》报：《二月黑风从何而来》——我写；第三期，二评《红岩》报：《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叛徒》——我写；第四期，三评《红岩》报：《评二月黑风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也我写。其他还有什么“八三一纵队一命呜呼，二四二红总寿终正寝/ 难兄难弟，一样下场/交院‘九一五’、河运校‘航锋’等‘反右’干将也纷纷倒戈。”“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历史宣判分裂主义者罪大恶极/三司驻渝总站十大罪状”……通通我写。为了说明当时心态，下面引一段“创刊宣言”：

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宣传员；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誓死捍卫者；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家；我们的《山城战报》，是天不怕、地不怕、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至于办报风格，“宣言”称：

她诞生在这个惊天动地、被“一月革命”的历史风暴所震撼的年代，她诞生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殊死的鏖战搏击的时刻，严酷的战斗，使她生就了一副英雄相！她没有半点折衷主义的媚骨，也没有一丝虚伪卑微的奴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山城战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毫不含含糊糊，毫不吞吞吐吐！

《山城战报》报头下明明写着：“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会主办”，革联会明明宣布自己是“重庆市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最高权力机构说话的报纸，观点竟如此横蛮偏颇，说明这个政权肯定有点儿问题了。

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一书中谈到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时，

有这样一段话：“完善的法律对个人的关系与完善的理性对激情的关系是一样的：那就是协调相互冲突的力量，以避免毁灭并增进整体的力量”历史上的所有政府都该是一个调节器。它必然通过政策法令和政治手腕（包括舆论）来协调各阶级、阶层、各社会势力、各利益集团的矛盾、乃至于冲突，使之达到平衡与和谐。让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在社会利益的蛋糕上分一块食。《山城站报》的话语系统哪儿像一个政权机关的报纸？完全是地地道道的派别喉舌。而革联会本身也如此，一开始就摆出压倒一切的姿态，事情注定只会越搞越糟。

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来的都是中文系学生，一姓李，一姓张，一姓冉，相对就内敛得多。其中李姓同学笔力最为雄健，颇多功力。报上的几篇短评，如“大江东去”、如“小议亮相”、如“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等就出自他的手笔。

除了文字编辑，技术保障都由专业人士担任。何文伟原系《重庆日报》编辑，老报人。头发卷曲有致，整天都和蔼地微笑着，很容易让人想起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看他一丝不苟地画版样、定字体、字号，我第一次知道编报还有那么多技巧。另一位编辑确实就是艺术家了，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版画教授：尹琼。山西人。他画报头、画题花、漫画，标题提字，从来精描细绘，兢兢业业。总之，从两位长者身上，我发现了许多年轻人的浮躁和大可不必的自负。人们很难把他们和“造反派”这个词联系起来。

报纸三月十四日创刊，由于有专业人士参加，又在《重庆日报》正儿八经的专业印刷厂印刷，从版面安排、版式、质量、字体多样性、美术水平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份报纸是有专业水准的。

报社有人属革联会“铁杆”，有人不惹事生非，自然就有不“铁”、甚至充当“奸细”者。四川外语学院派来的编辑代表就是一个。此人名黄贵。报社所有人员中，唯他的电话最多，每打电话他必先自报家门：“我叫黄贵，我叫黄贵”。黄系江浙小生，“我叫黄贵”的前三音吐字极其温柔，而最后那个“贵”字却发得崩儿响，像咬一粒刚炒好的脆豆。每次听他自报家门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他原

来的名字不就叫“阿贵”吗？如果让阿Q打电话，我想也该是这样自报家门的。

编辑部的同事从来不和黄贵开玩笑，因为他太一本正经。而他的一本正经肯定是自觉孤身落于虎狼之窝，心理上对外部环境有一种本能的警觉。他的独来独往和没完没了的电话确实很快引起了众人反感，并且很快发现该黄果然是砸派观点：电话一律小心而小声，像地下交通员向党组织报告敌情。一般小声打电话有两种情况：一是谈情说爱，一种就是告密。大家确认他属于后者：百分之百，他在向“组织”报告革联会内部情报。

众人终于忍无可忍。有一天——我的日记记载是四月二十四日——全体报人终于一致愤怒，先是有人上前指责他消耗话费太多，接着就直奔主题，质问他为何告密？争端一开，全体人员同仇敌忾，一哄而上，江浙小白脸自知寡不敌众，怕挨打，很知趣地虚晃一枪便开溜。编辑们余怒未消，去办公区旁边的寝室将“奸细”的被子、衣服卷成一团就往楼下扔。编辑部设在市委大院临街的一幢大楼三楼。这幢楼房原是市委干部休闲喝茶的沙龙，一面临街，还有一面则紧邻居民小院。被子是扔向临街一面的。下楼去还得绕出一个地坝，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去街面捡回落物。如果扔到居民院子里情况就更复杂。我曾从三楼援梯而下，去过那居民院。那回我倒不是拣东西而是逃命：关于这个下面还有详述。黄贵是怎么跑去大街？如何捡回被子衣服？捡没捡回？我们一概不知，因为他一走，就再没有回来过。

重看笔者为《山城战报》所写的一组评论，无非都是些老调重弹：西师八三一等组织如何反对夺权、如何反对革联会——重点尤其又是罗广斌如何操纵、如何煽动，等等。只是其中《评二月黑风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说砸派历史根源，提到了发生在八一五腹地重庆大学的一桩历史公案，良多趣味，不记可惜。

公案主角叫徐光明。重大八一五有时无时提到所谓“托派”“徐派”“第三条道路”，就是说他。

徐光明，重大无线电系三年级学生。文革肇始，他绝对算得上重大校园出道最早的一条好汉。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该系同学驱赶工作组，他便是积极分子之一，后来还听说自费去过一趟北京。徐脾气怪异，素喜独来独往，所以他去北京也完全是个人行为，对重大的文革毫无影响，许多同学都不知道有这事。

性格独特再加上思想超前，这就注定他在文革运动中曲高合寡，难觅知音。

八一五和“保皇四军”打得难解难分，他竟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孤孤单单游离于两派之间，一本正经专事理论探讨。比如：“八一五本身就是不彻底的革命事件”“九三、四上北京是右倾逃跑”“砸烂八一五总团，实际上就是向中国社会的修正主义思潮开火”，等等。除了理论探讨，他还真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红岩公社”，社员太少，据说就七个。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造反派正和保守派斗得你死我活。老保嫌他右，老八嫌他左，两派共同嫌他太左，谁也不搭理他。

“红岩公社”的绝对少数派状态，到一九六七年春中央提出反击“二月逆流”后才略有改观，以后又与几个从原八一五中“杀出去”的小组织联合成立了重大“井冈山公社”，还陆续发展了一些教职员，才有了一点起色。不过仍然因力量弱小而不敢在校内活动，长期流落在外。后因一个偶然的、谁都没有料到的原因：大学生毕业分配，突然奇迹般地起了变化。

一九六八年秋，按四川省毕业分配办公室的要求——“分办”主任张西挺，对骂她“烂萝卜”的重大八一五一直耿耿于怀，这回轮着她出损招了——规定所有高校的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必须由两派人员对等组成。重大怎么可能没有两派？“井冈山公社”不是一派吗？更何况那时候“井冈山公社”已正式入盟“反到底”派。人少？人少有



徐光明一九六八年春
在中央学习班时留影。

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当初不就两个人吗？毛主席说啦，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政治上一律对等。这一下好了，为数不算少的、逍遙了一年多功夫的原“思想兵”“赤卫军”战士，正发愁政治上无枝可依、毕业分配无人为之议价呢，一夜之间便纷纷参加“井冈山”，当了“井冈山公社”社员。对此，寂寞多年的徐社长肯定大喜过望——只是他的高兴没管多久，因为毕业分配一结束，大伙儿便天南地北，各奔前程去也。再说新社员们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八一五到底右倾还是左倾，他们只关心自己分个好地方，最好还要照顾夫妻关系，别弄得分居两地、牛郎织女的。那时候很多“逍遙派”“胖左派”都已结为夫妻或准夫妻。

几十年后，平心静气而论，要做到和徐社长一样特立独行，敢于与众不同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井冈山公社社员之一邹世友，电机系学生，早年参加八一五造反后来又反对八一五，曾被同学们一顿痛打。电机系还有一位女生，吴桂伦，造反也很早，后与八一五分道扬镳，一人自立“偏在塞中俏”战斗队，自然也被男同胞痛打。徐光明挨打更是题中之意。他个子矮小，估计也经不住打，八一五的大个子们就喜欢把他揪住，用手将他的头发摸来弄去，揉得一团糟，他从不反抗。一位亲历者告诉我，说有一次见徐找八一五同学辩论，人多势众的老八根本就不屑于与他罗嗦，只管弄些稻草往他头上挂，往他嘴里喂：因为大家说“社长”喜欢“捞稻草”。徐竟一点儿也不反抗，很有古豪杰之风：“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更蹊跷的是：保守派垮台，八一五和反到底又闹开了，作为老八的对立面，反到底照样不买他的账，不但不买账，而且同样把他骂得一文不值。西师八三一《红岩》报一九六七年的《新年献词》中就有这么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我们的队伍里，机会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很能麻痹一部分群众，享有相当的市场。重庆大学的‘红岩公社’就是推销这种货色的经理部。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反动思潮，我们千万客气不得，一定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此前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红岩》报第六期还有一段更为经典的

论断，说徐“一边举起左手高喊打倒重庆市委，一边却举起右手大叫要打倒八一五派。这真是毛主席早在四十年代就批判过的戴季陶主义的活标本。”

下面的事就更见鬼了，不过两三月功夫，八三一为了对付八一五，很快和这个“戴季陶”握手言欢，跳进了同一条战壕。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解决重庆问题，徐还被反到底推为二十个正式代表之一，到人民大会堂去向中央最高当局呈述政治立场。著名政治实用主义者、十九世纪英国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说：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初入文革政治园地的大学生行为选择，竟然如此惊人的近似！

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在评论卡夫卡小说世界时说过一段话，对于描绘文革年代的社会肖像倒真有点像：

在此，没有任何事物在世界上有一个确切的位置，没有任何事物具有稳固的、不可分割的轮廓。每一个存在物不是在上升就是在堕落。一切都在自己的邻人或对手交换着特征。那些该寿终正寝的事物都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些早已精疲力竭的生命还仍处在其漫长生涯的开始。在此根本不可能谈论什么秩序和等级。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在神话世界中得到拯救，然而比起这个世界来，神话世界却不知要年轻多少。

把西师八三一的《红岩》报评了“三评”就没有再评下去了。不是无话可说——要想说的废话还很多——而是，全国的形势风云突变：大闹怀仁堂的老家伙遭到毛的反击，谭震林首当其冲。对于八一五派来说，出现了一个相应的、类似噩耗的传闻：三月十六日，王力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会上发表讲话，说四川翻过来了。那时通讯很不发达。这句话过了好些日子才传到重庆。

几乎是一种巧合，我翻看日记，我个人对于革联会发生动摇，恰恰也是在三月十六日。这次动摇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延续了几乎整整一个月。这样说吧：神使鬼差，我差一点儿就站到砸派阵营去了。

第十一章 迷惘与动摇

让我对革联会发生动摇的事情发生得有些突然。

三月十五日那天还好好的。日记这样记录了当天的好心情：“革联会召了全市造反派的宣传通讯会议。警备司令部作了形势报告，很好。/西师八三一垮台后，斗争缓和了，没有什么对立面，到处是升平景象。每天都有人来报喜报捷，人们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生产都搞好了。这个场面真有意思，在革联会工作的老百姓出来接见报捷的老百姓，互相鼓励互相祝贺，多有意思！多么动人！/回学校跑了一趟，似乎一切都正常了，从今天起，机械系就开始军训了。整整半年没有见过这种秩序，我感到有些不习惯。/我很想走了，走到遥远遥远的边疆去！/正如一雏鹰，在风暴里练硬了翅膀，要到远方去飞行了。”

第二天我的情绪就全变了。三月十六日，报社要我和西南农学院派来的黄天俊同学一起去天府煤矿采访一个大会。变故就发生在这次采访中。

天府煤矿离城很远，从市区到了北碚，渡过嘉陵江，还要坐好长一段矿区小火车才能抵达。西南师范学院也在北碚，他们之间距离相对就近便多了，八三一在那儿的影响自然大得多。毛泽东和刘少奇当初不都在安源煤矿搞过革命煽动吗？现成一堆煤矿工人摆在面前，要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自然要以伟大领袖为榜样去那儿找矿工串联。天府煤矿成了八三一的“红色根据地”。八三一垮台，“红色根据地”跟着倒霉，自是题中之义。三月十六日，该矿召开群众大会，就是要把被砸派夺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是一个阴天，刚到下午，天就很灰暗了。天空密雨飘洒，细细地沾湿衣衫，让人心里有些压抑。我和黄站在嘉陵江边等了很久才过来一只渡船。乘船过渡，又在一个小煤站等了很久，才搭上运煤的小火车。在我的心目中，代表着大工业生产的矿山，到处都该有卷扬机

的隆隆声、有筛煤的扎扎声、有煤矸石从车兜里倾倒而出的哗哗声，小铁轨交错纵横，机车换轨、煤斗碰撞、调度员的哨子瞿瞿地叫……总之，到处都该是热烈和喧嚷。但今天没有。面前的矿场一派冷清。我觉得气氛异常，预感将发生什么不测。满眼只有灰蒙蒙的密雨下个不停。我们坐在工棚等待，终于等来一列矿车，我们就坐在肮脏不堪的车斗里，摇摇晃晃赶去了目的地。

大会在煤矿的大礼堂举行。礼堂空间硕大而简陋，屋顶用油毛毡搭铺，巨大的穹窿下能容得上千人。我们向煤矿当局：军代表、还有矿上的人说明了来意，然后就赶去了会场。乱哄哄的穹顶下早挤满了矿工，一片喧声鼎沸。我这才想起为何今儿矿山到处冷清，原来人都奔这儿凑热闹了。与会者一律昏暗的劳保服，好多人直接从掌子面来，只见满面尘灰。我忽发奇想，如果以他们为模特儿画一组素描，一定很有体积感和震撼力。

后来就开会了，主持人表情严肃地宣布大会开始，然后敕令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揪上台示众。我记得名字好长一大串，主持人念了很久才完毕。被点名的人显然早有准备，等主持人话音一落，马上乖乖地从四面八方的角落一个个钻出来，自觉去舞台沿口站好、低头，恭恭敬顺作弯腰服罪状。其中事前做好准备者，一上台便抖抖嗦嗦把公章从袋子里倾倒在主席台上，以示交出权力。这些公章估计夺过去还没盖过几回便再易其手，无奈归还了。接着大会发言，声讨“牛鬼蛇神造反”“右派翻天”的种种“滔天罪行”。发言人太多，类似的话那一段时间我听得很多，也就不想记也记不起了，唯一印象深的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发现，一个工厂的公章大大小小集中起来，竟然有这么一大堆！

我很快知道了：在台上主持“反夺权”会议的，全是不久前才被八一五打垮的“工人战斗军”骨干——我开始有点儿不顺气了。从矿山回北碚，我和黄去他们学校西南农学院住一宿，第二天又去垮台不久的“八三一”老巢西师采访，心里憋的一股子邪气越发不顺。

重庆大学绝对已是一派太平盛世，可走进西师校园，气氛却让人

大感异常，有点像当初八一五事件爆发前夕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到处弥漫焦躁不安，人人都迷茫而冲动。我和黄走来一条林间小路（好像是一个水池边上？），系在两株大树间的棕绳正好新挂出一溜烟大字报，怒气冲冲的年轻人立即围上去争论起来，仿佛恐袭突发，顷刻间四面八方涌来许多人参战。我和黄被挤在中间了。

大字报是原八三一同学所写，明确替被打成“右派”的组织鸣不平。悬挂大字报的学生马上遭到一大堆“春雷”的围攻讨伐。前面说过，“春雷”核心系八三一反水出的温和派，为首的骨干分子确实属于老造反，可一旦把八三一打垮，为壮大组织，瞬间便批量吸纳原“思想兵”“赤卫军”入伙，保守组分增长太快，不免授人以柄，被坊间讥为“老保翻天”，或者直接戏称其为“春麻儿”。

“春麻儿”正是春风得意时，人多势众，大字报前的辩论就越来越不讲理了，以至于我和黄天俊都感觉他们完全以势压人，于是替可怜巴巴的八三一打起了抱不平。“春麻儿”气势正盛，马上掉转枪口对付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我俩自知身份暧昧，马上虚晃一枪开溜。池边小路已赶来一大帮八三一助阵，双方已势均力敌，我们成了多余的人，再说，解放台还有一个群众大会等我们去采访哩。

昨夜的雨已经停歇。雾重庆的天气像捉迷藏，这一天忽然变成难得的大晴天，太阳暖洋洋高悬头顶，让人心情特别惬意。解放台地处北碚街区中心，有点像乡村社戏的露天广场，很简约，就一光溜溜的地坝和一光溜溜的小土台。我记得那天的群众大会气氛一点儿不热烈。听众就有些西师的学生，全集中在前排，后面便空空荡荡，只稀稀落落站些看客。我和黄就远远站在看客群的后面。

大会程序和前一天的天府煤矿差不多。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宣布把“反革命”某某、某某某揪出来示众。今天的某某某不似昨天的一大排，就七个，西师八三一的主要“勤务员”周荣诸人。唯一一位女士，叫周德英，显得特别突出。这些某某某一上台同样站一排，低头，恭恭敬顺作弯腰服罪状。不同的是，今天的某某某全都戴手铐，因此更显杀气。看见七个年轻人戴着镣铐押解出来时，笔者突有一种惊心动

魄之感，头皮一时发麻。几个月前，这几个热血青年不是和我们一个样吗：为了保卫至高无上的领袖、为了保卫某种纯洁无疵的信念，造反、抗争，与“黑市委”、与“保皇四军”浴血奋战，叱咤风云、威武不屈……事情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样呢？他们确实曾经和我们作对，有时候确实让人感到讨厌，他们垮台确实曾让我们快活得弹冠相庆，但我们没想过要把他们真地打为敌人、铁镣加身，黜为阶下囚啊！忽然间，我听身后一人愤愤不平地说：

“这样对待革命小将，对吗？他们也是造反派啊！”

我发现身后有好几个来看热闹的重大同学。说话人正好我熟悉，而且他正是在问我。此人叫余明庆，人白净而清瘦，脾气极“冲”，他最喜欢的一句口头禅就是：“现搞！”“现搞”是重庆土语，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立即揍！”“现搞”遂成了他的绰号。武斗时期“现搞”担任重庆大学专业武斗队“301”的发报组长，在“华蓥山根据地”曾闯过一次大祸：为了在女同学面前“冲”一回，他于夜间误发了三颗绿色信号弹，让整个华蓥山区闹了一场虚惊。为此被武斗队的哥儿们真的“搞”了个鼻青脸肿：这是后来的故事。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那天，他在北碚解放台斗争会表露的不满，代表了与会重大造反学生共同的情绪，大家不忍继续看下去——包括我。我无意继续采访，愤然退场了。我在那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晴朗的星期日。在北碚解放台由春雷主持大会，斗争八三一的几个头目。作为一个造反派的我，看到这情景，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让人心烦的事情继续发生。革联会决定“解放”辛易之，更是其中重头之举。

让革命干部代表参加“新生红色政权”——这一点儿没有错。从理论上讲，中央对各地夺权的要求就有一条：必须“实行军队、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砸派攻击革联会最致命的一条就是“学生单方面夺权”。军队紧接介入，革联会这张桌子算有了两条

腿，那还差一条呢。当时确实有一个“革命干部”的：徐正身，他一直站八一五一边，但级别太低，仅仅小小的二商局局长，缺乏说服力。政治上的事，必须首先在理论上站得住脚，操作上才站得住脚。

要说清楚“解放”辛易之为什么让八一五的同学心烦，有必要把文革前后重庆市委的情况说一说。

先说第一书记任白戈。任籍出四川南充。那风水宝地人称“三总”故乡，总司令朱德、总书记邓小平、总参谋长罗瑞卿都出籍那儿。除此之外，那儿还出过一位大人物：当时的中办主任、后来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任白戈身材矮胖，人称“任胖子”，健谈而热情，很有人脉。以他的革命渊源和老乡关系，和中央上层杨尚昆、罗瑞卿等长期保持着特殊的亲密关系。还有，他喜欢舞文弄墨，三十年代在上海文艺圈就跟周扬跑过一段，多少算得个左翼作家。文化大革命以罗瑞卿落马拉开序幕，加上被人称为中宣部“阎王”的周扬也属重点整肃之列，面对这场来头不小而意图含混的运动，与上述二人关系暧昧的任，内心之忐忑可想而知。六月一日，北京大学“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任白戈吓得忙不迭按江苏收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民模式，照葫芦画瓢，于六月二十日毫不手软将重大校长郑思群打为“黑帮”，派出阵容豪华、多达二百余人的工作组进驻，此一大手笔显然想要表白自己紧跟中央部署的凛凛决心。他压根儿没想到，重大恰恰成了重庆市委的“滑铁卢”。

郑思群在学生中威信极高，皆因虽贵为高干，他却从不摆架子，不骂人训人。上课时，同学们会看见他悄悄坐在后排听讲，有时还掏出手绢擦拭玻璃窗上的尘灰。去食堂巡视，他甚至当着学生的面把掉在桶边的饭粒从地上捡起来吃掉。电机系四年级有位同学叫郑志胜，家穷没钱买鞋，赤脚上课，小郑正好遇上老郑了。老郑问小郑为何不穿鞋？问他在哪个系？哪个班？第二天，像奇迹一样，一位和蔼的陌生人便来到小郑寝室，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郑同学很快知道了，陌生的送鞋人正是校长秘书。文革中，郑志胜因多起血案牵连而被监禁十余年，出狱后两鬓斑白，万念俱灰。笔者问他：当年，你何以要

如此铁心死保郑思群？如此狠心毒打市委工作组长？并最后参加八一五造反？他眼神木纳，沉思良久，极其认真地回答我：

“就为了那一双鞋呀！”

工作组强令学生们把斗争矛头对准校、系两级领导，学生们偏偏把矛头对准了工作组及其后面的重庆市委。工作组长恼羞成怒，亲自召集全校团干部及左派学生秘密开会，并在会上大义凛然地宣布：重庆市委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书记任白戈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经过考验的好班长！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反动的！演讲说到激昂处，他拍案而起，险些把茶杯震翻在地。

工作组长确信他的恫吓足以大收奇效。不料北京马上就和他开了个政治玩笑。秘密报告后第二天：七月六日，《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机会主义的口号》便全国转载，文章在两条注释中明确定义：任白戈是“大黑帮”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任白戈、重庆市委、还有驻重庆大学的工作组，兜头挨了一记狠狠闷棒。后来事实披露，这篇文章下来不久，任被迫“请假检查”，以“海外侨胞”身份隐匿乡下去了。

重庆市委的接力棒交到了市委书记鲁大东和辛易之这一对儿女亲家手上：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鲁成了老大，辛成了老二。去大专院校跑腿、安抚不安分的学生娃娃……这类罗嗦事自然全落到了辛头上。八一五重大师专闹事，前去灭火的，正是辛易之。他被学生困至深夜而终于不肯吐露一字，拒绝承认学生的“革命行动”；九月三日、四日，重大学生在师专广场绝食，前去灭火的，也是辛易之。这次他依旧故伎重演，拒绝承认“革命行动”。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辛是八一五第一个要打倒的“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现在驻军要八一五第一个解放的“革命干部”，也是辛。你想得通吗？

中国人传统美德讲究投桃报李。驻渝部队如此卖力支持八一五，你八一五这点面子总要给吧？“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积怨甚多，学生们思想不通，那就做工作吧。军队先做总团勤务员工作，再通过总团勤务员做哥儿们的工作。总算勉强答应了，行，那就开会吧，来点

仪式，名正言顺。二月二十七日，在革联会领导下，由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大礼堂召开斗争鲁大东大会。人民大礼堂是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整个建筑群依山而筑。漫长的、层迭而上的巨大石阶托起一座高高在上的圆形穹顶。两边画栋雕梁，廊腰曼迴，引伸出一带盘盘囷囷、峥嵘嶢嶢的高檐飞阁。礼堂外中而内西。圆形大厅很像莫斯科大剧院，包厢金碧辉煌，层迭直上，巨大的屋顶浩若苍穹。在这儿举行的都该是重量级会议了。是日五千人参会，声势蔚为浩大。参会者个个心照不宣，所谓批斗鲁大东，不过是项庄舞剑罢了，真正意图是要让辛易之揭发、批斗鲁大东以“火线亮相”。其余群众代表的发言，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多有抵触情绪的重大八一五学生也热热闹闹前来参会，会中有口号云：“辛易之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革命不分先后”等语，大家也跟着喊。回校后却一个个心里添堵，别扭得不行。据知情人介绍说，这个颇显滑稽的批斗会毕，鲁大东被押回重庆大学学生七宿舍监护地，刚出汽车，他便訇然坐地，状若小儿哭天，口中大呼冤枉，称，不是辛受鲁蒙蔽，而是鲁受辛蒙蔽云。

为了确保辛易之尽快上台，《山城战报》也开足马力。三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五期，六个版面，“解放辛易之”就占了整整两版。现将标题实录如下：消息：“揭发批判辛易之的大会在重大‘八一五广场’举行” / “欢迎辛易之和我们并肩战斗——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代表黄顺义在三月二十三日批判辛易之大会的发言” / “贫下中农社员谈辛易之（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治五三战斗组）” / “为什么辛易之可以参加革命的‘三结合’”（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要武”战斗队、“二七”战斗队、“红旗”战斗队） / “欢迎辛易之参加革命的‘三结合’”（重庆八一五机械兵团川江电机兵团） / “我们所了解的辛易之”（市革联会市党校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为了报答军人对自己的支持，重庆八一五够意思了。

只是辛易之没有想到、力挺他的五十四军没有想到、甚至扭扭捏捏拉扯他的重大八一五也没有想到，他的复出已经不可能：既然他已

和八一五有过这样暧昧不清的蜜月，那么不久后平反复出的砸派理所当然就要把他看成自己的死敌。既然他已经成了两派最具争议的人物，那么在重庆的政治宴席上，要让他坐上“革命干部”这把椅子就不合适了。一年后，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坐在“革命干部”席位上的，竟然是两派都一致要打倒的鲁大东。四川老百姓有句俗话：“久等吃好席”，在这儿倒刚好用得着。政治棋局上的博弈规则就是这么滑稽：这是后话。

一九六七年乍暖还寒的三月下旬，重庆已经听到有关“二月逆流”一说，预感到北京又有什么新动作。就在意图“解放”辛易之的同一期《山城战报》，二版刊登了“本报观察员”文章：“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同时配发消息：“死灰在复燃/保皇四军言行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报纸很抢眼地摘要刊登了一直被八一五嗤之以鼻的“救世主”、首都三司头目蒯大富的讲话：“迎接第八个回合的大决战”；还有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一夜暴富”的聂元梓讲话：“警惕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胜利弄得晕晕乎乎的八一五，现在必须从他们最瞧不起的御林军眼色里猜度北京的气候变化了。

下面是那段时间我的日记摘抄：

从戚本禹同志的一个讲话中，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这股逆流的代表人物，就是在农林口搞反攻倒算的谭震林。/王力同志讲：四川整个地翻过来了/北京来信节节传来，称：北京舆论一边倒，说重庆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而革联会正是这股逆流的产物，罗广斌是革命烈士，红代会发表声明，支持西师，大骂重大八一五是叛徒集团/据传周总理三·三一讲话，说重大八一五变了……

一场巨大的风暴又在重酝酿起来，从同志们激烈的神情里，从同志们按捺不住胸中的气闷而爆发出来的歌声中，从辩论会上慷慨的发言中，从满地的大标语中，又可以听到八一五春雷前的风音雨响，而且，同志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出在军队。

有人写大标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这段文字记录在三月十七日和四月一日之间，没有具体标出时间，很随意，这使我无法回忆起上面所说的发言慷慨的辩论会、满地的大标语，特别那一条“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大标语，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何时发生的？有些什么细节？同学们有些什么不满和困惑？但有一点很明白：作为八一五事实上的政治中心，重大校园再度动荡不安了。一九六六年八月那一次，压力很大，但他们心里非常明白：毛泽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这回不同了：他们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说不准他们很可能和刚刚被他们打垮的“思想兵”一样，主观上想保卫毛，实际上却走到事情的反面：这一点，使他们恐惧万分。

四月一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六期开始正式刊登文章《炮轰谭震林，粉碎新反扑》。这个有些滞后的信息向重庆人证实：在北京，以大闹怀仁堂为标志的元老造反，已被毛轻而易举击败。《山城战报》跟着起哄，开始有点稀里糊涂，不过聪明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一回，他们实际上是在向自己开炮。

第十二章 陷入动荡的重大校园

《山城战报》以非常显眼的通栏标题刊登文章“炮轰谭震林，粉碎新反扑”，表示重庆市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紧跟北京开始动作了。但具体怎么动作，却什么也没有说明也无法说明，这篇长约一个整版的消息无非像本流水账，干巴巴地介绍了农业部在二月中旬发生的、在外人看来毫无故事性的鸡毛蒜皮。中央高层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打算干什么？大家全蒙在鼓里。

八一五、革联会及驻军对所谓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可以从该期刊登的几篇文章看得出来。头版头条：“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函重申了军队立场，大意如下：一，“原保守派组织的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是李井泉通过原市委一手炮制的。”“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二，“目前原保守组织中的某些少数人企图重新恢复组织，对此，我们是坚决不支持的”；三，“参加原保守组织中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四，“（原保守组织中）如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分子继续玩火，那么矛盾就会转化。我们一定支持革命左派，粉碎资产阶级复辟的反动逆流。”

该期报纸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还有一篇本报观察员文章《树欲静而风不止》，内容大同小异。根据我自己作的记号，那篇社论是我写的，现在重读亦不知所云，无非又把已经垮台的、毫无还手之力的走资派、保守派数落一通，威胁一通罢了。仅有一段属专有所指，内容如下：“有的革命小将，由于头脑中‘私’字作祟，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被阶级敌人利用了，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对于这些革命小将，应当帮助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可是有的人却趁此机会摇身一变，以当然左派自居，不准他们革命，把这些革命小将一棒子打死。”这段话显然表述了笔

者三月十七日在北碚解放台眼见八三一头目带铐示众时的愤懑之情，久压难抑，不吐不快了。

重庆大学的校园，这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下面是我的日记：

三月三十一日。不平静的夜。同学们不顾总团某些人的阻拦，征集签名，准备次日大游行，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团连夜召开小组长会，被迫上马。

四月一日。压抑在同学们心中大的全部激情统统爆发出来了，像火山的岩浆全部爆发出来了。/晨六时，紧急集合，召开全团大会。周家喻上台大放厥词，企图阻止游行，群众大造其反，然后，数千人浩浩荡荡进城，进行了爆发性的游行，震动甚大。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发表，大大鼓舞了革命造反派，我们这一群为西师、交院早就抱不平的八一五，心里感到无限兴奋。

四月四日。革联会召开了一个全市的不像样子的大会誓师向刘少奇开火。会上，我校打出大标语：“警惕山城和平演变”“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联会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震动很大。在上清寺贴出了四·四大会质疑（革联会原拟定于四月四日举行全市的所谓“工代会”——笔者注）的大字报和不准工纠挤进工代会的大标语。对于即将在旌旗招展的人民大礼堂召开的所谓工代会，同学们表示，若要召开的话就坚决造反。/人们在议论：重大八一五要反了。

四月五日，革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决定无限期延期召开工代会。

时间过得太久。以至我回忆模糊，问过好些同学，大家怎么也想不起三月三十一日那个“不平静的夜”，到底是怎么不顾总团某些人阻拦，征集签名？总团连夜召开的小组长会上，又是怎么被迫上马的？次日凌晨六时，广播里号声响起，熟睡的同学又是怎样趁夜赶去八一五广场（文革后改名为“思群广场”——笔者注），将“大放厥词”的周家喻哄下讲台？……如果能将这些细节写下来一定很精彩。可惜

这些尘封既久的记忆胶片，被岁月拉上太多的划痕，只能把它们小心拼接一起，以使人得以感受那年代年轻人的困惑和抗争，仅此而已。

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已经正式平反复出。重大八一五为此是付出了真诚努力的，对它们的复出也表示了由衷的高兴。问题是：八三一们认为自己的造反既然付出了比重大八一五造反更沉重的代价（他们的遭遇本身就构成了革联会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注脚），在重庆的政治盛宴中理所当然应该坐上主宾位了。这是一匹倔犟的烈马，原本就不愿被八一五套上笼头，现在自然更不可能成为附庸。政治博弈的规则就是如此：成不了铁锤，就只能作铁砧。砸派既然不想成为附庸，必然就应该成为主宰。主宰者（或企图成为主宰者），办起事情常常就不再需要理由了。马基雅维里这样定义合格的“君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他们应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可以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马氏被认为是近代政治学的开山鼻祖。

西师八三一复出后便开始接二连三地发表“严正声明”。第一天的声明说“重大八一五是坚强的革命左派”“重大八一五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和重大八一五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第二天的声明就开始改口，我团原来发表的声明，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律作废；第三天的声明就直奔主题了：重大八一五是山城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这个弯子转得实在太快，搞得当初巴心巴肠为他们喊冤叫屈的工科学生实在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一边要维护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八一五、革联会，一边又要伸张正义，使信念不被玷污。这一回，两者竟如此南辕北辙，他们注定只能在两块沉重的磨石间接受挤压、只能无可奈何地嚼食自己种下的苦果了。

四月五日的日记记录了我的迷乱：“重庆乱了，一向称为铁板一块的重大八一五也乱了。/向谁决战呢？/重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在

什么地方？/警备司令部有没有谭震林？该不该砸烂革联会把这个谭氏人物暴露出来？/重大八一五是不是被利用了……/一连串的问号，把勇敢的八一五战士的思想搅乱了……”

砸革联会的声浪一天高过一天。重大八一五却不知所措，沉默了。校园里开始出现大标语：“坚决砸烂伪革联！”，署名：“反到底”。这实在非常有趣：当时砸派还还没有谁想起这个字号呢，却被八一五自己抢先用上了。同样有趣的是，标语竟是当初发起八一五事件的主力：业余文工团的几个激进分子所写！

四月六日日记：“重大八一五没有说话。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在八一五内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一次，没有结果，又来一次，又没有结果。在总团的会议上，一次，没有结果，再开一次，也没有结果，再开，还是没有结果……/人们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砸还是轰？”……

事实上担当着领头羊角色的重大八一五，它的沉默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严重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重大校园几乎就是重庆的政治大本营。上面一有风吹草动，八区三县的“革命群众”都喜欢到重大来找八一五讨教。遇有这种情况，林木秀美的重大校园就非常热闹了，如赶庙会，如过佳日，如踏春冶游，求教访客或歌于途，或休于树，往来而不绝。他们一般先去总团信访组，再由总团信访组介绍到各系各班的战斗组接待，程序很规范。造反伊始的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就曾经在寝室里接待过文艺系统的几个先锋派人士，并且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歌舞团张运涛、越剧团田会珍、话剧团孟庆善、杂技团郑洪等共八人，后来他们全都成了文艺界的造反先驱和领军人物。那时他们尚未出道，见了造反派，神情激动不亚于在白区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一个个争相表白，畅吐衷曲，出得校园则一律革命信心倍增。还有个同学，后来在我们报社做过一段编辑的，就在我们最为困惑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因为接待重庆纺织六厂来访代表，和其中一位很迷人的女工一见钟情。几个月后，他们正式恋爱了。正式和这位美人确立恋爱关系前夜，该同学曾非常认真地把我拉到门外征求意见，极其

庄严地说道：

“周，你知道，我这个人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我想找个漂亮的……”

我大笑，连连表示赞同说：“她——够可以啦！”

后来他们就爱得难分难解，后来真地喜结了连理；再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桩很失败的婚姻，政治因素和感情因素纠缠交错，演绎出太多事前根本无法预测的悲剧情节，二人最终只好分手——这个故事写下来一定催人泪下——为了保护当事人，笔者在此姑隐其名。

重大八一五的沉默对于徘徊歧路的整个大派无异于一场灾难。群龙无首，让面临抉择的兄弟们无法忍受。有一个工人在重大校园贴出一份大字报，代表了八一五派共同的焦躁不安。这是一首叫《呐喊之声》的诗歌，其时被很多同学传抄，我也把它抄留在日记本上。下面照录其中两段：

不要这样沉默，重大八一五
让雷霆喊出你胸中的愤怒
为什么万里之外对你缺席审判
为什么前后左右向你进攻
假如你胸中是一轮红日，
解开纽扣，把它托上解放碑峰

山城人民永远热爱你，重大八一五，
川江雄歌，决不做易水悲曲
谁个是红心赤胆照长空
谁个是沽名钓誉梦云楼
任它柳随风摆，帆听风说
还看今朝红岩，岂效渔家轻舟？

四月五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八一八战团举行辩论会，率先统一了认识，接着数千人浩浩荡荡到重大来声援游行。前一年年的八月十三日，重庆大学造反派第一次冲出校门造反，就是去的建工学院游行，

那次行动成为了重庆文革爆发标志的八一五行动的预演。而这一次，事情反过来，轮到对方来推动自己了：重大八一五还有什么可说？看到建院学生在团结广场、在沿江马路、在学生宿舍间夹竹桃长得密密匝匝的小路上穿行呼喊，重大的学生娃娃从寝室里、从运动场自发地一涌而出，和建院的队伍集和一起，又向重庆师专涌去。师专学生自然立即汇涌其中。接着，三中、一中、师专附中等校的“中八一五”也闻讯赶来。师专是八一五事件的发源地，此时此刻此地的的集合本身就具一种象征性含义。在当天日记上我无限兴奋地这样写：

顿时，夜晚的八一五广场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八个月前，就是在这个广场上，点起了重庆市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烽火，八个月后，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前夜，又在这个广场上，响起了重庆市的第一声春雷。夜啊，不眠的春夜，沙坪坝在燃烧，山城在燃烧……

雨果在巨著《九三年》中这样叙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没有什么比国民公会更为畸形，也更为崇高的了。英雄成堆，懦夫成群……他们相互摩擦、相互挑衅、相互恫吓。”“那里的一切都飘浮不定，人们怀疑、犹豫、退却、拖延、窥视，人人自危。”中国文革庶几近之，群体无意识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只是事情不可能靠一次集会煽动起来的激情就彻底解决。年轻的心是飘浮不定的云。这会儿吹东风，它向西边飘，一会儿刮西风，它又会飘向东头。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中国，天空里刮的全是乱七八糟的狂飙罡风哩！

日记上记下的一件事足以说明我的思想何等混乱：一天晚上我回学校，不是恶作剧，而是非常认真地“试着以砸派的观点与（美术）队的同学辩论”，公然是“我胜利了”。于是我兴冲冲地马上返回市区，和《山城战报》的邓姓编辑一道去找到革联会主任刘润泉，准备和他也这么来一次模拟辩论。从沙区到市区十多公里地，平时坐车尚嫌挺艰难呢，而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简直健步如飞。

刘润泉，时任五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东北人。个子矮而壮硕。后五十四军调防云南，升任昆明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再后来，他退休了，移居广州军区干休所赋闲养老（他夫人是广东人）。九十年代我到深圳经商，曾让公司助理、原四川外语学院八派学生专程前去看他，探访者回来对我说：他老多啦，完全像一个郊区菜农。其实在我的印象中，他身上一直就看不出更多军人的威严，更像一慈眉善眼的邻家老头。革联会期间，我们呆在一个大院，随时都能见到他，每向他说到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说到由此而在社会、在八一五内部引发的种种混乱，他就只会叹气，反问我：“我们该怎么办呢？事情都是你们搞起来的。我们解放军只是对你们支持，你们也闹，我们怎么办？”他态度的真诚本身就够让人感动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已经记不起那一晚我和他的谈话如何起？如何终？大约又是他的诚恳把我征服了。于是，我的日记上有了这么一段记录，说我和他交谈后：“对革联会又做了重新估价。我有两点看法：一，革联会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由于谭氏人物造成？还是由于认识问题？到底能改？还是不能改？我的结论是后者。二，如何看待砸派？他们是真的掌握了大方向？还是出于复仇心理？是孤立地看待他们的行动？还是历史地、全部地分析他们的行动？结论仍然是后者。鉴于这两点，我认为革联会不能砸。”

接下来我写到，“深夜，又赶回学校，把同学们说服了。”

天哪！那一晚上我竟然又从市区向沙区跑了十多公里地！我是不是有毛病啊？事过几十年，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形容当时我的行为状态，有四个字再恰当不过：

“掐头苍蝇”。

驻军部队定然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四月八日这天，五十四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决定亲自出马，稳定军心。数辆军车将重大八一五的二百余名战斗组长，还有建工学院的部分代表拉到了鹅岭山麓的警备司令部小礼堂。时间是下午，山城重庆的天色晦明不定。仅主席台上亮着一盏绿色的台灯，给人柔曼平和之感。白斌首

先传达刚结束不久的中央军委军以上干部会议精神，重点是林彪所谓“古今中外……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和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胡诌。接着由蓝亦农就革联会、镇反诸问题发表演讲。我记得他说话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看资料时还架一付老花眼镜，显得很有书卷气。质朴的工科大学生被军人的儒雅和真诚征服了。演讲者肯定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讲话结束时，蓝已胜券在握，意味深长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我们心中是有数的。如俗话所说：任凭风浪起——”话犹未了，台下马上齐声接茬：“稳坐钓鱼台！”

这一天是周末。五十四军趁热打铁，当晚，刘潤泉紧接又到重庆大学召开会议“交底”，对八一五表示坚决支持。

砸派气焰日盛一日。大约他们头脑也有点发热，在策略上就显得过于粗糙，只管采用各种手法、千方百计刺激八一五本已显得脆弱的神经，只管把革联会骂得一文不值，什么“叛徒集团”啦、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啦、什么“被黑帮收买了”等等，还用讽刺漫画将他们描绘为丑陋不堪的“癞格宝”（重庆地方语，即“癞蛤蟆”——笔者注）。其实，如果聪明一点，他们完全应该采用怀柔离间之策，打拉结合——如果真那样，说不准重大八一五很快就四分五裂了。保守派垮台不久，那些热爱党组织的乖宝宝们，他们和所谓“走资派”之间发生的所有悲喜剧八一五记忆犹新。八一五们不愿意、甚至非常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便重蹈覆辙。事实上，上面说到的四月八日下午和晚上与军人的会面，在重大校园里很快就被一些激进分子指责为“拉一派打一派的黑会”“和当初李井泉召集思想兵开的黑会没有什么两样”。八三一面对如此大好局面，偏偏还要步步紧逼，致使山穷水尽的重大八一五别无选择。敌人的辱骂和年轻人的虚荣，注定让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捆在革联会的战车上。

四月九日，大田湾体育场再度成为重庆所有眼球聚焦的舞台。八一五派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此召开大会，誓师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火。蓝亦农再次到会演说。主旋律依旧是：“革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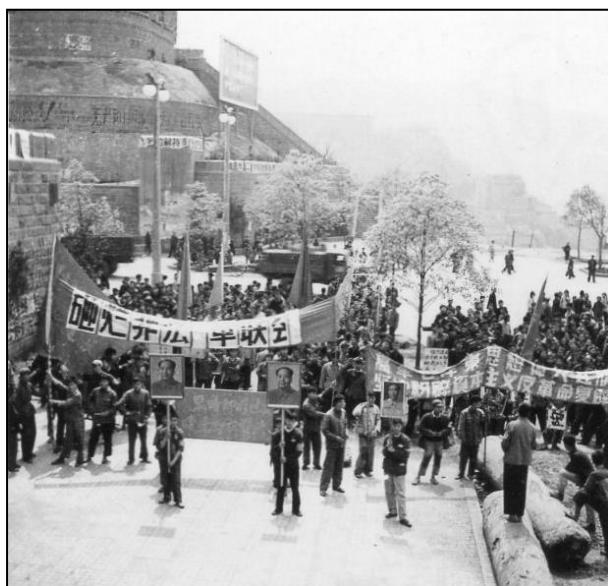
好得很！”

这一次效果差了许多。会间，工业校八一五派不听招呼的学生娃娃爬到主席台前，大书标语：“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中学生九一纵队干脆多次冲击主席台。虽然造反未遂，但裂痕正式公开：八一五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就在这个大会上，大家都不再迟疑地选定了自己的角色。该退场的，纷纷退场，要和革联会站在一起的，因叛逆分子的胡闹而彻底铁了心，坚持在会场呆下来，把口号喊得更加响亮。

从这一天起，重庆的政治格局重新明朗。在保卫革联会的营垒，重大八一五再度成为核心。

第十三章 革联会，从迷乱走向明朗

《山城战报》为三日刊。六期以前，出版都非常准时，到第七期却推到五天后才出版，而且这一期简直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重庆人关心的东西毫不沾边，全是些照本宣科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空泛消息、空泛感想、空泛文章，甚至铺张以极地用一个多版面连载反刘少奇的“先知先觉者”陈里宁的《狂人日记》。这个长篇日记非常玄乎，真伪莫辩，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姓陈的沽名钓誉之徒精神确实有点毛病。只是那年代整个中国都在发疯，他的精神疾患反而显得十分正常了。毛泽东最高指示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刘少奇是坏家伙，反对刘少奇当然就是好家伙了，歌颂那位精神病患者就理所应当了。其实，这篇奇文我压根儿就没仔细看过，刊登它的唯一好处就是它长。在编辑部思想混乱、不知何云的时候，用这种文字垃圾充斥版面实在是最佳选择：既符合大方向，又不用向读者表明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刚成立的重庆井冈山红卫兵举着“砸烂非法革联会”“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横幅标语在市中区牛角沱集合准备游行。

革联会原定四日召开工代会——这次大会是革联会计划中让重庆社会秩序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和我们报纸一样，也被推迟了，比我们更惨的是，它是无限期推迟。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六日始，革联会连续用两天时间召开了一个全市革命造反派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同一天，革联会发布了《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几个问题的通告》。十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八期用头版全版刊登了这个文件。再三天后出版的第九期则在第二版刊登了联席会议消息。从这个通告和这个会议的召开，可以看出革联派通过一番折腾，思路已基本理出了头绪。四月六日的《通告》共谈了八个问题，（一）斗争的主要任务（二）关于革命的“三结合”；（三）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组织；（四）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五）关于镇反工作；（六）关于夺权中的问题；（七）关于保守组织；（八）抓革命促生产。《通告》的基本立场和对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看法，在警备司令部三月二十六日《公函》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并且表述得更加明晰具体。如第二条指出：“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绝不许把他们当作陪衬，更不准把他们排斥在外”；第四条明确宣布了“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等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五条提出了“在这次镇反工作中凡被错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平反”；第七条再次重申不许保守组织“纠集原班人马打着‘造反’旗号，恢复原有组织，更不允许招降纳叛，改头换面重新组织，否则立即取缔，对于首恶分子，必须……依法惩处。”第九期刊登的会议消息，报道了市革联会常委会的六条决定。“决定”则从措施上对以上原则进行了落实，如：“立即对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肃反问题进行周密的调查和处理，抽调一百名红卫兵，由两名常委同志亲自率领到八区三县检查，迅速纠偏”“立即调查处理沙市纱厂（即重纺六厂——笔者注。我之所以要特别注明这一点，因为紧接着，我将在这个事件中遭遇一段九死一生的故事）等单位的问题，彻底打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凡是被保皇势力反夺了权的地方，革联会坚决支持并帮助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权立即夺回来”。至于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革命组织，革联会“现在公开认错，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议能够取得这些结果，应该说很不错了。《山城战报》第九期对会议做了这样的报道：“各革命组织的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发扬了大民主，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用

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在重庆的各种表现，同时对革联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关于会场的气氛，只轻描淡写说了一语：“经过激烈的辩论”。我的日记实时记录了当时的会场情况，正好成为上述消息的注脚：

四月七日-四月八日。革联会召开炮轰大会。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纷纷上台发言，申诉（或者说是控诉吧）本单位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解放军有很大的责任。当然，问题也是直接涉及到革联会的。/会上，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血和泪的控诉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二轻兵团的一个代表跳上台去，大声说道：“同志们，革联会是我们把它扶起来的，我们为它大喊大叫，为它鸣锣开道，可是现在它却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没有为我们干一件好事。我们不要它了！大家一道起来把他砸烂吧！”/一席话，把同志们激怒了，大家在下面乱嘘、起哄：“滚下去！”“滚下去！”。师专唐宗明走上去：“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我说，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有错误，有缺点，我们炮轰它，帮助它改进，砸不是办法……”外院余朝文冲上去：“同志们，刚才这个人发言是个大阴谋，我代表川外八二六表态，坚决砸烂革联会！”全场大哗，一群人冲上去，把余推开，迅速在话筒前排成长队，要求发言。/“我代表2307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发言，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革联会好得很！就是好得很！”/“我代表八一兵团表态，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不能砸，只能炮轰，只能支持，革联会就是好……”/“我说，我是二轻兵团的，刚才那个人不能代表二轻兵团，只能代表他自己，我们二轻兵团的广大战士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就是好，好得很！……”/发言，一个比一个激昂。情绪，一个比一个冲动。会场上，掌声雷动，口号起伏，支持派和砸派，在这个会场上迅速地分化、集结……

会场尽管吵得天昏地暗，但毕竟多数代表对革联会达成了明确共识，即消息所说：“大家一直认为，革联会是我们造反派长期浴血奋战的成果，革联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决不能把革联会看得一团漆黑，一棍子打死。”会议的成功使得主持会议的革联会常委、财贸八一五头头王绍川，心满意足地代表革联会对大家的批评表示了“衷

心感谢”。

会议结果无疑是对五十四军（即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充分肯定，革联会主任刘润泉非常满意，他在讲话中愉快表示“会开得很好。”并再次真诚发誓：“镇反工作要规定三条，不管任何人假借镇反为名，镇压左派，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二，如果有人背着革联会干坏事，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三，今后捕人要经过警备司令部党委批准。”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也到会助兴，他以军方的身份表态称：“革联会好得很！我们过去支持革联会，现在支持革联会，将来还要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保卫革联会，支持和保护左派广大革命群众。”

就在会议开得热热闹闹的同时，思想处于极度迷乱的我，为《山城战报》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这就是在刊登革联会“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那一期报纸，我自作主张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吹响进军号，迎接大决战”。出版时间是四月九日。按时间推算，文稿当是开会前后写的。

这篇文章惹出是非，完全因我个人对形势的判断混乱而酿成。

当时北京的提法是：“二月逆流”。而我们的提法——前面说过了，偏偏叫“二月分裂主义黑风”，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当然是八一五派偏居西南，对京城二月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前提下的信口开河。需知：正统的政治概念是不允许丝毫修正的，我们在此常识性的问题上犯如此低级错误，既因政治上的无知，也因为操作上的无可奈何。我们既已疏离于北京的文革主流，就只能像迷途者在政治歧路间莽撞奔突。忙乱无措之际，我们只感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自己面前的敌人太多：刚刚平反的八三一是一拨；刚刚投入八一五怀抱马上又被踹开的保守派又是一拨；还有对八一五耿耿于怀，一直站在旁边看笑话的“走资派”、保守派也算一拨……面临几股反对力量，我们不知如何招架，干脆就捆在一起对付，于是在“二月黑风”、“三月逆流”后面又来了第三个提法：“多边围剿”。文革那会儿，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很容易引起同情；而地位受到挑战，又很

容易把大家动员起来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我们于是力图和北京正宗提法接轨，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八一五遭受了多边围剿！最危险的时候到了！同志们！团结起来，战斗吧！

我就是在这种认知混乱之下写了这篇社论。社论危言耸听，言之凿凿，极富煽动性并立即在编辑部会议上通过。可是等到文稿已送印刷厂付印，我莫名其妙又恍然大悟，感觉出什么问题了，马上又把“掐头苍蝇”的洋相重演了一遍。关于这个洋相记录在四月九日的日记上：

晚上回校（即社论出版当天——笔者注），我和《8·15战报》（我走后，《8·15战报》由何国光，即前面提到的那位集邮专家主持——笔者注）的同志们又一道讨论了形势，大家基本上同意了我的观点，否定了“多边围剿论”，于是我急急忙忙挂电话给《山城战报》，阐明了我的观点，希望同志们马上考虑，如果这篇社论真有问题的话，请马上通知印刷厂停印。他们又同意了我的观点。

第二天一早，我忙不迭赶去市区，匆匆忙忙跑回《山城战报》。
日记记录：

奇怪，刊有这篇社论的《山城战报》已经在街上出售！我急忙向大家谈及这一事，并迅速挂电话给印刷厂和发行科，要求立即停止发行，并将已发出的报纸迅速追回。

可惜，事情已经迟了。这一天，街上已经出现了大标语：
《山城战报》4.9社论是大毒草，必须批判！

报社很快把四月九日出版的《山城战报》收回了，在该社论的位置临时换上了上海《文汇报》四月七日的社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重新印刷，重新发行，同时刊发了“紧急启事”一则，称：“本报四月九日第八期社论‘吹响进军号，迎接大决战’有严重错误，特紧急声明这篇社论撤消，已发出的少量报纸作废。并于四月十日将本报第八期改版重印。”这样，第八期的《山城战报》就有了两个版本

和两个出版日期。如果用集邮爱好者的术语来说，就是多了一个“错版票”。这也算文革小报历史上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吧。

随着对革联会“支”和“砸”斗争的明朗化，《山城战报》社论凸现出的思想迷乱也很快结束。那些天，几乎天天都有人来重大声援游行。有大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工人和别的什么队伍，他们敲锣打鼓，穿行在夜幕中的校园广场、沿江马路和学生宿舍间夹竹桃长得蓬蓬勃勃的小路之间。有人还举着火把，火光在春天的暗夜里显得晶红耀眼。那场景说得浪漫一点，如古骚人秉烛之夜游；说得悲壮一点，则让人想起高尔基笔下那位为拯救人类灾难的英雄丹柯，举着自己胸中掏出的心，照耀人们前进。“向重大八一五学习！”“向重大八一五致敬！”的口号声彻夜不息，闹腾得重庆大学无法安睡。“每闻风飙之起，常怀凌云之志”。迷乱的大学生们纷纷从床上跃起，赶去门外夹道欢迎。掌声、欢呼声、口号声汇成一片，响彻夜天。

一天晚上回校，我正遇了这种场景，于是也挤进队伍和陌生人一道激情万分地呼口号，一道鼓掌。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发现一位薛姓同学、电机系的激进派、上面提到的“偏在寒中俏”战斗队发起人的同班同学，于是我大声喊：“你还砸吗？”他显然也很冲动，大声回答：

“不砸了！”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砸派要把我们打成叛徒，那咋行？”

四月十二日，重大八一五在风雨操场举行全团辩论大会。会议刚开始，便有人跑去台前写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大标语：“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算是给大会定调了。人一旦陷入狂热必然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教义的盲目崇拜，并任由这种崇拜掀起的激情泛滥，从而随波逐流，盲然放纵。《8·15 战报》第十五期发表的《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对目前形势的再次严正立场》断然肯定：革联会是一月革命的产物，而一月革命是比“十月革命”“更伟大的”的历史创举，对它的怀疑不啻是无知，完全就触犯了天条。从此开始，以后的行为只需要诉诸情感的神圣激发而不必再作任何理性判断。这次辩论会后，重大校园再无杂音。

重大八一五需要用行动向世人宣示自己的统一意志了。四月十五日，周末，他们和师专八一五、重建八一八等沙坪坝区的造反派组织以纪念八一五事件八个月为名，举行串联游行。队伍由沙区出发，途经小龙坎、石桥铺、大坪、两路口直涌市中区，一路上，人越汇越多，到了解放碑——日记载：“已汇成了数十万人的洪流”——这个数字虽然有点夸张，但场面总还是蔚为壮观就是了，次日，八一五派又在尚未涨水淹没的长江珊瑚坝集会，日记载：“近百万支革派冒雨召开誓师大会”，这个“近百万”，显然有点夸张，只是同样也没谁来点过数。会议题目是“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实际目标谁都知道是要炫耀支革派的实力。我记不起五十四军的军官们是不是到了会，李井泉诸人却是绝对参加了。他们是会议必不可少的道具，因为：只要恶狠狠地把他们揪到台上低头示众，就证明自己革命大方向始终正确。

作为对等的行动，为表示自己的大方向也始终正确，砸派决定在下一个周日（二十三日）也开一个类似大会，他们的题目复杂一些，叫“打倒刘邓陶，砸烂革联会”，为此他们还向“伪革联”发出一份“勒令”，要他们交出李井泉等诸道具供批斗之用。

这道难题让革联会很当了回事，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有各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共商对策。这一回，被激怒的八一五没给八三一们好脸色。与会代表热热闹闹发表了一通愤激之情，之后，秦安全代表重大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算是一锤定了音。秦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首先是向刘少奇开火，而砸派砸烂革联会，显然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其次，砸派砸烂革联会，本质上是企图否定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最后，有一条理最为刺激，秦提到重庆市委的一段历史公案，即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问题，由此升发，他抛出了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论点：本次文革革命运动，市委的实力派已受到沉重打击，而以萧、李、廖为代表的“少壮派”则并未伤筋动骨。当前砸派的活动，实际上是为这个不甘于失败的“少壮派”翻案，实施反夺权。

该观点确实很酷，虽然很多人均不知萧、李、廖乃何方神圣，可

是单凭“反党集团”、凭“少壮派”、凭“反夺权”……让众人联想一部扑朔迷离的推理小说，如《一双绣花鞋》《梅花党》之类，从而将听众彻底征服，这就已经够了。大家确信砸派已落入诡谲的案中案、谍中谍却一无所知。八一五再次觉得自己非常聪明而砸派愚不可及。

秦安全，重庆大学无线电系五年级学生，校学生会干部。秦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用网络流行语称，典型一帅哥。在饥饿年代度过青春期、身材普遍偏矮的一代人中间，秦一米七几的身材尤其人才难得。八一五总团勤务员中，他出道最晚，而且一直被派去全市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工作，校内鲜有名气。他在校内第一次亮相是在“一二·四事件”后一次关于罗广斌“赴京告状团”及“联合指挥部”的辩论会。他思维缜密，推理严谨，语调不温不火，与工科学生偏重逻辑的心理需求很对路，于是一鸣惊人，从此后声望雀起。关于“萧、李、廖”“少壮派”“反夺权”的提法，再次彰显了他的谋略与辩才。

在六十年代前期的重庆领导班子里，确有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其人。萧为市委组织部部长、李为市委副秘书长、廖为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青年才俊，雄姿英发，被人普遍视为第一书记任白戈心腹爱将，重庆政坛的少壮派人物。没必要论证他们是不是年少得志，喜露锋芒，反正，面对六十年代初四川万户萧疏，饿殍盈野的惨状，三个人实在忍无可忍，或用进京开会、或借中央派人来川暗访，将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告了一状。这些御状在北京、四川几经辗转，最后却回到了李井泉手上。这不是虎口送食吗？李处理这类问题是绝不手软的。记得我还是孩提时候，一九五八年，四川有人（肯定是非常不起眼的老百姓）也曾给李写过一封信，匿名的，对社会问题说了些大不敬的话。此信马上被公安翻拍成胶片（当时没有复印机），放养成足尺的照片无数，在省会城内到处张挂，悬榜缉凶。对普通草民尚且如此，在共产党内岂容得以下犯上、跳蚤成精？“李政委”如此震怒，任白戈虽欲保挾过关已不可得。李明确威胁，如果任不及时处理萧李廖，就得考虑他自己的问题了。任白戈只好上演一场挥泪斩马谡的苦戏，李、廖二人革职，萧送四清工作团下乡去也。实施时间是一

九六三年五月，重庆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料三年后文革烽起，李井泉、任白戈为保自己过关，偏偏又旧账重提，按北京整肃“三家村”模式，把萧李廖三只“死老虎”拖出来以重庆“三家村”之名痛批一番。批就批吧，没承想事情不出一月，任白戈自己偏偏意外落马，市委大佬们一个个泥菩萨过河，谁还有功夫过问这三只“死老虎”？萧、李、廖在党内斗争中已被整得心绪寂寥，“流年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能保全个“名节”便阿弥陀佛，谁还敢搞什么“反夺权”？

可是偏偏有打抱不平的红卫兵、红透神州半边天、见冤案就上的翻案专业户：“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主动找上门来了。文化革命确实无奇不有，天津有个闻名全国的揪叛徒专业户：天津大学八一三。

“北地东方红”刚好反过来，专门喜欢为人翻案。“北地东方红”学生领袖王大宾向笔者证实过，说躲藏在他们学院等待翻案的干部太多，以至于多得连最专门喜欢闹乱子的江青也难以接受了，曾经阴阳怪气地指责，说他们专门招降纳叛。

如果说“北地东方红”帮忙翻案最成功的案例是让刘结挺、张西挺咸鱼翻身，在四川省革委会当上了显赫要职，那么最失败的例子就当属罗广斌案了。“东方红”等到罗死都死了才匆匆忙忙成立专案组。专案组由总勤务组李某负责，成员一为北地“东方红”曾某（男），一为西南师院八三一何某（女）。最后翻案失败——专案组历时一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让江青一句话就宣布告吹：“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这句话是毛夫人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解决四川问题的会上说的。按照“三一五”指示中的这一精神，北京地院东方红只得决定解散罗广斌专案组，令曾某把资料全部上交四川省革筹组。但是翻案虽不成功，曾、何二人却在“并肩战斗”中朝夕相处，渐生爱意，最后喜结连理，终成眷属。这不能不说这是那场大革命留下的一份美丽的副产物。

相比之下，萧李廖的翻案活动既不像罗广斌案那样波澜迭起，也不像刘张案那样卓有实效。事实上，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北地“东方

“红”确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即从拘禁地将“萧案”苦主分头找到，像蛇头搞偷渡一样先把他们接去该联络站的重庆驻地，接着再密送北京，安排地院住下，后又悄悄转入四川大学，让他们集中提供“揭发李井泉”的材料，雄心勃勃要将他们打造成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尚在暗中加工，不料被八一五帅哥先抛了出来：当时确实让我们大感震撼。几十年后，我问过八一五总团的核心人物黄顺义：对此情况，你们当时是怎么掌握的？黄回答，说他对此也一无所知。秦安全从哪儿弄来这些情报就不得而知了。重要的是，事情的新鲜感和冲击力让众人的耳目为之一震，这就够了。革联会最后决定：砸派如果不用“勒令”，对革联会的称谓上不加“伪”字，可以考虑将道具给出。否则：坚决不给！

作为报复，四月二十一日，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等组织对北碚地区八一五派召开的“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誓师大会”发起造反。大会地点依然是北碚解放台，正是八三一头目周荣一帮人的耻辱之地，所以造起反来怒不可挡。重大八一五的宣传车当时正在此奏乐助兴，八三一们一涌而上，把汽车、广播器材及铜管乐器全部砸了个稀巴烂。

事后，八一五的传单说那批铜管乐器价值上万元：该数在当时是确是有点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实在有点夸张。但说它们值钱不假，而且从造反一开始就掌握在重大业余文工团员手上的这批铜管乐器，每次游行在最前面列队、走步、吹奏，确为造反派大壮行色。如今这些宝贝被反目成仇的八三一公然砸烂，八一五的愤怒可想而知。消息传来，正在重大集会的师专附中、一中等八一五派，立即和重大学生一起，杀气腾腾，直奔北碚而去。示威人等一律身着民兵装，腰扎皮带，有点北京高干子女“红八月”搞红色恐怖的劲头，吓死人的。次日，不依不饶的重大及沙区学生上万，继续盛怒游行。被砸坏的宣传车、广播器材、铜管乐器等等，全数随队展示，作为砸派挑起武斗的如山铁证，在市中区上、下半城杀气腾腾地绕行一整天。再次日，砸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就是上面说的“打倒刘邓陶，砸烂革联会”

的大会，八一五继续以牙还牙，对本来就不甚庞大的游行队伍实施围堵、嘲弄、捣乱，把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队伍折腾得够呛，双方纠缠了四、五个小时方才各自收兵。

全武行的重庆文革，好戏开台了。

第十四章 沙市纱厂历险记

叙述重庆日益惨烈的群众争斗之前，有必要补充一段我个人的历险故事。时间是革联会的迷乱时期，地点是沙市纱厂。

沙市纱厂是重庆棉纺六厂旧名。位于长江南岸李家沱，从重大所在的沙坪坝到那儿非常远。前面曾说到该厂工人代表来重大求访，其中一位美女和我的编辑同学一见钟情，并且共同演绎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当初，他们的爱情绝对是真诚的，每个周末美女都要大老远从李家沱赶来沙坪坝和我同学约会，周日晚我同学又总要恋恋不舍把她送很远很远。看见他俩缠缠绵绵离开重大，我都会不期然想起《诗经》里的名句：“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这一段与沙市纱厂有关的热恋实在令人羡慕。

沙市纱厂留给我个人的记忆却特别糟糕。

前面说过，四月六日革联会常委会作了六条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立即调查处理沙市纱厂等单位的问题，彻底打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凡是被保皇势力反夺了权的地方，革联会坚决支持并帮助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权立即夺回来”。事后革联会确实很快这样做了。

关于该厂“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情况，西师八三一机关报《红岩》第十期的“棉纺六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调查报告”作了详细报道。这篇撰写于四月十七日的文章有如下叙述：

六棉纺织兵团“于元月二十八日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权所掌握的党、政、财、文大权/但是.....在四清运动中被列为四类干部的厂长王××和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曾××（保卫科长）、屈××（厂办公室主任）等，惊魂稍定，又立即支使已垮台的工纠中的顽固分子，于二月二十三日拼凑了一个新的保皇机构——重棉六厂‘二七’分团...../六棉‘二七’分团，在革联会和区×××部

长的支持下，于三月十七日晚，借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到该厂‘镇反’为名，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进行反夺权之实。当时区公安分局的政法兵团何××说：‘把章交出来！如果他们夺错了，我们帮你们夺回来。’当晚革联会也去了三人，其中王庭学（一直忠于八一无派的工人组织“二七兵团”一号大佬——笔者注）也表态说：‘二七分团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有些缺点和错误’……以后王××（厂长）等一小撮混蛋，还拉大旗作虎皮，欺骗群众说：‘三月十七号夺权，警备司令部是支持的。当时就是早夺了两个钟头，若迟两个钟头，警备司令部还要派一排人来支持夺权。’”

上述过程和四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十期《山城战报》介绍的大同小异，在此不再赘引。关于反复辟夺权，《山城战报》的消息则报道如下：

“四月三日，市革联会组织六中 32111 战斗团、三中抗大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单位部分战士开始进厂，配合着该厂的广大革命战士，一面调查研究，一面大造声势，协同作战，在兵团战士的凌厉攻势下，几天之内，厂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的御用组织、纯‘工纠’变种——六厂二七兵团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四月七日，兵团战士在毛纺厂红岩战斗团等革命组织的协助之下，把大权重新夺了回来，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

这篇文章肯定是我写的，之所以印象特别深，不为别的，就因为棉纺六厂离沙坪坝太远。大学时代我担任校美术队队长，每年都要组织同学到四川美院参观学习。从沙坪坝到美院所在的黄桷坪就够遥远了，而李家沱，还要从黄桷坪往前走到九龙坡，再从九龙坡乘船渡过长江方才到达。我在美院学生的风景写生中多次看过薄雾中的九龙坡、灰蒙蒙的长江和江对岸依稀可辨的李家沱。我对那儿的风物环境记忆尤深，所以我能肯定这则消息是我去采写的。为这则消息配发的评论员文章：“革命尚未成功，刀枪不能入库”自然也是我写的。文章题目很显杀气。眉题是：“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长革命左派志气，灭阶级敌人威风”；正题是：“纺织兵团六厂战斗团痛击反革命



《山城战报》笔者撰写那篇引起风波的报道与评论。

纵队和纺织兵团把权夺回来了。这是真的支持吗？……现在工纠变种六棉‘二七分团’高叫要砸烂革联会！他们又是真的反革联会吗？不！是周瑜打黄盖，在演双簧，迷惑群众，革命的同志们！警惕啊！”

按常理推断，既然革联会公开把“二兵团”打成了“右派”，打成了“阶级敌人”——需知：在那个年代，这是最高级别的政治定罪啊——罪犯可能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宣判者“演双簧，迷惑群众，”吗？几十年后，如果要实事求地叙述这件事，只能这样说：当权者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忠诚，不能不把真心投靠他们的重棉六厂“二兵团”一脚踢回他们原来的位置；“二兵团”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忠诚，不幸而成为了政治游戏的牺牲品；那么，那个撰写调查报告的西师同学呢，偏见不幸让他跑得比无知离事实更远。至于我，则因为这篇文章，莫名其妙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生活故事。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月十七日，我和报社一冉姓编辑一道去灯泡厂采访。灯泡厂也

逆流”。副题是：“他们重新掌权，扬眉吐气，振臂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消息和评论员文章共占一个整版。顶头通栏则是毛泽东语录：“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可谓气势汹汹了。

相比之下，《红岩》报的调查报告对于造反派重新夺权的记录就很显无奈，有点言不由衷了。报告只在最后一段轻描淡写谈到：“虽然在四月七日，革联会的人来假惺惺地支持六棉革命造反军‘红日’

属“老保翻天”重灾区，反夺权情况之严重仅次于六厂，而且对该厂造反派的平反——据说——是五十四军副军长白斌亲自处理的，足见革联会对此事重视有加。行前，我和冉先到军代表郝子义办公室了解情况。

郝子义，五十四军文化处副处长，在革联会分管政工。与亲善和蔼的刘润泉相比，郝的外表正好和形成强烈反差。郝身材魁梧，络须满腮，很有军人威仪。一九六七年烽火连天的八月二十二日，郝同另三位副处长、一位处长分乘三辆吉普从市区返回警备司令部听报告，途经两路口，意外遭遇占据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反到底派枪手袭击，死处长一人，伤副处长及随员5人。郝腹部中弹，大肠外流。另一副处长曾惠民股骨中弹，整条大腿截肢。两年后二人随部队换防来到云南，笔者曾在昆明和他们见面，话说重庆当年，二人愤慨良多。中印战争打得那么厉害，该军牺牲者最大不过营职，而重庆一日，竟伤亡六名正副团级大员！说起当年砸派，他们免不了怒火难抑。革联会那会儿郝还没有那么多愤怒，我和冉走进他的办公室，正好有二人坐在沙发上与郝交谈，像是讨论什么问题，语气平和，甚至很客气的。见我和冉进门，郝忽露如释重负之情，很快将我推介给坐在沙发上的人。“他们就是报社的，”他说，“你们找他！”

我莫名其妙，二人已经毫不客气地发难：

“重棉六厂的文章是谁写的？”

“我写的。”我说，“怎么啦？”。

来人喜出望外，宣布：今天要找的就是你！继而顿然变脸，厉声威胁：

“你给我们平反！”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谁打你反革命了？”我也拉下脸来，“处理六厂复辟是革联会决定，你找我有什么用？”我毫不怯场。

“我们就找你！”对方坚定不移地大喊大叫，“你把我们两千革命群众打成右派，我们就找你平反！”

“你胡搅蛮缠！”

我的态度非常强硬。在政府机关，自家门口，我怕谁？喜欢循规蹈矩的保守派和我斗了几个回合，自知不会有实质性结果，便悻悻撤退了。行前，他们没有忘记问我的名字。我得意地宣布：坐不改名，走不改姓：周某某。

二人走了。

第二天革联会便通知我作为报社代表，前去六厂听取意见：我想这该是郝的主意了。同去的还有一位军代表，年纪与郝相仿，分管政法的，李姓。李给人的感觉是既不威严也不和善，就是瘦，一付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让你摸不透他水平有多高或多低。一路上他压根儿不和谁说话。我想他是应该向我问问情况，统一统一口径的，可他就是一句话不说。党的组织工作者大约都是这德行吧？我想。最经典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作者捷尔任斯基就是如此，在苏联的革命传统故事片中，长着一绺山羊胡子的捷氏从来没有露过笑容。我记得他只会冷冰冰地说一句话：“你这个叛徒！”。上次我去李家沱是赶公交车，辗转许久，这次是革联会派车送，虽然一路沉闷无话，却不用多久就到了，汽车从九龙坡乘轮渡过江，上岸，直接开进了六厂。

几百职工早已守候在那里，球场乱麻麻一片，要求平反之声震天动地。为首的就是那天在郝办公室见过的人，他把我们领进一间很大的屋子（像是食堂），还没落座，跟进的人群便将我们二人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平反之声又起，再次震耳欲聋。我跟在军人旁边落座，莫名其妙想起了古老的三国故事：关云长单刀赴会。那天我们是双刀赴会。有军代表在侧，我记得我自觉很安全。那年月所有东西都打破了，只有军装的国防绿代表着秩序和权威。再说，起哄的全是些老保，手下败将，我确信他们只不过嘴上嚷嚷而已。会场组织得很糟糕，甚至根本就没有组织，反正任众工友一个劲儿地乱吼乱叫。

李代表正襟危坐，我也正襟危坐。老保欺软怕硬，不敢怒对年纪偏长的军人，叫骂声就全冲我这个穿便装的黄口稚子一人。我安坐闹中，以逸待劳，很舒服地体会什么叫“硬着头皮顶”。几十年后，我在

云南听山民对歌，歌中总是多夹发语词、语助词，如“伊儿哟”“呀儿哟”“哥勒妹子”之类，开始听时对歌词摸头不着脑，听多了摸到诀窍，歌者一旦凡开口，我就把“伊儿哟”“呀儿哟”“哥勒妹子”之类逐个剔除，内容就很明了了。这场景总会让我想起沙市纱厂的围攻，几百人吼来吼去，无非就是要我这个学生仔给他们平反，只是在内容中加了很多“黑笔杆”“烂笔杆”“臭文人”“死文人”之类的发语词、语助词。

军代表很懂后发制人，等众人叫得再衰三竭，这才突然一声断喝：

“革联会派我们来听意见，你们谁说就谁说呀！乱嚷嚷干什么？”

我突然对他刮目相看了：他才是今天真正的关云长。群众顿时被吓得不知所措，满场鸦雀无声。俄而有勇者试探着带头又吼一声，其余人等这才回过神来，满屋子又此起彼伏了。这情景让我又想起了一个成语“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捷尔任斯基”则又开始以逸待劳，等众人又吼得差不多了，才又不耐烦地再次断喝：

“我们今天专程来听意见，你们乱吼什么？如果没诚意，我们现在就走！”

看来军代表也没什么可怕。会场反正没人主持，人人皆可自由发挥。军代表话音刚落，场上立马又吼，而且越吼越来劲。

“捷尔任斯基”估计拿不出什么绝招了，于是金刚怒目，再次拍案而起，断然宣布：“你们既然不想说意见——小周！咱们走！”

这猛然一拍，真地个把四周吓坏了，会场再度鸦雀无声，人们退潮一般乖乖闪开一条路，让我们大摇大摆走了。这时我才发现围攻者已经如此众多，从大厅一直挤挤地排到球场：我们的车就孤零零停那儿。工人们继续抓紧时机对我吼叫，依旧是我要我平反和臭文人烂文人之类，只是加入了一些口水——没人动手。我们关上车门便一溜烟走了。我在心里庆幸：

天咧！多亏是老保！

事情并没有完，老保也绝非我相象的那般无所作为。

事后第二或者第三天上午，山城战报正开编辑部会，忽有两个不

速之客上楼来了，怯生生地向大家问：周某某在不在？我马上敏感意识到他们是在问我。那天的郝处长办公室的访客记住了我的姓，而我的名字他们只模糊地记了个音，所以今天来人所报的后二字都不正确。

主持编辑会的军代表重复问了一次他们找谁？他们重复了一次——军代表马上回绝了，说报社无此人，然后继续开会。二人无奈地下楼去了。

过一会，又换了二人上楼，又问周某某在不在，还是怯生生的，依旧把我的名字报错了，军代表很快回绝，二人又下楼去了，会议继续进行。我的预感却非常明确，他们肯定是来找我，而来人肯定就是重纺六厂的。说不准他们的大队伍已经等候在了编辑部的楼下，专等我落网。

果然，下班下楼，地坝已被闹嚷嚷的工人围得满满宕宕。其他编辑先走了，我、慈眉善眼的军代表、还有刘福最后在出现，一下子就被团团包围了。有人认出我来，大吼一声：

“就是他！”

然后一齐大吼：

“就是他把我们两千革命职工打成了右派！”

“强烈要求他给我们平反！”……

三人被分割围困。对军人不敢造次，很快被他们放行，军人顺势把刘福拉走，接着来拉我——但已不可能：我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局面是一比数百，无法脱身，我只能孤军奋战了。

工人的行动今天组织得好多了。有主有次，发现我确实无法逃跑，一个首领模样的人过来向我交代政策：“今天你跟我们回厂去！”

我故作镇静，问：“跟你们回去干吗？”

回答：“给我们两千革命群众说清楚！平反！”

对方完全是非常得意的恶狠狠了。报社的同事们已不知去向。个人的抵抗显然毫无意义，我爽快地回答说行，但我得吃了饭才能走。市委大院已看不见人来人往，没有谁可以对我施以援手，唯一的自救办法就是拖延时间，等上班人来，或者将他们引向人多的地方再寻机

会。

老保毕竟老保，面对偶然得手的猎物，他们的姿态显得很高，头领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派出彪形大汉数名陪我前往食堂。一路上，头领明确威胁：“把话给我说清楚，到了厂里，群众对你的态度不满意，发生了什么过激行动，我们是不负责任的。”那年月所谓的“群众过激行动”，翻译一下，谁都明白就是拳脚相加之类的意思。造反派打当权派、打保守派，即使打你个人命危浅、气息奄奄，只要说一个“群众过激行动”，法律就甭想介入。既已落入狼窝，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唯一可做的，就是表现自己的勇敢和气节，于是我毫不示弱地回答：

“你们小心：我出了事，你们脱不了手！”

午饭时间已过，市委大院一派冷清。我和押解我的大汉们一路舌战，一面只想着如何拖延时间等待救星出现，或者利用对方漏招悄然逃命。一个人孤单单被人拖去关黑屋子、挨群殴毒打绝非好买卖，我一定要想办法自救……可惜，一路上什么也没发生，食堂已经到了，硕大的屋顶下空无一人。如果不出现奇迹，磨磨蹭蹭把饭吃了，最后还是只有一个结果，被这帮大汉绑架、由凶巴巴的工人呼啦啦吆喝回厂，去面对无法预料的“群众过激行动”。

几十年后，如果说重庆市委机关食堂留给我的印象，应该说有这么两件：

第一件是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这位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人物，文革一来，竟沦落到与我们为伍，同在一个食堂里搅勺子，这事让我非常直观地感到世道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

任是在前一年七月、文革伊始即被北京通过一篇署名文章的注释点名被打了下去，正因为倒台早，反倒让他“塞翁失马”，少却了许多麻烦：其他那些还在台上和学生纠缠不清的书记常委什么的，后来七零八落，一个个全被群众揪起来当了道具，在批斗会上弄得死去活来，而他这只“死老虎”，偏偏谁都不想管，送革联会一交了之，反倒得了许多自由。他和我们在同一个机关食堂搭伙，凭票吃饭。因为系

走资派，食堂遂立了两条不成文规定：一，必须站着吃饭。二、只能买低价位的菜品。我曾有意识靠近他的饭桌吃饭，有时干脆把菜端过去和他放同一张桌子站着吃，作近距离观察：“死老虎”碗里果然都是些清水菜肴。每顿饭他都吃得认真至极，满嘴咂咂有声：我猜想他的心态绝对正常，因此虽陷逆境而身体硕壮依旧，美中不足只是胡须不常剃刮，如秋草之零乱，显出了许多落泊之征相。

我如此观察任书记完全出于好奇。一九六六年八月我曾写过一篇大字报，描绘此公的住房。解放后激情岁月，上峰成年累月总是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号召大家学大庆“干打垒”精神，先生产后生活什么的。可此公常住人口好像就仨（他，夫人、人称“山城母老虎”的华逸，还有一个上音乐学院的宝贝女儿），却住了花园一院，别墅两幢，一中一西，院中小廊回合，曲径通幽，道不尽的幽静闲适。那时他已被中央点名下课，人去楼空，胆大包天的中学生便敢于逾墙而入，把公馆打开了展览，这个展览让众多在“干打垒”和准“干打垒”里艰苦度日的山城百姓大开了眼界，就像当初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一样，据说，有工人还当场哭起来，说真是修了！真是修了！如此下去，劳动人民真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我写的传单题目就叫《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传单还专门提及了一件事，说任一家每月吃水果就花三十多元！其钱数实在让人咋舌。重庆造反早、造反派多，任白戈公馆展应是功不可没。

市委机关食堂留给我深刻印象的第二件事，就是在绑架者威胁下的那顿午餐了。

就餐时间早过，食堂已空无一人，我径直去伙房打来饭菜，一个人便回大厅轻嚼慢咽起来。食堂大，至少有二三十张桌子，条凳多已损毁，后来者打好饭菜往往只能站着吃，因此大家吃饭都要抢早抢快。这天没谁和我抢，我只管慢慢悠悠地吃，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吃饭，只是以吃饭为幌子拖延时间观察动静：几道大门果然都被彪形汉子封锁。我第一次发现食堂那么大，那么空旷，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引起空空回响。

大汉们等我磨磨蹭蹭终于放了碗，于是走过来催我上路。其时，大院路上还是不见人影走动，离上班一定还早。我又找借口说，六厂的事情具体由组织组的人经办，必须找上他们和我一起去方有好效果。老保又非常宽厚地同意了。大汉们再次跟我在大院里乱窜。当时我满脑子都抗日影片中游击队的“蘑菇战术”，我带他们到处瞎兜，故意找根本没人的房间乱敲一气，无人应答，又胡乱找另一间再敲。对方似乎发现了我的阴谋，不断紧催强逼，并且继续威胁说群众会有过激行动云云。正在绝望，公共厕所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平时天天路过毫无感觉——不就是普普通通的厕所吗？——这当儿我却惊喜万分。我想起了，那些天厕所后墙正在维修，扒开了一个大缺口，从正面是看不见的。我隐忍急切之情，镇静告诉对方说：“行。我去解解小便，解了就走。”

除了保守派工人的老实巴交之外，剩下的就是我的运气了。大汉们傻呆呆等在厕所外的小路上，我已身手矫健地翻越厕所后面的围墙，溜之乎也！墙后是市委领导宿舍区，一幢幢小楼掩映在初绿的林中。我如脱笼狡兔，一口气急穿而过。其实，翻过围墙那一刹那，我就确信已经脱险，但我还是跑得很快。我个子瘦小，体育活动的唯一强项就是长跑。这个良好习惯一直坚持几十年，使我至今仍能在老迈之年保持旺盛精力。穿出宿舍区，下坡，一溜烟石阶，左边是科委机关什么的。这些路我全熟悉，跑到底，面前就是巍峨高耸的人民大礼堂了。正好有公共汽车开来，我跳上去，直奔望龙门码头，然后乘缆车下坡，上轮渡。船行大江，长风浩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事情还没有完。

我在长江南岸的姐姐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回学校呆了两天。报社是有电话的——大约当时信息意识太差——我没打电话，第三天下午，径直又回市委大院了。从上清寺到市委大院的街道上，这一段时间如乡街集市，总是砸派人员前来静坐、寻事、看热闹。这一天同样人头涌涌。我确信已时过三天，企图绑架我的纱厂工人无论如何都该散了，于是毫不在意地从熙熙攘攘的闹众中穿挤过，登上了三楼的

编辑部。刚一进门，刘福就惊诧喊起来，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怎么啦？不可以回来？他说：你没看见下面这么多人？我说：看见啦。刘福一声长叹：

“坏了！那些都是抓你的！”

他告诉我说，六厂的人一直就没走，在楼下静坐好多天啦！几天来声援的、轮班的、看热闹的，人越堆越多啦！

全编辑部都为我没被发现而庆幸，紧接又为我如何脱身忧心如焚。没有时间犹豫，大家当即派人下楼，不知哪儿找来一架很长的竹梯，悄悄绕去报社后侧的居民小院，把竹梯架上来，让我马上援梯而逃。我脑子里当时定然是闪过许多古代故事：武子胥过昭关、刘玄德跃檀溪、石达开缒城夜逃……当时我想我肯定也什么都不能想。抓我的人随时可能冲上来，我匆匆忙忙援梯而下，逃出居民院，上坡，从另一个方向踅到市科委那个山坡，顺三天前逃命的路径再度直奔望龙门码头，再次渡过长江避难去了。

重棉六厂的二七兵团，后来正式成为了坚强的“反到底”，即砸派。

第十五章 中央单独解决重庆问题

沙市纱厂危机结束，我就彻底回学校了。北京已传来消息，说重庆问题将在解决四川问题后单独处理，总团要我立即回去做资料工作，以备上京参加会议。这样，从五月一日起，我就离开《山城战报》，并且再也没有在那儿呆过了。

此前，为配合四川省和重庆问题的解决，重大八一五就派出了阵容强大的“百人赴京汇报团”去首都开展宣传活动。领队是吴庆举。吴非常喜欢主持这类具有悲壮色彩和轰动效应的活动，而且在这类活动里总有英雄独胆一类上佳表现。一九六六年九月，重大学生绝食两天而后徒步上京，数千人呆在北京展览馆孤立无援，凄凄惨惨戚戚，那一次，便是吴带领一帮人去府右街中央文革接待站苦守多日，终于等来了那位虽为国人却必须随时带翻译出场的陈夫子伯达的接见，陈老头的福建话谁也听不懂。陈夫子尚未接见之前，吴在中南海门外苦守太久，以至于自己都觉得快顶不住了，遂从府右街现场捎回一封信，倾吐满肚子苦水，对此次悲壮绝食北上流露出许多绝望。诉苦信连夜向恶卧裸地的数千同学宣读，当即有意志脆弱者痛哭失声。那一晚我也在现场，九月秋凉，辗转无法入睡，索性和几个同学起而谈议，直到东方之既白。

此时，军号忽然意外响起，紧催众人集合，侠肝义胆的“老黄牛”黄顺义跳上石凳，向众人大声宣布：昨晚吴庆举的信把形势估计错了！现在我们重新估计！

平时我总觉得“老黄牛”缺少一点儿政治智慧的，北展九月那天早晨黄的表现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懂得了“政治形势”原来是可以根据需要来任意“估计”的。黄顺义充沛的激情再次把大家鼓动起来，当天，几千人又打着红旗到北京四处活动，支援苦苦守候中南海边的吴庆举一行，终于坚持到了陈老夫子的接见，算

是给刚出道的八一五挽回了许多面子，也给喜欢出风头、却又流露过悲观论调的吴庆举挽回了许多面子。一九六七年四月的吴庆举老练多了。其时北京舆论几乎一边倒。清华《井冈山》、北地《东方红》等大牌小报配合四川、重庆问题的解决大造舆论。《山城在浓雾中》、《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之类耸人听闻的文章接二连三登陆那一时段的显赫版面。仅读标题就足以把人吓得毛骨悚然。吴庆举带领同样自命不凡的重大同学披挂上阵，正是要对首都三司作正面抗击。

临行前，吴庆举带领众人在八一五广场举行仪式，正式宣誓出发，浩浩乎激烈壮怀，有点北上抗日的感觉。他们满以为王师所至，一定所向披靡，殊不知这次的遭遇并不比一九六六年九月那次好，甚至还要糟得多！既然京佬们在重庆被八一五“地头蛇”砸过、抄过、欺负过，现在你自个儿送上门来，我首都三司当然要一报还一报，而且决不手软。八一五的北上队伍到北京不过几天功夫，北地“东方红”就两次光顾他们的住地东大桥接待站。接待站原是一片新落成的住宅区，居民还没入火，政府就临时安排上访人员呆下了。首都的造反派冲进住房，把他们从重庆带来的传单、书籍、告状材料一抢而空，把告状团的“战旗”撕个粉碎，还“绑架、毒打我赴京汇报战士”。“重庆崽儿”生性刚烈，素多亡命之徒，败而弥勇，百十号人立即开到中南海门口去排队宣誓，把胆壮得足足的，接着又开去北京地院找“东方红”算账。自投虎穴，寡不敌众，抗议者自然少不了又被一顿好打——事后，告状团的同学对我说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他们正被打得无可如何之时，突然有一彪单车队呼啸而来——一色黄军装、一律红色黑字袖标——飞车队迅速对“东方红”暴徒实施包围，继而皮带如长鞭上下，对准“东方红”便一阵乱打：八一五趁机溜了。后来知道，飞车族原来是恶名昭彰的联动分子、被中央文革巨头搞得灰头土脸的“贵族子弟”。对于首都造反派，他们有天然的刻骨仇恨。

刊登在《8·15战报》十九期头版的《告首都人民书》（写于四月二十七日）、及刊登在二十一期头版、写于五月三日的“誓词”，除了向首都市民介绍重庆一月革命伟大成果和八一五战士忠于毛的拳拳

苦心，也硬着头皮向社会道出了上述冤情。

“重庆崽儿”的强硬暴烈很起作用。我到北京后在东大桥住了十来天，“东方红”就一直没再来找过麻烦。重大学生在窗台上堆满砖头、石块。墙上贴了两条字体斗大的对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横批：“坚决自卫”。那画面，分明就是一个月后重庆大规模武斗在首都的试用版。告状团主帅吴庆举已在几年前作古，另外的总团勤务员对此事又依稀莫记，笔者只能根据仅有的文字资料和自己的记忆对告状团的活动记略如上。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俗称“红十条”）是五月七日公布的。我们果然很快接到正式通知：重庆问题单独处理，要驻军、革联派和砸派三方派人同时赴京与会，两派群众组织各出代表若干名——这儿说“若干”，因为现在无论采访哪派当事人，都说不清具体人数几何，有说五个的，有说十个的，有说二十个的。每个受访者都言之凿凿——甚至举出姓名，比如：罗广斌老婆胡蜀兴称是砸派正式代表，另一些受访者断然否认，说当时罗广斌本人的问题还糊涂着呢，怎么可能让他老婆掺和进来添乱？——甚至举出细节，说接见那天时已子夜，太晚，周总理一进来就请大家一起吃饼干，吃得各方其乐也融融，另有一些参加者则干脆说吃夜宵纯属子虚乌有……弄得专攻重庆文革史的专家们头痛不已。

我是随革联派代表于九日晚十点乘 20 次特快列车出发的。我记忆中的人数是三十五：但这不是正式参加会议的人数，比如三十五分之一的我，就一直安排在后台做资料工作。所有代表先在重庆大学党委办公室集中做统一交代，这才齐赴车站。会上到底交代了什么？谁交代？军人出没出场？讨论过什么别的东西？现已无法记忆。只记得在火车上我一直和后来担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熊代富邻座，两天多车程，随时随地都能聆听他讲大好形势，讲革联会地位如何之固若金汤，中央对革联会的态度是如何明朗。革联会优秀如斯，要是中央不承认它——我坚信不移——事情之邪门就只有太阳从西边出、流水由低而高可比。

熊，重庆大学冶金系学生，眼镜儿。生性稳健，为人为事周到慎密，说话慢慢吞吞：正因为慢慢吞吞，他的话给人感觉就是字字权威，绝非戏言。几十年后，我在深圳一间公司忝任总经理，曾专程回重庆把颇受当局夹磨的他弄来沙头角分管一个生产标准件的合资企业。他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圆熟老到的处世风格给我印象尤深。他之所以颇受夹磨，皆因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委”成立时他当过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后来还当过市委常委、团市委书记什么的，算是地地道造反并“起了家”的“三种人”。其实，按他平和的性格，即便政坛风光之时，也肯定不会得罪任何人的，要不，就凭那年月的炙手可热，等到“走资派”重掌权柄之年，随便编个理由也足以把他弄进局子去“修理”几年的。事实是他最终有惊无险，仅仅受点夹磨罢了。深圳共事几年，我发现他凡见了老干部，第一句话总是千篇一律：

“您老身体不错啊？”

说得老家伙心里滋润得很——这是后话。

驻军要员谢家祥政委、白斌副军长、耿志刚参谋长等则于次日晨直接飞京。其时，他们天上飞，地上的列车正路过我的家乡成都，日记记录了当时心情：

早上，车过成都……街上一片荒凉，站内也一片荒凉/我们在想，重庆是光明的重庆，重庆的革联会有很大的成绩，甚至可以说是一面红旗吧。这次去不会有什问题的。毛主席既然指示重庆问题要单独解决，那么，一定不会与四川问题的决议那样处理/欢笑的车轮，铿锵锵地载着我们充满希望的心，驶向北京……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个人、从而整个派别的这种自信，是多愚蠢可笑。

十一日晚车抵北京，飞京的军方代表早已向军委文革作过了长达三小时的汇报，并通过军委文革将书面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是解决重庆问题实质性的预热。对此，我们当时一无所知。我记得的仅仅是“赴京汇报团”的弟兄们激情万分地到车站接了我们，那一晚我们兴奋无比地在东大桥地铺上作达旦之谈。还有就是，第二天起床就发现鼻子出血：我第一次体会到春天的北京空气原来如此干燥。

解决重庆问题第一次会议是我们到后的第三天，即十三日进行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汪东兴、王力、关锋诸人。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现在已无任何具体可供回忆的线索，据我保存的材料，说是双方各派十人出阵。砸派七人先行发言，而后革联派三人发言。日记只有如下几句：“我们取高姿态，而砸派以谣言含量达 90% 的咒骂向我发起攻势。我们摸了他们的底，心里更踏实了，决定下次全面反攻。”这些情况很可能是参加会议的勤务员们告诉我的。

几十年后重读日记，以为自我感觉不错的我们实在幼稚得太可以。所有的政治博弈，其实都不能用神圣、正义之类的概念来评价的，它们都不过是权力集团利益、实力之间的平衡和妥协罢了。文革的政治博弈中，学生充其量只是上层行为的背景而已。重庆问题怎么处理？说穿了，得看文革派和军方在分配权力方面如何讨价还价？而毛准备如何平衡？和老百姓的一厢情愿毫无关系。从可以确认的事实来看，砸派谁出席？谁发言？发些什么言？都是由首都三司圈定的，而首都三司背后是中央文革的影子。同理，八一五谁出席？谁发言？发些什么言？也都是军队在幕后提词。接见第二天、即五月十四日，便有了四川省革筹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人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八条意见上奏。这些意见如此快捷精准，和后来公布的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决定丝丝入扣。如无上面授意，他们定然不可能如此快捷、如此准确地写出如此要命的文档。完全可以这样猜测，这个与重庆数百万人命运攸关的文档本身，就是由北京准备就绪，无非让他们签字划押而已。把所谓代表弄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去象征性地发发言，不过是给热血沸腾的造反群众下点毛毛雨，来点心理按摩罢了。

十四日午后，我应召赶去西苑宾馆，听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就

中央重庆解决问题的意图向八一五代表吹风。我们傻傻地以为北京已按驻军意见也即八一五意见把事情定下来，把革联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认下来了。让我们去听耿参谋长吹风，就是去听胜利捷报。

耿志刚，中等身材，壮实。看见他总会让人想起少林寺的武林高僧。人前一站，他总是很显威严。那天的情况却有点邪了门。他刚刚开始说话，满场便像捅漏了马蜂窝，嗡嗡营营乱成了一团。代表们根本不愿再听下去，狂躁不安地只想找谁拼命却不知该找谁拼命。我稍有迟到，一上二楼就陷入混乱，好不容易才搞清楚事情缘由。

原来北京的意思，是肯定驻军成绩，就是说，肯定驻军支持的是革命左派，同时，为避开矛盾，决定绕过两派争论不休的革联会，重新组建一个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市革筹），仍由驻军负责主政——这个结果，对军队肯定是大大利好、从而对八一五也大大利好。可是，自以为是的学生领袖们那天全成了政治上的榆木脑袋、饭桶、白痴！一听说北京不提革联会三字，就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一样失魂落魄，参谋长话犹未了，大家马上罢会，一股脑儿要向楼下奔。耿身手敏捷地闪来楼口，大张双臂阻拦，要大家留下来把话听完——其实，当时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奔哪儿去？只知道楼梯是唯一的通道，于是就死命往外挣。武林高僧果然力大无比，最后真把大家拦住了。

革联会不就一个名字吗？好比说钱，有人叫人民币，有人叫钞票，有人叫银子，不管怎么叫法，钱就是实质。几个月来，八一五巴心巴肝、大喊大叫、誓死捍卫，又是写文章、又是对口词、又是打油诗、甚至还有歌曲，什么“新山城嘿战鼓敲，一月革命卷风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了权，滚滚长江拍手笑……革联会就是好，革命红旗永不倒！”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把自己真正想要捍卫的东西都忘光了。不就是权吗？现在权还不明明攥在驻军、也就是攥在八一五手上吗？乱嚷些什么呢？西苑宾馆这帮乱众一听人家把“革联会”这名号废纸团一样轻轻松松扔一边去，就如丧考妣：政治上何其无知而可笑！被“武林高僧”重新劝上二楼的政治白痴们好不容易把传达听完，无话可说，一个个垂头丧气散了。我返回东大桥，又和同样困惑不解的

哥儿们毫无实际意义地嚷一通，骂一通，睡觉。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大家还傻乎乎地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以为这一切的发生，皆因中央不了解重庆的真实情况所致。下次接见，我们还有机会向最高首长报告的，而且侥幸认为最后结果定然还会是“革联会”的完胜——两天后的第二次接见很快粉碎了这种天真无邪。那天正好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发动文革标志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周恩来、康生、杨成武、王力一千人等走进人民大会堂西北厅的时候气色非常好。关于重庆问题的中央文件已经敲定。周显然没有闲功夫和不懂事的娃娃们啰嗦，他一进会场就开宗明义宣布：

“今天结束重庆问题。”

接见是深夜进行的。准确时间应该是十七日了，从一点十分开始，至三时三十三分结束，共两个多小时。两派都有许多人在大会堂门外等候消息。这是五月北京惯常的暖春之夜。星斗满天。天安门广场阒无人声。两派人士都站在沉默不语巨型圆柱下等待。无人说话。他们都是些重庆市最自命不凡的人物，而那两个多小时，他们却成了最不自信的人。站在夜幕里，忍受着漫长等待的折磨，像囚徒惴惴不安地等待终审判决。

接见毫不拖泥带水。周恩来宣布“今天结束重庆问题。”之后，当即点名八一兵团张益代表八一五派发言，紧接点名江陵厂砸派代表发言，两派代表发言完毕，不容任何人插嘴，周宣布：“你们写了不少材料，很多事情都弄清楚了，不要耽误久了。”接着宣读中央决定，并逐条作出解释。

“决定”凡五条，其意略为：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李井泉、重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任白戈；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

动的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三，立即建立由五十四军副政委蓝亦农为组长、副军长白斌为副组长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吸收各派群众参加；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五，要拥军爱民。云云。这个决定后来被俗称“红五条”。

平心而论，这个正式决定和前面提到的张、梁、刘、张四人意见，大意无甚出入，而在肯定驻军成绩的程度上，还更有甚于四人意见，明显让八一五多捞了好些分。比如四人意见仅轻描淡写说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而正式决定则明确肯定：“有显著成绩的”；四人意见说驻军在处理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式决定干脆将此话删去。难怪事后，砸派一个代表对我说，听完五条，心里明白大权还在五十四军手里，一下子就懵了，而八一五带头羊周家喻在中央要员面前，则信誓旦旦表态，决心要“解放全人类”，要到保守派产业军去做工作，云云——如此得意洋洋，算是明白人了。重庆传闻，说周的姿态被周恩来誉为“高姿态、高风格、高水平”——此兄后来便有了一个著名的撮号，曰“周三高”。

相比之下，留在学校的勤务员们简直就是糊涂虫。“周三高”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得意洋洋表态“要解放全人类”，千里之外的重庆事情却已完全失控。如果在家主政的人换一换，情况也许完全就是另外一种面貌了，可惜留在校内的，偏偏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黄顺义。重大八一五所有学生心里都堵满了干柴，一点星火就足以点燃燎原烈焰。黄的失控偏偏就成了最早的火星。

那场景很像悬疑电影里峰回路转的故事：

五月十七日上午，“老黄牛”和留校的“勤务员”们全都值守在电话录音机旁，焦躁不安地看着值班女生把北京来电逐字逐句记录在纸上。四周如此安静，只有磁带机嘶嘶旋转，还有女生的笔尖在记录纸上划出沙沙声。最后一个字记录完毕了，中央文件里终究没有出现

任何关于“革联会”的字样，勤务员们全傻了眼。

重庆大学八一五这帮政治上的“楞头青”，他们对毛、对共产党的狂热崇拜毋庸置疑，几个月来偏偏莫名其妙将这种崇拜固化为对“一月革命成果”革联会的崇拜；从而毋庸置疑的引申便是，否定了革联会（不管什么形式的否定），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东大桥告状团的弟兄们在北京呆了快两个月，该挨的打挨了，该游行的游了，该抗争的争了，所有一切皆属白费。大家尚未听完赴京参会的秦安全传达便一哄而散，游山玩水去了。远离旋涡中心，大家相对容易超脱。当天我去的是十三陵。日记写了：“思想太乱了。我想让长途车上奔驰的冷风和十三陵前清凉的大气沁一沁我的头脑……”

重庆方面却没有功夫冷却。整个校园都不知所措。总团马上召集会议传达、辩论：吵得一团糟！接着在阶梯教室召开小组长开会辩论：同样一团糟！下午干脆在风雨操场召开全团大辩论：情况更糟糕了！动力系四年级学生杨宪腾第一个跳上台，他的发言劈头盖脑就是一句：“给老子啷个搞起的！”

杨出身一个十分可疑的家庭。父亲在大陆政权易手前夕跑了台湾，留下孤儿寡母苦度日。按当时标准，算是标准的黑五类狗崽子。大约置之死地而后生吧，位处绝境的杨兄反倒活得十分率性痛快，文革期间该造反他照样造，该骂谁他照样骂。这种性格后来让他理所当然担任了本校以“低姿态”论战为宗旨的《横眉》报主编。毕业分配时，有人状告他骂过“林彪像奸臣”“江青是慈禧”云，把他弄来“学习班”和我们这帮“问题份子”一起写交代。彼此同病相怜，我们自然都竭力帮他解脱，但实在说吧，我们心里都不踏实，大家对他的口无遮拦一直深信不疑。我没有可能参加五月十七风雨操场的辩论会，但我坚信不移：杨的演说火色一定忒足，出格的话一定忒多。接下来的发言继杨宪腾的恣意妄为，一个个均有声有色，胆大包天。革联会是八一五的圣殿，圣殿倒了，大崩溃的惶惑、迷乱以至于疯狂，势不可免。大家开始怀疑：五条意见毛泽东到底看没有看？副统帅林，到底看没有看？如果看了，那么，一贯英明伟大的他们为何会糊涂如此？

无线电系李姓学生甚至疯疯颠颠在六宿舍前公开写出标语：“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进军号”。

李的标语并非个案。重大八一五的惶恐和迷乱很快被推上了颠峰。当天，总团自己就迫不及待发表了一个“对当前时局的严正声明”。

“声明”继续自以为是地宣布“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毫无意义地继续为不复存在的革联会招魂，宣称它“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声明”发誓要“坚决支持革联会，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声明”怒气冲冲地警告：“山城砸派从二月黑风以来，就一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必须改弦更张，悬崖勒马……否则，坚持下去，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矛盾就会转化。”最后，他们高呼“革联会必胜！砸派必败！”

陡然降临的绝望使八一五丧失了起码的政治理性，洋洋洒洒数千字，通篇竟然没有半个关于中央“五条”和拥护“五条”的字样。

这个严正声刊登在五月十九日出版的《8·15 战报》第二十一期。

与此相反，五月十七日成了砸派的节日。大约他们同样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只是自己的敌人那么气急败坏地拼命反对，他们理所当然就要坚决拥护。退一步说，或许他们已经明白自己依旧两手空空，但反正“伪革联”没有了，他们就算是胜了一回。为什么不高兴？

文革期间，北京盛传一个政治秘笈，叫《三十六条权经》什么的。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记得。如：“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进，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又如：“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又如：“政治斗争中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又如：“谣言重复三次就变成了真理”，还有什么“与其花十倍的力量去掌握一门技艺，不如花十分之一的力量去交一个精通这门技艺的朋友”，等等。其中有一条极其刻毒而且极具可操作性：“诱导对方犯错误”。现在，重庆这个从来狂妄自大的八一五犯错误了，砸派应该趁火打劫，火上添油了，抓紧把这帮神经脆弱的哥儿们推进深渊吧！

他们喜气洋洋地举行大游行。欢呼五条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重庆城满街都是庆祝“伪革联寿终正寝”的口号。文化宫大门前还扎了两座纸做的“伪革联之墓”，倒吊着纸扎的、象征革联会的“癞格宝（癞蛤蟆）”，顽童们则用竹竿吊着真正的癞蛤蟆满街里欢跑……

砸派的欢呼果然让八一五轻而易举落入圈套。十八日，砸派大游行次日，八一五派马上神经错乱地举行更大规模的反击示威：“誓死捍卫革联会”。好像国已破，家将亡，他们要冒死奋起，发出最后的吼声了。气氛悲壮严峻。重庆大学的队伍尤其引人注目。走在最前边的是体工队员，牛高马大，个个手握皮带，杀气腾腾地簇拥一道革联会的金字招牌，上面还扎一朵红绸。接下来是巨幅标语：“强烈要求张国华、梁兴初到重庆答疑！”整个队伍无任何拥护中央五条的标语，恰恰相反，革联精神万岁之类的誓言则比比皆是。每一张杀气腾腾的脸上都写满对中共中央的怨尤和愤怒。

八一五气还没有缓过来，喜出望外的砸派马上又开始第二波反击，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再次狂扑而来：

“重大八一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

“坚决揪出重大八一五炮打中央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重大八一五素以稳健著称，如此胡来实在让人大吃一惊。眼见得沙坪坝方寸大乱，最着急的莫过于五十四军了。无论如何，重大八一五事实上是重庆文革最重要的稳定性力量，它一旦崩盘，整个重庆的局势将不堪设想。五一九大游行次日，驻军首长不能不气急败坏前来救火了。

那一天，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韩怀志、参谋长耿志刚全体出场。演讲会还是在风雨操场举行。军人们一上台就大大方方接受了重大学生献给的“八一五的袖章”，还故作姿态地表示“能作为一个八一五战士，我感到很光荣。”接着副军长白斌宣布，他们是来“向同学们学习，趁这个机会给同志们作个汇报的”……军人一个动作几句话，轻而易举便把余怒未消的大学生搞得熨熨贴贴。伸手不打笑面人。人家态度如此真诚谦恭，你学生娃娃还有什么好说？于是不断高

呼“毛主席万岁！”；高呼“重大八一五永远忠于毛主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接下来，上任伊始的革筹组长蓝亦农像幼儿园阿姨诳娃娃一样向大学生证实文件的真实性。信誓旦旦地宣布它确实是经过“毛主席批了的、林副主席看了的”。他发誓：“八一五总团的同志……要我们打包票，我们所有的军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的，一致打包票。”

受了委屈的娃娃突然被大人在嘴里塞了一颗糖，全场哑然。

接下来开始讲故事。说的是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之战。五十四军是参战胜方，讲起故事来自然起伏跌宕，津津有味。故事高潮是得胜收兵，缴获了枪械无数。蓝说，他们在五千多米的喜玛拉雅山（刺激！）把敌人散落的武器收起来，擦好，正要班师回朝——突然，故事峰回路转——上级通知他们把战利品悉数交还对方。“指挥部的同志有的哭，有的气……当时想不通，我是作政治工作的，很发愁。这时马上来了一个电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作政治工作的就很高兴了，就把这句话传下去，全体指战员没说二话。大家议论这是为什么？说不出道理，只晓得毛主席说的就是对的。”

狼外婆终于被羊妈妈打败了——故事顿时赢得满堂彩。

最后，蓝在演讲中明确宣布：“（军队）过去坚决支持你们，今后坚决支持你们、相信你们！（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今后“如果不依靠你们，不相信你们，（我）就是光杆司令”。面对笑逐颜开的大学生，他又谨授机宜，说：“看问题要看得远，看一千里。革联会是临时的，过渡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更上一层楼”

这句话后来变成了八一五派有名的口号：“革联会开新宇，革筹组更上一层楼”。

白斌接下来的演说从感情角度对学生娃娃继续煽动，自然更惹火。他特别讲了一件现实故事，说重庆三中“抗大兵团”给五十四军军部打电话，“他们一面打电话一面哭，心情很沉痛，说希望我们给重大八一五作一些工作。重大八一五是重庆八一五的旗手，这个红旗不

能倒。说我们三中抗大兵团看着他们。我们思想上也想不通，但五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们就要坚决照办（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向三中抗大兵团小将学习！毛主席万岁！）……这是中学生将了大学生的军，这个军将得好！三娘教子，子教三娘，为什么中学生不能教育大学生呢？完全可以。（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

是不是大学生更书生气呢？相比之下，中学生确实更懂得实惠？下面这句有名的口号就出自于当时的中学生：“方糖也甜，圆糖也甜，砸派有个铲铲权！”（笔者著：铲铲为四川土语，空空如也之意）。几十年后，重读这些演说和激荡满场的口号，必须承认，中国军人和国外军人确实大不一样。外国军人从不过问政治，而中国军人个个都是一流的政治鼓动家。当然，那年月的大学生思维水准本来就和小娃娃相去不远。两者互动，政治鼓动的煽动效果很快显现出来。

会后，重大八一五立即发表“再次严正声明”。“再次严正声明”除继续重申“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革联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除继续抽象地表示要继续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继续高呼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之外，已不再具体地要誓死捍卫什么东西了，这些条文的位置也在声明中明显后挪。开宗明义第一条，是对中央五条“最最坚决拥护”“最最坚决执行”；第二条，坚决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一五派在无奈中举行的大游行，表态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决定（俗称“红五条”）。

拥护由蓝、白、唐等人组成的市革筹组的正确领导。从“严正声明”到“再次严正声明”，时间间隔不过三天：这个弯子转得也实在太急了些，不免言不由衷。“再次严正声明。”不像两天前的“严正声明”那般气壮如牛，没有放一版的显著位置，而故意放到了四版的角落。第一版刊登的是“五条”原文，还有号召学习“五条”的通知，羞答答地告诉大家：“毛主席是舵手，八一五跟着走，毛主席说了算，八一五照着办。”工科学生就是工科学生，还远没有修炼出专业政客的厚脸皮。

以上这些文本，发表在姗姗来迟的《战报》第二十二期上。

到二十一日了，终于被折腾有点明白的八一五在大田湾重新召开大会，人数组称二十五万。会议主题：“坚决拥护中央五条”、“革筹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山城八一五派英勇奋斗的胜利。革联会好，革筹小组更好。”革筹组副组长白斌到会讲话。大会通过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热热闹闹折腾了几个月，这一回合总算尘埃落定。“中央五条”、从而革筹组的存在已无可置疑。两派都面临了新的巨大难题。大凡执着于宗教信仰的人，当厄运骤至，他们要么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要么果敢拒绝，以死相争。八一五和八三一，他们对信仰的狂热不亚于宗教徒。问题是，他们的上帝和远在虚空的上帝不一样。天堂里的上帝因为虚无而让信徒有可能按自己的观点对上意任意诠释，从而最终让自己心灵平衡；真实存在的上帝则不一样了。他健在，据说身体还非常非常健康，他随时要亲自发表“最高指示”。而且指示变化莫测，甚至自相矛盾，让你既不能从容，也不敢拒绝，剩下的，只能是尴尬和无奈。对于骄矜自负的八一五，他们原来所感知的砸派是不堪一击的、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廉罗栈”散兵游勇，而如今，在他们必须遵循的红头文件里，砸派突然间成了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一大派！他们必须学会与之平等生活；再说，砸派和成都的川大八二六一样坐过牢，在云诡波谲的政治博弈中做过太大的风险投资，他们理应得到巨额回报了。川大八二六原来不就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个小

小支队吗？而现在一转眼却成了把红成压得喘不过气的政治新贵。西师八三一呢？相比之下，他们的收益太可怜了，充其量就平了反，让他们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有点像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笔下那个贪得无厌的渔夫老太太，除了草屋和木盆，现在依旧一无所有。实权还在八五一一边。他们依旧只能生活在枪杆子的阴影之下。

第十六章 我所亲历的“六五”大血案

上面说到“中央五条”下发第一时间发生的重庆戏剧，我都不在现场。我正在由武汉开往重庆的船上。

没有坐直通火车从北京返回，而取道武汉乘船溯江而上，一是因为革联会被否了，我的心情太差，想乘机去看看三峡风光，散散心。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是我有个姐姐在武汉作医生。我叫她七姐。兄弟姊妹十一个，就我和她关系最好。不仅仅因为亲情，更要紧的，她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共产党员，而且长得最漂亮——我从来认为把她的照片登上时尚杂志《大众电影》封面，绝不会逊于任何当红明星——我把她视为我们家族的骄傲、我的生活偶像和精神导师。整个大学时代我一直和她通信。凡遇了思想问题，不论大小，只要一读她的回信都会顷刻化解。虽然她信上的话和政治辅导员的说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无非青年人应如何树立革命人生观、世界观、如何放眼世界、胸怀全球，等等，但同样的话一旦出现在姐姐信里，我总是感到温暖熨帖，心悦成服。

这一次的武汉之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姐夫是南下干部，大小算得个“当权派”级别，姐姐在她们单位多少也负点小责，早被文革理所当然地抹去了光辉。再说，一个多月后即因为绑架中央大员王力而闻名全国的“反动组织”：“百万雄师”，正和革命派“三钢”“三新”一道把武汉地区的文革形势演绎得天昏地黑。姐姐和姐夫自己还面临许多理不清、解不开的精神乱麻呢，他们能给我解开什么心结？在姐姐家呆了两天，同样憋得难受，很快又离开了。从武汉到重庆整整需要五天工夫。五月二十四日一早出发，二十八日下午才到达朝天门码头。下面的日记记录了当时郁闷：

五月二十五日。万里晴空。/船在辽阔的大海一样的长江上航行

了一天。/山城的斗争，到底进行得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在船上，什么都听不到。

五月二十六日。阴。/已经第三天了。昨天下午三时，船过沙市；今天凌晨二时，船过宜昌，逆流而上，便已进入西陵峡。大约四点过，从梦中醒来，披衣起望，两岸已是群峰壁立……真的像到了世外桃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消息都听不见。”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雨。/船在航行。/驶过幽暗的峡谷，绕过险恶的滩头，白天黑夜，不倦地前进，驶向山城……/船没有在奉节过夜，今天上午九点，船到万县，刚一停船，我马上就跑上岸去，我多么想在大字报上找一点关于我们重庆的消息！/街上，大字报很多，但关于重庆的消息很少。在一个剧团门口，喇叭吵得特别厉害，在一条条地数落重庆伪革联的罪状。/另外，在街上还看到一个重大八一五和建院八一八合办的宣传栏。上贴《8·15 战报》和《818 战报》各一。《8·15 战报》是五月十九日出刊的，第一版是重大八一五关于重庆时局的严正声明，口气很硬/在街上，还有所谓重庆来信，嘲笑伪革联垮台了，重大八一五公开写大标语反中央，并有一半人上京告状云云/……我们的八一五，到底怎么了？……

重庆等待我的是一派刀光剑影。

中央五条没有给山城带来和平。尘埃落定，八一五终于弄明白自己是真正的赢家，于是开始以胜者惯有的伎俩挥舞橄榄枝呼吁和平。《8·15 战报》仅二十三期一期（五月三十一日出版）就有如下文章：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停止内战”“同志，你的枪口对准谁？”。六月三日第二十四期又发表大块文章：“致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等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呼吁停止内战。

八三一心里当然明白，同意对方的和平呼吁无异于束手就擒。他们与其被蚕食消解，宁愿拼个鱼死网破。一年前，在刘少奇的所谓“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仇恨帮助毛泽东培养出了一只高呼造反的“天兵天将”，使之得以顺利地发起“倒刘”运动；那么现在，“二月镇反”炼炉里焙烧出来的，则不再是那么幼稚的“天兵天将”了。他们已经窥破政治斗争的许多秘诀，老辣了许多。重庆的文革舞台便有了不断

升级的、蛊惑人心的精彩舆论，如“警惕没有伪革联的伪革联”，如“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如“誓与山城赵永夫血战到底！”等等。赵永夫是当时青海省的军队将领，因开枪射杀造反派群众而成为“带枪的刘邓路线”代表人物。重庆大大小小的实体摩擦、斗殴，也随着舆论的喧嚣而不断升级。

下面是日记记载的一些事件：

五月二十八日，砸派召开群众大会，粉碎“炮打中央的反动逆流”。大会称：“重大八一五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八一五立即回敬：“谁要八一五投降，先把头颅交上。”

五月三十日，重大四名学生前往重庆医学院张贴大字报，遭对方围攻并殴打。四人愤然回校，正遇战斗团在风雨操场召开辩论会，疯狂的掌声把挨打同学簇拥上台，其中一位受害者掀起上衣沿半圆形的台口绕行一遍，展露背部尚在流血的累累伤痕，满场顿时掀起一片仇恨的旋风。

三十一日，八一五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邹茂林“烈士”追悼会。邹茂林，重庆石油学校学生。死时仅十九岁。从《8·15 战报》上刊登的照片看，完全是个稚气未脱的娃娃。他是怎么被打死我已无从知道。现在能找到的资料仅仅是《8·15 战报》二十六期，邹茂林母亲在追悼会上的发言，题目是：“红卫兵勇献青春，烈士志气贯长虹”，发言除一些流行的豪言壮语和孩子如何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之类的事迹，具体罹难死情只字未提。

六月二日，重大八一五数百人前往重医递交“照会”，就五月三十日我校同学被打一事提出抗议。去人再遭医学院及航锋（河运校砸派组织）“毒打”。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人们懂得了，对于景阳岗上的老虎，没有什么可以忍让的余地。武装起来！用战斗粉碎反革命的进攻！我们也要武装起来，每人一把弹弓，每人一根棍棒，每人一顶藤帽，把每一座大楼，都筑成一座堡垒。”

关于这些情绪描述，我很快看到了现实的样板。

某天去石油校，天已黄昏，石油校院依旧一派繁忙。全是半大中

学生，男男女女，或往来不绝地扛石条（重庆叫连儿石）、抬木料、或席地围坐，用作业纸包石灰、用铁锤砸石块以作“弹药”。教室的所有窗户都挂上了草帘作为掩护……那景象和抗日传统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上老百姓对付“鬼子”扫荡前的繁忙毫无二致。重庆大学的抗战准备比这些中学要晚得多，但现代化程度要高许多，在当时沙坪坝地区最高的建筑物：六教学大楼——正因为高，后来便成了反到底火炮轰击的最佳目标——门前，甚至架设了七弯八拐的管道系统和威力巨大的高压喷射装置：其力量足以致人死命……

重庆文革史著名的“六五血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北京回来后我一直无事可干。《山城战报》的军代表已经撤走，由石油学校那位德高望重的中文老师李乃如重新组阁；《8·15 战报》在我离开后也一直由几十年后重庆的著名集邮专家何国光等几位同学操办，我不想再涉足其间，终日价无所事事，到处晃荡，继续从北京就开始的悠闲时光——直到六月七日，这种悠闲终结了。

那天黄昏，挥汗如雨的重庆突然变得有些凉爽，寝室窗外的山坡上，蓊郁的树林在晚风里沙沙响，让人特别惬意。晚饭后，我坐窗前闲翻书卷，楼梯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文工团员王太康，还有另一位叫蒋元伟的，全副武装闯进来，大声问我：

“敢不敢去打砸派？”

所谓全副武装，当时的水平还停留在水泊梁山时代，就一身玄色劳保服，头上一顶藤帽，武器则为一根金属棍棒，如打虎武松之哨棒然。俩玄色武夫面前一站，让我恍若看见神话故事里的力士金刚。王太康即八一五事件次日和我一起秘密赴京告状的亡命之徒。而蒋之亡命又远在王之上。保守派甚嚣尘上的一九六六年秋，蒋曾独闯包围圈，爬上几十米高的烟囱顶上将“麻子兵”的大喇叭强行撤下，英雄独胆，让围观者歎嘘不止！蒋、王都是舞蹈队队员，身手矫健，在他们眼里，我分明只是手无缚鸡之力、只能躲在屋里写文章的酸秀才而已。二人手提棍棒冲来下战表，分明是要逼我出洋相。年轻人的虚荣心容不得我怯场，甚至连去哪儿？什么时候去？为什么打？我统统没有问，放

下书卷就答了：

“有什么不敢？打就打！”

王蒋二人立即带我去弄来一根金属棒：铝合金的，轻，估计打起人来不会致命。我拿在手上很踏实。接着我们又一起爬上一辆装满人员的卡车，开去三教学大楼前停下。三教学楼是采矿系办公楼，该系同学下矿实习时都由学校配备劳保用品，藤帽极多。大家跳下车，一窝蜂跑去楼里仓库一人取一顶戴上，这就出发了。我已经知道西南师范学院两天前开始发生了大武斗，至今还局面胶着，胜负难分。好像八三一占了点儿上风，春雷有点顶不住了，需要哥儿们马上前去增援。

藤帽和棍棒备齐，我们的车却没有直接开去北碚——拥挤在一堆玄色武夫群里，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开进距重大不远的重庆师专——文革期间，重庆师专广场经常成为沙坪坝区八一五的集体活动场所——这时候，暮色迷离的操场早停满车辆。全是卡车，足有几十辆。车箱里挤满武斗人员，棍棒参差林立，气势蔚为壮观。队伍定然是要在这儿集中完毕后才统一出发。

天已黑净，天上开始下雨，飒飒啦啦，越下越大。衣服早已透湿，可众人全不在乎，他们好像不是去经历生死存亡，而是要赶赴一次新鲜热闹的嘉年华。

我混混沌沌地挤在车斗里，根本没发现精力旺盛的蒋、王二人早已失踪。他们不知到哪儿溜躻了一圈回来，兴冲冲地站在车下叫我快下去。我问为什么？他们不答，只神秘地向我挤眼睛，要我马上下车。我坚持要求说明原因，他们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句要我躲雨，接着将我强拉下车，又拖上另一辆车。这是车队中间唯一一辆大客车。我猜他们二人大约发现我这个秀才今天没拉稀，够意思了，让我晾在卡车上继续淋雨有点于心不忍。

上了客车我才发现原来这是指挥车。熊代富，就是后来的重庆市“副市长”，和一帮人正在紧紧张张商量作战方略。熊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雨越下越大，夜色显得更黑更浓。打仗的人就喜欢这天气，卡车于是编队出发了。雨太大，路滑得不行，汽车无法启动，于是吆

喝众人下车推。车轮边、驾驶室、车斗下边一片散乱。马达开始轰隆隆响，满身泥水的推车人同时开始惊咋咋呐喊。车灯的光柱里只见的雨丝如麻，人戈交错，让人想起历史巨片中大战将临的经典镜头。

我经历的重庆文革史著名的六五大武斗，就从这儿开始了。

届时为止，这确实算得双方有预谋、有组织、大范围调动人力、器械、运输工具的一次最大武斗，也很快成为两派舆论渲染最多的新闻热点。六月十六日出版的《8·15 战报》二十六期，几乎用全部版面报道了此事，文章有：“一腔热血怒澎湃，洒去犹能化碧涛——记西师六五大血案”、“西师八三一炮制六五大血案铁证如山”“杀害解放军的凶手，往哪里逃！”、“何其残忍！何其狠毒！”“勇献青春谱壮曲，笑洒热血写春秋”“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文稿有铺垫、有高潮、有细节，而且每个细节都惊心动魄，通读文章，宛如重读战争年代的英雄故事。比如，写到“八三一”将“春雷”围困三楼，然后准备实施爆炸一节，文章道：“暴徒们点燃两枚雷管的引线。引线在迅速地燃烧。大楼在危急之中！二百多名阶级兄弟的生命就要毁于一旦！/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高大的身躯冲上二楼，猛地扑向炸点。‘轰——’雷管爆炸了！这个身穿绿军装、背着水壶的解放军战士应声倒在血泊之中……他的共产主义英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关于事件的准备，《8·15 战报》则刊登了若干八三一战士的揭露材料，其中有刘××说：“六月五日中午，我大队勤务员说下午有个统一行动。下午约两点半，同学通知我到美术系办公室，并叫带上棍棒……约三点到了总部，周学昌（勤务员）说今天下午攻新图书馆，把春雷赶出来……约四点，广播里吹起了冲锋号。见很多八三一战士手持棍棒冲进图书馆大楼。总部门前的宣传车（北碚反复辟指挥部，是井冈山）高叫：‘春麻挑起武斗’……周荣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武化大革命。四川最后是枪杆子解决问题，最后逼你拿起枪杆子了。”还有张××说：“五日午饭后，总部通知中文系大队的全体战士把基建科的铁器搬办公大楼上，搬完后回到宿舍。这时是两点半左右，班勤务员个别通知说，等会儿广播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开始行动，反穿衣为号。”

这些材料，估计是后来被俘的八三一人员被提审时的供词。其中有一些现在尚可依据逻辑判断进行证实或者证伪，有些却很难了。下面再摘引几十年后两位对立派人士的回忆：一位是周荣，“西师八三一”一号勤务员。他说事前他曾“主张占领那幢楼（图书馆），未引起重视，结果被春雷占了，然后就是春雷不断挑衅，八三一的人过路（到食堂）就常被打或掷石子，以后又看到在抬‘连儿石’（注：即石条）修工事了（来的外单位的八一五派工人），他才向勤务组提出不能不争取主动把楼抢过来。”另一位见证人叫杨向东，现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已退休赋闲。杨当时为西师教工五一红卫队负责人。他认为“六五事件”起因完全因为春雷的“挑衅”：先修工事，高音广播每天挑衅，故意刺激八三一犯错误，而进攻确是八三一主动发起的。因“春雷居高临下，占了优势，又准备充分”，所以进攻“处于劣势，受伤肯定是八三一的多。”

几十年后，把那些偏颇、甚至过于离奇的成分剔除，复盘这段历史，我以为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先是，西师八三一总部设在中文系大楼。中文系大楼上边的山头上，尚未装修的图书馆大楼雄踞制高点。勤务员周荣的主张未被采纳却被春雷抢了先手。春雷占据新图书馆大楼，立即着手修建工事。其间还邀请若干外单位的同派工人、学生参与修筑。工事既成，装于楼顶的高音广播便开始日日挑衅八三一敏感的派别神经。周荣遂有了充足理由敦促勤务组发动进攻，把大楼夺过来。经过一番精心策划，遂在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十三中“九八”、河运“航峰”、重庆医学院等数百砸派支持下，于六月五日下午向图书馆大楼发起突然袭击。这是一座刚刚断水的建筑物，由阅览楼（主楼）和藏书楼（附楼）两部分组成。主楼共四层，附楼共六层，主楼二楼有天桥和附楼相通。八三一从主楼底层和藏书楼同时攻入，将春雷完全困到主楼的三层以上，紧接将二、三楼之间的楼梯用炸药炸断，再用火烟炙烧熏烤，火中还加上些辣椒、六六粉之类辛辣刺鼻之物以加强熏烤效果，欲将春雷困死楼顶。春雷事前显然已有准备，用汽油铁皮桶装了好些自来水，还准备了许多饼干之类的干粮。武斗发

生后，前来劝架的解放军又用吊篮送去了一些食物，这样，春雷得以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坚持下来了。被困第三天，即六月七日晚，八一五经过精心策划，几十辆满载武装救援人士的卡车于是在飒飒夜雨中出发了。

从沙坪坝乘车到北碚，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一小时左右，可那天我们的车却走了整整一夜。天黑如墨，行动力图隐秘，车速自然很慢，更严重的是我们在行车途中不断遭遇伏击，行动就得步步小心了。

第一次遭伏是在双碑。双碑离沙坪坝只有十多公里，就是说，车队从师专刚刚开出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遭到了伏击。车队正行进，前面突然停了下来，整个车队停驶许久，一辆吉普车才在雨中逆向驶来，驾驶室有人用手电筒直射天空，光柱里看得见密密的雨丝——这是事前约定的信号——我们车也用手电光回应。指挥车位居车队中部。吉普车戛然急停，“侦察兵”跳出来，在雨中向客车喊话，说前方山谷已被砸派用石条封锁，两边山头疑有伏兵，急问如何处置？熊总指挥马上碰头计议并当即决定：命指挥车后面的人全部下车，徒步上前包抄山头，打掉伏兵，占领隘口，抬开石条，待道路打通，指挥车前边的车队即齐喊杀声冲关，位居指挥车后的空车尾随开到，占领隘口的人员再上车跟行。

事情好像进行得比较顺利。命令下达不久便再次得到侦察兵报告，说山头已经攻占，隘口已经疏通，指挥车于是下令所有车辆全速前进。那一刹那的情景我记忆犹新：恐怖的“杀”声在旷野呼天啸地而起，撕人心肺。所有汽车全部提速，疯牛一般狂冲而前。闪过隘口那一刻，我的瞳孔定然急剧放大：山峡两边站满手握棍棒的人，乱七八糟的石条已被抬开——有那么一刹那，山上好像还有一根木头滚下，一个人跟着木头滚下来，来不及站稳，便有我方人员冲过去一棒将其搠翻。

出峡谷，车队几乎凭借惯性狂奔。周遭墨黑一片，我们如坠地狱，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猛地，又来一阵惊天动地的破碎声炸响，接着便发现指挥车两面的窗玻璃碎片四溅，我看见我们车上有人被飞石砸得尖叫、头部血流如注，同时又听见前后的车队中也是叫声

一片：我们中了伏击了。指挥部急令停车，并派人下车去道路两边的田野搜寻、追趕袭击者。好一会儿，平静无事了，车队又开始缓缓前行。俄而雨脚渐住，野地云路俱黑，依旧什么都看不见。害怕再遭伏击，车队只敢时停时走，磨磨蹭蹭向前挨，好不容易快到北碚了，突然又得报告，说前方隧道里似有火光闪烁，疑是伏兵，车队只好又停下，又派人先去包抄山头，不知又过了几时几刻，反正大家都已困顿难支，头一靠上椅背就昏昏欲睡。等先遣队把山头占领，天色已经依稀放明：隧道里原来是“红农八一五”的农民举着火把在那儿接应。车到北碚，天已完全大亮。大战将临，大家已全无倦意。当地老头老太太箪食壶浆，送来许多稀饭、咸菜、点心和鸡蛋等食品，我是一点也不想吃了，其他人好像也食欲不佳，但求快些开车赶现场去。

图书馆武斗现场很快让我大吃一惊：完全一幅原始部落械斗图。废墟一样的楼顶立满手持棍棒的躯体：全光着身子，或者穿着破烂不堪的背心，裸露的脸部、肩膀、肚子、腿部和手臂均被熏得斑驳黢黑。没头盔保护，躯体们便从被子里撕出棉花裹在头上，很像蛮荒部落的印第安土人头上插满翎毛。废墟间烟火缭绕，其味焦臭刺鼻。我心中顿然一紧。

大队援军的突然出现显然让废墟上的印第安土人无比兴奋，也让盘据在一楼二楼的占领者有点儿猝不及防。进攻尚未开始发动。火烟缭绕的大楼四周出现了一片骚动不安的沉寂。八一五的指挥现场设在一片小树林间。四周还安排些武装人员布防。地上还摊开一张示意图，很是像模像样了。熊等人围蹲着示意图讨论攻略。一会儿召来许多建筑工，又运来许多竹木，很快捆绑成云梯。接下来，指挥人员用最古老的办法：射箭，与四楼的“春雷”传递信息，接着“春雷”从四楼扔下几根长绳，攻方人员拉过绳头将云梯顶端捆好——攻略这就全部准备就绪。

俄倾，总攻开始了，号手将冲锋号得很凄厉，云梯被长绳迅速拉上三楼，武斗人员顿时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大楼涌扑过去，援云梯攀爬而上。多是些中学生。他们什么装备没有，光着头，也没有劳保服

什么的，一个个勇如飞蝗，势不可当，全不管石飞如雨，只顾闷着头前赴后继，奋勇争先。有人被砸，有人落梯，或仰坠，或前倒，血流横飞，喊声震天，却无一退缩，那场面真的惊心动魄。飞石是从二楼倾泻下来的，如瀑如雨，飒啦啦掷地有声。三、四楼的“春雷”为配合冲锋登楼者，便奋力向二楼洒石灰扔石头以为掩护。云梯上虽有伤者坠落，但更多人已冒死上楼，爬进窗口接应早已疲惫不堪的“春麻儿”。

我先是站在远处呆看，很快便被狂乱的冲动感染，无法自抑，遂提着棍棒冲了上去。残楼已被所有方向团团包围，唯正面大门堆满石条，用厚厚的黑板阻挡，攻击力量最显薄弱。似有神秘力量控制，我自然往那方向冲了过去。进攻者和守卫者双方通过大门上方的天窗孔互掷石块对战。外面人多，扔石多，很快将里面的“火力”压制住了，众人于是冲上前去搬石条，用棍棒砸黑板。困在里面的“敌人”已无“弹药”好扔，突然间竟扔出许多点心和茶叶鸡蛋之类，攻方多为中学生和农民，一见掷物中有如此美味，顿时停下进攻俯首拣拾，一边拣一边揣物入囊。眼见得胜利在望而进攻者如此眼浅，我忍不住愤声疾呼：不要拣！不要拣！话音未落，里面已又将一阵乱石抛出，当场砸得贪小利者惊叫不止，这才不敢懈怠，抓紧扔石还击并继续砸黑板。黑板很厚，砸了很久方才砸开。冲进大厅，大楼其余各门均已洞开，八一五呼啸而入。八三一全线溃散了。

冲上二楼，我看见已全是自己人。二、三之间的楼梯事前已被炸断（八三一大约是要以此把三楼以上的春雷彻底困死），众人一边搭木板把“春雷”接下来，一边又顺天桥向后面的藏书楼冲击。藏书楼空间狭小，窄窄楼道被胜利者挤得水泄不通。事实上，大“八三一”们早就跑了，没有跑掉的人已为数极少。寡不敌众，只能一层楼一层楼地向楼顶且战且退。八一五人多势众，从楼梯通道投石开路，呐喊着尾追而上，还有一些人则用棍棒冲打楼顶的铁皮——藏书楼的书架是混凝土整体浇灌的，为通风计，在书架处预留了一排排空档，其上叠放着一层层可以上下挪动的铁皮隔板。隔板捅开，其余人就一个劲

儿向空档里猛砸石头。

“八三一”已兵败如山倒，很快退到六楼：无处可退了。我们到达制高点，如苏联电影之攻克柏林然，红旗应当插上国会大厦了。只是空间太窄，且无红旗好舞，面前就一群惊恐万状的战败者，于是得意洋洋狂呼：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造反派素多慷慨激昂之辈，动动辄就要“誓死”这样“誓死”那样，可一旦面对真刀真枪的敌人，举手还是举得很痛快，而且一个举得比一个快。也有人举得稍慢，胜利者正好就有了表现自己英勇无比的机会，毫不客气便一棒打去，打着哪儿是哪儿：头部、肩部、胸部、臀部……只要打得叫唤就成。可惜满屋子连举得慢的人都没有了，只好就砸碗、砸水瓶、砸洗脸用具什么的，好像器皿也属砸派观点，都该挨打。

俘虏被全部押解下楼，经过清点，多为北碚地区的中学崽儿。藏书楼一层空间就那么大，容不得许多好汉。“战斗”结束，我曾溜跶到大楼旁边收容俘虏的平房去看过，俘虏全蹲地上，由带队者领颂毛语录，还派发点心，并通知家长逐个领走。大学生就十来个，全押回重大了：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情况。

事发第二天，重庆街头却出现惊人消息，说西师八三一在“六五血案”中有“三百壮士”跳楼，其悲伟壮烈毫不逊于抗日战争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这一消息顿时把我打懵了。我承认，在我写过的文章里，叙事不实者有之、夸张骇听者有之，究其原因，最多不过道听途说、派性偏见而已。在亲历了惨烈血火的切肤之痛，发现舆论与真实竟可以如此天差地别，这却算第一次。我必须承认，就打那一刻开始，我的胆儿也突然间变得忒大，我也让哥儿们马上写一则八一五的悲壮故事：在六五血案后紧接发生的“施家梁遭劫”中，八一五有“八百壮士投江！”。从那后来乃至很久，甚至大学毕业了，我被发配到了遥远边疆，在全民“庆九大、献忠心”的活动中，写通讯稿、写学毛著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讲用材料”，我都一直沿袭红卫兵年代遗风，爱怎么写怎么写，极大提高了当地宣传部门的发稿率和好稿率，深得

领导赏识。

当政治理想和支撑它的革命理论还是一种信仰的时候，人们的所有行为，不管崇高、愚蠢甚至荒唐，往往都是真诚的，而一旦发现政治仅仅是一种功利，人们就会把支撑它的理论仅仅当作一种武器了。

战地重新平静下来，满场一派狼籍。后来，对方又组织了几次反冲锋，都无功而返。该打扫战场了。那一辆用作指挥车的客车开来楼前地坝接运伤员先行返回。我的小腿在冲击大楼时被石块击中，已肿得老粗，算得伤员了，自然被大家劝上车。附带的任务就是把俘虏押解回重大。所谓押解，其实很简单。俘虏们都已被捆绑得结结实实，像箍桶一样，还用绳子上上下下扎了好几道箍。怕他们喊叫，又在地坝上胡乱拣些脏破布、臭袜子往嘴里一堵，然后像木料一样塞到座位下面。动弹都不可能，反抗绝对不会发生了。让我们担心的倒是：满车都是伤病员，如果路上遭到对方武装拦截，待会儿满身被捆、嘴巴被堵、像木头一样塞在座位下面的，大概率就该反过来轮到我们了。为安全计，乘客和汽车进行了伪装，驾驶室前故意挂了个“31路”公共汽车标牌。乘客身上太赃，就把衣服反过来穿：虽然依旧很赃。一路



重大八一五 301 野战部队

上提心吊胆，故作镇静，遇了几处盘查，还好，都是八一五的，放行了。回学校把俘虏交给了302，我们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当时重大有两只专业武斗队，一曰301，性质属野战，成员多为敢作敢为、敢拼敢打的血性汉子，颇受人尊崇。302就不同了，负责校内治安，名唤卫戍部队，大家更喜欢叫他们“乡丁”，以为这帮人没胆量上战场，只敢在学校耀武扬威，纯属“门坎猴”。

回校第二天，有“门坎猴”

兴冲冲来叫我，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说俘虏中有一个《红岩》报编辑，要我前去参加提审。几十年后，我怎么也想不起那俘虏的姓名了，面貌更浑然不清：因为他的眼睛一直被蒙着，跪地板上，几个“乡丁”围着他威胁恫吓——我进门时有人正用脚踢他的腹部，当即被我劝阻了——这件事一直让我纳闷。一天前，冲上西师图书馆大楼楼顶的时候，我完全就像小说书上说过的“杀红了眼”的匪徒，手提棍棒，看见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想打，事情仅仅过了一天，面对曾经和自己兵戎相向、你死我活的敌人，为什么我却忽然间成了“圣人”？那年代，人总是被仇恨追逼着在天使和魔鬼两种角色间来回变脸。神性和魔性，永远在你身上表演和厮杀，一不小心，就会定格在天堂，或者冥界：你别无选择。

看见跪在地板上的俘虏，我莫名其妙成天使了。我只觉得他怪可怜。我问他任何问题他都一一回答，而且回答得还忒老实。我对《红岩》报知道的其实并不多，诘问起来也就东拉西扯：你们编辑部有多少人？他回答多少人；我问都是些什么人？他又一五一十回答；我又问他自己写过些什么“毒草”？他马上回答写过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也不知道，他胡乱编派我也毫无办法。很快无话可问了，于是就搜身。肮脏不堪的衣兜里搜出了几斤粮票几毛钱，还有几张照片。其中有几张是北碚缙云山狮子峰顶拍照的，四个人，同牵一面“八三一”战旗迎风而立，表情颇为悲壮，俘虏交代，说那是三月份八三一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遭遇解散时的留念。我马上宣布说“反动照片，必须销毁！”。他不表异议，接着只是哀求，说其中有一张是他和姐姐的合影。他姐姐远在新疆，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看他。他说钱、粮票和“反动照片”都可以交我们处理，他和姐姐的照片恳请留还。我仔细看了一下，果然有一张照片是他和一个女孩——我想那应该是他姐姐了——那一刻突然想起远在我武汉的姐姐。我的姐姐显然比她漂亮得多——因此我回答得十分肯定也十分大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这张照片、包括钱和粮票，都可以如数还你——你必须老老实实把你的罪行写出来。”

审问就此结束。

后来乡丁们对他怎么处置的，我就一无所知了。听说是写了检讨，就放了。前面提到的《8·15 战报》上的揭发材料，估计就是出自于这些“俘虏”之手。

下面补充说说八一五虐俘。

八一五并不是对所有俘虏都一律优待。关键得看倒霉蛋是什么情况下被俘的？尤其还要看被俘后落在了什么人手里？我亲眼见过的虐俘事件至少有两次。考虑到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便公开虐待者的名字。

一次是在两派武斗最为激烈、仇恨也最为激烈的时期，“门坎猴”在校内捉奸细，轻而易举抓来了一位女老师。该老师是校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不知怎么参加了砸派，这就被盯上了。这位青年教师长得不算漂亮——正因为不漂亮，所以就从来没有像漂亮姑娘那般喜欢出风头，让男生们对她众星拱月——但她演技不错，属于实力派明星。参演大型阶级教育话剧《年轻的一代》，她出演革命老人肖奶奶 B 角，演得出神入化，让学生观众一个个感叹歎嘘，发誓要继承前辈遗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没承想文革来了，她莫名其妙成了崇拜者眼中的奸细：有人揭发，说就是她给出信号，致使我校某目标遭到了砸派炮击，损失极为惨重。总之，就为这个，原来非常尊敬她的“乡丁”们断然将她抓了来，捆在一张凳子上，四五个壮汉围着，用烟头烧她的手臂，还用手摇电话机对她实施电刑。弄得她一忽儿痛苦地大喊大叫，一忽儿嘤嘤低声痛哭。我正好从门口路过，我觉得那场面很像革命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英雄江姐受刑。不同的是，出现在我面前的真实的施刑者和被刑者，都是我的熟人，这一次，我无法在天使和魔鬼之间明确选择自己的角色，只能一走了之。

还有一次，我到文工团某队找某个很要好的同学。他也是“乡丁”。他正忙着打一个俘虏。俘虏是从河运校捉来的。河运校是砸派的“武斗之花”，某次对阵重大 301，被打了个全军覆没——关于那场战斗，我在稍后的章节将会详作介绍——俘虏便悉数押解回来交给了 302。

这下好了，“乡丁”们有足够机会表现自己的阶级觉悟了。我这位好友现在就正在发泄自己的阶级仇恨。倒在地上的俘虏像箍桶一样，全身上下被他打上了好几道箍。这样，“乡丁”打起来非常方便。他把金属棒举得高高，然后劈柴一般猛砸而下，又举起来，又砸。每砸一下，“俘虏”就惨叫一声，身体疼痛，于是像木头一般滚来滚去。“乡丁”已经打得很累了，索性把衣服脱得光光，就穿条一条底裤，又打。见我进门，他很灿烂地愉快一笑，告诉我说：

“这就是砸派！河运校的！”那表情有点其乐无穷。

我总以为施暴者是很有才气的演员，他的表现欲应该去舞台彩灯下去向那些渴慕和期待的眼睛发泄，而现在，他的发泄对象却只有一个：而且是用这种过于残忍的方式，而且是对一个缧绁加身、蒙着双眼、毫无反抗能力的人（而不是观众）。这件事成了此后我和这位朋友关系间一道沉重阴影。

第十七章 施家梁兵败和熊代富脱险

北碚是重庆的模范卫星城镇。蔚蓝的嘉陵江水静静绕城而过。背后是郁郁葱葱的缙云山。山下则是有名的北温泉。这个优雅秀美的小城镇，摆布着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农学院三所高等院校，算是文化礼仪之邦了。本来人就少，低头不见抬头见，很富于人情味的。“六五”这么一打，双方杀红了眼，怨怨相报，很难再相处了。西师图书馆大楼被攻克之后，作为权宜之计，两派代表达成妥协：八一五势力暂时撤出北碚。

时间是六月九日，前来支援的数千八一五开始向市区撤退，害怕被报复的北碚居民也跟在后面撤，熊代富带队，走在最前面，其后是疲惫之师和扶老携幼的各色人等。车少，就先运老弱病残，运进城再返回来，再运。为加快速度，车来回接运，人则不停步行向前。人太多，且杂乱无章，只能一步一步地挨，速度就很慢了。事后听人说起那场景，我莫名其妙会想起《三国演义》刘玄德携民渡江时的尴尬和混乱。

队伍刚刚离开北碚不远，出一段隧洞，行至一个叫施家梁的地方，突然有若干卡车呼啸驶来，与八一五的疲兵惫勇伤病老弱逆向而行，向北碚方向行去。八一五很快发现车上人员均头戴藤帽、手执棍棒，预感事情不妙并且很快发现事情果然不妙，忙大叫中埋伏了！

从市区前来增援的砸派“军工井冈山”几十车人马，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八一五的包围。他们从前后两个方面将他们堵截在狭长山谷中。如果他们的行动计算得更精准些，八一五的下场可能还会更惨——好在八一五很快警觉了，峡谷中恰恰有一个三叉路口，路口一座小桥，穿桥而过的一条小路可抵达嘉陵江边。八一五便踞桥狙击，掩护老弱病残者撤退。只是路太窄，不可能疏散出多少人，而且对于不识水性者这儿正是一条绝路，更多的人便往旁边的山坡上爬，依踞高地



北碚“六五血案”。八一五派败走施家梁，凭借小桥和反到底派人员对峙以掩护大队人马撤退。根据笔者对亲历者的采访，现将几例个案简述如下。

之一：文昌武，电机系五年级学生。文个性豪爽，大学期间历任班文体委员。就“体”而言，他当是够格了，篮球打得不错；“文”就有点差强人意，那时每遇政治运动，学校和系上都喜欢搞文艺会演以配合宣传鼓动，而每次演出总少不了有文同学新作问世。他进行音乐创作时的场景很新潮：上身脱得精光，就留一条底裤（重庆天气太热），房门大开，他独个儿高高站在寝室自习桌上边舞边唱——他身材瘦而高，桌上舞姿轻而易举便让人想起蹦蹦跳跳的大马猴——一旦唱至某句，感觉满意了，他马上蹲下来记录于纸。他创作的一首歌是关于植树造林的，歌词原文如下：“同志们，你们说怎么办？干！加油干！要把那荒山变果园……”前几句侃切有力，最后一句节奏却突然变缓，好像电唱机电量不足，唱片转速突然变缓，歌声也就跟着有气无力，显得非常搞笑。还有一首歌曲是配合爱国卫生运动的，歌名《耗儿歌》，歌词如下：“那个耗儿嘛真可恶，一天到晚窸窸窣窣，咬烂衣服咬破鞋哎，夜晚又来咬耳朵！咬耳朵！咬耳朵！”大学毕业后文和我同赴云南工作。某次我向妻子谈及此歌，她大声抗议，说我绝对是在丑化同窗：“世界不可能有这么难听的歌曲！”不久文来我家作客，我故意当着妻子求证，文大笑不止，而且当即且歌且舞表演《耗儿歌》——恰如一只大马猴，笑的我们前俯后仰。

文正是以这种惯有的政治激情投入了文革并且参加了武斗队。可惜出师不利，第一仗就在施家梁峡谷遭遇了伏击。“我们看事情不好，

且战且退，散兵游勇撒得漫山遍野，其状真可谓落花流水。在“八一五”的历史上，这实在是一次十分丢脸的战斗。

根据笔者对亲历者的采访，现将几例个案简述如下。

之一：文昌武，电机系五年级学生。文个性

马上跳上路边的保坎（挡土墙），用石头还击。”他告诉我说，还击一会，发现敌人越来越多，“寡不敌众，而且我们已连续作战三天，体力明显不支，只好向山上败走。”山坡陡峭，杂木乱生，他和另两个同学好不容易会齐，像绿林好汉一样提着哨棒，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跋涉。完全搞不清方向，只能乱走。害怕被砸派观点者告发，不敢轻易问路，也不敢轻易留宿，在山上整整辗转三天才回到学校。他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是饿得不行了，突然发现半山上有家幺店子，他们便强行把柜台上唯一的食品：玻璃罐里剩余不多的硬糖通通向店主“借”来吃了。看他们蓬头垢面，满脸凶相，店主怎敢不借？借条倒是写了一张的。事后文告诉我，他们哪有工夫去还？对方又怎敢来讨？事实上，逃命回校后，他们连幺店子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呢！更何况兵慌马乱，有何信义好讲？

施家梁兵败归来，文就逍遥于运动之外了。据我所知，文刚进大学时填写的“家庭成分”好像不错：“贫农”什么的，到后来农村“四清”，不知咋就被工作组查出乃父原是“漏划地主”——此事对文的打击是很致命的。文能以黑五类之身而如此大无畏参加革命，已经很难得了。第一仗便打得窝窝囊囊，自然没心思继续冒险。再说，高年级学生本来就面临毕业分配，马上可以挣钱养家了，无所谓身亡且轻如鸿毛，何以面对家中眼巴巴等着儿子寄钱的老父母？后来文果然回老家和中学同窗的廖姓女生专心致志谈起了恋爱，并最后喜结连理。

个案之二是张国梁。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典型的成都机灵鬼，身材短小精悍，说话语多机锋，有时还喜欢来点恶作剧，一不小心，甚至还会作出点惊世骇俗之举。原先我曾读过他写的大字报，文笔犀利机智，颇多鲁迅遗风，如果弃工从文，他定能成为杂文名家的。我第二次组阁《8·15 战报》就理所当然邀他加盟了。入盟前我和他到沿江马路谈心，我问：

“你最喜欢写什么样的文章呢？”

他的回答非常肯定：

“骂砸派！”他说，“我就喜欢写骂砸派的文章！”

施家梁兵败逃跑，当是他多项惊世骇俗举动之一。我已记不起他具体如何从乱军丛中跑出，总之，冲出重围他就一刻不停地顺着渝碚公路向沙坪坝方向飞奔，一直跑到“二机校”——已经有二三十公里，到八一五势力范围了，有中学生前去搀扶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遭伏击了！”接着便昏迷过去。

苏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是二机校的学生宿舍。一个女孩子正在给他打扇。从施家梁到二机校距离如此遥远——中学生本来就对重大八一五非常崇拜，张国梁此举自然让他们想起古希腊那位长跑四十多公里报告胜利喜讯的传令兵菲力彼得斯。菲氏跑到首都雅典，高呼胜利之后便倒地而亡。张虽倒地却没有身亡，而且报告的是让人晦气的消息，这却丝毫不影响中学生把他视为英雄。张被聘来战报编辑后，那位打扇的女孩还常常来重大看他。每次坐在编辑部的办公桌前，女孩含情脉脉，平时多言多语的张兄反而无声无息——哥儿们恨不得煽动张兄马上采取“革命行动”。二人为何后来没能结为伉俪？旁观者无从知道，如果要用时下的流行术语解释，显然该归于“缘分”了。让人总感几分遗憾。

最有名的个案，当算“熊代富虎口脱险”了。熊名气太大，所以一旦被抓，立即就让敌方认了出来，遭遇也就最为惨烈。这段经历后来被人写成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传单，题目叫《熊代富虎口余生记》。文章把整个过程记录得十分详尽，可惜笔者没有收集这份文档。八十年代末，我在深圳某公司就任经理，曾礼聘熊前来就任副经理。距那次被抓已过了二十余年，他那只被捆过的手还九痕累累，绳迹荦荦如新，整只手已变形如鸟爪一般可怕。他告诉我说，被抓那天，先是被打得昏迷不醒，继而被对方用铁丝和绳索反绑起来扔进西南农学院暖棚的泥地里，醒来已不知过了几日几夜。后来又被注射大量麻醉剂弄去北京，病愈后手便无法复原了。

他被弄去北京的情况是这样的：砸派要把他作为“革联会武斗指挥”弄到京城“交中央文革处理”。为了便于运送，遂给熊注射了大量麻醉药。为了不让人发现，还给他披一件大衣，由人以护送病人上

京救治为名，在茄子溪或者离重庆更远的一个小站上了车，一上车就关进一个软卧车厢。房门终日紧闭。这情节很像现在电视上频繁出现的绑匪鬼鬼祟祟偷运“肉票”的镜头。一个叫徐登贵的乘警发现事情蹊跷

(他是八一五观点，也见过熊代富)，一路上就开始动脑筋了。具体情节我已无法回忆，记得是徐得了车上同观点的乘警配合，在列车到达前与北京站的警察取得了联系，绑架者刚刚背着熊走下火车，立即就被警方截获送有司处理。

熊虽然逃出了砸派虎口，事情并没有完。北京公安部门是把他作为外省疑犯或别的什么身份可疑者关进收容站，同样没有人身自由。在重庆，熊当是个跺跺脚能让地皮儿发颤的人物，可在皇城根儿，他一文不名，关着就关着，不管你也不放你。倒是重大的弟兄们急了，遂派出一阵容强大的工作小组赴京营救。营救组员就有前面提到的亡命之徒蒋元伟。事后据蒋介绍，说营救的过程十分惊险的，有点美国特别突击队去中东解救人质的意思，可惜现在我把细节通忘了。

八十年代末熊和我虽然朝夕相处，可大家成天忙于做生意，无暇回忆这些陈年旧事，一叹！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倒是：六月某日，我和他像平时一样散着步去上班。“风波”刚平，前些天热闹非凡的深圳大剧院和旁边的荔枝公园显得格外平静，熊突然对我说一句话：

“这下好了，我们压力终于减轻了。”

我有点莫名其妙，遂问他此话怎讲。

他说：“政府花这么大力气去对付动乱份子，我们这些文革骨干，



二零一四年底周孜仁（右）与熊代富（左）、
黄顺义（中）在重庆合影。

可以松口气了。”

我忽然想起：熊在他原来的单位确实被压抑得太久。我专程去重庆调他那回，他们厂的人事干部曾非常不屑地对我说：“他这种有历史问题的人，根本是不能放到沿海去的。”我游说许久，最后甚至诅咒发誓，说我们也是国营企业，我本人也是共产党员。他要真出了事，私逃了港澳，我甘愿连坐受罚，这才把对方镇住了。虽然这一辈子我压根儿——按我自己的说法，仅仅在思想上入过党而从来没有在组织上入过党。

作为整个事件的尾声，是解放军到现场制止武斗过程中亦有多人被殴打或被扣押者，警备司令部为此怒而向一个群众组织发出公函索人。这也是重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现将公函全文照录如下，作为本章结尾：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函）

（67）警司字第 22 号

军工井冈山：

六月九日八时左右，重庆炮校侦察营一连连长陈干清率本连四十余名战士，和警司派出的部队（均系徒手）共同在西师执行调解武斗任务后，乘军车返回天府煤矿（归警司统一担任军管），在北碚渡口候船时，军工井冈山一千余人，手拿木棍，头戴安全帽，从北碚街上，吹着冲锋号，朝渡口冲来，先打、抓群众，后围住我侦察营的军车，不问青红皂白将连长陈干清，班长周长军、战士郑克俭、刘家荣等四同志，从车上拉下来，拳打脚踢，抢走帽徽，强行抓走。十四时左右，陈等被押至西农八二六，十七时左右又押至军工井冈山总部进行非法审讯，审讯前用木棒压在肩上，铁棒压在头上，逼着战士承认“打死了人”并说：“不老实，就打死你”。审讯中，均遭毒打。二十三时左右，班长周长军等三同志被赶出门外。周长军、郑克俭重伤入院治疗，刘家荣轻伤归队。连长陈干清至今仍被扣押未放。

我们严正指出，军工井冈山必须立即释放连长陈干清，并对这一事件进行赔礼道歉。同时还必须指出，你们这种强行架走、扣押、殴

打和侮辱我人民解放军人员的行为，是严重破坏了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亲自签发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七条通令”。在审讯我战士时提出所谓“解放军不是制止武斗，是专来打人，还说用刺刀挑死三个女战士”等一系列问题，纯属造谣。希望军工井冈山的革命同志，能够正视缺点，改正错误。否则，如对我们的劝告置若罔闻，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附：炮校侦察营战士郑克俭等同志向警司谈“陈干清等四同志被抓的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

主送：重庆军工井冈山

抄送：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

第十八章 《横眉》和《8·15 战报》成都版

关于重庆文革的史料，六五事件被公认为首次、最严重的流血事件。打斗规模不小，双方动员的人数多达数千。两派以此为题材大造舆论，也算得够耸人听闻。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场血案双方都难论输赢：砸派虽被赶出了图书馆大楼，而施家梁对八一五追堵伏击，使之损兵折将，还俘获大将一人，两相比较，八一五还算吃了个不大不小的亏。八一五派由此便总结惨痛教训，以为不能在舆论宣传上老说自己怎么受害了：仅仅博取老百姓的一点廉价的同情毫无意义，要解决问题，归根结底得靠自己“砣儿”（拳头）大。基于这种思路，重庆各区八一五派便有了建立“捍红指挥部”之举。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著名的野战部队 301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301 成立后，专门延聘重庆搬运装卸公司一位武林高手张某作教席。张某部队转业，三十上下年纪，精瘦，一旦运气，身上的肌肉便一块块鼓起来，每块肌肉都非常漂亮，而且纹理关系显现无遗，有点像解剖教科书上没有蒙上皮肤的人体模特。当时没有香港功夫片上市，如果有，我想大家定会把他和李小龙、成龙之流联系起来一起加以崇拜的。几千大学生每天在此武星带领下练拳习武，偌大的团结广场便杀声震天了，很有些全民皆兵的豪迈。反到底当然也不含糊，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也纷纷建立。重庆的大规模武斗渐成格局。

与此配套的宣传舆论当然也不能再一味高姿态。《8·15 战报》已经不行了。《8·15 战报》就喜欢高姿态，就喜欢板着面孔、煞有介事地讲大道理。读者们对此意见已经很大，于是总团决定马上再办一份低姿态报纸专事损人骂人、让大家解恨出气。这份报纸就是后来的《横眉》。

我从北京回来整日价闲游浪荡，“老黄牛”黄顺义就把我叫住了，要我主持该报的筹建工作。筹备会在《8·15 战报》办公室召开。参会

人员有杨宪腾，就是前面说到骂“中央五条”“给老子啷个搞起的！”、骂“林彪是奸臣”、骂“江青是慈禧”那位仁兄；此外还有无线电系同学吴明才、采矿系同学龚堂光、吴红彬，系班不详的同学窦绪昭等，好像还有现今定居美国的电力专家刘云仁。这些同学后来成了《横眉》主力队员。我自知性格使然，骂人损人绝非强项，但还是把事情应承下来了。关于刊名，最后定为《横眉》，也是我取的，火药味依然不浓。

《横眉》于一九六七年“六五事件”后不久创刊，因其宗旨是作“低姿态”舆论进攻，到次年三月十五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八一五被北京猛克一顿，该报无法为继，只得戛然终刊。我虽为《横眉》报始作俑者，事实上却从未管过。该报一共出版过多少期？发过些什么文章？我一无所记，甚至一张样报也没有收藏过。具体主持《横眉》的是杨宪腾。我之所以没有介入该份报纸，和杨大有关系，在此必须说明。

杨，四川泸州人，动力系四年级学生。八十年代移居美国，现在美某公司编写软件，一九九五年回国省亲，他曾专程取道深圳出境，并与我同住数日。他的穿着言谈与和学生时代毫无二致，随便得很。有一天去珠海游玩，他唯一的一件西装外套遗失在船上了，返回深圳，我见就一身暗红旧毛衣，书包斜挎肩头，毛巾胡乱扎在书包带上，依旧典型的红卫兵装扮，于是大笑，我说：

“革命大串联回来啦！”

他说：“在美国，我从来随便如此！”

我说：“你们美国佬不讲点企业形象么？深圳公司上班还要求西装革履呢！”

他说：“要什么企业形象？我们老板专门拉拢国防部，做政府订单。关我何事？”

他就这么个德行。

只是谈及文革经历和去国生涯，他会向我流露出许多沉重和无奈。年轻时候，杨热情奔放，嫉恶如仇，嘴巴尤其不忌生冷。如此火爆脾

气参与《横眉》编辑实在是最为合适，坦率地说，我对他印象一直不错，但要由他来担纲报纸编辑，我却有点心里发怵。前面说过，他家庭出身极端可疑，刚进大学，他报名参加美术队，正好由我主持招考。在众多应试者中间，他的绘画水平不低，但一了解他的“政治面貌”，方知乃父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跑了台湾，问题就严重了。笔者自己的家庭本来就可疑，自然害怕沾惹“屁股有屎”比自己还多的人，因此否决了他的参队申请。对此他竟毫不介意，一直和我交好如素。文革动乱，处处陷阱，我总希望有出身硬扎的人和我搭档，出了问题好帮我担戴，岂敢再找一个包袱给自己背上？杨既然愿意在《横眉》主动揽事，我便趁机溜之乎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我如此小心翼翼做人，毕业时还是和杨一起被揪出来，和他同时住了学习班，一起写了两个月的检讨，一起被发配边地：他去了张家口一个煤矿，我去了云南边疆。这是后话。

既然不愿主持《横眉》，总团就要我到成都去协办《8·15 战报》成都版。成都版刚创刊不久，由赴蓉挺进纵队三位同学主持编务，负责人为机械系一年级同学王益富。王，四川夹江人，苏东坡、郭沫若的老乡，人极聪明。小时候他在家乡很出风头的，过年过节，地方上的川剧表演总少不了让小把戏登台客串亮相。他的经典段子是《马房放奎》，直到上了大学，他一高兴，还喜欢自我陶醉地讴上一段：

明亮亮灯光往前照
耳听谯楼已三敲
我陈文古做事把心坏了
只怕人饶哪，天不饶！

从夹江小城来到重庆大码头情况大不一样，大学里高手如林，根本轮不到他来出风头，尤其他参加校体育队习长跑，每次比赛，据说最后“赶鸭子”总是非他莫属，加上年级又低，因此总被高年级的师兄们当马仔呼来唤去。文革运动翩然而至，他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

意外派上用场，从此后终于时来运转。独行于校园，他喜欢高视阔步，鞋底如置弹簧然，肩头永远一颠一耸，像在射灯下作才艺秀。先是保守派“破四旧”，收缴来许多“封、资、修”的旧书旧报旧唱片，一直堆在党委小楼，八一五战报由印刷厂迁来党委小楼，这些老保时期的“战利品”自然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王从中弄来了留声机一台、老唱片若干，非常宝贝地放在自己枕边，每天睡前总要播放不止，尤其那首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他对《马房放奎》的热情已黯然消退，现在他百听不厌的，已换成油腔滑调的“到处流浪、到处流浪”了。而且他特别中意的还不是正文，而是歌曲过门，过门完毕，演员刚要开唱“到处流浪”，他马上毫不留情地将唱针又放回起始位置，重来，嘴里同时大叫一声：

“巴实！”

“巴实”是四川俚语，“真棒”之意。听他大呼“巴实”的神态，你准会想起超级球迷高呼“GOAL（进球！）GOAL（进球！）”时的疯狂，足见他的文革生涯是很愉快的。他愉快，还因为文化革命确实让他得到了很多实惠，比如，参加四川问题的学习班离京回川，他搭乘便机偕五十四军的军官们返回，成了莘莘学子中第一个乘飞机的幸运儿，把师兄师弟们羡慕得要死。大家问他感觉如何？他得意、甚至非常不屑地回答：

“总而言之：巴实！”

大学毕业，他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一份让人想都不敢想的好工作：给某军军长当了私人秘书。王的性格柔韧性本来就差，加上仕途风顺，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一九七六年毛逝世不久，据说他代军领导某某给江青草拟“劝进书”一份。江青一倒，上面追查下来，军领导都稳如泰山呢，他这个小秘书偏偏承受不了重压，拔手枪把自己崩了。

成都版的另外二位编辑，一叫刘星泉，喜欢写诗，因此多一些诗人的多愁善感而少一份造反派的张扬。另一位黄肇炎在本文开头就提到了，后来曾任云南某炸药厂总工程师。这位师兄是天生工程师料，动手能力极强，甚至做饭、裁衣、打家具样样精到，皆因为出身可疑，

乃父在国民党军队里服过务，所以在报社内他绝对低调，只做具体文字工作，出风头的勾当通通留给了师弟王益富。

我六月中旬到成都。其时成都版已经办了二期或者三期了。我参与的仅为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内容都由王等三人编写，我只在编排、画版样等方面帮助做些技术指导。该报我一份都没有保留，内容也全然无法记忆。印象深刻的倒是一些别的事情：编辑部设在华西医科大学（当时叫四川医学院）。华西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名牌大学，所在地人称华西坝。校园风景如画，晚霞里的西式古典钟楼、肃穆的东方大屋顶、静悄悄小溪和草坪都是成都风景照片的经典镜头，成都孩子儿时的梦中圣殿。编辑战报那儿呆半个多月，我却丝毫找不到半点诗意。我们在解剖房里打地铺睡觉，四周都是储放死尸的黑匣子。将匣子的盖板打开，黑色福尔马林液体里，浸泡的全是被肢解的耳、鼻、头、手和五脏六腑，喜欢恶作剧的中学男生，经常从液体里提出一个人头或一条手臂，跟在女孩子的后面追，吓得女孩们惊吒吒地乱叫。和肢解的人体呆在一起生活实在难觅诗情画意。

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就是我刚到几天，成都形势便急剧恶化，报纸根本办不下去了。

成都形势恶化的情况是这样：

五月六日，解决四川问题的所谓“红十条”下达当天，成都就发生了造反派冲击飞机制造厂、该厂保守派以“护厂”名义开枪打死打伤数百冲击者的流血事件，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保守派“产业军”的彻底瓦解。按照文化革命的一般规律，保守派垮台之后造反派内部还该有一个短暂蜜月。问题是：上任伊始的省革筹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迫不及待要把和他俩一道亡过命、坐过牢、共过患难的八二六哥儿们风风火火拉扯上台。虽然没坐过牢、但却也一直帮忙翻案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当然不高兴了。老百姓都做事尚讲究投桃报李，可刘张这两口子，刚刚衣锦荣归就把当年恩人忘个干干净净，红成对此不能不深表绝望。一绝望就想搞点什么动作，就像重大八一五当初要在风雨操场开大会，臭骂中央五条：“给老子啷个搞起的！”

六月二十四日，成都地质学院和成都工学院的学生冲去省革筹砸了办公室，据说抄出大批整红成和八一五的“黑材料”。还不解恨，二十五日又冲击成都军区，声言要捉拿刘结挺是问。千回百转寻人不得，心中怨气更不打一处儿起，撤离军区的时候，红成队员发誓：马上到北京直接找毛泽东告状。当初红成帮你告御状能够推你上台，如今再告一御状，焉知不能叫你重新下课？总之，毛泽东好像是红成的远房亲戚，只要到了北京，御状总会一告一个准。

二十六日，人民南路广场（即今天府广场）隆重举大会——参会人数号称数十万——欢送“红成小将”千人上京告御状。关于这次行动，我的日记对事件和情绪作了片断记述：

没有什么可抱幻想了！……除了造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还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地院的小将们把头都推得平平的，准备当反革命。

小将们喊出呼天抢地的口号：“生作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

红成在大街上游行，整齐、威武、像九月的白色恐怖下那样。

红卫东的工人在街上游行，整齐、雄壮，他们高呼：“红成小将往前冲，后面有我红卫东！”……

“红卫东”是成都东郊片区红成派的工人造反组织。东郊是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区，产业工人力量很强大的。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国营工厂纷纷萎缩、转制、倒闭、拍卖；当初为捍卫毛泽东出生入死的产业工人纷纷下岗和失业。成都东郊片成了成都“穷人区”的代名词。文革那会儿可不一样，能在东郊做一个产业工人是很让人自豪的。一到礼拜天，东郊片的工人涌进城买东西，一旦和柜台后面的服务员吵架——笔者在现场，亲自看见了如此骂仗——工人阶级开口第一句话就摔出：

“你要怎么样？老子，×机部的！”

见那盛气凌人的劲儿，好像东郊片区的车间流水线生产的不是机

器和电子元器件，而是国务院的部级官员。在他们的眼里，和川大八二六沆瀣一气的工人造反兵团，充其量不过是些鸡鸣狗盗之徒：提茶壶的堂倌、卖汤圆的小贩、修鞋匠、理发匠、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算什么工人阶级？真是岂有此理！刘张这两口儿也真莫名其妙，公然会把这些人也封为四川文革的主力军！红卫东当然不服气。他们誓作坚强后盾，让红成小将往前冲。

这次活动的后续情况，我在八一五战报32期上查到如下两则报道：

“七月十日，陈伯达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广元军分区，要军区派一武装班护送红成一百名代表上京。

“红成地区总部已于七月十一日早五点二十一分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一百名代表乘34次车从广元赴京”。

成都到广元，不过三百多公里，六月二十六日出发，七月十日才到，半过多月。红成这次非常悲壮却十分幼稚的大动作，看来很不顺当了，简直就是非常失败。其所以失败，皆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把政治游戏规则搞清楚。政治游戏是不兴讲投桃报李的。政治游戏只讲利益。刘那么起劲地拉扯八二六，说到底，皆因利益而不是情感。

关于这次行动的另一份原始记录，见于黄肇炎八十年代的一份说明材料。其时，重庆大学曾经在文革中蒙羞而后重掌权柄的一两位当权派，对造反学生总有骨梗在喉之感，于是如追索负案在逃的纳粹分子，派出人事干部天南地北地搞外调、分发材料。其时黄肇炎已在云南边疆群山之颠某炸药厂任总工，多次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科技奖项，尽管如此，远在母校的当权者仍不想让其轻易漏网。黄遂做了如下交代：“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支持红卫兵成都部队北上告状，受挺进队派遣，随同红成去北京。当时纵队负责人是郑全体、张正茂、童正荣。我们一行二十多人，由童正荣、何培余带队，同行有刘兴泉、陈开阳、李川荣、张胜科、覃文发（担任总务）、任开祥……七月七日到达北京，住二轻部接待站。到京后，我们在重大八一五驻京联络站的领导下参加文革。驻京联络站负责人是动力系曾世明……”

上北京告状，尤其徒步上京告状，对于重大学生绝对是强项，红成兄弟上京，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全力配合，当属天经地义。只是编辑部三个人走了两个，剩下王益富也不知身遁何方，我一个局外人，工作自然难以为继。六月二十九日那一夜，四川盆地天气特别闷热，半夜还下起了滂沱大雨。雨滴砸在车顶上劈劈趴趴乱响。乘坐 301 次车返回重庆，我在日记上非常娃娃气地写了两句话：

长夜欲晓天更暗，残冬将尽雪更寒。

第十九章 七月，血火初起的山城

回重庆，八一五和反到底双方已经开打。砸派不叫砸派了，刚刚走马上任的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来重庆视察，亲自建议改名为“反到底”。砸派这个名字有点儿不雅，容易被人将谐音演绎为“杂种”“杂酱”之类意含讥讽的贬义词。事实确乎如此，即便被正式更名“反到底”，八一五还是喜欢轻蔑地用“杂”字大做搞笑文章，挖苦对手。只是事情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七月，名称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以“六五事件”为发端的武器的批判，已经远比批判的武器更有说服力。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并流处，群山环峙，气候畸糟，交通发达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孕生了重庆人鲜明、火爆的群体个性，催生了许多耿介豪侠、敢作敢为的血性汉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一个云南朋友、长期生活于温和、敦厚、内向社会的儿童作家张焰锋第一次去重庆，巴人性格的热烈火爆让他大感惊诧，回昆明向我谈说见闻，进门第一句话就是重重的惊叹号：“重庆民族！重庆民族！”他认为重庆人作为特殊的社会群落，其鲜明个性完全足以构成一个独特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心理特征。这种环境孕生的性格特质足够滋养邹容、江竹筠、成然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而一旦被导向了邪恶，必然将演绎出颠覆一切、毁灭一切的社会悲剧。其次，重庆军工厂极多，除了飞机，几乎所有常规武器都可以在此配套。据可以相信的资料记录，一九六七年七月，反到底派一次就从兵工厂把“一万二、三千条新式武器发出来扩散到外面”，所谓“反到底舰队”，三只船上均装备了大炮，“大的一只船装了十门之多”；八一五派也一次从国防厂“抢出一百二十万发子弹”。这些原因汇合在一起，重庆成为中国文革武斗最惨烈的地狱渊薮，便很自然了。还有一条最要命、全国共生的原因：文革前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教育，已把人类起码的良知泯灭殆尽，同时把对于假想敌的仇恨鼓胀到了临

界点。从孩提时代开始，提醒众人成天关注的，就是蚕豆地里踽踽独行的老家伙，是不是梦想变天的地主分子在偷食公社庄稼？蹲在学校门口的小摊贩，是不是企图用关于吃吃喝喝的儿歌腐蚀下一代？喜欢到宿舍区外吆喝的磨刀匠，会不会就是当年杀害村干部的“雷四滚子”？……总而言之，炸药桶长长的导火索早已到处点燃，经过十多年缓缓引烧，到文化革命算是燃到尽头，开始起爆了。对于人类应该百倍尊重的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均毫不足惜，可以轻薄，可以践踏，可以蹂躏，可以屠杀。性格火爆而又掌握了杀人武器的重庆人，把人性的丑恶、残忍，演绎得淋漓尽致。

六月下旬，我还在成都，天真得一塌糊涂的“红成”娃娃们正壮怀激烈徒步北上，重庆已经热热闹闹打了起来。据现在能够找到的资料，六月二十三日，便有了双方由上百人参加的重医附小武斗事件。此役死四人，伤百余人。七月一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再次武斗，使用了钢钎、刺刀、自制燃烧弹。死二人，伤数十人，附属一院门诊部被迫全天停诊。这次武斗中，重庆医学院六八级毕业生、《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反到底在市中心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我失骄杨君失柳”之类毛主席诗词歌曲回肠荡气。“烈士”亲属作控诉发言，表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紧跟伟大统帅继续革命到底。

返回重庆后一次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黄昏，不知因为何事，我跟学校的卡车去位于石油路的五一技校。那儿已成双方武力拉锯的前线地区，八一五派大坪地区武斗指挥部就设在那儿。暮色如晦，五一技校并不宽大的校园里，少男少女们正在全力备战。正值花季年龄啊！他们应该穿着宽松的T恤和漂亮的连衣裙去黄昏的花园小道谈说自己的梦想和温情，但这时的他们，却全都穿着肮脏的劳保服在抬石头，构筑教学楼前工事；还有的人则坐在地上，把石块砸碎，再用筐子挑进大楼作武器；更多的女生则用作业纸分包石灰，一小包一小包地放好，也是做武器用的。所有窗户都已砸得精光，学生们便挂上草荐做为掩护……这景象和革命电影《地道战》上老百姓对付“鬼子”进村

前的繁忙毫无二致。我在兵荒马乱的校园里胡乱溜一圈，接着就看见有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把几个俘虏押上车来，眼被蒙着，脊背被打得鲜血淋淋，长长的伤痕等距离地一道一道相挨，像是用刀背细细砍出来的，非常可怕。第一次对一位受虐者做如此近距离观察，我心中不觉直发颤。这已不是电影镜头的特技渲染，也不是教科书抽象的描述，更不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会的泥塑模特。他完全真实，就一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活人！我不敢直面它。我有意站到车厢板的另一面去。我竭力鼓动自己去回想一个月前在风雨操场展示过的、我的同学被打得同样血肉模糊的脊背，好让我尽快催生报复的快感，保持心理平衡。

等到天完全黑尽我们的车才开动。旁边人告诉我抓的都是“红大刀”成员：“红大刀”是重庆建设机器厂有名的武斗之花。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乘夜来此，是要将这几些俘虏运回重大。大坪地处两派拉锯热区，不安全。送去八一五的大本营、地处沙区的重大，自然最可靠了。在黑暗里折腾许久，汽车径直开到了重大的第六教学大楼。六教学楼正是我们的电机系教学大楼。同学们上课、做实验总是在那儿进进出出。我知道这幢六层的黄色大楼是沙坪坝最高的建筑物，我为它而自豪。每当月色清明之夜，下了晚自习，从长满青苔的石阶向宿舍走去，我心里总是充溢着青春期躁动不安的、带着几分忧伤的情绪。和它共同生活了五年，可我压根儿不知道大楼下面还有一条很可怕的、暗无天日的地地道。地道很长，中间还隔着几道沉重的铁门，扭动铁门把手，会发出地狱一般的匝匝声。完全可以想像，将俘虏们关进去根本是无法逃跑的。

那一天的经历使这样的概念变得不可动摇：我们和对立派之间的仇恨已经完全无法逃避，也无法调和。不是我们把他们消灭掉，把他们像今天这些俘虏一样关进地狱，那么我们（包括我），就会被他们关进地狱，或者消灭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念过千百次的毛教导已不再是“语录本”上干巴巴的教条，它已变成了一九六七年中國每一个人类群体成员必须遵循的生存法则，和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四川武斗的初级阶段，还停留于“冷兵器时代”，每一间民房都成为制高点，所有房屋上的瓦片皆成了投掷武器。

可怕的事情每日每时都在发生，都在不可动摇地刺激人们的神经中枢。我知道我已经被绑上了奔向死亡的战车。我别无选择。我只能从我的视角将他们一件件记下来，记录在我编辑的报纸上，如同无法逃遁的囚徒在墙壁上

刻画记号，作为随同时间流逝的历史见证。在我重新接手编辑的第一份《8·15 战报》第三十一期上，所有版面都充斥着血腥和仇恨：

二版、四版：悲歌震华莹，碧血涌大江——望江机器厂反革命暴乱纪实；

二版：七七枪声：六中小将惨遭枪杀/二七战士英勇献身；匪徒血洗歇马场/英雄头断红岩厂；

第三版：死难烈士万岁。刊登了近日武斗死者生平事迹。死者计有：

余成英。建设厂工人。六月二十三日，航峰、军工井冈山九一纵队“血洗”石油校时被长矛刺伤，抢救无效死亡，时年三十七岁；

杨胜金，红卫纺织厂消防队员，六月二十四日上午被对立派毒打致死，死后被剜眼、割去耳朵和生殖器，用镪水腐蚀后沉江未遂。时年三十五岁；

冯仲荣，望江厂工人。六月二十三日，在望江厂“反革命暴乱”中被井冈山派用三棱刀刺为重伤后死亡，时年四十三岁；

余开泉，望江厂供销科长，在该厂“反革命暴乱”中被井冈山派惨杀，年龄不详；

张朝喜，林校学生，六月二十八日被红阳中学对立派追打，落入

水池。死后发现左耳被割，头顶钉进二寸圆钉一颗，左肋骨被打断一根，左胸被刺进一刀，喉管塞满稻草。时年十七岁；

王吉强，供销社职工，六月二十四日凌晨被砸派用弹弓石头击中头部，跌下大楼，触断电线而亡，时年二十四岁；

苏毅，六中学生，死时二十岁；

丁正贵，建设厂工人。七月一日被航峰武都队员连刺九刀而亡，时年三十一岁；

邓树荣，重纺五厂老工人，据称，七月一日，为制止砸派暴徒破坏该厂锅炉，被进攻方用长矛刺中胸部、腹部和大腿，流血如注而亡；

周芳英，重纺五厂老工人，和邓树荣死于同一事件，同一时间，被刺穿腹部，已满四个月的婴儿尚在腹中。死者年龄不详；

王崇杰，四川外语学院学生。七月三日，北碚八一五派抗议重纺五厂“71 血案”，抬尸游行，砸派对游行队伍实施冲击，王腹部被长矛刺穿，肠子外流，血涌如注而亡；

包自成，兵工厂（八一兵团 20 团，不知为何厂——笔者）工人，七月五日被“偷袭”的对立派用钢钎刺穿左胸死亡，时年二十八岁。

其他的死者就是“七·七枪声”一文中，被小口径步枪击毙的六中学生陈乐洲、八一兵团 65 团的李叶明，七月八日，“反到底”武斗队伍“猛虎团”等的发动突然袭击中，红岩机器厂的死者，计有：黄习琨、吴华明、徐秋林、余春保。

我就是在这样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重庆八一五派一次集体追悼会现场。从照片上看到的名单可以大致辨认出，这是多日武斗中陆续死亡的王吉强、艾万和、冯仲荣、余开泉、杨胜金、包自成、周芳英、余成英、陈乐洲、李叶明、巫天华、丁正贵、程祥云等十八人。

背景下回到《8·15 战报》、并且重新组建了编辑部。如果说一个月前创办《横眉》，我还表现了些许绅士风度，那么现在没有了。如果说过去，我做事情总会因种种原因而忧心忡忡，那么现在不了。在你死我活的文革丛林，我必须为自己的继续存在寻找理由：比如对自己说，八一五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我必须和它生死相依；比如对自己说，其他哥儿们都在舍生忘死，自己怎能作怕死鬼、懦夫、软蛋？甚至对于自己的生命，我也开始感觉不再重要。有一段时间，嘉陵江对岸反到底派射出的三七炮弹夜夜在我们编辑部头顶呼啸，在黑暗的天空划出一道道红通通的弧线，我们不得不深垂窗幕施行灯火管制。躲在挥汗如雨的斗室，我给一位深爱我的女友写过一封信。她是我的同学，那时，她已逃回远离重庆的老家。我在信中对她说：

“我随时都准备死去。这封信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永诀。”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情绪重新组建编辑部并重返了战报生涯。

我说重新组建编辑部，是因为《8·15 战报》原来的人员已经在武斗开始后悄然离开，几乎空仓了，必须重新召集人马。新班子相对要年轻些。名字非常女性化的男生霍晓琳和以骂砸派为乐事的“马拉松英雄”张国梁同属机械系三年级。冶金系吴克和负责发行的布依族同学韦亮清属一年级。还有一个电机系四年级同学叫张忠云。张忠云最大的特点就是相貌极帅。他与霍晓琳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仅具有工科学生慎密的逻辑思维，而且颇多政治智慧，发生在全国、四川和重庆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零碎事件，很容易就被他们串在一起，迅速抽象出一个高屋建瓴、甚至耸人听闻的理论或者观点。他们考进工科院校完全是一种错误，他们完全应该去当政客。年级最高的就当数我，还有一个采矿系六六届的郭德福。郭兄长相极富态，像阶级教育展览会上经常出现的殷实的富裕中农。

相比之下，两个张、我和霍晓琳们四人，成了战报的“黄金搭档”，因此就有了后来闯下大祸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及后来评论四川时局的一系列“毒草”文章。

编辑部重新搭建起来了，但战事日紧，运输越来越困难，以至后

来印刷器材供应、制版、发行等都变得极端麻烦，根本无法保证按时出刊。再后来，沙区和其他几区的交通完全中断，原来送市中区印制一厂专业印刷的事，后来只能重新回到学校印刷厂自己进行了。发行渠道完全中断。从三十四期开始，只能象征性地印一两千份，由编辑们自己拿去街上叫卖。从报面看，字体单调，印刷质量也明显差了许多。

其实，当时报纸出多少份？甚至出与不出？都不重要了。在血火烽起的山城，舆论本身已显得苍白无力。武器的批判已经整个儿代替了批判的武器。《8·15 战报》继续出版，唯一的作用仅仅是表示自己还继续存在。

一天晚上，我和张宗云去沙坪坝卖报，一个小女孩笑嘻嘻地走来。我们以为她要买报，正要抽出报纸给她，对方却连连摆手。她把自己的拳头纂得紧紧的，伸向张忠云，要他把手掌伸开。张把手掌打开了，她把她的拳头伸到上面，也打开：一枚金属物体落在张忠云握满硬币的手上——一声清脆的叮当响。我们看清了，是一粒半自动步枪子弹。

女孩快活地吩咐：

“拿去打砸派！”

然后又是一阵胜利的大笑，她飘然而去。

第二十章 毫无意义的插曲：钦差大臣重庆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中央文革的御用红卫兵“首都三司”曾在北京工体召开了一个所谓“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我读过该次大会的报道，“北航红旗”代表的发言给人记忆犹深。我非常怀疑那篇发言稿是经某演说家推敲润色的，全文警句叠出，妙语连珠，每个段落都足以赚得如潮掌声。比如：“我们现在还是少数。可少数有什么稀罕？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两个人，敢于向全世界宣战！（大意）”还有一句，演说者说他很自豪，“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年轻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完整地重演了一遍。（大意）”等等。我猜度发言者的意思是说，造反派从造舆论开始，到组建政治组织（如红卫兵、战斗团之类），经过和政敌（指当权派和他们的附庸：保守派）反复较量争斗，再到夺取政权（即抢广播站、印刷厂之类）——年轻人有幸在短短几个月内非常简洁、有效地走了人类权力争斗历史的全过程。

后来的事实很快说明，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发言那个后生仔结论下得实在太匆忙。如果我们大体认同上述观点，那么必须补充的是，直到一九六七年夏天的全国武斗，才算把那句话补全了：人类的械斗撕杀，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从野蛮时期的棍棒、石头，到铁器时代的大刀、长矛，在短短一两月内非常简洁、非常有效地升级到了现代的枪炮、坦克，即由冷兵器时代迅速前进到热兵器时代。一年前说那句话，可以非常浪漫非常威武潇洒，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时的武斗大不了就挥挥拳头，抡抡皮带——相当于手工作业，伤者死者大不了就个位数十位数，没有真正进入“大工业生产”时代。一九六七年的重庆可不一样了，坦克、军舰、榴弹炮、高射炮、海岸炮、重机枪、轻机枪、半自动、手榴弹、火焰喷射器……真刀真枪，一应俱全。幸好这儿没修飞机制造厂，要不海陆空整个儿添全，便更完整而热闹了。

准确说吧，那已经不叫武斗，该叫战争了。面对这种气氛，很多同学都困惑了。困惑无计，干脆一走了之：谈恋爱，回老家，帮助爹妈种庄稼。

就在这时候，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谢富治、王力，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带着几个“北航红旗”的学生到西南巡游来了。他们六月二十七日第一站到达昆明。他们自称是来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的。七月四日离开昆明到达成都，还在成都军区主持了什么会议，接着到达重庆——他们快速穿梭，当然也是想要“就地解决问题”。

关于他们的重庆之行，《8·15 战报》第三十二期用大量篇幅作了报道。总题目是：“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文章说谢、王诸人“受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委派，于七月十三日抵达重庆，并于十四日凌晨接见了八一五革命派和山城砸派。中央首长听取了双方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从报纸全文刊载的王力讲话中，感觉他们确乎是想稳定局势。讲话一再强调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说“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二、三月份的事”，中央十条和五条发出后，“四川问题，重庆问题，从原则上已经解决。”讲话还一再说重庆驻军五十四军“是毛主席的好部队，是可以信赖的”。在天下大乱的危局面前，军队是唯一尚存的权威。肯定军队，事实上也就是强调稳定。中央大员的到来，给战火初起的重庆和迷乱惶惑的重庆人，似乎带来一线曙光。

可惜没有。

事实是，从“毛主席身边来”来的人未必知道毛的心事；事实是，那时的毛根本就不想武斗降温。据文革史家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一文披露，七月十八日，即王力在重庆讲话后第四天，毛在武汉召见周恩来、王力等人便说了：

“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毛是十五日秘密到达武汉的。前二日，即谢、王诸人赶到重庆当日，周恩来匆匆忙忙赶赴武汉为毛的巡视作安排，并电告谢、王诸人

火速赴鄂听候提调。因此十四日凌晨谢、王对重庆两派代表的接见显得极其匆忙。会议在警备区礼堂进行。《8·15 战报》载：“会后，首长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然后登上直升飞机，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离渝返京。”

战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那张合影照片。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吴庆举挤在谢身旁抢了个恰到好处的镜头：一脸笑容可掬，凸现出八一五战士紧跟党中央继续革命的满腹衷忱。其他人也都笑容可掬，表示对首长讲话的一致拥护——其实，这些都毫无意义，业已被仇恨全速驱动的战车已把整个山城拖入火海。而且代表们压根儿不知道，这几位大员并非“离渝返京”，而是开始吉凶难料的武汉之行——几天后，正是那个王力，惹得武汉“百万雄师”冲冠一怒，直接导致了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爆发。武汉老百姓说：如果那天不是王力挺身而出让群众抓走，秘密住在东湖宾馆的毛就差一点儿出事了。老百姓说：毛多年不坐飞机的。那一回，正当武汉满城都在欢呼“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这时，毛泽东金蝉脱壳，匆匆忙忙乘飞机逃上海去了。领袖遭险，举国震惊，于是全民共讨之，全军共诛之，东海舰队紧急奉命西进，溯江而上，近逼汉口，预防鄂省兵变……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题材，完全能够让后世电影艺术家演绎出票房价值极高的历史巨片。紧接着还有一件与山城老百姓、乃至全国老百姓命运攸关的事情，就是“七二〇事件”发生后第三天、即二十二日凌晨，怒气冲冲的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群众组织及其他方面代表，明确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第一夫人说：“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第二天，《文汇报》造反派以类似号外的单页传单随报夹寄散发了这个讲话。

钦差大臣谢、王曾给重庆带来过的些许安慰，顷刻间风流云散。

那时《8·15 战报》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报纸。除了原来校党委订阅的、正经八百的各地党报，全国数不胜数的小报每天都会由敬业精神极强的邮递员准时送来。不几天就一大摞。堆放成了问题，于是就不得不择日卖掉。卖废报纸那天是我们的节日。编辑部全体人员一齐出动，去伙食团借一辆板车作运输工具，然后把成捆成捆的报纸拉去废品收购站卖掉，再顺道拉板车跑一趟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或两只鸭子（我想不起为什么每次都是买鸭子？估计便宜）、再加上一堆土豆，接下来编辑们全体动手，自制一顿准共产主义美食狂吃烂饮。所谓准共产主义美食是指“土豆烧鸭肉”——文革前，政治辅导员经常鄙夷地告诉我们说，苏联修正主义头目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所下定义，公然是“盛着土豆烧牛肉的一盘餐”。

小报太多，除了可以用来换鸭子和土豆，能够提起我们阅读兴趣的实在太少，但是夹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文汇报》中附送的那页传单，仍然让我们报社全体震惊。我在第一时间看到权力很大的毛夫人“懿旨”，总的感觉就是顿时傻眼。这种感觉说明我对日益恶化的战争状态忧心忡忡，对可能实现的和平还心存侥幸。把那传单交给大家传阅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话：

“既然中央都不想控制局面了，我们还等什么？”

大家无话可说。我们不知道是恐惧？困惑？还是松了口气？现在已经没有谁打算保护你了。大家说：那就打吧！破罐子破摔，名正言顺乱打他一气吧！

那一天，我情绪失控地用墨汁在编辑部的白墙上，横横斜斜地划满无可奈何的誓言：

雄心尚未收，
壮志何时酬？
不作怕死鬼，
盔甲誓苦斗！

下面的事件是谢、王离开重庆之后一个月内发生的。我从重庆文革研究史家陈晓文的《重庆武斗大事记》中直接摘录于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两派在工业校武斗中使用枪支。其后全市相继发生抢劫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事件，武斗全面升级。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六日，荣昌县城两派大规模武斗，参战共600至700人，使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死亡78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望江机器厂武斗队用高射炮击沉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舰上三名军人罹难。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两派在建设厂清水池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打死二十二人，伤多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望江机器厂武斗队以三艘改装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二十四人，打沉船只三艘，创十二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至十三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五六百人，支援人员上万。动用各式枪炮和战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至十三日，望江机器厂武斗队进攻驻厂部队指挥部（设在郭家沱中学），打死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两名战士，一名工人。

两派在解放碑地区激战，交电大楼及临近建筑被焚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两派在嘉陵江大桥武斗，打死十一人，伤多人。燃烧市二轻工业局大楼、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房及部分设备。

.....

阅读这些条目，是不是有点像背诵小学历史课本上的大事年表？也许会让人感觉乏味，那么作为注释，我想在下面再直接引用一段文字——这是一位部队官员在当年所谓“清理阶级敌人”运动中的讲话。讲话介绍了军工企业造反派头头方文正（八一五派）和邓长春（反到底）在八月武斗中的一些“罪行”，这些事实基本可信：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在舰艇反到底一号船上邓长春为了纪念武斗中打死的舰队副司令李鲁沂举行追悼会上，邓长春亲自下令枪杀两个革命同志，为李鲁沂这个坏蛋祭灵。邓长春本来决定要枪杀四个同志，其中有两个学生遭到别人反对才没被杀，但陪了杀场……当时邓长春把李鲁沂留下的手枪交给付明礼，令他杀害了这两个同志，尸体被丢在了江里。”

八月二十二日，八一五派撤出空压厂，撤出前，方文正“阴险地问大家，地下室二十多个所谓俘虏怎么办？有人说用手榴弹去把他们全炸死。方文正同意了并指名三个学生去执行，……后地下通道堵塞，被火力封锁不通，未去炸成。二十三日晚，……一个叫何大发的说，

“全部炸死太多了，把有血债的五个打死”。方文正同意了，并叫何大发带三个学生去执行，何大发就将五个人提出来带到一个车间旁边枪杀了。……特别残忍的是刘素德同志怀孕五个月。邓（刘的丈夫，也属五人之一）说：“你们把我杀了，不要杀我爱人”，遭到何大发拒绝，邓又要求说，“你们等刘素德把孩子生了再杀吧！”何大发等人说不行，全部枪杀了。”

几年前，好莱坞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曾用非常真实的镜头再现了半世纪前纳粹党徒屠杀犹太人的血腥场面，让人震惊颤栗。现在，当我重新摘录曾真实发生在自己身边这些杀人故事，我除了梦魇般的颤栗，还有，就是深深的自责：这一切不过才过去三十多年呀，为什么我们差不多就忘却了？

第二十一章 我记忆中的死者

重庆大学在武斗中共死亡二十四人。查阅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版的《8·15 战报》第三十七期，在编辑部文章“活着的八一五要报仇”后面曾有一则启事：“急告读者”，说是“决定出版《青年英雄的壮丽史诗》”，希望这些“烈士的亲友和同志们多多给我们提供材料和投稿”。后来，我们确实收集到了很多有关死者的资料、照片、同班同学写的事迹、日记、书信等，我把它们作了些文字上的整理、编排，又加了按语，集成一册——只是书没来得及出版，书稿却在动乱中散失殆尽。因此，我手上已经没有了死者的具体情况记录，连死者的准确数字也经过几番周折才弄清楚。

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教导：“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些同学死去的时候，战斗团确实都举行过追悼仪式，



重大八一五烈士陵园草成纪念照。二排右五（正中）为301政委吴庆举。

尸体下葬时，都向天空鸣了枪，让那时非常紧缺的子弹炸出惊心动魄的一片乱响，为死者送行。后来，一九六七年大规模武斗结束，确实还在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松林坡是学校紧靠嘉陵江的一座山坡，教授住宅区。坡上满是密密的马尾松，山头有一片开阔宁静的草坪，还有小亭一座，灰柱灰瓦，很有些幽情野趣。假日，共青团员们都喜欢来这儿过组织活动，在霍霍作响的松涛

声中唱歌、朗诵报刊刚刚发表的抒情长诗。一九六七年秋天，没有死的同学就在草坪中央挖了一个大坑，将被枪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尸体一具具窖下去，埋上黄土，将校园内民主湖周围的石栏杆拆掉，抬上山，为墓地砌成了围栏。坟前立了纪念碑，还在进口处竖了很大一面诗屏，诗屏上刻着毛泽东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另外，纪念碑上刻“革命英雄永垂不朽”的字样，还镌上八一五火炬的图案和一篇碑文。碑文是王益富写的，而那个流传很广的八一五火炬图案，则是战报创刊不久我设计的一个题花。大概图案比较简洁鲜明吧，又比较好画，很快被广为采用，成了八一五派得以共识的徽记。

又过了几年，我回母校造访，重新登上苍树迷离的松林坡，这天正好满天里下着密密细雨。时间是一九七二年夏天。死去的同学的墓尚未掘除。无言的纪念碑上爬满苍苔。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山下嘉陵江无语东流。我在潮湿的碑台前独坐良久，感慨无已，口占了一首古体诗词，其意略为：

千里重归访旧冢，
独上松林路，
雨濛濛。
烽烟战旗无寻处，
草离离，
残碑苔痕浓

此别难再逢。
邀我众冤灵，
出冥宫。
一江碧涛作琼浆，
请共我，
醉酒哭英雄。

后来，我果然已无法与这片坟莹重逢。母校那一两个曾经在文革

中饱受冲击的老领导东山再起，他们当然不愿让这一堆乱草丛生的泥土——此外，还包括在广场上一本正经挥动巨手巍然屹立的钢筋水泥毛泽东——继续刺激他们非常脆弱的神经。于是叫人把塑像砸了！把坟场挖了！通通毁了，毁它个了无痕迹，毁它个寸草不留，毁它个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又过了二十年，一九九二年，我因生意上的事情回到母校，下榻于松林坡新建的外宾招待所。面前——我发现正好就是当年的墓地：只是现在已变成了招待所前的水池，半亩横塘，水面落满了残叶和暗淡天光。我问刚刚成年的宾馆服务员：

“这儿曾经打过仗。你知道吗？”

天真烂漫的女孩拼命地摇头。

“这儿曾经炮弹满天飞，一晚上打几百发炮弹，你相信吗？”

还是摇头，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于是我说了，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就是在这儿，在现在水池这个位置，埋了好多好多死人，和你们差不多，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冤死的大学生！

这一次，她真地吓坏了，吓得跑进屋里不敢出来。

我终究再也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完全弄清楚，但他们中的好些人，我却至今记忆犹新：唐世轩、李盛品和董继平就是其中的三个，或许，还应该有段亚伟、刘文举和别的人。

资料说明，重庆大学的第一位死者是张全兴，采矿系统三年级学生。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死于化龙桥市工业校之战，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第一位死者，却是唐世轩。他也死于同一天，死于同一个地方，同一场该死的工业校之战。

唐是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出身工人家庭。独子。非常奇怪，我们学校的好几位死者，包括下面还要谈到的李盛品和段亚伟，都是独子。大约独子所得到的太多母爱很容易让他们变得理想主义，甚至还有点儿任性。唐世轩刚进大学，正遇校党委宣传部要求美术队把新闻摄影工作兼做起来。我们就悬榜招人，我主考，他来报名，这样我便认识

了唐世轩。他非常自豪地在我面前排开一摞照片请我鉴审：全是 120 相机拍摄的六厘米×六厘米生活照。照片主角大约是他女友：歪斜在公园草地上扭怩作态。女孩的相貌平平——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是按当时的政治标准，这类照片反映的全该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只能藏起来偷偷地孤芳自赏，他怎么可以恬不知耻地拿来向人炫耀呢？真是荒唐！我当时自以为自己是很有原则的党的宣传工具，理所当然就把他回绝了。再说，唐世轩生得那般清瘦，尖嘴猴腮，我不相信他会有什么艺术气质。

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事后他依旧常常找我套近乎。理由很简单，当时学生都穷得很，想要拥有一架相机比现代人想要拥有一座高级别墅还难，而美术队有相机——虽然是党委宣传部配发——这对唐世轩的诱惑力却始终毋庸置疑。那是党交给的宣传工具啊！非常神圣的，不管他怎么表示讨好，我从来不敢私开缺口。

文化革命爆发了。他终于找到了一展才华的大好机会。造反了，他的性格使他参加八一五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他很快在总团宣传部谋到一个梦寐以求的位置：摄影。那年头自由得很，更何况他出身工人阶级，绝对底气十足。他有了自己的专用相机——不知是从哪儿搞来的？那年月只要胆子大，要搞一台相机实在太容易了。反正他人已经死了，我们没必要深究这个——九月徒步上京、天安门广场谒见领袖、国庆大游行，到处都能看见他不知疲倦地跑前跑后，累得大汗淋漓。八一五惨淡经营之初，所有活动的照片都出自他的镜头。

《8·15 战报》成立后我们交道就更多了。他常常送些照片要我鉴赏，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将作品刊诸报端。当时制版条件差，我一直没能给他一个机会，虽然他的热情总是那么让人感动，而我确实答应过一定安排版面给他发表——没承想他死了，死得那么突然！

事情就是因为攻打工业校引起的。

重庆工业校位于沙区通往市区的咽喉地带：化龙桥。化龙桥本属于八派势力范围，反到底掌权的工业校正好成了一个“钉子户”，有点骨鲠在喉的难受，八一五必欲拔之而后快：这就有了七月二十五日

之役。八一五进攻，先是死了张全兴，这是重大八一五第一次死人，传说是被守方射手用小口径步枪射杀的，而且据说凶手还是市体委一名专业射击运动员，枪法超准。尸体运回，举校哗然。一贯喜欢出头露面的唐世轩当然憋不住了，立即宣布：我马上去把现场拍下来！我要用镜头揭露砸派开枪杀人的罪行！这样，他就去了，赶得还特别急。当时八一五还处于冷兵器时代，意外出现的热兵器枪声使进攻队伍一时不知所措，全都停住了冲击，躲进旁边的隐蔽地带等候命令。唐世轩到了，看见主楼前面了无人影，心中好不欢喜：喏大空地，完全足够他选择一个最佳的拍摄位置呢！于是大摇大摆走上前去。于是——据说主楼上狙击手黑洞洞的枪口正好对准了他——躲在四旁的小伙伴们吓坏了，大声喊叫要他赶快躲开，可他不！他是唐世轩呀！唐世轩是不管这一套的。他镇定自若，偏不躲！今儿他来，就是要抓拍这样的好镜头呢！这才是过得硬的历史罪证呢！他聚精会神地对镜头，调焦聚，拨光圈——还等不急摁下快门，枪又响了，就一枪。唐聚精会神对镜头的时候，枪手也正好有工夫认认真真地调整枪口准星，不错，就一枪：正中唐世轩额心。他死了。

唐世轩和张全兴的尸体同时放在图书馆供同学们凭吊。二人的遗体都穿军装。军装均是赝品。总团不知从哪个纺织厂搞了些白布染色加工的，缝工极其粗陋。给他们的尸体穿上，算是安慰一下殉道者和苟活者焦虑难平的心吧。二人死相都极可怕，而活着的模样却幼稚可爱——我们在八月二日出版的第三十四期战报上刊发了二人的照片，还用整整三个版面刊登了纪念文章，第三版几乎还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张全兴的日记摘抄，并用其中一句话作了标题：“我要作一个雷锋、王杰似的人”。唐世轩没有留下日记，本来想刊登几张他的摄影作品以为纪念，但烽火连天，交通阻隔，进城去制作图版实在太危险，只好作罢，仅由唐世轩生前所在战斗组“2111 纵队”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题目是“怒向刀丛觅小诗”。

几十年后才得知，那一仗反到底也死了人。战斗以八一五的胜利而告结束，抓回的俘虏不少，都交重大处理了。重大的“卫戍部队”

除了将其中少数“首恶份子”扣押待审，其余人等全部用翻斗车运去沙区门户小龙坎，嘻哩哗啦倒去街上了事。这事当然很荒唐而且残忍——现在重新争论谁的死伤更为惨重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应当追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会如此神圣、如此心甘情愿地举起杀人凶器，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下毒手？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要这样心甘情愿地从容赴死、暴尸街头？也许，我甚至更愿意相信仅仅我们这派死了人，这样，让我永远保留住那份震惊和悲哀。因为这悲哀完全属于我自己。把事实留给历史学家去考证吧！

几十年后得知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在那场战斗中不仅仅“反到底”动用了热兵器，八一五同样也动了热兵器——作为综合性工科大学的学生，重大八一五利用其他院校学生不可能有的知识和条件，很早就开始试制热兵器了。这些热兵器包括：“八一五”式冲锋枪、手榴弹、还有土火焰喷射器等。说土，是因为这种火焰喷射器不过是用普通灭火器的外壳，内装一些液体燃料罢了，这种改装对于从事科技研究的大学师生虽属“小儿科”，而在仅仅只有大刀长矛的战场上，它的出现，威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中梁山战斗的胜利，很大程度是因为八一五方使用了自制的土火焰喷射器。

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重大 301 纵队得知反到底武斗队从煤校返回电机厂，便安排喷火手及土炮在路旁玉米地设伏，指挥者在房顶上用探照灯和号声指挥。时逢反到底“武斗之花”航锋战斗队胜利凯旋而过，小伙子们士气正旺，排成整整齐齐多路纵队，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雄赳赳挺矛而前，像十九世纪欧洲精神战时期神气活现的步兵方阵。那势不可挡的架势，神经稍有脆弱，谁见都害怕。后来我曾听成都方面的人说，到成都支援八二六的重庆砸派崽儿，就是凭这种赤膊方阵，同样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一天之内，兵不血刃，便将“红成”的几十个广播战端个精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这一天，重大 301 纵队看见“武斗之花”的拼命方阵神气活现挺矛而来，却不慌不忙排成横队，亦排出横队挺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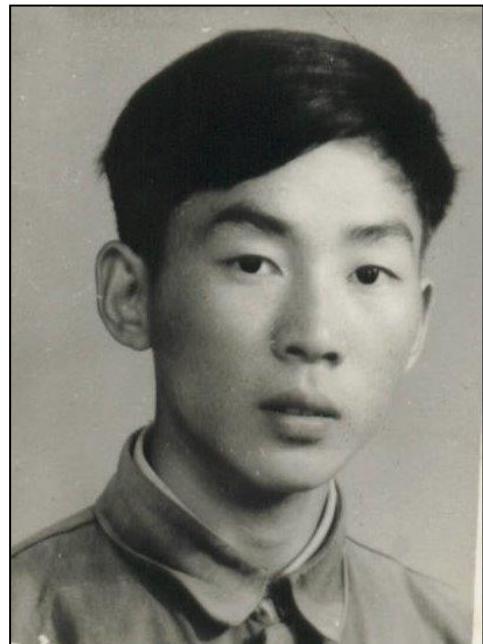
拦路，只是个巍然不动。等到“敌军”方阵步步接近，突然从屋顶上传了一声哨响，横队如门洞开，喷火手 Z 和 H 从人群中冲来中间：灭火罐的火焰喷射而出——古典兵器遇到现代战力，结果不言而喻：

“武斗之花”顿时被烧得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漫山遍野逃命，大学生于是乘胜追击——据几年后清理文革学生“罪行”的结论性材料称，该战斗烧死对方两人，刺伤轻、重各两人，活捉多人押回重大“处理”。

我曾有幸鉴赏过这类土制武器，甚至看过某些武器的制作过程，严格讲，这些杀人凶器质量是很糟糕的，比如八一五式冲锋枪，一抠扳机，子弹没射出，弹簧倒先从枪膛里蹦了出来。更严重的是，手榴弹引爆时间严重参差——据一位参与制造的同学、电机系姓 D 的高材生、现某大学教授告诉我——从拉环拉出到爆炸，时间应该是三秒六：这个时间正好足以投掷出去并正好杀伤敌人。可重大八一五自制的手榴弹，引爆时间七长八短，根本无法掌握准确的投掷时间。李盛品，机械系一年级学生，当时著名的“八一五烈士”，就因为这个白白送了命。

李盛品，川北山区考来的农村孩子，喜欢梳偏分头，一看便是那种很土却非常乖巧的好后生。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出版的战报第三十五期几乎用了一个整版刊登关于他的文章，计有：八一五总团追认唐世轩、张全兴、李盛品三人为“优秀红卫兵、模范八一五战士”的决定，有李生平事迹简介，有悼念文章一篇、悼词五则、评论：“无私才能无畏”等。但我始终想不起为什么偏偏没有登他的照片？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张梳偏分头的照片肯定是送到我们编辑部的。

给人印象更深的，则是发表在同一版的李盛品日记摘抄：“青年英雄的壮丽史诗”，和“李盛品烈士给一位朋



李盛品生前留影。

友的遗书”。这封遗书，实际上是他死前写给他女友的情书。当年大学生忌讳谈恋爱，所以我们发表时在文字上做了技术处理：把“女”字删了。该情书是武斗刚开始时写的，还来不及寄出他便死了。李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回忆了旧社会家里所受过的苦难和如今所享受的幸福，结论道：“如果没有祖国的前途，一切所谓个人的前途都是骗人的鬼话”因此，他对女友说：“阶级敌人随时到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的问题是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毛主席早已下了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现在是决战时刻，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他告诉女友，“为了制止武斗，宣传群众，掌握斗争大方向”，他将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去。他没有告诉她要去干什么。但同学们是知道的，就是去辅导中学生使用重大自制的土手榴弹。对于本校产品的质量问题：引爆时间不准他是清楚的，因此进行演示时，他让中学生躲得远远的，自个儿拉掉引信，然后将手榴弹握在手上测算投弹的最佳延迟时间。不幸的是，他试验的这一枚，引爆时间恰恰很短。他粉身碎骨了。在那封没来得及发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若有什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里人，如果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望）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想好。/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望）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我想，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可能心里就会开朗些。”信在刊登之前，曾用大字报的形式先行公布的九宿舍门前，这个故事和著名作家李准写那个关于志愿军给妻子写信的抗美援朝小说几乎完全一样，让所有读者感动不已。在同学们一致要求下，总团专门派人派车在炮火连天中把李的母亲和女友从遥远山区接来学校参加了追悼会。一老一少两个不幸的女人来到学校，当天我就赶去看望了：老母亲一直扑在学生宿舍的桌子上痛哭不止，整整一下午都没抬起头。我只能看见一部散乱的苍苍白发，那么耀眼而摄人心魄！

董继平的尸体不在墓坑里。他中弹后没有马上死去，一直到了几十年后，他才默默无闻地倒在了四川新津岷江支流一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而无人知晓。他的悲剧恰恰就在于：他当时没能痛快地死去。

这是一次由全市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统一策划的战斗。开始是想攻占建设厂——那是一间制造常规武器的著名兵工厂——以获取半自动步枪。队伍开到了，快要开打了，该厂的内应人员却说他们不知道对方的火力点布置在什么地方？真是荒唐透顶！好吧，反正人来也来了，就抓紧去攻占制高点：清水池吧。打仗，抢占制高点肯定没错，不攻白不攻。反正有坦克掩护，这回胜仗是打定了，这就冲。时间是八月五日。这一仗战况如何现在已无资料可查，但重大死了好几个人却一点没错，我能询问到的，便有谢宗正、陈茂明、张显明、刘文举。在向水塔前冲的路上。董继平的钢盔被子弹击落，接着子弹便从他的脑颅斜穿而出——他没有死，甚至没有成为植物人，经过相当时间的治疗，他活了下来，会吃饭、会发音，开始是一些简单的元音：“啊”“哦”之类，后来，同学们去看他，故意在病床前高呼毛万岁，董麻木的脸会微微一抖，接着伸出大姆指，哥儿们故意又说“刘少奇！王光美！”他又换成了小姆指。四十二期《8·15 战报》发

表的专访文章无比感慨地赞叹，董继平同志“爱憎是何等鲜明！”——正因为这，大家把他称之为身边的“麦贤德式的英雄”。麦氏是广东小伙子、六十年代青年人的超级偶像。麦在某次海战中创造了子弹射穿脑颅还高呼毛万岁的人间奇迹。

再后来，董继平可以在同学的搀扶下蹒跚学步了。开始还好，同学们都在学校，能随时给他喂食，帮助他解便和洗漱，不久毕业分配了，人去校空，这位“麦贤德似的英雄”境况就说不完的凄凉了。尤



董继平生前留影。黄顺义提供。

其糟糕的是，他竟开始恢复了记忆！分配外地的同学回校看他，这位“英雄”便会傻傻地说：家里还有老母亲啊！还等我毕业工作寄钱啊！说着还会流泪！开始，学校每月支付他十来块生活费，后来，干脆把他遣送回乡了事。同学们都在天南地北为自己命运奔忙，他也就被慢慢忘却了。直到前几年，我到四川新津县公差，才知道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只能靠乞讨和拣拾垃圾堆里的食物为生，最后，不知什么时间，这个本该成为电子工程师的他，终于无人知晓地倒在岷江支流那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死了。

关于这次战斗，一位亲历者：侯念平，就是将日记送给我作为素材的同学，对我作过这样的叙述：

L 大汉做了简单的动员，说这一仗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大家接着就冲上去了。我们是分三路上去的。正行进间，听冶金系纵队方向有人问：口令！不等回答，双方就交了火。我们是由“红农八一五”的人带上去的，突然发现前面有对方工事，大家急忙卧倒，紧接着从后面响起了炮声，炮弹呼呼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扑下身子回望，发现是空压厂的坦克在掩护我们进攻。对方工事很快被摧毁了，但我们还是不敢进攻，整个指挥一团糟，我们害怕坦克打了我们自己。一直等到坦克开走了，我们才向山头冲上去。上去了，对方战壕里还留下一架 127（按：一种机枪，发射直径 12.7 毫米炮弹的）架子，枪管已经给扛走了，地下是一大滩血，估计枪手受伤撤退了。旁边还留了很多炮弹。刘文举，我们一起冲上来的同学，一看便高兴了，高兴得蹦起来——就在这时，正好一排子弹扫来，他大腿中弹，翻身倒地，鲜血涌流如泉。我们马上组织还击，把残敌打跑，这才急忙把刘背下山去，到空压厂医务室找人紧急处理。

一个医生准备对刘的静脉注射一种叫右旋糖酐——据说是扩容的药剂。不知弄错还是什么原因？竟注射成了酒精（后来发现是用装右旋糖酐的空瓶，装的酒精）！把刘拉回重大的时候，血管完全僵硬了。我们正围着尸体抱头痛哭，来了一个七军医大的女军人，告诉我们，说那医生很可能有意杀人。大家顿时盛怒难遏，提起枪就赶回去

抓那医生：那人已经跑掉了。

几十年后，我想，幸好那位医生跑了。如果不跑，文化革命的死亡簿上，肯定又会多添一具冤魂。

在这段笔记上，我还记了侯念平对我说到的另一人：段亚伟，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侯告诉我，说段是在战斗中被对方抓住的，后来被拖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了。侯对我说，他才是真正的英雄呀，才是真正没有私心杂念的人呀。他说，我至今怀念他们！

段亚伟死后的情况我至今记得清楚。同学们在广场上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并且把他的父亲和母亲都请了来。父母亲好像都是教师，而且好像也只有这样一个儿子，茹苦含辛，好不容易拉扯大。可以想象，儿子的死让他们何其悲苦！但是发言的母亲在会上没有像来自山区的李盛品母亲那样泣不成声，而更多些知识妇女的理性。《战报》摘登的母亲发言如下：

“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心爱的儿子，内心是非常悲痛的。但是我感到骄傲，因为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她发言时的悲苦和庄严让我想起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那幅有名的《牺牲》：可怜的母亲用树枝一样枯瘦的手臂将自己的孩子无助地举向上苍。我们在《战报》第四十三期刊登了追悼会的消息。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我想不起为什么这么晚才对他进行追悼？是不是一直没有能找到他的尸体？大字报为他出了纪念专栏。我们把她母亲发言中关于为共产党培养了一个好儿子而骄傲这句话，写成了通栏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夏天的重庆，这样的场景随时可见。
陪伴这些冤魂远行的，不是哀乐，而是枪声。

几十年后，我读到了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人物伯尔的许多作品。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毁灭、忏悔和沉思，让我深深震动。现在我已不知道两位可敬的父亲母亲身在何方？如果还健在，我真想再见一见他们，和他们一起平静地讨论一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事。因为很久以来，我都想把段亚伟和他母亲的故事写下来，我相信这个故事会和伯尔的故事一样动人心魄。

第二十二章 战火中沙坪坝的社会生活、人和事

一九六七年的八月，沙坪坝是一座孤城。

它的政治地图是这样的：东北面，横亘着嘉陵江深深的河谷和滚滚江流，对岸是被八一五称做“沦陷区”的反到底势力范围。有名的兵工厂江陵机器厂的砸派绝对控制局面；东出化龙桥、沿江至少有三公里路段完全暴露在江陵的机枪火力之下。八一五周年纪念，曾有外地来渝参加庆典的年轻人，从城里返回，正遇江北的机关枪向化龙桥方向密集扫射，子弹打在路边岩壁辟哩叭啦响，火光如电，乱石横飞，全都是真家伙，吓得外来客魂飞魄散，只得匍伏在地，靠着江边马路的石栏杆连续爬行几公里，到了土湾方才敢起身直行；沙区东南出口是小龙坎，往前就到了大坪、杨家坪，那儿鏖战正急，打得难分难解。卡车总会不时拉些鲜血淋淋的伤病员和死尸回来，一会儿又将一卡车一卡车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拉上战场。和平老百姓挤在小龙坎狭窄的街道两旁，热热闹闹地向他们鼓掌欢呼，送稀饭送鸡蛋什么的，有点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得胜凯旋、以送子弟为国捐躯的热烈与悲壮。往西北好点，出北碚，一直向西，到合川、到武胜、到南充……都是八一五的势力范围。但是，沙坪坝最关心的，是它和重庆市的政治经济中心：市中区的联系。一旦卡断，它就成孤城了。

当然也有急事需要进城的，但必须是武装车辆，如坦克、土装甲之类。所谓土装甲车，盖有两种，一种是在普通卡车的外面完整地蒙上一层钢板，仅在驾驶室前面露一长方孔以作观察之用，这种当然比较接近洋装甲车了。还有一种更土的，则是在汽车四个车轮外各装一个圆形钢板，车斗里仅垒上砂袋，驾驶室外仅蒙些棉絮什么的。运送粮食从化龙桥到沙坪坝来往的车，多是这种，遭遇袭击，只要没把车轮打坏、驾驶员打死，都可以全速冲过封锁线。

我一直无缘乘坐这种文革特色的运输工具，将近两个多月时间，

六十多个日日夜夜，我一直呆在沙区，没进过城。

一九六七年八月的沙坪坝之夜是最黑暗的，黑暗得像地狱。天还没黑尽，热烘烘的夕阳还悬在山头发烫，嘉陵江两岸的大喇叭就开始骂起阵来。先是北边江陵厂的，照例气势汹汹宣告：“今晚我们将炮击重大！今晚我们将炮击重大！请重大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请重大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接着是南边重大的广播，重大的内容要丰富些：首先，“向战斗在江北沦陷区的八一五战友表示崇高的敬意！”接着，“对生活在江北沦陷区水深火热中的和平居民表示亲切慰问”接着还要奉劝对方的顽固份子弃暗投明、悬崖勒马之类，最后才是“今晚我们将炮击江陵！今晚我们将炮击江陵！请江陵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十五公里！请江陵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十五公里！”，骂阵结束，不一会儿就动真格了。一排排炮弹挟着红通通的火光从天而降，炸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关于这一段炮战，我们下面还有介绍——为避免挨炸，大家都不敢开灯的，都躲安全地带去了。校园一片漆黑。重庆大学图书馆一位职工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从前几天起该厂（指江陵厂——笔者注）就每晚广播，要重大和平居民后撤五里，人们无处可撤，只好到几栋楼房的底层去，各楼底层都人满为患。水泥地上横七竖八铺着油布、席子，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挤在一起过夜，天明再回家。几天后没有打炮了，但广播依旧，人们躲疲了，就在家里窗户挂上棉絮，桌子上铺上棉絮，人躲到桌子下。几日无炮仗，以为平安了，谁知一天夜里十点突然炮声大作，还夹着机枪声，出门一看，只见夜空中一颗颗炮弹从对方闪着红光飞来，十分密集，人们顶着棉絮往树林里跑。炮弹像是在头上飞过，十分骇人。一直到凌晨六时才停。”

《8·15 战报》报社位处江边，远离学生宿舍，一次我到宿舍区和同学聊天，深夜返回，只能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摸索返回，突然间被荷枪实弹的人唬住，大呼：“口令！”——原来是 302，即学校的卫戍部队在戒严。发现是我，他们放行了。事情过去很久，才知道他们是在杀人。据资料披露：被杀者为重庆水泵厂工人康某某，当然是对立

派人员。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旁边那棵很大的黄葛树下处决的。用半自动步枪射杀，对准头部，就一枪。执行处决时先戒了严。时间是八月二十二日。

白天还是热闹的。战争打成这样，工厂自然是不上班了，没有去处，就到重大看热闹。重大校园面积不小，风景秀丽，看点很多。依旧行者游于途，疲者休于树。有些人是被赶出来的，如江北“沦陷区”的八一五派，无处可逃，也就跑重大来了，反正重大钱大气粗，对哥儿们管吃管住。有些“难民”住在学校里，无事好干，只能终日瞎逛。加上临时来游者，再加上本校学生，真的热闹非凡。最吸眼球处是民主湖边的防空洞。防空洞是停放死尸的好地方。山城八月，毒日似火，尸体很易腐烂，一腐烂就臭气熏天，虻蝇乱飞。防空洞凉快，停那儿自然情况会好些。难民喜欢去那儿为陨命战场的“烈士”洒几滴泪，顺带也看看被小报传单描绘得非常狰狞的“砸匪”到底什么样子——被俘的反到底分子一个个蓬头垢面，被人押解，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敌人”洗尸裹尸。负责押解和管理俘虏的同学叫郑志胜。郑志胜成天也总是蓬头垢面，成天也和俘虏一样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自己的战友洗尸裹尸。

郑志胜，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文革前，每逢课余假日，他都喜欢背个竹篓到街上检废纸、废物、桔子皮，送荒货站卖掉，又买回些字纸篓、理发剪什么的为大家义务理发。那时的大学生穷。同学们对郑的义务服务赞赏有加，遂评为班级学雷锋先进分子。他本人也穷。没钱买鞋，就光着脚丫上课，这就有了前面说过的偶遇校长郑思群，并蒙校长秘书送来赠礼新鞋一双的奇迹，文革初肇，郑校长无辜蒙冤自戕，重大学子因此奋起造反，首开“炮轰”省、市委和西南局的先河，郑志胜顺理成章成了八一五铁杆。因为太铁，他便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斗中与多起血案牵连被监禁十余年。出狱时郑两鬓斑白，万念俱灰。一次我去重庆公差，听说他出来了，曾相约在母校见了面。话说文革当年，大家都道不完的感慨歎嘘。我告诉他，当初看见他天天和俘虏们一起兢兢业业洗尸裹尸，我们都特别感动，我还在报社内部号召大家

向他学习。实际行动就是让编辑们走出办公室，分批上前线做战地采访，与 301 哥儿们并肩战斗。感慨之后，我认真问他，当时你为何造反呢？

他眼神木纳，沉思良久，极其认真地回答我：

“就为了那一双鞋呀！”

这已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

一九六七年的郑志胜风华正茂。武斗初起，他对文革也曾非常困惑。让他命运发生转折是有一天黄顺义找到了他。担任总团勤务员的黄是他同系同年级的同学。黄诚恳无比地对他说，现在送来重大的死人太多哪！本单位的、外单位的，凡死了人都送重大来。不堪重负呀！事情也是，谁叫你是重庆八一五的大哥大呢？谁让高教部每年要拨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钱给你破费呢？现在不上课，教育经费自然都用来给文革派上用场了。黄说，总团请汉渝路王老汉来裹尸，裹一个五十元，裹两个一百，如是腐尸，还要额外加价哩！如今死人成堆，国家的经费受得了么？黄顺义对学雷锋的模范说，反正你没事，就你来干这个吧！为国家省点儿钱！

郑志胜二话没说，出山了。他让总团把俘虏全交给他——从此以后，他便有了重大文革史上很出名的一个绰号：“尸长”。

尸长非常敬业，每天一早就将俘虏们带出来，先把裹尸布洗干净，在运动场的双杠、单杠上晾好，然后像幼儿园阿姨一样，成一行地带着俘虏们向防空洞进发。俘虏衣服褴褛，他也衣服褴褛。俘虏蓬头垢面，他也蓬头垢面，和俘虏毫无二致。问题就出来了：八一五难民们站在防空洞外面看热闹，对“砸匪”骂骂咧咧，骂得起性，捡起石头便砸，操起棍棒便打。尸长外观和俘虏毫无二致，也免不了要挨点石头挨几下棍棒什么的。为了表示区别，总团就给他配了一柄手枪——当时武器紧张，配给他的枪是没有机头的，根本不能实战，无非作为标识而已。不料这柄枪日后恰恰成了一条线索——有人就以此为由，举报他曾持枪杀人。他于是被审查了，于是就和我一起住了“学习班”，天天写交代。



“尸长”郑志胜退休后经常回到他当年选址安葬武斗死者，如今已是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卫兵墓园”去看看，并已如实写下他忏悔那段人生的回忆录。

哭得人人为之动容。工宣队长也感动了，走上前拍他肩膀，像逛娃娃一样，说：“毛主席说过，老实人不吃亏！老实人不吃亏！你看，事情不是说清楚了吗？”

事情当然没有说清楚。事实是，在那个是非颠倒、整个中国都着了魔的年月，他已被套上了他自己无法解脱的链条。他果然间接参与过杀人。毕业离校不久，他便从遥远的克拉玛依被捉回来，投入了大牢。几十年后，我看过有关他的审查资料。他和其他一些同时被捕入狱的同学们，在战火纷纷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在那些个我们不知道的、戒严的黑夜里所做过的一切，确实让人震惊又匪夷所思。我竭力让自己回到三十多年前的纷飞战火中去，设身处地去重新想一想，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我又总是这么害怕。我无论如何不想去责怪他们，事实是，他们（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已经为此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这就够了。

还是回到上一世纪的一九六七年八月。

江陵厂对重庆大学的炮轰是从八月初开始的，用的都是该厂自己

关于他的举报材料最多，他的交代材料自然就写得最是没完没了。有一天写着写着，他突然嚎啕大哭，自言自语大叫：“我处理过这么多尸体，难道都是我杀的么？这样写交代，什么时候有个完？”说着拿起尚未写完的材料便撕——被我拦住了。审查结束，工宣队长给我们发放毕业分配证，念到郑志胜名字，他始而从凳子上缓缓站起，继而癫狂大呼：

“毛主席万岁！”

接着便扑倒在床，大放悲声，

的产品：三七高炮，不过作平射而已。所幸的是——按当时的说法——反到底掌握着高炮厂，也掌握着炮弹厂，但引爆的引信厂偏偏在八一五派手上，这就救了重大的命。炮弹没有引信当然不会引爆。（几十年后，江陵厂反到底的当事人断然否认了上述说法。他说他们使用的完全是真炮真弹，之所以没有爆炸——他的解释是：他们使用的是穿甲弹，又有说是填沙的试验弹——存疑）不会引爆的炮弹就等于一个会飞的铁丸子。重庆大学高达六层的六教学楼是全沙坪坝最高的建筑物，理所当然成了最佳攻击目标，几天之内便被打得千疮百孔，有如蜂窝一般——也就蜂窝一般，无非戳了些直径为三十七毫米的窟窿。房子巍然不动。一个人没死没伤。没死没伤的同学们每天早上就把四面八方散落的弹头收集起来，装进竹箩，放在二宿舍和三宿舍间的马路上办展览：自然又成了战火孤城的一道风景线。还有同学索性搭起梯子，用斗大字体在“蜂窝”上写了一首毛泽东的浪漫诗句：“昨夜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最具有喜剧意味的是，电机系系主任，后来重庆大学校长江泽佳的厨房也被一枚飞天铁丸击中，在墙壁上戳了一个直径三十七毫米的窟窿。老教授哭笑不得，于是合伟大领袖原韵，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窟窿边上。题目是：“八一八炮轰纪念”，诗云：

通宵炮声急
弹洞灶房壁
可惜好钢铁
不分我和敌

山城八月，每时每刻都有年轻生命血泊中訇然倒下。蓬勃生命里无法阻挡的爱情也像潜流在暗地里汹涌澎湃，演绎些非常特别的故事。下面是其中之一。

武斗开始后，学校医务室的医生都跑光了，刚分来的两个卫校毕业的女孩 W 和 J，就成了唯二的战地医。伤员太多，两人只得轮流值

班，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麻烦的是，W 和 J 都长得如花似玉，这就难免会惹得人春情萌动，同时势必影响到革命工作了。果然，一个大学生、体育队男星，我们叫他 F 好了，F 没上战场——没上战场当然无可指责，对文革想不通呗！——问题是，他除了不上战场，而且也不是什么铁杆，呆在学校就无事可干了。无事可干就最容易春情萌动。还有一个问题：W 和 J 住在三宿舍，F 也刚好住在三宿舍，早不见晚见的。一来二去，F 就和其中的 W 两情相许了。W 和 J 住一间屋，一个白天值班晚上睡，另一个晚上值班白天睡，事情就变得很方便了：F 便总有机会和 W 躲进小楼成一统，在隆隆枪炮声中尽情享用战火中的青春。

隐情很快被发现。体育队的哥儿多参加了 301 野战，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生入死，你老兄公然还如此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怒的哥儿们于是设下陷阱，非抓 F 一个正着不可。

捉奸的全过程如下：

一个晚上，J 值夜班，自然轮着 F 到 W 的房间幽会。当晚正好无战事，武斗队员便在该房间四周秘密设伏，然后在广播站打开广播：“下面播放紧急通知！下面播放紧急通知！今晚送来伤员太多，请 W 医生听到广播后，马上到校医室来！请 W 医生听到广播后，马上到校医室来！”学生宿舍的每个楼道都装有喇叭，那晚战火正歇，校园很静的，喇叭一叫，全校都听得清清楚楚，正在温柔之乡的 W 和 F 肯定也是听明白了，只是半夜惊梦，他们定然如惊弓之鸟，害怕落入圈套，躲在帐中迟迟不出。伏击队员急了：他们单等 W 出门那一刹那便冲进屋将 F 从“销金帐”中生擒活捉。广播嚷了半天不见动静，只好让 J 回屋去喊 W。这一次，W 出来了，J 刚一进屋，W 就匆匆出门而且很快将房门带上。二女孩前脚一走，武工队员马上后脚跟上，用 J 的钥匙将门打开了。

奇怪，屋内空无一人！F 已经出逃，爬到寝室旁边的女卫生间去了。他是从窗户上逃跑的——房间在二楼，他显然是像壁虎一般抠着墙缝从心上人的窗口爬过去的。他爬墙行走的情况一定和上战场亡命

一样惊心动魄。爱情的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样强大。

F 还是落了网：他很快被哥儿们从女卫生间抓了出来。武网恢
恢，疏而不漏，他能逃哪儿呢？

第二天早上，战火纷飞的重大校园传出的头条新闻偏偏与政治无
关：漂亮的女医生 W 服安眠药自杀，未遂。

第二十三章 八一五周年印象

《8·15战报》一共出刊六十多期，基本上都是八开版，归属于真正的“小”报。说“基本”是因为其中有两期例外，算是四开大报了。一期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出版的特刊，庆祝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毛泽东巨型塑像落成。另一期就是八一五周年的纪念号了，八月八日出版。

纪念号除了隆重刊出毛泽东大幅照片、花里胡哨地摘登些不知从哪儿抄来的“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之类诗歌、小故事、言论，第四版还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通栏标题下拼凑了一期画刊：

《八一五之歌》，画刊共含七张照片和五张画作，还首次刊登了文艺作品：署名“周炽”实为笔者胡诌的半长不短的抒情诗。五张画作也是笔者在唱“独角剧”。纪念号的纸质、排版和印刷质量都十分精美，和那段时间的报纸形成了巨大反差。

“独角剧”。纪念号的纸质、排版和印刷质量都十分精美，和那段时间的报纸形成了巨大反差。

前面说过，由于重庆战事日紧，沙区和市区的交通已完全断绝，从八月二日第三十四期开始，一直到九月二十日第四十期，报纸都在学校印刷厂自己排印，纸质和印刷质量糟糕得没法提，尤其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三十六期为最，报头及题花



炮火围城下编辑出版的《8·15战报》周年庆典纪念版显得非常寒碜的。

连制金属版已不可能，只好用木板代替：我画稿，编辑部负责内勤的布依族同学韦亮清刊刻，有点儿抗战时期传单的味道，显得十分土气。八月八日提前出版的纪念号何以豪华如此？显然事前早有准备，把文稿、图版备齐，送进城里正规印刷厂制作印刷，再想办法拉回来的。

为准备庆祝八一五周年短命的节日，编辑部算是煞费苦心了。

煞费苦心的当然不止八一五，反到底为迎接这个倒霉的节日也绞尽了脑汁。几十年后，一位反到底领袖人物在个人回忆录里专写一段《向八一五的“生日”“献礼”》，记叙了当时实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左右，在反到底江北指挥部的会议室，由江北指挥部勤务组长苏××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攻打嘉陵江大桥……。苏××先报告大家，近几天江北指挥部接到不少八一五派的恐吓电话，说什么八一五的一周年“生日”要到了，砸派准备拿什么礼物贡献给八一五？赶快让出江北区，免得老子过生的时候生气……

苏××的话，引起与会者一阵哄笑。八一五要过生，我们打嘉陵江大桥炮火不正是给他们献大礼吗？只不过这个大礼只会使八一五的兄弟伙“生日”过得难受就是了。

会议制定了攻打嘉陵江大桥的详细计划，决定八月十四号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准时开始炮击，炮击时间定为三十分钟，到十二点为止。停止炮击后，潜伏在大桥下边的体委井冈山兄弟们就尽快冲出去占领桥头……

反到底派当时掌控着大部分武器生产厂。猛烈的炮火让八一五措手不及。他们的计划如期事实了：八月十五日清晨，反到底占领了江北通往市区的门户：嘉陵江南桥头。

局面就这样不断恶化，虽然我们在报纸上拼命表现自己的勇武和豪迈，作为私人情绪的真实记录，那些天的日记却准确地记下了我、从而八一五派的郁闷和尴尬：

八月五日。杨家坪战斗进行到第五天，人心惶惶。

“八一五风暴”剧组的十几个同学心想不通，断然退出剧组，回家“逍遥”去了。（“八一五风暴”是模仿著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照葫芦画瓢搞的一台综艺节目。类似做法当时全国各地都有：比如成都的“四川很有希望”、云南的“八二三风暴”，等等。）据当天传回的消息，剧组七位女同学和其他男生刚到火车站即被砸派武装人员抓获。下午，坚持战斗的演员们绕舞台游行数周，宣誓将演出进行到底。

八月六日。杨家坪战事继续吃紧。

这天不知从哪儿跑来一帮武装八一五，直接闯进重大总团，敦促301马上出兵驰援前线，否则立即交出弹药。重大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挟，双方僵持不下，于是拔刀相向。在重大校园内摆开战场，打了一整夜的枪。枪好像都是向天上打的——因为事后没听说死人。301一帮枪手气急败坏夜闯报社，把机枪直接架到我们编辑部窗口上。我的办公室正好在二楼，算是制高点了。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公布一周年纪念日。上午总团开了一个会，大约通知庆祝吧。但我没去，心情很坏，根本没心思庆祝。几十年后，我从日记知道，那一天上午我们编辑部“来了许多客人……谈论中国的命运……话题是从（？）……”开始的……

这一则日记很独特。事实上，我真想不起话题是从什么开始了。因为这一天的日记写好不久，很多地方就被我自己用墨汁彻底涂掉：估计那些话太异端，怕日后出问题，就抹了。而且抹得非常黑。几十年后，我曾用酒精和水去擦拭墨痕，可惜年深日久，底下的文字已很难露全，只是断断续续可以看到：“上午来了许多客人……谈论中国的命运……话题是从……全国一大批……和某些受压制的左派，难道不可能成为别的势力吗？中国又会怎么样？那时，恐怕就不会是苏联式的政变了，不会是了，而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政变了。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原则在哪里？纯粹是宗派斗争！”

从没有涂抹的日记中还能看得清楚，说当天无线电分团的勤务员们写了一个“严正声明”称，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越来越不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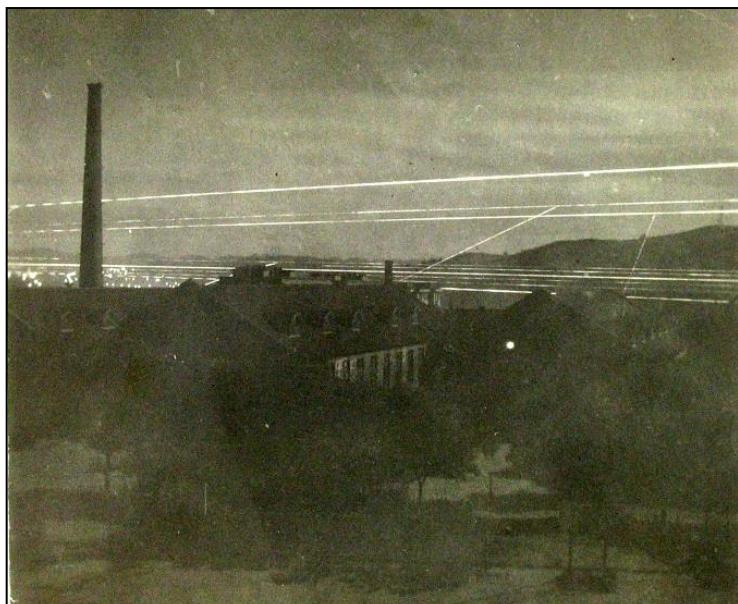
因此，“从八月八日起暂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署名是“×井冈、×延安，×韶山”。而当天晚上，我们编辑部不知哪儿去弄了些酒菜，“胡乱吃了一通，胡乱闹了一通”。我是发过誓一辈子不沾烟酒的，但“这一天，我喝了酒，这是我第一次喝酒”。

八月十二日。日记写道：

去年我们炮轰市委，今年的今天，砸派可是真的炮轰我们啦。真的炮轰。用打飞机的四联机关炮或大炮。总之，昨天炮轰了我校一夜……今天（早上）检到一百多个弹头。/今晚又炮轰……嘉陵江漆黑漆黑的，连一只船都没有。山城死亡啦！真的死亡啦！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通红通红的炮弹在天空中轰轰地飞过，在山谷中引起一阵阵巨大的回响。

八月十三日。昨天半夜，江边造纸厂的草堆给燃烧弹打燃了，火烧得很大，没法救，一直烧到今天。我们都伏在战壕里看，很晚才睡。

.....



此照片摄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八一五派周年庆典”之夜。嘉陵江对岸的江陵厂反到底用三七高炮平射重庆大学校园，重庆大学学生则用重机枪进行象征性反击。图中横向弹道为高炮轨迹，两道斜线为机关枪轨迹。

纪念会原来准备十四日举行，天公不作美，突然狂降大雨，遂改期在第二天。

大会地点选定在重庆三中（现南开中学）广场。重庆大学位于江北反到底主力江陵厂炮火射程之内，绝对不能大规模聚众停留。江陵厂在广播里放出风声，要为八一五的生日放礼炮，这因素不能不考虑。

前面说过，当时八一五的解释，认为江陵厂的炮弹都没有引信，无非

是些会飞的铁丸子，没什么杀伤力。可那毕竟是真正的大炮呀！重大八一五最多只有挺挺重机枪，射过去的子弹连人家的眼皮子也够不着！虽然重大的广播每天也叫得厉害，要对岸的砸派小心，要砸派附近的和平居民后撤，那完全是打肿脸孔充胖子。每天晚饭之后，重大的重机枪手都准时出发，开赴江边阵地去过枪瘾，作象征性还击，毫无实际意义地把子弹打得劈哩叭啦山响。哥儿们看见长得牛高马大的武斗同学扛着重机枪神气活现走过，都要报以快活的掌声，枪手们则很自豪地腾出手来向大家致意。

八月十四日这天，双方都发出威胁，要对方附近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至十五公里。这一回，重庆大学特别认真地下通知实施灯火管制。八一五周年纪念的这一天，整个校园黑暗凄惶，与节日气氛毫不沾边。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绪下迎接八一五周年纪念日的。

在南开中学举行的纪念大会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无非是主席讲话，代表捧场。据第37期《8·15战报》载，纪念大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筹备大会作了精细安排，向全国各地发出了邀请信函。重大八一五一号勤务员周家喻以主席身份作中心发言，随后发言的外地代表，颇多影响的新北大公社代表、西安交大红卫兵总部代表、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等等，清华414总部也派代表来了，虽然他们在当时的中国文革舞台似乎名气太小，但后来却在中国政坛高官迭出，相反，前面那些个文革名角却在以后的年代纷纷落马。本地代表发言的当然最多：所有八一五的铁杆弟兄，都借此机会来这儿显示自己的团结和实力。

把开会地点改在南开中学绝对是明智之举。当天——据我的日记记载：江陵厂确实“连续向我们开炮。打得很厉害……声称，这是为我们鸣礼炮，我们也当真把这些炮当成礼花来看了，的确没有什么威力，只是吓人，我们倒喜欢看呢！”纪念会后举行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八一五风暴》演出，演员们绝对非常卖力，只是事关人命，满天的炮火似乎更吸眼球。

日记记载的是，那天，我仅仅将演出看了一半就走了，我和几个同学专门跑到位置比较高的学生甲舍屋顶上去观战，看红通通的炮弹像急雨一般向电机系的教学大楼倾泻，炸出惊天动地的响声。我们看得如此兴趣昂然，直到天降大雨，这才次第离去。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那天晚饭时分，嘉陵江对岸突然传来几声巨大而沉闷的炮响。重庆大学威胁许多天了：要“炮击江陵”要“炮击江陵”——不过只在喇叭里叫叫而已，而八月十五日这天重大的炮队算是动了真格。这一回没有虚张声势。这一回是真家伙。而且打得很准。事后知道，重庆大学用得是真资格的榴弹炮，口径为一百二十毫米，而且炮弹有引信。而且由专业军官指挥的——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天的日记记载：我们“轰了他们三发榴弹炮，他们是受不了的”当时盛传，榴弹炮打得很到位，江陵的一幢办公楼被打垮一半，死伤惨重——那一天对方确实被打懵了。事后，江陵对重大的炮击声确实哑了三天，直到八一八才又恢复。

几十年后，江陵厂反到底派组织“军工井冈山”某勤务员在他的回忆文本中证实，那次炮击重大方向打来了九发炮弹。被打的“一处是翻砂车间，一处是厂技工校，一处是厂办公大楼，还有一部分厂区围墙也遭了殃。”该厂工人周厚才、陈锋华、赵三杰和厂技校学生丁伯寿被打死，厂医胡义衡等七人受伤。

六十年代初期，苏共头目赫鲁晓夫有一句名言，大意盖为，现代战争中的士兵不过是等着挨打的一堆肉。当时苏共被我党明确定义为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中共理所当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对武器的作用嗤之以鼻。林彪所谓“人的因素第一”、所谓“精神原子弹……比物质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当是把“唯意志论”观点发挥到了极致。

重庆八月战争为我们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佐证：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没有先进武器，确实只能成为一堆等着挨打的肉。狠狠教训了江陵厂反到底弟兄的这门 120 榴弹炮从此成了无往不胜的八一五英雄，哪儿紧急就把它派往哪，哪儿需要就让它马上出发。八月十八日，调去攻打河运校、重医学院、潘家坪，八月二十八日，调北碚歇马场炮

击×××部队（实际上是一个军校），三次共发射炮弹三十二发。所到之处，无坚不摧，屋残壁断，天崩地裂，真的个人心大快。

半个多月之后，战事停歇，我到满目疮痍的河运校和杨家坪大街独自徘徊，街两边向我涌来的无法回避的废墟，突然间让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迷茫。

这门120榴弹炮是“借”来的。

炮兵学校和我们八一五关系不错，派一帮学生去“抢”，而对方半推半就，这就“抢”来了——那时候军工企业基本上都被反到底控制了，八一五的武器大都只能去部队去“抢”。大炮来之不易，很让人珍惜，八一五战士白天把它藏在防空洞里，要用的时候才拉出来。停战了，借来的东西得物归原主，要送走它，哥儿们还依依不舍。九月二十一日是归还日，301炮班的弟兄给炮口披红挂花，然后，一个个全副戎装，挨个儿和大炮站在一起照相留念。然后，敲锣打鼓将它送出学校，送回把它“抢”来的地方。

光有物质基础当然不行，还得承认人的因素，几次炮战弹无虚发，打出如此专业水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每战均由炮校教官亲自指挥。

炮校一共来了三位教官，其中核心指挥的教官姓×。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字很生僻，故而官方在后来审查他的文件往往写错。×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小伙子，恰恰因为他参与了这几次炮战，事后清查文革劣迹，他理所当然被清除出了军队。开始是到成都一个压缩机械厂当工人，后不知何故又转到什么环保制造部门，大约内地日子不好过吧？八十年代，他独个儿跑了南方，开始了漫漫天涯的闯荡。广州东站后面有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叫瘦狗岭，他就在那儿的一条郊区公路边搭个棚子，堆码些石材开始了惨淡经营，雇一个人守店，自个儿则成天骑个摩托车到处“攻关”。店后的山坡是一片贫民棚户区，他租了一个单间住宿。每次我到广州看他，两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恶卧长谈。有一回，他致电我说他弄到一部小轿车了，我去广州，他一定要开车接我，我以为他发了，很高兴，等小车开到一看，原来不知什么年代的“伏

尔加”，周身油漆脱落，破败不堪，像从垃圾堆拣回的荒货：我的心凉了半截。

某次，我一位亲戚从台湾回大陆省亲，专程取道广州看我，这消息使×十分振奋。那些天，他什么生意都不做了，一早就用摩托车把我从瘦狗岭载进城，全天候陪伴我亲戚游览、进餐，而且“叔叔”“婶子”地叫得熨贴。宝岛来访的夫妇俩是极端虔诚的基督徒。每饭必祷告，感谢上帝赐福，如文革时饭前必诵读毛语录一样。我和×暗自好笑：明明我们买单请饭，可他们不感谢我们，偏偏去感谢主赐宏恩，真他妈牛头不对马嘴。×却很有耐心，私下对我说：“老弟，别急！等我用生意经去打败他的圣经！”我说这厮太顽固，你定难成功。他依旧信心十足，说当初我们信仰毛主义不挺顽固么，现在如何？

亲戚离境前一晚，他果然情真意切地对台湾来客说了：叔叔，大陆现在形势不错，可广大山区的农民贫穷得很啊！他绘声绘色地告诉对凡间事毫无兴趣的老夫妇，说山区有大量石料等待开采，而城市建设又急需石材，如果能帮助山区农民弟兄开采石材，（一开采出来就是钱呢！），帮助他们致富，可是功德无量的善举呀！只是——他说——现在手头资金非常短缺呢。

“叔叔！”他满面诚恳地请求：“您能否帮忙在台湾融点资？”

只懂得耶和华、摩西、耶稣和保罗的老夫妇如听天书，皆因吃了我们几顿好菜好饭，吃人嘴软，只得客客气气敷衍一通，说是回台后一定向富富裕裕的教友宣传。事实是，我亲戚一回台湾便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的“阴谋”彻底破产，他依旧过着拮据的、却永远不愿屈服的日子。

他曾到深圳我们公司来看过我。依旧背个书包，依旧一身工装，不修边幅。事后我公司的员工非常不解，问我：

“你不是说他怎么了得么？在广州闯荡这么多年，怎么还像个乡下的游击队长？”

我只好反问：“你们读过巴尔扎克的《夏培上校》吗？”

我确实很尊重他。我以为，不管怎么说，和巴尔扎克笔下那个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法兰西上校一样，×毕竟在过去的时间里英雄过，只不过命运把他毁了。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当时反到底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出色，对120大炮的行踪非常清楚。八月十八日，大炮和×一起调去攻打河运校。当天晚上，江陵厂便恢复了对重大的炮击。日记载，对方“向我们展开了大规模轰击，估计打了三百多发炮弹，二舍、四舍和甲舍也都挨了炮”。我们那位备受尊敬的江教授韵和毛泽东的打油诗“弹洞灶房壁”，其灵感就源于那一晚的隆隆炮声。

日记说，那一晚炮弹呼呼地在我们编辑部头上飞。而我和另一位编辑，以“骂砸派”为重要嗜好的张国梁同学，已经呼呼入睡了。

第二十四章 内战无胜者

重庆的八月战争继续进行。

毛泽东曾如此定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一九六七年的中国政治是如此稀里糊涂，山城重庆的母腹中流血而出的怪胎，注定还要莫名其妙的继续存活而且继续折腾下去。

下面这段记录重庆八月事件的文字，摘自一份重庆大学官方的结论性文档（有根据确认这份文档是按照“组织手续”报呈政府档案机构正式存入历史案卷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引文中人名一律隐去，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晚，重庆市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武斗司令 Y 等人到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找到 Q 商讨武斗问题。Q 立即召开勤务员会议……着重研究攻打重庆河运校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一线，以利固守沙坪坝地区。因武斗规模大，Q 建议 Y 召开沙区片会，做出决定和部署；

八月十六日上午，Y 在市一中召开沙区各单位各头头会议……一致同意马上调集力量攻打河运校和潘家坪地区，并决定成立前线指挥部……各武斗队于十七日到指挥部报到。

十七日下午，Q 在×××部队会议室召开武斗部署会议，决定重大 301 武斗队的榴弹炮阵地设在虎头岩上，一中、三中和二机校的武斗队埋伏于×××部队与河运校之间……二钢厂等单位的武斗队布置在重庆医学院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一线……十八日拂晓发起总攻。

十八日凌晨先使用榴弹炮和高射机枪射击各点后，开始冲锋。仅把河运校的武斗队打跑了，其余各点无进展。十九日凌晨又发动第二次总攻，也被对方打败。

由于连续两天遭到失败，Q、Y 又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派 T 去乐池调三七高炮，派 Z 去北碚搬“援兵”，W 去空压厂调坦克车，二十日凌晨再次发动第三次总攻，亦未能奏效……

为了配合 Q 等人在大坪、潘家坪作战，八一五派空压厂头头 Y

等人将住在该厂的重大 301 武斗队 33、34、35 和 37 纵队调去攻打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此次武斗中，301 武斗队的何孝柱、萧再光等八人被打死，方维汉等七人受伤……

整篇文档很长，笔者仅根据自己亲历亲见亲闻，摘录了其中以为基本可信的部分。该文档其余更多部分，笔者以为修史者完全在信口雌黄甚至无中生有，即便一些事实基本可信的部分，其叙述语言也流露了太多的、本不应有的偏见，其偏见甚至有超过当年对立派人士的激烈。读完这份官方的历史性结论，我突然对曾经读过的、古往今来数千年留下的官方正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我必须坦白，正是读了那则今后很可能被未来的孩子们认为是正史的档案材料，我痛感有必要在这篇回忆录中，把我个人亲身经历的文革故事如实地记录下来。

下面我接着写。

武斗者的死讯给活着的同学带来的悲哀无疑是巨大的。八月二十日上午，重庆大学八一五总团组织了一次报告会，由前线返回的同学介绍战地情况。会场设在冶金系学生食堂，一个系的学生食堂当然比平时开大会用的松林坡礼堂小得多，但依旧显得空空荡荡：留校同学已经为数不多了。大家聚集其中，坐着，整个世界鸦雀无声，只有演说者一顿一挫、掷地有声的发言，气氛尤其悲壮肃穆。我当天日记上记录的报告会内容，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这个山头（王家大山）易守难攻，我们坚持了五个钟头，人都快昏死了。本来，我们是可以撤退的，但考虑到全局，考虑到伤员同志，因此我们一直坚持下去，直打到弹尽粮绝。/我们的同志牺牲很多，我们心里十分难过。我们一天都吃不下饭，我们要为他们报仇！

前线指挥之一，身材魁梧的 L 在会上非常沉痛地说，虽然战斗中对方死的人比我们多，但是，我们的同学都是多好的同志呀！我们一个换他们十个也不值呀。L 说得激越悲愤，声泪俱下。台下一片沉重的唏嘘和亢奋的呼喊。

王家大山的失利让全团震动。不管怎么说，一次战斗八死七伤，日后无论如何是难以交代的。再说，反到底派在军工企业的势力毕竟太大，武器配置毕竟太强，速战速决已经不可能。总团的头头们的信心开始动摇了，很快决定把上述四个纵队全部撤回学校休整，等候时机再行动作。其时北碚区已完全掌控在八一五派手中，建立了所谓“模范区”——关于这个，笔者在后面还有记叙——再往西北：合川、武胜、南充、广安……除了岳池县还被反到底控制，整个西部已全线飘“八”。位居这片“红色根据地”的中南段，是著名的华蓥山，地势险峻，危乎高哉，大陆政权易手前夕，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曾在此与国民党周旋多日——是一个开展游击战、保存实力、准备大反攻的好去处——经过几番酝酿，重大八一五总团有了把队伍拉上华蓥山，建立长期战争根据地的设想。

这当然是个无可奈何的决定。事实上，即使是在那几场战斗中占了些便宜的反到底，对于乱作一团的重庆形势，也并不乐观——因此，得知中央调查组突然到来，双方绷紧的心弦都莫名其妙露出过一种暂时的缓释。

中央调查组到来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一日，组长陈彬，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还有一位团员，名唤温伯华，据说是周恩来的联络员。调查团在重庆呆的时间很长，根据现今可以查阅的资料，他们至少到十一月份还没有离开：十一月四日重庆大学开了个“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二人都参加了。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第四十六期《8·15 战报》头版刊登的大会照片上，二人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重庆警司司令员韦统泰一字儿端坐在主席台。陈彬戴眼镜儿，瘦削，鼻略尖，很有些文弱书卷气。

这个“央”字号的调查团到来并没有给血雨腥风的山城带来和平。超级文革大员谢富治、王力来了重庆，两派照样越打越热闹，小小陈斌算得老几？整个重庆已经混战一团，他们能有什么新招？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对于同时被胜负难料的战争搞得下不了台的双方头头，调查团的到来确实让他们有过一丝儿侥幸的欢颜。

还是得引用那位反到底领袖的回忆：

八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因为刚到体育馆，正和一些人在交换各自了解的情况……一个人匆匆来到了体育馆。……（他）掩饰不住兴奋的神情，神秘地告诉我们一个特大喜讯：

中央调查组到重庆了！

……我们听到这一消息，都感到十分兴奋，认为反到底派的救星来了。我们当时对五十四军是不信任的，然而在重庆主政的就是五十四军，他们明显偏袒八一五派，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倍感压力沉重。中央调查组的到来，对我们当然是意外的福音。我们相信中央调查组一定是公正无私的，一定会主持公道。我们一致决定：立即通知周围各武斗据点，不准再开枪。八一五的兄弟们肯定会跟往常一样，不打一阵枪是睡不着觉的，就让他们去过枪瘾吧，我们绝对不要还击，好让中央调查组看到只有八一五在打枪。这样，反到底在中央调查组面前就争取了主动……

反到底派领袖们的好梦，偏偏很快被他们自己人的一阵乱枪击破。

中央调查组到达重庆第二天，即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许，警备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张甲奎、文化处副处长郝子义、保卫处副处长曾惠平及卫生科科长戚宗勋、参谋吴士龙、司机李永梁等七人，分乘四辆吉普由市革筹组返回警备司令部开会，车过重庆交通枢纽两路口，突遭宽银幕电影院前面马路上的反到底枪手射击，张甲奎处长当场身亡，司机李永梁重伤不治身亡；郝子义、曾惠平、齐宗勋、吴士龙五人中弹受伤，其中受伤尤以曾惠平为重，腿部中弹，被反到底派人员送电影院旁的第一工人医院，截去下肢，终身残疾。

《8·15 战报》第三十八期对此事的报道原文如下：

司机当场被打死。张处长身负重伤，送警司抢救无效，壮烈牺牲。郝处长被子弹击中肚子，肚子被打穿四个洞，生命垂危。曾处长腿被打断。戚科长手臂受伤。

宽银幕电影院的枪声对于八一五当然该是福音。作为重庆文革中的特大案件，此事让八一五的对立派确实付出了沉重代价：从是年八月下旬开始直到后来整个社会重新恢复秩序，反到底派从领袖到群众，有三百余人被审，或被关押。

即使如此，那一天我的日记依旧非常低调。我对于使用武器来进行的文化革命已如此厌倦。我谁也不愿再相信。我看不见任何曙光。对于中央大员的到来，日记上只有轻描淡写的几行字：

中央的调查团来了……不知道这次来又会干些什么？我不明白。不过我对他们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本来今天中午是第一次接见两方代表，后来因故停开了。原因是砸派在两路口开枪射击警司首长，一人身死，三人重伤，他们都是师级干部（按：原文如此），这，也许是给代表团的一个见面礼吧。

出乎我的意料、同时也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曙光竟然很快出现了。不是因为宽银幕电影院的枪声，而是远在北京宫纬后面再次发生了戏剧性变故。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就在他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提出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年多来他几伸几缩，多次试探，总感要对军队大动手术绝非易事，七月二十日发生的“武汉事件”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变最终让固执的伟大领袖改变了主意。八月初，《红旗》杂志发表关于“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紧接就传出毛的批示曰：“还我长城！”接下来，“七二〇”的凯旋英雄王力被抛出作为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黑手”，“七二〇”过去仅仅不到二十天，王力就从“文革英雄”的宝座上一筋斗栽进了秦城监狱。——这一次，毛需要给枪杆子们吃一粒定心汤元，也向胡乱搅局的反军派递个眼色，让他们稍事收敛。运动搞了一年，毛泽东最大的一块心病——刘少奇败局已定，该想办法稳定稳定了。中央调查组到达重庆的第四天，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即联合发布了《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运动的号召》。这个“中发表 67 (274)”号文件明确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经垮台了”；要人民务必搞明白：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伟大的长城”。文件宣布：“人民解放军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文件警告：“要防止破坏，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浑水摸鱼”……总而言之，与军队过不去的造反派不能再胡闹下去了。文件最后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伟大领袖相提并论，齐呼万岁。

接下来，九月一日，周恩来及江青、陈伯达、康生诸人出席北京市革委扩大会议并发表谈话，声色俱厉地指出：“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南京、重庆很紧张，对野战军大军区司令员动不动就打倒，新调去的野战军马上受围攻，这里面没有坏人伸手怎么能令人相信咧？”

(周恩来语)。任何场合都风头必出的江青在会上更大秀感情，她说了：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世界上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啊！你们夺他们的枪，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有阴谋的”。一个月前还雄心勃勃要“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康生，讲起话来更是寡廉鲜耻：“解放军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问题，他们想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完全是痴心妄想，是几个苍蝇碰壁。想动摇解放军，白日做梦”。

再十一天，即九月五日，上述四单位再次发文。这个中发 67(288)号文件干脆就叫做命令了（俗称“九五命令”）。题目全称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兵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除了重申“八二五号召”中的几个“不准”之外，更加肯定地宣布：解放军（对反军抢枪者）“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如劝阻和警告仍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为，应采取措施，对其少数坏头头和少数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军有权进行自卫还击。”……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毛泽东高呼“还我长城”的时候，一直和驻军

保持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八一五，当然又可以非常骄傲于它的一贯正确了。翻看那段时期的《8·15战报》，满眼都是得意洋洋的呼喊：“举起双手，迎接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迎接伟大胜利的曙光！”（第四十期文章“编辑部就当前时局答读者问”），“把砸派的坏头头和黑后台揪出来示众！”（同期“六五支队”文章）说起反到底，完全又是一付盛气凌人的教训了：

“交出黑后台可以，溜走不行！”（同期“指点江山”评论员文章）

从这些文字，当然可以看出一个小报主编心中再次唤醒的廉价、虚妄甚至有些无耻的愉悦。

还是回过头来继续记叙中央调查组到来后发生在山城的血腥故事。

反到底派枪击警备司令部诸位处长这个“见面礼”确实起了作用。第二天凌晨四时二十分，中央文革办事组即紧急致电重庆警司并要求转交两派群众组织。这个电报刊登在《8·15战报》第三十八期。原文照录如下：

根据中央调查组的反映重庆武斗严重。

1. 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希望两派做到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商店、街道和居民点进攻和射击。请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撤出包围；
2. 绝对不允许对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
3. 双方立即达成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181页载，该电报稿是周恩来亲自审阅的：足见问题的严重性，亦足见这次来渝的中央调查组确实手眼通天。

电报中提到的空压厂，当时正被反到底久围强攻，形势岌岌乎殆哉。进攻方主力“军工井冈山”人多势众，控制在他们手上的武器多而精良。战局上的劣势正教八一五大感头疼，中央调查组来了，八二

五文件来了，他们可以高呼拥军爱民的口号，顺水推舟，体体面面地下台，把破坏和平的罪责留给反到底。

刚刚在两路口闯了大祸的反到底，公然还那么傻乎乎地不给中央来人好脸色。北京电文已经明确指出，要反到底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他偏不。血战一周，死人无数，好不容易胜局在望，怎能轻易言退？反到底继续加强武力强突猛攻。八一五反正是决定要撤退了。方文正，空压八一兵团二六零二团一号勤务员，身材瘦小。不苟言笑的表情总给人一种城府颇深的感觉，但在决定光荣撤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方文正遇到了一道难题。他忧心忡忡地环顾四周，问大家：

“地下室里那二十多个俘虏怎么办？”

有人说：“扔几颗手榴弹，把他们全部炸死算啦！”

空压厂陷落在即。方，这个不苟言笑的江西小子别无选择，同意了。

接着他指名三个学生去杀人。敌方火力太猛，地下通道被封锁，行动延宕至第二天才得以执行。

第二天，一个叫何大发的弟兄似乎清醒了些，他对方文正说：“全部炸死，太多了吧？把有血债的五个打死行了！”

忧心忡忡的方文正看看他，又同意了。他同时让何带那三个学生去速速行刑。何去了。

他们从地下室将五个人提出来，带到一个车间旁边，悉数枪杀。死者之一邓×，是车间什么干部，他妻子刘素德已怀有五个月身孕。临刑前，邓哀求道：“你们把我杀了，不要杀我爱人！”，何没有理会这个素无怨仇的工友。邓又哀求，说“你们等刘素德把孩子生了再杀吧！”

全厂已烽烟处处，没时间延宕。

何说不行，接着一阵乱枪，五人全部被杀……

又二天，八月二十五日，空压厂被反到底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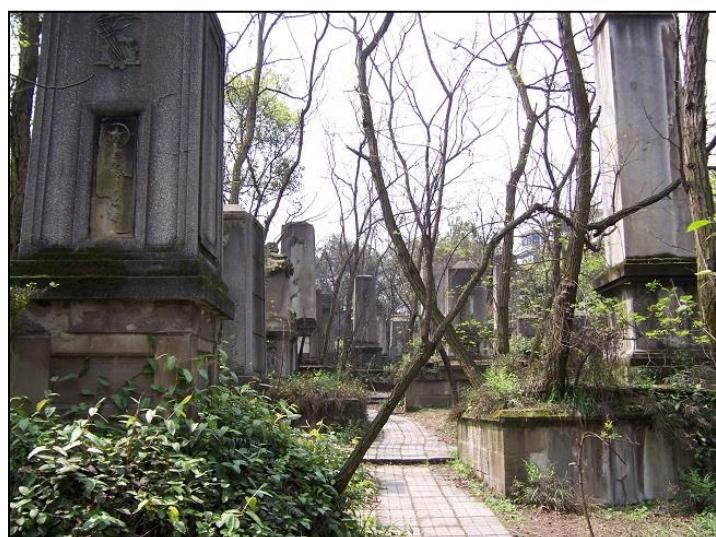
空压厂之战的失败者撤出后第三天，八一五以牙还牙，在北碚歇马场，把该地区反到底的最后一个据点：某军校一锅端了。缴获步话

机等军用物资若干。八一五得意地把这次胜利称为“八二八歇马场大捷”。

一九六七年的重庆八月战争，至此算是基本告一段落了。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一场稀里糊涂的战争，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注定没有胜者。不管杀人者和被杀者，伤人者和被伤者，从本质上说来，他们在撕杀中所表现的真诚信念和献身精神都不过是被人欺骗和愚弄而已。真正应该钉上历史耻辱柱上的，只应该是那些高高在上、手握权柄、煽动仇恨的大神。

只是，仅仅从表现形式来看，八一五没有从战场上得到的东西，轮到战后来获得了。毕竟中央调查组来了，毕竟“八二五号召”来了，毕竟“九一讲话”来了，毕竟“九五命令”来了。这些东西都在斩钉截铁地维护军人的权威。反到底呢？他们那么地沉不住气，喊过那么多让重庆军人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口号，诸如“揪出山城赵永夫！”“打倒黑警司！”“绞死匪首白斌！”之类。从“六五”事件抓捕连长陈干清等四人起，后来又有了八月三日望江厂人员用高炮击沉军分区交通艇致使三名军人罹难一案。还有八月二十二日两路口，警司干部多人被袭一案……总之，现在轮到反到底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了。而八一五，洋洋自得，他们为自己始终和军人站在同一战线而骄傲无比。

不管是颓丧、还是得势，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事实很快证明，所谓拥军派的暂时胜利也是根本靠不住的。要对付这帮无知的、充满政治理想的、初涉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实在太简单了。记得当年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一个远近闻名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本是重庆武斗期间八一五派死者的乱葬岗。几十年后，这片文革遗址阴错阳差幸存下来，成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兵墓园。

大饥荒，我至少有两次饿得几乎昏阙倒地，可听政治辅导员站在讲台上一说：这些全是苏联修正主义作的孽！说：有志气的中国青年，要发愤图强卧薪尝胆！说：党中央说了，困难到此为止！我们顿时激动得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饿着肚子只穿一条裤衩去和秃头赫鲁晓夫拼命。一九六七年的八月，武斗死了这多人，我们曾经那么动摇不定，牢骚满腹，对文革疑虑重重，甚至开始反感，但一听北京为自己说了几句好话，顿时又受宠若惊了——恰恰是这种虚妄而短暂的狂喜，最终催生了后来我那篇文章、阴影一样笼罩了我整个人生的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

第二十五章 军事根据地的喜剧

九月三日，我去北碚参加所谓“八二八祝捷大会”。当天的日记记录了如下情景：

作为八一五派红色根据地的北碚城，给我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的车是早上8点左右出发的。从重庆至北碚的公路，一直都十分平静。到同兴乡，开始有第一道关卡，三道交错的石墙拦住去路，只留出一条很窄的S型通道。车停下了，一个手持“三八大盖”的“兵”走上前检查验明，然后放行。/一会儿，车过施家梁，沿着嘉陵江奔跑一段路，过龙凤桥，便到北碚了。迎接我们的，又是一道检查介绍信的关卡，又是一道有S通道的墙，再绕过一道用灭火机改装的炸弹网，便进入了北碚城。/祝捷会已经开完。大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其热闹程度，大概只有节日的解放碑可以与之相匹。大字报非常多，大标语也稠密至极。一会儿，锣鼓声响过来了。红旗和欢呼声簇拥着一队队英雄队伍。他们是在八二八大战中，用生命换取胜利的英雄。他们都扛着枪，握着最高的奖赏：毛主席著作，骄傲地在大街上走过/街道的墙壁上，宣传画向他们欢呼，写着喜报的大红纸向他们欢呼，林荫道中幡飞的标语向他们欢呼：“庆祝八二八大捷！”“文攻武卫好得很！”“穷追砸匪！”……

祝捷大会的第二天，即关于收缴“武器、装备和各种兵种军用物资”的“九五命令”正式下达前夜，九月四日，重大301纵队以军训为名，私匿武器，神不知鬼不觉向华蓥山进发了：按照总团的部署，此行是去建立根据地，以保存实力为持久战作准备。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田野和山峦都肃杀无声，很利于实施军事行动。此前，我们《8·15战报》编辑部已开过会，决定要用实际行动向301学习。实际行动之一就是派出人员分批跟队301做战地采访。霍晓林和张宗云作为第一批成员跟队出发——在华蓥山采访数日

返校，他们曾兴致勃勃地向留守编辑汇报了全部见闻——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天天很黑；知道从沙坪坝至北碚的道路和山峦也很黑；也知道了行进过程中，所有卡车的大灯全都关闭，只亮着荧火般的尾灯，行进得十分隐秘和缓慢。车上都配备步话机，每车一台：从“八二八大捷”中缴获的。车与车之间完全用电台传递信号。比如——霍晓林和张宗云饶有兴趣地向我们模仿道：“一号！一号！二号向你喊话！我们已到陈家桥！我们已到陈家桥！”“一号明白！一号明白！二号二号，请继续前进！请继续前进！”——完全和电影里看过的镜头一样，挺刺激、挺有英雄感。遇了部队岗哨（那时军队已经开始动起了真格，对两派的枪支格收无论），大家就远远地背起武器下车，从漆黑一团的田间绕行。从霍、张的介绍中我们也知道了 301 的同学们最后住在位于山顶的江华镇，指挥部设在一座小学校的校舍里，而大家每天的活动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军训和打靶。此外，华蓥山到处都茂林嘉树，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记者的介绍十分刺激，谈话间，还不时出示些武斗队发给他们的东西，如宝贝手榴弹之类。当然，还有 301 纵队成员才配发的赝品黄军装，这待遇，他们二人也享受了——这一切，足以把大伙儿的胃口调得足足的，一个个都恨不得马上也轮值去根据地走一遭。

只是很快便传来一个让人晦气的惊人消息：九月十二日，“31 纵队”十一名同学（其中包括一名女生、人称“小联动”的）在岳池县石垭镇遭遇武装伏击，一人中弹身亡，十人被俘，生死不明。

事件亲历者之一刘抗生向笔者回忆，说他们此行是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整个南充地区都是八一五的天下，唯独岳池县尚为反到底盘据，老八想利用重大进驻华蓥山之际，趁机将南充地区的砸派一鼓而荡平之。十一个人于是便出发了。

下山后先到广安，就是伟人邓小平老家，当时属八一五势力范围。在那儿问明了情况，壮壮行色，又从县城出发，继续沿公路两侧向岳池县搜索前进。很快到了广门公社石垭镇地界：这已是反到底势力范围了。一路无事，众人胆子愈发大了。枪端在胸前：是五六式冲锋枪，

很先进的了，于是似有符咒贴身，刀枪入不得的，怕什么？重庆那样的大码头都闯过来了，料此荒远地界能有何方凶煞挡道？金秋已悄然来临。这是川中丘陵的丰饶季节，蝉声还没消隐，小溪在缤纷的野菊花下歌唱，很难得一派田家秋景。远远的坡头上影影绰绰，好像有人头晃动，大学生们遂停下来望望：不过是些村夫野老、牧童稚子罢？大家毫无警觉，依然摸索前行——就这当儿，一梭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来了，斩杀得路旁的草叶飒飒啦啦乱飞。武斗队员发觉事情不妙，一齐迅疾扑倒在地。路边一片红苕地，枝蔓正旺，他们急匆匆地匍匐而进——他们不知道敌人已完成了对他们的合围！

武斗队员冯纵，校足球队队员，父亲是重庆市中医界的超级权威人物，家境优裕，小伙子故而一脸白白净净，灵毓清秀，帅气逼人。如果当时他不去穿那一身愚蠢的赝品军装，不挎着冲锋枪到素无怨仇的川中丘陵游荡，继续留在校园里，他绝对该是女大学生梦中的多情公子。可惜，历史不可回避地让他去了，不可回避地让他爬进了那片红苕地。红苕地枝蔓横生，茂密的叶片儿被他的赝品军装撕扯得哗啦啦响。只是地势太开阔，而他个子又高，还来不及成功隐蔽，一枚子弹已经准确无误地射中他的胸膛：就一枚。弹孔应该是正穿了心脏，大动脉顿时血喷如注——扑卧他旁边的刘抗生如是说——他只蹬了蹬腿，像临死前的青蛙那样，接着就不再动弹了。

那时候已顾不上处理“战友”的尸体了。大家惊喜地发现旁边正好有一间民房，急急忙忙便退进去——数倍于学生的敌人武装紧跟着将小屋团团围定了。

已经无路可逃。躲进小屋的大学生全都抠死枪机，握紧手榴弹，对方只要敢冲进来——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那一刻，双方只能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这一刹那，刘抗生——就是向我讲述这段生死经历的同学，突然向门外冲出去，他挥舞着手臂高喊：

“双方都别打啦！双方都别打啦！”

这是撕心裂肺的一声喊。几十年后，刘对我说，他自己也说不清

为什么当时要跑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喊，总之，命运就这样让他跑出去，喊了：并且就因了这一声喊，整个事件的进程便回转了方向。余下这十个大学生的命运，本已像急流出山，眼看就要跌落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因了这一声喊，事情便突然转了向。人的命运常常总是这样，因为一件事变、甚至一个小小的细节，便整个儿改变得面目全非。几十年后，我已无法记全这十个人的名字，除了刘抗生，还该有钟永志、范和棣、郭汉宗、李伟森、刘再明……我总相信，如果当时没有那一声喊，那么，我们西南地区的厂矿，包括昆明钢铁公司这样的特大型钢铁企业，就会缺席了这几位优秀的总工程师、厂长和高级工程师。

对方首先把刘捉了。敌人继续对屋子实施武力围困的同时，对他进行了突审。

刘抗生，四川成都人，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他本来 he 应该是上五年级的。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因乃父曾作过国民政府成都市秘书长，他理所当然落了榜。悟性极高的刘对这个结果早有所料，于是毫无怨尤、心平气和地走上了社会，当起了板车工人。他性格快爽耿介，敢说敢为，聚谈豪饮间，其伶牙俐齿、行云流水一般的粗言俚语让人啧啧叹服，这些，从而很快在江湖闯荡中得到了认同。一九六二年，刘少奇、邓小平出面收拾毛泽东大跃进留下的败局，四川省副省长康乃尔主持川内考务，宽大的阶级政策成了被家庭包袱压得喘不过气的青年们的福音。刘初闻此言，信疑掺半，他不相信共产党会对他们这帮另类网开一面，皆因劝说的人多了，姑妄听之，他不抱任何希望地再次去了考场碰运气。不料这一回竟然中了——大概就因为此，他做事从来不会忧心忡忡瞻前顾后，从来敢说敢干。他相信运气。

岳池被俘前，刘抗生至少注定应该还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地点是李子坝，他开“造反车”进城——“造反车”是文革专用术语，即既未经过正规驾驶训练，也无正式手续取得车辆使用权，胡乱弄一辆汽车就去满世界狂奔。那一天刘驾车进城路过李子坝，不知为什么就翻了，打着滚儿翻下了几十米高的悬岩，车被摔得

粉身碎骨，人公然没被摔死，而且很快又活鲜鲜地走下病床继续革命了。第二次也是六七年，去炮兵学校“抢”枪。该校军人本来和八一五观点一致，也不知道为何神使鬼差，那天却得到一个假情报，说是有几车“砸匪”要前去抢枪。军人们火气不打一处起，当即枪上膛、刀出鞘，严阵以待。这一回刘抗生依然神气活现地开着“造反车”，车门两边还神气活现地站俩护卫。他们名为“抢”枪，实为到八一五哥儿们的仓库去搬武器，当然不会什么任何危险。护卫站在车门边上，一手抓车窗，一手腾出来迎着万里东风挥舞开道，那感觉很酷的（按：那时的“造反车”上几乎都有如此护卫。更神气的还都要早背上交叉插两把红绸大刀，或者在腰间别两柄盒子炮）。既然炮兵学校的学生们事前已经得知“砸匪”要开车来抢枪，而现在果然又来了这么几车耀武扬威的不速之客，当然不客气了。第一拨子弹刷刷射出，首先就把站在车门边出风头的大学生撂翻落地，其余人等见情况不妙，惊慌失措地四下里逃散——误会当然很快澄清，可是中弹人已不可能死而复活，奇迹恰恰又在于，就在死者身旁把玩方向盘的刘，公然又躲过了一劫！

死过两次了，刘站在死亡面前自然容易镇静自若。周围都是专县农民的刀刀枪枪。刘故意装出一付懒洋洋的、无可奈何的表情，就像被人胁迫的乡下佬。

对方问他：

“做啥子的？”

“我能做啥子？工人。”他说，“挣钱吃饭呗！养婆娘养娃娃唄！”

这已经很有人情味了，审讯他的人软了半截。又问：“你工人，有婆娘娃娃，为啥还到我们这儿胡闹？”

“厂里个个都参加革命，我不参加行么？毛主席号召么！不参加，人家说你觉悟不高，以后我在厂里还能混得下去？”

他还说，除了婆娘娃娃，家里还上有高堂老母，体弱多病，难着呢！工资本来就低，日子本来就难过，你们打死我我倒痛快了，老母亲咋办？婆娘娃娃咋办？造孽啊！他说你们就看着办吧！反正我活着

也难！他还说了，被你们困在屋子里那些弟兄们倒净是些无牵无挂的小年轻，都没结过婚，没老没小，他们真要和你们拼起命来，谁吃亏谁划算说不准呢！

若论舌战，专县上的“土八路”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事情很快决定下来：行，不打了。你动员你的弟兄们先缴械吧！缴了械再说。

事情就这样暂时摆平。

十个人被关了起来。据说，对方还同意对冯纵的尸体先做了妥善处理。算是非常人道了。

这些情况，是事后刘抗生告诉我的。当时传回华蓥山的消息只说是全军覆没。梁大汉，冶金系五年级学生，301纵队司令，星夜从广安驱车回重庆搬兵。政委吴庆举正好夜奔广安前线。两车路遇，风尘仆仆的梁跳下来，大叫一声：我们十一个弟兄全完哪！说罢，便与吴抱头痛哭！梁大汉道旁发誓，除非砸派乖乖放人，否则，不将岳池小城踏为平地，绝无颜再见全校弟兄！——后来，他果然把重庆八一五的各种土洋战车、土洋武器动员起来，奔赴前线把岳池小县围了个水泄不通——该消息是否确切，待考。因为部队收缴武器风声日紧，大规模的武力调动如何进行？再说，当时五十四军确已通过成都军区对岳池县的武装部施加了压力，打了招呼，和平谈判已很快提到了议事日程，武装包围已似无必要。五十四军甚至还承诺，如果和平解决无望，他们将派出“突击队”性质的精兵，以野营拉练的名义进城，俟机将被俘者抢救出来。

八一五战报的第二批前线记者就是这时候赶上华蓥山的。第二批记者也是两人：专好骂砸派的张国梁，还有我。

我们赶去山上，岳池方面的情况已完全明朗：双方没有打起来。通过军队干预，对方同意重大八一五派人前去谈判俘虏问题。关于这次非常富于戏剧性的谈判，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八一五首席代表吴庆举曾非常详细地对我说过所有细节，只是年深日久，记不全了，而吴已于几年前作古，许多情况也无从证实，如今尚能记起的两件事情是一，由于当时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因此八一五方面很主动，甚至

有点儿以势压人。对方不敢出来，非要八一五进岳池谈判不可。去就去吧！无非虎穴狼窝！还能把得理不让人的八一五怎么样？吴带一个高参（机械系钟姓老师）一个警卫员（冶金系一个大汉），当即就出发了，还专门开了一辆品相尚新的吉普车去。车过广门，到敌方地盘了。砸派的武装部队荷枪实弹恭侯大驾光临，刀刀枪枪在路两边一字儿排开，像古装电影的军阵，很是杀气威武。对方要吴等三人下车，换乘他们预备的车辆入境。吴很有大将风度，走下吉普，带领参谋、警卫，威仪棣棣登上对方破车然后绝尘而去。那情景很有鸿门宴的感觉：吴对我如是说。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谈判过程中，吴发现对方对国内形势省内形势完全稀里糊涂，于是就大谈八二五号召，大谈九一讲话，大谈九五命令，谈得对方诚惶诚恐，转弯抹角倒想反过来巴结八一五，事前商定的所有谈判事宜自然十分顺利，都按八一五说的办。

最难的是一个小小细节：胶卷问题。吴告诉我，说十位同学被俘后，曾被对方强迫举手做投降状，逐一拍照留影存档——这太损八一五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了。八一五从一九六六年八月造反伊始，就有一句响当当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中央音乐学院南下学生还心情激动地将它谱成战歌，大会小会，游行示威，众口一词，均高唱此番战斗旋律，非常震撼人心。可现在，你瞧，八一五的钢铁战士们公然在敌人的淫威下举手投降，成何体统？——几十年后，我已经无法想起此胶卷问题是否确实？可能有，那么，艰难的谈判肯定已经把它摆平，就是说：毁了，为出生入死保卫毛革命路线的弟兄们挽回了面子。也可能没有，那么该问题的谈判就完全是多此一举。几十年后旧事重提，他们举没有举手？投没投降？当然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双方冒死捍卫的，都是莫名其妙的、虚妄的玩艺儿。忠于它和背叛它，其道德评价没有什么不同。

西线无战事，根据地自然无事好干。战报编辑去了，大伙儿自然要我们给讲讲山外的革命大好形势。没有事了，我也就跟着他们军训、打靶。打靶是每天早上必修的晨课，半自动、冲锋枪、机关枪，都要

轮着打。这就遇到一件趣事，差点要了大伙儿的命，不记可惜，兹简述如后：

却说某天早上，大家正在打靶，旁边闲游浪荡地来了三人：一男俩女。男的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现搞”、镇反期间和我同在北碚解放台前对批斗西师八三一“坏头头”表示过不满的机械系学生，时任根据地电台负责人。俩女孩是电台发报员，记不起是何系何年级同学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现搞”脾气极“冲”，好出风头，现在，有俩女战士紧跟侧旁，他当然更想露一手。看见大家打靶，“现搞”自然想来几个“十环”让女同胞开开眼。

可惜持枪弟兄们对他的作派偏偏不买账。你想打？偏不给！他求了几个同学，都不行，太丢人了！一气之下，他拂袖而去，按情节分析，他该对俩女孩说了一句：

“有什么稀罕的？今晚上，我有更好的让你们打！”

早训结束，总部传下话来，说岳池被俘同学已经定于当日出狱，要各纵队安排代表一起前去广安县城迎接。早饭毕，四辆卡车便浩浩荡荡出发了。几十年后，为晋谒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故居，我专程去过广安。那已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广安已撤县建市，宽广的街道花团锦簇，大楼楞次栉比，很现代化了。一九六七年九月第一次去那儿，广安很寒碜的。麻石路两边全是低矮发黑的木板房舍，城口甚至还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城门洞，墙头乱草萋萋，很显衰败荒老。从华蓥山到广安不远，早餐后出发，中午就到了。吃罢午饭，岳池方面还没有消息。大家就扛着枪满街里游荡，去城外空寂无语的渠江边拣瓦片打“水漂”，用冲锋枪射击对岸的石头……一直挨到黄昏了，吃过了晚饭，岳池的战友还没有回来——那边传来消息，说尚有些细节没有谈妥，要我们今天不必等了，大伙儿只好讪讪地驱车回营。那一夜天很黑，没有星月，山峰和旷野晦明莫辨，我们如历虚空，如坠地狱，大家都挤在车斗里任崎岖的山路颠簸。

突然，我们听见司机在驾驶室里大叫“危险”：大家警觉起来。奇怪：凡遇道口和转弯处，黑暗中都有人用手电筒发信号。整个根据

地实现联防，每晚都会给出一个通行口令，遇到意外情况就需进行紧急盘查。那晚上的口令是“三长两短”。具体是，如遇了盘查，行人需回答“三长两短”，汽车则需用喇叭鸣三长声，两短声。如果错了，地下到处都有地雷，马上就会拉响，埋伏的枪手会乱弹齐发，打你个人仰马翻。那一晚我们没听说有什么紧急情况，何来一路盘查警示呢？司机捏着一把汗，不停地鸣着“三长两短”，战战兢兢地沿山路盘旋而回。坐在车上的人也战战兢兢，深怕司机摁错了节奏，顿时车毁人亡！

好容易回山了，指挥部空荡荡的，为数很少的留守人员一下子全冲上前把我们包围了。他们不是要问我们是否接到了被俘同学，而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莫名其妙。

此时，武斗人员也从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撤回总部，把我们包围了。他们光着膀子，气喘嘘嘘，子弹带斜挎在汗水淋漓的肩上。枪刺在黑暗里闪烁有光。有的人还拖着重机枪，枪拴拉得哗啦哗啦响。他们也不关心我们是否接到了俘虏，而是：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更加莫名其妙了。好一会才明白：他们差一点儿就把我们当做入侵之敌予以歼灭了！幸好我们回答正确，要不，机关枪早已瞄准，地雷也早侍候着呢！情况是：当晚，不知谁传来情报，说有四车砸派将要前来偷袭。而我们的车，又正好四辆！最蹊跷的是，当晚，天上确实发了三颗信号弹，均为绿色——这正好是当晚的特急信号。已经酣然入睡的武装队员翻身而起，立马拖枪上山，进入阵地，各就各位，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问题又出来了，这三颗绿色信号弹，是谁打的？几十个人集结在黑黢黢的小地坝上，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排查，很快证实：总部绝对没有任何人发过信号。那么是谁呢？山就这么大，人就这么几个，目标很快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现搞”。对，就是他！前面不是说过吗？早上，他想在女孩子面前出风头，碰了一鼻子灰，有人就听他说了：“今晚上，我有更好的让你们打！”

没错，确实是“现搞”。那一天，他不知道怎么搞到一只信号枪，三枚信号弹。趁着月黑风高，他确实带着俩女孩，上荒野山头去小小地过了一回枪瘾，一人一枪，偏偏都是：绿色！

有点像古时候的故事了：烽火戏诸侯。武斗队员们怒不可遏，如狼似虎一般齐扑“现搞”的房间。“现搞”知道坏事了，倚门而立，手里紧紧抠住那柄信号枪，把一颗信号弹顶上枪膛——那枪弹射出来，近距离还是很有杀伤力的。“进来呀！”他喊道，“谁敢来，我就开枪！”

没有人上去。几十人全呆围在四周。局面正在僵持，总团勤务员查正礼赶来了，他慢吞吞上前，对“现搞”命令道：“把枪放下！”

“现搞”乖乖把枪放下了。不等查勤务员再说什么，怒气冲冲的武斗大汉一涌而上，把他按翻在地，结结实实地“搞”了个鼻青脸肿。

第二天早上，在小学校的小地坝上开了“军人大会”。鼻青脸肿的“现搞”和两个女战士规规矩矩做了检讨，说自己犯了“自由主义”，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又一天，被俘的同学回来了。好像是直接回的学校。因为不久。根据地也就解散了。时间是九月二十八日。301 从上山到下山，一共二十四天。

下面是我的日记：

九月二十九日。阴。

301 的战士都回来了。在北碚缴了枪。是昨晚回来的。我去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那心情该是怎么样呢？就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解甲归田一样。大家狂跳，疯吼：好了！完了！大联合了！和平了！要武斗，再从拳头重新开始升级吧！

第二十六章 无法重归的私人生活

华蓥山根据地解散，标志着一九六七年的重庆战争正式结束，人们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是国庆节，我抽空去南岸看了姐姐。这是三个月来我第一次进城。日记记录了当时的轻松心情：

现在是“和平民主新阶段”，到处是战后恢复时期的景象/……从两路口一直走到红港(按：即朝天门)，又走回来，细细观察了一番战争的遗迹和战后的恢复景象/航锋(按：指河运校)、解放碑交电公司可算是首屈一指的战争纪念物，经过战火摧毁之后，全剩些光架架了。红港大楼和我校的六大楼差不多，密集的弹痕记下了血痕斑斑的“八八海战”。在大楼前的街心花园里，有一个新垒的土堆，上面压满白花，前面有一个木牌，上写：“八八事件殉难烈士”……/街上人不少，因为商店全关着，游人只好在街上溜跶。这些人大多和我一样，是来看稀奇的。/电车线正在修复。“人交八一五”写出大标语：“向抢修线路的五十四军学习！”/一辆辆汽车在街上奔驰。为了避免检查站的解放军同志多此一举，因此车上都挂着牌：“邮政专用车”、“粮煤专用车”、“蔬菜专用车”、“毛著印刷专用车”等等。/小街上的垃圾堆如小山，现在正被一车车拉走。/这一天，恰好是大太阳。九月明丽的阳光下，山城像在春天里苏生了。……我心里非常舒畅，我真想喊一声：/“新山城，你好！”

我开始第一次领了工资。时间是九月二十八日。日记是这样记录的：

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领工资，这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我不再是消费阶级了，而是一个用自己的劳动来为人民工作、养活自己的人了。工资是这样一个标志。/在过去读过的诗歌中，我记得是歌颂过这件事情的。但我没有心情写诗。想起死去的伙伴，那些勇敢的英雄……我感到难过。

工资标准是四十二点五元。我给父母寄去了二十，余下的，除了补交伙食费，我还为自己买了一件灯芯绒外衣。动乱一年中，我的衣物已丢失殆尽。后来发配云南边疆，出发时检点行李，总重量仅仅十三公斤，除去非常压秤的一大捆书籍、笔记本和画册（还有我保存至今的文革资料），衣物重量几乎为0。我差不多是赤条条走向远方的。

同学们都陆续返校了。十一月四日，全校学生在风雨操场召开声势浩大的动员会，宣布“复课闹革命”。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央调查组陈斌一行、驻军首长蓝亦农、白斌一行均出席了大会并演讲致辞。《8·15 战报》第 46 期用了整整两个版面刊登大会消息及首长讲话，还配发了社论。紧接出版的第 48 期（第 47 期为与《山城战报》的合刊）又继续发表社论：“让教育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发表头条消息：“欢呼我校教育革命高潮的兴起/不是春光，胜似春光”。“革命”把大学生早已搞得心灰意懒，他们不想再折腾了。北京的目的好像也基本实现，当局不想大学生再胡闹了。一九六七年初三月，“重庆革联会”如日中天之时，重庆大学也搞过一次“复课闹革命”，但很快因为“反击二月逆流”而流产。这回不一样了，不是因为这次的号召更鼓舞人心，而是心如死灰的大学生已精明了许多，也务实了许多。把壮丽的理想和官场的是是非非通通留给政治家吧！老百姓靠空头政治是过不了日子的。要在社会上立足，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一身过硬本领。

同学们纷纷有些巴结地去把老师请回讲台，继续向自己传道授业。情况完全反过来了。原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教授、学者、权威们在他们眼里全是一文不值的“白痴”，甚至干脆就是些“牛鬼蛇神”，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不了。他们非常急迫地感觉有必要从曾被他们“打倒”、“批判”的人身上学习能够立足社会的本领。毛泽东的文革，在他所期望的若干领域，开始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

采矿系同学入校时个个都为未来能在黑色的矿井里献出一颗红心而骄傲，但是现在不了。他们已经懂得在暗无天日、充满冒顶、爆

炸、灌水等诸种危险的井下作业意味些什么。空泛理想的滋味让他们尝够了，他们现在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不用谁批准，全体同学一致宣布“造反”：通通转入“机电专业”学习，而且事实上他们就这样做了。这个“革命行动”日后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几十年后，在我认识的采矿系校友中，至少有一位丁姓同学，后来成了云南省非常著名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专家，而不是在黑不溜秋的矿井里爬进爬出的技术员。

五年级的同学已经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好学了。笔者正是如此。我刚刚完成了我的大学毕业设计——我的设计课题是“潜水电机”。据说是上级下给学校的一个科研项目，很容易让人产生想象力的。我至今保存完好的总装图上每一根粗实线、细实线、点划线、弧形和圆，都能帮助我想起初次进入科技实践的有趣故事——我们兴高采烈地带着我们的研究成果赶到党委去报了喜，第二天、未名湖畔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横空出世了。我们、继而全体中国人的生活都被彻底搅乱。既然伟大领袖发出如此伟大的号召，我们还能有什么犹豫？这就干了，舍生忘死，一干就整整一年多，毕业生们心甘情愿悉数免单，工资分文未取——我的同期校友们越想越觉得吃亏——现在总算好了，吃了一年多亏，总算可以拿钱了。我已记不起给我们发工资的中央指示原话如何讲的，反正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发的话就是了。就为这个，十年后他老先生辞世，大伙儿要为他流眼泪、为他十里长街送灵柩就绝对有理由。

眼见得就可以领工资了，高年级同学的革命彻底性一直就不如低年级同学。武斗开始那会儿，低年级斗志昂扬坚守阵地，高年级的师兄们却接二连三牵四挂五全往家里溜，像笔者这样“坚持战斗”的痴迷者确系少数。回家做什么？一曰避祸。五年寒窗好不容易熬过来，马上该挣钱了，死之可惜；二曰谈情说爱。谈情说爱在我的大学时代是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九六三年那年我上大二，上面就正式传达了高教部的文件，将谈情说爱明文列入禁止条款，共青团员更被要求带头模范实行之。



《山城战报》全体同仁在重庆大学毛泽东诗屏前合影，时间是一九六七年末。笔者在前排左2。

那一段日子的团支部组织生活是很显杀气的。领导总是板着面孔交代政策：有异性朋友的，必须一律交出情书，宣布与之一刀两断并作出深刻检讨，绝交信和检讨书均需在支部会上念交众人通过。没有朋友的——没有朋友的好说，以前者为鉴戒，下不为例就是了。我在班上为年纪最小者，大约来不及恋爱，无现行——这一点让我深感自豪，但我清楚记得师兄们垂头丧气交出情书、无条件缴械时的狼狈相。文革动乱，所有旧秩序一律砸烂，谁还管得了谁？原先转入地下状态的故情旧爱全部反弹，轰轰烈烈浮出了水面，有人干脆宣布：咱们结婚啦！结婚当然就需要钱。钱比革命理想更实在。国务院总理发话给钱，谁会拒绝？反正不打枪不打炮了，逃难在外的师兄们迫不及待从四面八方回校领钱来了。

报社的人也都回齐了。含历任编辑，含成都版编辑，都回到了设在党委小院的编辑部，热热闹闹聚会了一次，座谈见闻和别情，还照了相，然后留下部分骨干，其余散伙各自回班。历任编辑凑在一起，细数下来共二十来个，遂去民主湖畔留影一张，再去风雨操场的黄葛树前留影一张：那时候相机和胶卷都金贵得很，拍两张 6×6 就很难得了。人太多而镜头幅面又有限得很，好些人只能爬到树桠上去站位，所以大家管这张纪念照叫“树倒猢狲散”（见右图）。

既然“树倒猢狲散”，既然高年级同学



(包括我)，已经开始领工资而且马上开始毕业分配，编辑部自然就该由低年级同学接班了。大家一致推举王益富，就是那位对《拉兹之歌》的“过门”部分百听不厌的“王二麻”做主编，他经过一番纯属礼节性的推辞便欣然接受了。前面说过，王自幼聪明，喜欢和人扎堆并自我表现，命中注定他很容易在文革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最终为它殉葬——一九七七年江青一伙垮台，他因替某军要员起草过给江青的劝进信而被收审，自觉太丢脸，于是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

战报召开散伙会，时置八一五政治上豪气正雄，有很多风头可以出的，更何况武人刚刚结束了他们的光荣，再次轮到文人来表演了：王主编在这个时候就任，实在正当其时。

我算功成身退了。一年文革，为我漫长的大学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我深感自豪。进大学第一天，我曾坐在宿舍走廊的路灯下庄严地写过一篇日记，模仿我国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意思，写了一个“我的大学五年计划”。这本日记后来不幸丢失，该计划的具体条文也已十分模糊，但大意却记得清楚，该为：五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个岗位，人们将发现来了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朝气蓬勃，工作勤奋，热爱生活，富于理想……等等，总而言之，他优点很多因而倍受领导赏识和群众赞扬。大学五年，我确实以为自己在政治学习、业务学习、社会活动等诸方面都表现出色，继而在文化革命的血火考验中，也绝对没有拉过稀，还出足了风头。我以为我兑现了自己的计划，向党向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甚至——这样说吧，许多同学都在谈情说爱了，而我，连这个敏感问题都顶住了，我有什么理由不自豪？在十分模糊的“个人五年计划”中，我的确也写过一条，宣布大学五年间必须集中全力学习，不得与任何女生拍拖。现在，我的五年计划既然已经不折不扣地全部兑现，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考虑自己的私人生活了。

我们班管毕业分配的小组长黎专门来报社找我。

他问：你的毕业分配自愿准备填报哪儿？他告诉我，同学们的分配自愿表差不多都填写好了。他还对我说，按我这样好的条件，可以

随便挑好的地方、好的单位填，别人是没法和我竞争的。他所说的我条件好，除了上面我说的那些，还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就是：我没有女朋友，分配时不存在考虑照顾“夫妻关系”的麻烦事。

我不假思索地反问：

“还有些什么地方没人填？”

黎说：“西藏。”

“西藏一共几个名额？”我追问。

他答：“两个。”

我说那好——依旧毫不犹豫。我说，我曾说过毕业后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我绝不食言，我就去西藏吧。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我在他交给我的分配自愿表上很痛快地填了如下三个自愿：第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第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第三：“西藏”。

几十年后，我必须承认，在冠冕堂皇说上面那些话的时候，其实暗中我已有自己的小九九。我之所以问西藏几个名额，暗藏有一个非常虚伪的动机：我想冠冕堂皇地让那一位姓 Z 的女孩和我一道去闯荡天涯。我是那么自负。我确信她将毫无疑义地选择与我同行。

前面曾经说过，还上大一，在夹竹桃鲜花盛开的校园小路上，我曾邂逅了一位女孩并一见钟情，从此后便一直执着地暗恋着她。只是大学时代的过于神圣的理想和政治高压让我一直未敢轻举妄动，没有机会更没有勇气对她吐露私情，这样，另一位男同学似乎轻而易举地和她相恋——文革的动乱环境更让他们的恋情迅速进入更为实质的阶段，后来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与一切同时发生的，是另外一位女孩、我的同班同学——就是那个 Z，多年来一直对我深报好感。她的好感让我十分感动并且无法拒绝。一九六七年八月，当嘉陵江对岸的炮弹夜夜在头顶呼啸，给黑暗的天空粗暴地划上一道又一道红通通的弧线。在深垂窗帷、挥汗如雨的斗室，面对着死亡，我确信她是我最终的选择了，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说，我随时都准备死去。这封信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永诀。我说，如果有一天战争会结束而我还能

得以幸存，我们定然又会见面并且可能面临未来命运的选择，比如说：毕业分配。我说，我们相识五年，当是彼此了解甚深了。我等待你给我们之间的关系下一个结论：反正，我们都这么大了，用不着脸红……

那时，她已逃离重庆，蛰居在沱江岸边绿树遮映的老家。

我查阅了日记，这封信是八月十日写的，但直到九月二日战事平息才去邮局寄出。

她很快回了信。她在信中第一次正式向我表白了好感。表白得热烈而且肯定。那时候，我对女性心理全然无知，这封信让我的无知演绎出一个极端的错误。我偏执地确信：我的人生选择是如此的革命、如此的全无自私自利之心，而Z又是如此地爱我，毫无疑问，Z一定会对我的抉择言听计从，心甘情愿跟我去浪迹天涯。和她讨论分配去向是多此一举——根本没等到她返回学校，我就迫不及待向分配小组表了态。

我选择西藏的“自愿”很快被传为美谈，同时很自然地、极大地伤害了Z的自尊心。她返回学校，知道了我的选择。她要我向她作出解释。

这是重庆冬日一个晦暗的黄昏，我和她在嘉陵江边一株巨大的黄葛树下约会。我当然感觉到她是鼓了很大勇气邀我见面的，一路上却片语不发。少女的沉默让我深感难堪。我们一直在沿江马路上并肩走过，走了很久很久，终于坐下了，是在枯树下一个光溜溜的大石头上。我如释重负。面前是有名的风雨操场，巨大的盆地里寂寞地排列着一层层空荡荡的看台。Z仍然沉默不语。我终于局促地先开口了。我说：

“我已经填报了毕业自愿，你听说了吧？”

“知道了。”她说。

“那么，”我问她，“你意见怎么样呢？”

她仍然低头无言。夜色在寂寞的嘉陵江河谷弥漫，岸边的渔火稀疏迷离。我终于有些急了，因为马上要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四川三大组织：重大八一五、成都红成和南充临联的联席会议，商量关于在全四川“倒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Z一直不说话，我只好摊

牌了。我说：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西藏，我们就永远生活在一起了，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之间也就不再存在任何超过同志关系的友谊了……”

时过几十年，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原话就是这样的：像最后通牒一样冷漠和不可动摇。

她还是不说话，继续用顽强的沉默进行抵抗。

我不得不再次追问：

“你愿意吗？”

又沉默许久，她终于说了：

“我正在思想斗争。”

我松了一口气。

我说好吧，“你再想一想吧！我等你消息。”

接着我非常残忍地告诉她，我要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我得提前走了。

人说时光如白驹过隙，当年的少男少女转眼间都已年进花甲。我不知道那位可敬的 Z 有没有可能读到我的这段文字。但是，行文至此，我还是要深深地为自己的粗暴、无知和丑陋而痛悔不已。我希望能得到她的宽恕。

离开她，我径直去重大校务办公楼参加了整整三天的会议。前面说过，正是这次联系会议直接促成了我那篇混蛋文章，那个我一生都没有走出的阴影：《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报应吧。我伤害了一位可敬的女孩 Z，而命运对我进行了整整一生的惩罚。

我还必须坦白的，是我于炮火连天之夜给 Z 写信后不久，一群中学武斗人员从“江北沦陷区”兵败，撤退到了我们学校，一部分人还住进了我们所在的党委小院。于是，有几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就成了编辑部的常客。她们非常友善地还给我取了一个撮号，叫“常委”，因为她们认为机关报报社的主编，从级别上应该是总团常委一级的领导。

在大学生面前，她们显得那么的幼稚无知，以至我们仅仅只能把她们当成不谙世事、调皮贪玩的一群娃娃。

但是我（甚至包括其他的编辑）很快就发现了，她们其中之一：S，对我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好感，她的天真无邪对我产生了一种陌生的、很难抗拒的诱惑。我不敢承认这种情绪，更不敢向她拒绝这种我自己尚以为模糊不清的东西，于是我给自己定出了一个规划：等一等！等一等！反正什么都还没有发生——等到我和 Z 的事情一定下来，我就正式通知她，那时候，难题就不解自决了。

可是毕业分配方案迟迟定不下来。听说四川省分办主任、被八一五臭骂为“烂萝卜”的张西挺对于重庆大学在一派掌权的环境下完成的分配方案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断然否决。事情无限期地拖下来了。

事实上，当时我对此毫不关心。我着急的是：Z 干吗老不给我回音呢？我急于对我与 S 关系下个结论以便明确拒绝让年轻人难以回避的激情，而毕业分配这马拉松似的延宕把我搞得尴尬万分，情急之下，我不能不托人给 Z 捎信了：没有回音。接着又捎第二封信，仍如石沉大海。面对两个女孩的好感和两个方面都完全不确定的因素，我像迷途在三叉口，两条歧路都那么迷茫，都在向我召唤，我不知道路的尽头在何方。

我的思想陷入了极大的危机。

能够让我解脱的，也许只有乱麻麻的社会动荡。我一如发狂的陀螺，需要鞭子不停地抽打以维持旋转，一旦停住旋转，我就会颓然倒下。这鞭子就是争斗、撕杀、狂热。事情过了很久，当各方关系都已尘埃落定，Z 曾非常宽容地告诉了我，那时候她并非不理解我的革命热情也并非不愿意和我一起奋斗天涯，她只不过希望在我的思维框架内和我一起认真讨论一些今后的实际生活，包括成家和生孩子，她说，听人说，西藏恁高的海拔，怀上小孩都很难保得住呢，（天哪！当时满脑子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我，怎么没能考虑到这些啊？）而我，竟连一个商量的机会都不给她！她能不彻底失望吗？而年轻的 S，她比 Z 更多激情而且和我一样对个人生活的所有细节一无所知，因

此她毫无保留地对我的革命狂热表示认同和钦佩。她宣布她将义无反顾地和我奔赴天涯海角。我的虚荣心和她的欣赏发生了共振——命中注定我只能沿着这条荒唐之路继续滑下去。

S 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第二十七章 “必胜”出炉前后

“九五命令”下达后的日子，是八一五派的节日。重庆大学整个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和历史上所有的胜利者一样，我们开始做着胜利者们胜利后常常想做的事情，如：纪念英烈、如：讴歌胜利，还有，既然胜利了，那就必然要追究失败者的责任，清算他们的罪行，穷追不舍，用当时的时髦话说，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烈士陵园是修在松林坡顶上的。松林坡紧靠嘉陵江边，一幢幢教授别墅沿坡而筑，掩映于密密的松林间。山头开阔的草坪是共青团员们过组织活动的绝佳去处。八月武斗，死去的同学陆续埋进草坪中央，现在的工作就是把整个场面再完善一下，立个纪念碑，铺一条路，按照设计，还在上山处竖一面诗屏，上刻毛泽东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陵园落成于是年十月。

讴歌胜利的主要作品是大型歌舞剧《八一五风暴》，当时都按文革前《东方红》的说法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该“史诗”从武斗期间就开始排练，几经修改，现在正式上演了。剧本始由重庆一中一个叫扈来明的高三学生写出剧本、继而由重大文工团舒正国等人编导，其间我曾参加过剧本修改，所以有机会参看了最后的排练：地点是在新华路人民剧场进行。执导者为市歌舞团一对中年夫妇，女的叫黄茜，她的丈夫叫李光亨，胖，精力充沛，点子极多。有专业人士加盟，应该说节目是有一定质量了，虽然依旧是张牙舞爪、大喊大叫的老套路。

首演时间是十一月五日，地点是人民大礼堂。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央调查组组长陈斌及驻军首长全体出席观看并接见全体演职员。从《8·15战报》记录的文字知道，梁在首演后接见演员曾如此表态：“我希望你们多给山城人民演几场！多给山城八一五派演几场！多给解放军演几场！”。



《八一五风暴》剧照。

全川各地的八一五这时也带着所谓“慰问团”和“宣传队”走亲戚一般纷至沓来，弹冠相庆。据十二月十日出版的第五十一期《8·15战报》载，前来重庆“串门”的“友好团体”计有：

“张思德同志的母亲刘光友率领的南充临联赴渝慰问团”

“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率领的成都地总、红成赴渝慰问团”

“邱少云烈士的父亲率领的烈士家属赴渝慰问团”

“中印边界反击战战斗英雄吴元明率领的江津九七赴渝慰问团”

“32111 英雄钻井队英雄王有发、彭美凤率领的泸州赴渝慰问团”

.....

和“友好团体宣传队”的蹩脚演出同时进行的，还有大大小小的报告会、控诉会，控诉主题无一不是“反军派”罪行及其黑后台刘结挺、张西挺之其罪当诛。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派性“慰问团”的领队，或明为领队、实为傀儡者，全都是那年月中国政治宣传领域里的名人，他们的出现自

然就把本已够热闹的山城重庆，搅得更加热闹，也更加可笑了。

下面试举一例：

志愿军英雄黄继光之母邓芳芝，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时期便已成了公众人物，风光无限，见过的世面和做过的报告不计其数，可说久经锻炼了。至于中印边界反击战英雄、32111钻井队英雄诸人，也绝非等闲之辈，上台报告是决不会怯场的，问题出在那个张妈妈——《为人民服务》主人公张思德的妈妈刘光友。文革前尚无“老三篇”一说，知道张思德从而知其母者自然寥寥，皆因文革大闹腾，“林副主席”著文倡导，延安那位辞世多年的烧炭兵一下子方与神话故事中的老愚公、大洋彼岸的洋大夫白求恩一起名列三甲，伟若天人。南充地区的革命群众经过一番深挖细找，发现那位被毛泽东赞叹不置的张思德，其母亲竟然还活在凡界，其兴奋就不亚于基督教徒发现圣母玛丽娅之在人间显灵，于是立即发掘而出，委以要职：南充“临联”政委——问题是，张妈妈长期蛰居山村，什么世面都没有见过，更没在大庭广众间露过脸，要她到重庆大码头面对万千陌生面孔发表演说，自然就有点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每次上台就不得不由人在背后提词。讲话稿自是经秀才们事前认真编撰的，既身份贴切，又把捉刀者的意思说得明白，尤其注意将《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原话改头换面为己所用，如：把“八路军”改为“八一五”、把“根据地”已经“有几百万人口，但这还不够，还有更大些，更多些”移植为“八一五解放区已经有几百万人口，但这还不够，还有更大些，更多些”、还有什么“反



被年轻女孩灿烂笑容包围的老太太，就是名满天下的志愿军英雄黄继光之母邓芳芝，“黄妈妈”。

到底”的人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八一五的人死了，是‘重如泰山’”——余类推。张老太太毕竟初出此道，演讲即便全程提词，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仍有发生。一天，张妈妈在重庆大学风雨操场演讲，我们就有幸亲眼目睹了这类笑话：讲完了“革命战士把连（“把连”系四川土话，“全部”之意——笔者注）要心连心，肝连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之后，按照程序，老太太开始“振臂高呼”打倒走资派——这就遇到麻烦了。那年头需要打倒的官员太多，北京街头一张《群丑图》，榜上有名的“黑帮”，大大小小，光中央就上百！再加上四川省的、重庆市的；各地县的，谁记得明白？老太太办事极认真，她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坏蛋漏网，同时，如此众多的名字又让她极不甚然，因此把刘少奇、邓小平“打倒”以后就不知下文，只好转过头问：“还打哪个？”

提词人小声回答：“打陶铸！”

老太太马上高呼：“打倒陶铸！”

打完陶铸，老太太又问：“还打哪个？”

提词人答：“打彭真！”

老太太马上又高呼：“打倒彭真！”

剩下的功夫都这样，问一个打一个，慷慨激昂一直打了二、三十个，直轮到“打倒刘家两口子”，大会才胜利结束。

梁兴初那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凡遇重要活动，他总要出席并且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谴责“反到底”之反军乱军、图谋不轨，讲话中又总掩饰不住对他的同僚、“反到底”后台刘结挺、张西挺的明伐暗讨。梁兴初是“四野”虎将，五十四军是四野王牌。梁在五十四军驻节地盘的长时间存在，把八一五派对八二六派的进击，从而把整个四川的“倒刘张运动”有效地鼓动起来了。

在渝期间，梁兴初至少两次专门接见过反到底派的头头，一次是十一月三日，另一次是十一月六日。从现在能看到的谈话记录来评判，那完全不叫接见，只能称之为训斥甚至审问，反到底的头头们第一回

被骂了个狗血喷头，第二次通知接见，完全就兴趣索然、想躲而不可得了，而梁将军一开头就明确宣布：反到底的头目“都要来！只准多，不准少！”



梁兴初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到重庆后，对八一五派表现出公开的偏袒。这是一次接见重大八一五时的合影，前排右起第5为梁兴初，第7为韦统泰，第2为白斌。梁兴初的左、右分别为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秦安全和吴庆举。

十分错误的。你们报上的文章没哪一张不是错误的？你们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打倒这个打倒哪个，要枪毙这个枪毙哪个，还要绞死这个哪个，你们能绞死吗？谁给你们这样大的权力？你们不要当狗头军师了。你们大学生都怕死。……”

徐光明辩解：“八一五把我们的广播站砸了”

将军一点不给好脸色，武断宣布：

“他们不砸我都要砸。你们宣传的什么呀？不宣传大方向，而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对准革命群众组织。……”

谈话中，梁兴初没有忘记拿八一五作为反衬来寒碜反到底。梁说：八一五印了那么多批判走资派的材料，你们搞了些什么？

回答：我们搞了，没地方印。

梁申斥：没地方印，那些小报少印点不行吗？你们的大批判专栏我也看了，大都是别人的。你们自己不会写文章？《人民战争救山城》

下面是几段对话：
梁兴初这样问徐光明——就是重庆大学那个可怜巴巴的“红岩公社”、后来改称为“井冈山公社”的社长：
《人民战争救山城》是不是你写的？
徐回答：“不是我写的。”

梁立即打断：“你是司令嘛，你没有责任？
《人民战争救山城》是

不是会写吗？

五十四军的几位处长之死伤和军分区快艇之被击沉，当然是让军人最为愤怒的。梁将军在接见中拿着反到底印发的传单向军工系统反到底头目邓长春责问：黄纸黑字，还想抵赖！就凭这个就可以逮捕你！

他宣布：“你是舰队司令，由你打沉了几只船？你不要认为你有后台，你们的后台总有一天要垮台的。我还不知道你那个后台是好是坏！你今年二十三岁了，够枪毙了。邓长春你还跑不跑啊？”

邓就是曾经指挥着三条改装的军舰在长江上所向披靡的舰队司令。八月十八日为了给武斗中罹难的副司令李鲁沂祭灵，他曾亲自下令将八一五俘虏二人陪杀、枪决并抛尸江流。而现在，面对杀气腾腾的将军，他变得从没有过的可怜兮兮。他说：

“我能跑到哪里去嘛！”

梁道：“你跑不了！你跑到天上，我们有飞机，有高射炮，还有地对空导弹。你跑到地下，我也要把你抓回来。你跑到外国去就是叛国！”

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不失时机地把话题引向他们的腹心之仇：“你们打死了我们的处长，这笔账一定要清算！”

梁兴初接过话头，向反到底的又一个头目黄廉——就是前面说过的“四评四川时局”无中生有地描写的“乜斜醉意阑珊的眼睛”对新娘如此这般的新郎——追问：

“锯掉曾处长大腿的那个人，你同不同意逮捕？”

黄答：“同意。”

再问：“他现在哪儿？”

警备区已有人补充：“那人现在医院扫地。”



梁兴初与八一五派头头亲切交谈。在他右臂旁是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左臂旁是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熊代富。

梁兴初当即下令：

“马上派部队去把那人抓起来！”

《8·15 战报》载，梁发话之后，警备区当即派员离开会场前去执行了抓捕任务。其后第五十一期战报续报此事并特别注明：“杀害警司处长的第一工人医院右派‘医生’李一士是砸派”，且“已上三十斤铁镣”。《山城战报》39期和《8·15 战报》50期的合刊，曾用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一场惊人的反革命谋杀案”，文章记录“警司处长曾惠平受害经过”，说八月二十二日，遭到袭击的军车共四辆，第一辆车乘员曾惠平，遭遇射击后人被反到底人员绑架；第二辆车被袭击后逃离火网，第三、四辆则绕去文化宫得以脱险。文章花了很多笔墨介绍曾惠平被绑后的遭遇。其中强调说，对曾实施截肢手术的医生李一士是个右派……

行文至此，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李确属右派，那么，在当时有“公安六条”强制要求的政治环境下，他能够公开参与砸派的活动吗？而砸派又能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掺和进来给自己添麻烦吗？……后来才知道，李一士确是右派（以后跟全国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人一样得到了“改正”），但他文革中给曾惠平处长做手术绝非“反革命谋杀案”。本来他已经买好火车票想离开重庆躲避武斗，但运气不好，碰到火车因武斗停开，他被迫在火车站等候时，又被反到底派的武装人员跑来硬把他找回医院去给曾处长做紧急抢救手术。身为被监督劳动的右派他不能不服从，只好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成功完成了手术，保住了曾处长的性命。他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医生阶级报复”。梁兴初下令把他抓起来时，其实只是做样子给反到底头头们看的，那时李一士早已被警司抓起来并且遭受了毒打逼供……

至此，八一五这部政治战车已经加足马力、全速启动了。原来，他们说到刘结挺、张西挺还半遮半掩，什么“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王力在四川的追随者”，后来干脆就直呼其名打倒，再后来干脆就“烂萝卜”“野心家”“阴谋家”地喊得更加热闹。十二月七日，沙坪

坝区六万多人在师专广场正式举行誓师大会：“大树毛主席绝对权威，大破刘张个人淫威”。其他各地区的活动亦热火朝天。

“一评四川时局”《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一文，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关于该文的写作过程，在本书开始时我曾经做过描述：“头脑发热的编辑们在办公室墙壁上画了一张很可笑的全国地图，还用铅笔在上面画满红圈、蓝圈、红箭头、蓝箭头。就像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一样开始谈天说地，浮想连翩，舞文弄墨……文章由四个同学分头执笔，写好后由我统一润色定稿。”现在唯一需要补充的就是，除了我，其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霍晓林、张宗云和张国梁。

文章的反响是我们四人始料不及的，但写作过程确实很平常，所以在日记中对此我未作任何特殊记录。文稿写完后唯一曾看过的人，只有总团勤务员、和我一起闹腾八一五事件的吴庆举。他的大加赞扬让我迫不及待地把文稿马上送去了《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看毕，当即结果提出两报告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关于文章本身，我以为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几十年后重新检看这篇莫名其妙被捧红又莫名其妙被打黑的文章，我以为，有人将它与杨曦光诸人“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相提并论，齐名为“五大毒草”，实在有点冤枉。该文实在没有任何理论独创，也谈不上什么异端，仅仅一篇操作层面上就事论事的宣传文稿罢了，仅仅不过在叙事逻辑方面组织得相对严密、文字更加富于煽动性罢了，它于偶然中被毛看见，从而说了一两句模棱两可的话，遂被人视为圣旨，开始了同样莫名其妙的大张挞伐。

如果需要补充一点延伸故事，那就是，“必胜”的轰动极大刺激了我的虚荣心，也加速了我和 Z 的分手。我对于毕业分配已经变得更加漠不关心，而她，却在等待要同我认认真真商量今后的个人生活，包括生孩子、回乡探望亲人之类的细节琐事：这些事对于当时的我，却显得实在微不足道，我被捆绑其上的政治战车正在风驰电掣。在人

们的赞美和怂恿之下，我接着开始写“二评”，写“三评”——关于这，已经没有什么好说，仅把题目照录如后就足够了：

“二评”：《从王力的倒台到新独立王国的破产》。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刊登于两报合刊：《山城战报》第三十九期、《8·15 战报》第五十期。

“三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刊登于两报合刊，《山城战报》第四十一期、《8·15 战报》第五十四期。

“四评”——前面说过了，该文是延聘四川外语学院某中文老师、我心目中那位来无影去无踪的文林高人所写。我除了还记得反到底首领在潘家坪高级宾馆举行的那场子虚乌有的豪华婚宴，我就只记得标题《再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兼评，〈对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五评”是我从海南回来后、甚至又过了一个多月才写完的，刚刚脱稿，让八一五派如临地狱的灾难性指示、即包含有“《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那道圣喻的“三一五”指示下达了。我惊慌失措地躲在《山城战报》给我专门安排的小屋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厚厚的稿纸全部撕了，扔进抽水马桶，干净地、彻底地全部冲走。除了题目。什么都没有留下，题目是：“把刘张推上历史的断头台”

第二十八章 校革委会成立和吴庆举出走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毛泽东七十四岁华诞第二天，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当然就意味革命成功，意味着大权已经在握，不能不大大庆祝一番。

权力这东西实在太诱人又太害人。动乱年代，英雄豪杰窥视神器，策马问鼎，总要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而在和平年代，要让一个人堕落，只用让他为官一年半载——不论官位大小——就绰有余裕了。对于权力的崇拜，文革“副统帅”林彪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八讲话”可谓说到了极致，从而文革期间，老百姓由此衍生出的名言就更多了，什么无产阶级“想的是夺权，看的是夺权，干的也是夺权”，什么“权权权，命相连；有了权，蜜样甜；没有权，苦黄连”诸如此类。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作为重庆第一个一边倒的权力机构，它的成立对于重庆乃至四川的八一五派，其鼓舞和激励，不啻一针巨大的强心剂。

革委会当然是想在毛泽东诞降吉日那天成立，只是报告呈送省革筹审批时候遇到了麻烦，大约说是没有与另一派实现大联合，事情不得不延宕下来。同样的问题是，庆祝事宜已万事具备，箭已在弦，不得不发，更何况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正坐阵重庆指挥，这点面子谁能驳得？生米已熟，木已成舟，以善“和稀泥”著称的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只好卖个人情，批了。事情拖了一天，虽说是错过领袖华诞，反正批了，这就一好百好。《8·15 战报》第五十六期文“革命洪流，不可抗拒”为此不无得意地宣称：

重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八一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通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已经在重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我们八一五革命派在“炮打司令部”、在大造李井泉、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斗争中、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反击来自右的和左的反动逆流的斗争中、在大树特树毛主席，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权威的斗争中，大方向始终正确。



备受争议的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现场

重大革委会的选举是采用所谓“巴黎公社”式的“公民投票”办法进行的。委员会产生后内部权利分配之如何勾心斗角姑且不论，仅就委员的产生而言，我以为是确实体现了以简单多数决定这一古希腊“民主”原则的：张榜公布的结果足以证明这一点。榜示按得票多少排列，结果——谁都没有料到——得票数额名列榜首的，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典型的好好先生贺尔金，这实在有点滑稽！

贺，电机系三年级学生，一位从外到内都土得掉渣的普通后生，一付深度近视眼镜，永远低三下四地对人微笑——再丰富的想象力都难以把他往“造反”“领袖”之类的事情上扯。文革一年多，他确实没有半点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一句激动人心的说词，干脆说吧，他完全就口齿木讷，压根儿就没上过台出过任何风头，一直担任总团“财政大臣”而已。他成天就会给大家记账报账，工作任劳任怨，遂在民选中顺利夺冠。票数排行第二的也是个著名老实人，人称“老黄牛”的黄顺义。吴庆举得票第四，因他是名副其实的老造反，名气不小，此外，他在刚刚结束的武斗期间挺身而出，主动充任301纵队政委，大家觉得他够汉子气，他排位老四算是众望所归。最让人匪夷所思的

是，外间大名鼎鼎的周家喻，排名公然落在第十！同学们觉得该生就会出风头、“浮上水”、很少干实事。共产党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斯言诚可信也！

接下来更蹊跷的问题是：吴庆举造反早，名气大，事实上一直在总团担任领导工作，无论从哪个角度论，他都该是正式权力机构当之无愧的负责人，可在校革委会公布的最后名单中，他不仅没有当上主任、副主任，甚至连常委都没有安排一个，仅仅只充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普通委员——此事几乎不是秘密：在革委会内部的权利分配中，他遭人暗算了。对此他自是恼怒万端的：关于这个，我们留待下面再说。

庆祝大会原定在毛生日当天举行——因为该庆典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重庆市“最先的、最大的、最高的”毛泽东塑像也将在那天同时举行落成仪式。此事意义重大，不记可惜。

该塑像设计高度九点一五米，是为纪念刚刚出道的“八一五战士”上京告状，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广场觐见伟大领袖的“非常非常幸福”日子；塑像加台高共十二点二六米——这个数字不言而喻，领袖诞降吉日。碑台四边各宽八点一五米、塑像后面八根八点一五米的旗杆，这些个数字含意不言而喻：表征八一五战士紧紧围绕领袖干革命呗。俄

罗斯哲人赫尔岑在叙述宗教建筑时曾有如此定义：“教堂（庙宇）建筑本身经常离不开神秘的仪式、譬喻、秘密的献祭”，文革时期全国各地大造特造的毛泽东塑像，本质上也是一种宗教建筑，在任何一座塑像的相关尺寸和造型特点上，都能找到神秘的隐喻和象征。



在制造巨像的脚手架上，艺术家带领大学生们装模作样地学习“最高指示”。

重大校园的毛塑像后面还有诗词墙屏一座，上刻毛词《满江红》“小小环球”一阙，诗屏初建成，字体用铜箔贴就，没过多久就变质发黑，实在有损领袖墨宝光辉，警备司令部于是急批指标，派人去上海另购金箔回来重贴。这一补救措施十分重要，以至得以让人们几十年后再临斯墙，还能看见龙飞凤舞的“小小环球”光泽依然——只可怜毛塑像却已在一阵炸药的崩发中粉身碎骨，让孤零零的旧墙金字显得落寞不已！

塑像肇建于六月底七月初，重庆大学专门礼聘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著名的毛塑像专家叶毓山先生亲自来校操泥，下定决心要搞出几何尺寸和艺术水准都大大超过全中国任何一个马屁精的梦想。叶教授主塑，数十学生担任小工，风雨无阻，日夜兼程，仅月余，一尊硕大无朋的黄泥巨人果然便在第三教学大楼前的球场坝拔地而起。

剩下的就是翻制毛泽东钢筋水泥正身了。不料“八月国内革命战争”訇然而至，工程只好搁置——不是哥儿们怕死，忠心耿耿敬塑伟大领袖的同学谁个怕死过？虽说嘉陵江对岸的“砸匪”每天都数百发炮弹向重大校园倾泻，他们敢炮轰六教楼，敢炮轰图书馆，敢炮轰松林坡教授宿舍区，可是，他敢往毛泽东塑像的方向发炮吗？他们的炮弹只要敢把泥巴塑像擦掉一块皮——信不信：他们绝对“反革命”！政治上绝对被动！“敬塑”工地是当时全重庆最安全的地方。工程停工，皆因战火阻隔，钢筋水泥没法运来，不能不停。

重庆武斗打得热热闹闹那段时间，重庆各处被反到底赶出来的八一五战友纷纷避难于此。他们每天在重大校园闲游浪荡，除了喜欢去防空洞参观死尸，另外最爱的，就是到三教楼前的球场坝看身高十二点二六的黄泥巨人。

有如此众多看客捧场，为泥巴塑像日夜站岗的大学生就尤其洋洋得意，他们头戴钢盔，身背三八大盖，煞有介事地恭身而立，接受参观者的惊叹和敬意，非常敬业地介绍八一五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战斗，用最短的时间创造了奇迹。还有，三伏炎夏，久旱不雨，毛泽东泥身干得满身皴裂，八一五战士深怕泥巴领袖身有不适，每天还得提着

水桶于脚手架爬上爬下，顶着烈日给千沟万豁的主席泥身浇水保养。好在参观人众，哥儿们虚荣心很是满足，有时还装模作样围坐在塑像前面认真学习“老三篇”；大雨之中推砂运浆，还要故意对着照相机镜头做嘻嘻微笑状，非常前卫。

九月，战争终于结束了，塑像工程也得以全面提速了。重庆大学全是些工科脑袋，艺术环节一旦完毕，剩下的工艺问题就属于小儿科：先浇碑台，接下来扎钢筋、焊接、吊装模具、搅拌水泥、离心浇铸，最后砸掉模具：毛泽东出来啦！像齐天大圣从石头里一蹦而出：果然巍巍乎高哉，让人望之唏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七十四岁华诞第二天，重大革委会成立大会就在这尊巨像之下举行了。叹只叹伟大领袖在高台还没站上几年，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便莫名其妙宣布结束。曾在运动中备受羞辱的当权者重掌权柄，他们每天看见那尊塑像就准做恶梦——于是，在“拨乱反正”那当儿，终于憋不住就一声令下——在一个人不



照片上那尊高度恰好等同于毛泽东华诞吉日的 12.26 米高的宗教建筑物——毛泽东塑像——既然象征着造反学生的胜利，文革结束不久，重掌权柄的重庆大学当权派理所当然要在一夜之间将它炸得粉身碎骨。现在这儿是一座呆头呆脑的钟楼。

知鬼不觉的神秘之夜，好端端的毛塑像就被他们用 TNT 炸了个粉身碎骨：这是后话。

还说在毛巨像下举行的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梁兴初和驻渝部队高级将校韦统泰、蓝亦农等一字儿在前排就座。本校学生和外地的朝贺者数以万计，气球、彩旗、标语更多得无数，不提。《8·15 战报》破天荒地出了六个大版，内容共用五个板块和

大量照片做了报道。第一板块内容为“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对革委会主任周家喻、副主任秦安全诸人及会场群众场面进行了报道；第二板块为“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对梁、韦、蓝等做高规格报道；

第三板块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共刊登照片三张：中印反击战斗英雄陈代富大会发言、警备区武装军人为大会值勤和解放军驻渝部队参加修建大会广场。第四板块为“火树银花不夜天”，全是照片：广场上礼花井喷之夜、重庆话剧团的话剧演出：《张思德》、重庆京剧团的京剧演出：《智取威虎山》、还有驻渝部队、西南民族学院等的演出，当然都是文革经典动作：一个个张牙舞爪，装腔作势，其智慧和美感绝对大逊于现代机器人。最后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是各代表发言和全国各地的贺电贺信。发言代表规格最高者当数李世英：文革伊始便名满天下的西安交大学生领袖，其余贺客及发信发电朝贺者为数甚众而名人实少，兹将朝贺机构名单照录如下：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

同济大学革委会东方红兵团总部

山东红代会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天大八一三

贵州省红代会

青海大学八一八联委

郑州大学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革筹组组长、五十四军政委
蓝亦农在重庆大学革委会成立大会上发
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吉林省红革会长春市二总部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安徽工学院纵队
新华工革委会
武汉新湖大革委会
武汉工造总司
大连工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新厦大公社
新浙大联总
焦作矿业学院革命委员会、河南二七公社焦作矿院八一八兵团总部
南京航空学院红色造反团
新杭大公社、杭州大学革委会
中山大学红旗公社
四川林学院一〇一战斗团
西昌一二·一三革命造反团
开江二一〇联络总部
夹江一〇一八司令部
四川石油学院红岩公社
辽联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总团
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办公室
宜宾市红代会
自贡红井总
文红筹红卫兵内高总部（内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雅安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江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县地区支左领导小组、万县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市人民武装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充人民武装部.....



《8·15 战报》为庆祝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而印发的专刊。

以上这些人的反感非常合乎情理；不正常的情况倒是，重大八一五自个儿窝里公然也有不高兴的，最不高兴的，就当数吴庆举了。从“八一五”造反伊始，再早一点，为郑思群鸣不平、反工作组、反市委，他从来都牵线领头，如今革命成功，他公然连主席台都上不了！其内心有多不平衡可想而知。

吴自尊心极强、性格特别倔。重大革委会成立庆典有说不完的风光，可偏偏不给他留一个席位、半缕灯光！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一天，他担任大会的纠查队长，站在指挥车上在人头涌动的会场上来回穿梭——他不呆在驾驶室，偏偏站在车门口，一手抓住车门，另一只手臂就不停地挥舞，向观众大喊大叫，我完全看得出他的愤怒：他需要向人们注意他的存在。那一刻，我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

深夜了，曲终人散尽，吴突然来编辑部约我出去谈心。“东方红广场”已是满地寒光，一片清寂，只有毛塑像孤零零独立高台，巨臂

如此盛事，有人高兴，当然就有人不高兴：“反到底”自然是不高兴的，刘结挺、张西挺自然也不高兴——为此，他们还专门让省革筹办驻重庆联络员郭凤歧写了一个《我们对批准重大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几点意见》上报，说重庆大学“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八一五’一派夺权”，“将捍卫‘红十条’的‘重大井冈山公社’排斥在外”等等。

直挥天穹，显得超凡脱俗。想起白日里“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突然间让人有些悲哀。吴和我一直在学生宿舍临室而居，文革开始又一起造反，生生死死，悲悲欢欢，患难与共，现在革委会一旦成立，似乎一切都该结束了，而他的故事却还在悬念迭起之中，我的未来也晦明莫辩。走在阒寂无人的广场，我和他都有无限的感慨。

他突然对我说：

“周！你信不信，我们内部的有些仇恨，可能比敌对势力之间还要严重！这种仇恨很可能会长记一辈子！”

我知道他指什么，也猜到他要说什么人，很快把他的话头堵了：我不希望革命刚刚“成功”，八一五又起萧墙之祸。我故作轻松地笑笑，说：“文革中发生这些恩怨，对我们个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不是马上就分配了吗？最后还不飞鸟各投林吗？现在就让你当个主任、副主任，又有什么意义？”我真诚劝他：“别把作官不作官看那么重！”

那晚上我的劝戒当然毫无作用。吴是一个好胜极强的青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意外给了那么一段非凡经历，换了和平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杰出人物的。恰恰是文革的特殊经历助长了潜意识中的不应有偏执和张狂，他最终被时代毁了。一九九五年，他因病离世的前一年，我回重庆看望他，他已是一个拥有十多台机床和其他加工设备的工厂主了。我们都已饱经沧桑，对世事的洞悉当是很清醒了，可当我对他的商业成就表达真诚的赞叹，那一刻，他竟说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

“这算什么啊？我们这种人，原本该是当××的角色！辛苦半生，才不过办了这么一个破厂！”

出于对朋友、对死者的敬意，我把××几字隐去了——他说他该当××这话，太容易让人想起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的狂妄，对于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大不敬的。我理所当然该将此话隐讳了。我祈愿他焦躁多年的灵魂在阴界安息，阿门！

庆典次日一早，吴庆举带领校宣传队在毛泽东巨像前粗声大气地

宣誓一番，接着便出发到南充演出去了。队员们一律赝品军装和红袖套。吴领颂一句，众人呼喊一句，气势壮烈肃杀，像奔赴疆场的出征仪式——也许只有我最清楚，吴是想用这种形式发泄自己的满腔怨怒。这次吴带队外出巡演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出发宣誓以向人们表示他的个人影响力，还有，就是温栋梁之死。

温栋梁，四川自贡人，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也是文工团乐队队员，业余专攻二胡。此外，文革大乱始让人发现他除了音乐天才，杂文写作亦十分了得：俚语笑料，信手拈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把重庆的保守派命名为“麻子兵”，始作俑者，就是他——日后编撰重庆文革辞典，温生的名字是不可或缺的。他的死事发生在南部县。是日宣传队住二楼：他们本已演毕就寝，不知何处来了一批武斗勇士，住在楼下并且开始擦枪，一颗误发走火的子弹直向二楼袭来，正击中温的腹部，流血不止，当即送医院抢救——倒霉的是，那一晚停电，整个南部县一团漆黑，医院无法手术。命中注定了他该在那个暗夜离去，于是他死了。

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如果革委会不成立，或者成立了却让吴庆举如愿以偿，在其中谋了一官半职，他还会那么心理失衡、还会那么愤怒难抑吗？他还有必要采用将宣传队拉去南充演出来表明自己的存在吗？那么，这位好端端的温姓小伙子还可被走火的子弹夺走年轻生命吗？

我们有理由这样结论——虽然有些牵强——温栋梁莫名其妙成了重庆大学革委会的第一道、也是重大文革的最后一道祭品：第二十四位死者。

第二十九章 一九六八年，散淡的印象

一九六八年的新年，吴庆举遭遇政治危机同时，我的私人生活也面临着危机。

一年前的元旦，正值“无产阶级大夺权”前夜。每一天都让人热血沸腾。大学时代读美国记者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实录《震撼世界的十天》，总为自己未能赶上那些天翻地覆的壮丽年代扼腕。一九六七年初的“一月革命”终于为傻乎乎的年轻人提供了献身“震撼生涯”的现实舞台，我的兴奋和自豪不言而喻。一年以后的情况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回事。《必胜》的巨大成功让我沉浸的欢乐中，但私人生活中的难题却把我搞得焦头烂额。

新年前后，我和 Z 的关系已无法挽回，于是匆匆忙忙和 S 确认了恋爱关系：这个决定很快使我的内心陷入了极大的迷乱。年轻人尚未泯灭的纯真使我不敢和 Z 直接对面，同时又觉得必须向她作出解释，祈望她的理解。我只能逃避。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的日记这样记录了我的困境：“我想马上离开学校。如果不和她见面，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

“她”就是指 Z。

我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如实回述了我和 S 相识的整个过程并真诚向她忏悔。信的末尾——我至今记得写了一段现在看来依旧非常真诚却颇显可笑的话——我说，当我们年迈迟暮，回首往事之时，我相信我对党对人民都将问心无愧，但有一件事我却永远会痛悔不已：这就是与她的关系：我处理得过于草率。

我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时间把信交给她。全校正在召开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群众大会。地点是风雨操场。两个月前那个寂寞的黄昏，巨大的盆地里阒无人迹，我就是在那儿大义凛然地伤害了一位少女真诚的心。这当儿是白天，整个会场乱如蚁穴，我以为在这

种政治气氛极其热烈的环境之中把信交给她，会让私人情感上的创痛冲洗得淡漠些。

她果然在闹嚷嚷的人群中。我于喏大会场上穿行许久，终于发现她正靠在最后面的一段围墙边上。看见我走过去，她显得有些激动。我永远记得她眼里闪烁的喜悦之光。她的惊喜突然让我感到恐惧，我不敢看她，我甚至非常希望自己动摇。谢天谢地！和她同时背靠围墙的还有一个人：和她同居一室的、和她最要好的重庆女孩 SH。那一刻，SH 成了我的救星。我慌乱无比地走上前将信交给 SH 便匆匆离去。后来 SH 告诉我，收信当天 Z 就哭倒在床，几天不吃不喝。

这个消息让我恐惧欲绝。我没想到我对她伤害的严重程度会一至于此。直到了第二年冬天，我因《必胜》一文而被收审，内疚的心情才稍得缓减。我给她写了一封短信——那天晚上她就将和未来的丈夫、曾经暗恋她多年的 L 一同奔赴贵州山区，开始属于他们个人悲喜生涯。我已成局外人了，而且我的“牛棚”日子刚刚开始，吉凶未卜。我在信中除了对她和男友正式“确认关系”表示真诚的祝福，另外我说了：直到现在，我才那么庆幸我们在一年前结束了彼此的关系，要不，这一年里，你将无端为我倒霉的命运分担太多痛苦！她非常宽容地接受了我的祝福。那是一个山城的寒冬之夜，我们在牛角沱车站告别。我刚刚发现一位纯洁少女的心曾为我如此热烈而美丽地燃烧过，而这个草率的爱情故事就已经走到终点。这让我惆怅不已。看见她站在迷离夜色里向我挥手，那一刻我几乎没有控制自己的感情。天上满是冬日不息的巴山夜雨。我任雨丝肆无忌惮地爬在我脸上。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潸然泪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彻底政治化背景里长大了一代年轻人，他们对于自己最神圣的感情生活，表现得如此的陌生而无知！

个人生活中的初次危机完全令我猝不及防。一九六八年初，我只有远远避走一条路了。这样，我终于第一次离开“战斗岗位”，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海口。

事前，我完全不知道南中国遥远的海岛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

事实上，那儿的年轻人对四川的知识同样少得可怜：仅仅知道有一种叫“涪陵榨菜”的食品特别好吃。滑稽的是，那儿偏偏有一个叫“红卫兵海口第三司令部”的组织成了重大八一五的忠实崇拜者，这让我们有点儿受宠若惊。邀请信送来战报编辑部，崇拜者陌生的名字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我有充分理由说服总团的勤务员们，顺利地批给了一笔路费——我当然没有向他们提及那一个段纯属私人原因——这样我就去了。

我说自己第一次离开“战斗岗位”，是因为自文革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十字军”骑士，我们将拯救正在急剧堕落的世界。我把这个子虚乌有的责任看得如此神圣而重要，好像自己须臾离开，整个世界就会发生毁灭性的灾难。一九六六年秋天全国大串联，许多同学免费外出旅游，阅尽大山名川，从小渴望游历天下的我不曾半点儿心动。一九六七年夏天，战火在整个巴蜀延烧，许多同学都回乡避祸，当“逍遥派”、“胖左派”去了，我也没有走，我甚至对他们的胆小怕事嗤之以鼻。恶卧于炮火连天的炎夏之夜，我依旧做着壮丽的献身梦。而这一回，四川和重庆的政治舞台什么事情没有发生，我却走了。

海口给人印象如同四川郊县的乡镇，荒远又简陋，窄窄的古街显得冷落凄清，除了古老骑楼下有几家烹饪精致的粥店、尽头处有一些贩卖海石花和贝壳的棚户，几乎看不见商店，更鲜有内地司空见惯的大字报。小城的闲散和我的心十分熨贴，只是很奇怪，在外间闹得你死我活的文革，不知道在这儿怎么样搞的？

这儿的红卫兵（我记得海南音叫“昂威 bia”）“三司”确实召开了一个周年庆典，主人也确让我在庆典会作过一次为时不算短的演讲。大会很简陋，是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礼堂里举行的。它的简陋让我想起我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到嘉陵江对岸参加的那次矿区反夺权大会。我的记忆至今还能保证我是庆典上唯一的外地代表，而重庆的武斗为我准备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题材，我的演讲大获成功。接下来还和他们合出了一期合刊报纸。

合刊未署《8·15 战报》名，仅以海口三司机关报《惊雷》第 33 期的名义付梓，时间是二月二十六日。我代表编辑部写了祝贺文章：《敬礼，英雄的海口三司》，对等的是对方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紧紧握住你们的手，英雄的山城八一五战友》。现在重读这些游戏文字，我唯一能联想到的就是克雷洛夫寓言的一句话：“为什么公鸡要吹捧乌鸦？因为乌鸦吹捧了公鸡。”此外，我们还写了“王关林和重庆八月战争”和“让革命大联合东风来得更猛烈些吧！”二文，算是对对方每天的热情款待——天真可爱的“三司”中学惟恐我不能吃到当地的美食，每天都要给我送来许多粤式点心和小吃，还送给我许多贝壳和海石花——做了个交代。

海口的椰子树极多，从码头到城区漫长的道路两边全都是，海风浩荡吹过，不停地在林间抖下快活的沙沙声。独特的树和独特的南国景色让我十分兴奋。北方早已木叶凋残，山残水剩，这儿依旧一派郁郁葱葱，让人感觉特别惬意。除此之外，我就是成天和三司一帮中学生厮混。闲来无事，我们一起去沙滩拣拾贝壳，睡大觉，听海风和椰声不停歇地吹过头顶。无所事事地躺在南中国海暖洋洋的沙岸，我突然有了醉卧桃花源的感觉。正在震荡着整个中国的灾难突然变得那么遥远。

二月下旬传来消息，说是毕业分配已有结果，很快可以离校了。我于是匆匆忙忙返回重庆——那年二月月大，回到重庆是二十九日——回校后才发现是一场空欢喜：毕业分配毫无动静，依旧遥遥无期。我回电机系宿舍去，几乎所有五年级的寝室都空空如也，同班同学一一广义地说——所有五年级同学，回学校把工资领了，一看局势不妙，



与海口三司代表在海边合影

马上又跑了个精光。

高年级学生们的心灰意懒一点儿也无影响这个世界的热闹。重庆大学的校园依旧满是新鲜的大标语：“打倒刘张，斩断黑手，围剿派性，实现革命大联合！” / “文攻武卫，彻底粉碎刘张之流武装夺取专县的反革命阴谋！” / “加强纪律性，恢复重大民兵师！” / “念念不忘专县！”

我很快把离校期间的“战报”索来检看，前一年秋天胜利成果鼓舞之下的低年级同学依旧在乘胜挺进。二月二十二日，全校还有滋有味地召开了一个“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首届战士代表大会”；一本正经地“给我团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献身的二十四位烈士的家属，颁发了追认为我团优秀战士的证明书”；通过了决议案：“发扬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为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而拼死战斗！”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301 部队”部分人员与武斗中死难同学的家属（第二排）合影。韩平藻提供

重庆大学八一五的“战士代表大会”前的二月七日，重庆市的十二所大专院校八一五派也在重庆建工学院紧锣密鼓地召开会议，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个所谓“建院公报”。《公报》确认，四川“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由于有毛主席亲自

批准的市革筹组的正确领导，有四川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五十四军和其他驻渝部队这道伟大的长城，有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八一五革命派的浴血奋战，山城的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公报号召全体八一五战士为“为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大概与会头头们已经难以回避大学生中日益弥漫的消沉与失落，“建院公报”没有忘记写道：“会议严肃批判了‘逍遥正确论’的错误思想。指出，逍遥派就是不革命派。”真有些无可奈何了。

恰恰在我返回重大的前一天，重庆大学赴京参加中央四川问题学习班的人员刚刚在毛泽东塑像前宣誓出发。这次学习班的成员极其庞大，双方各约五百人。中央这回动真格了，要正经八百解决四川问题了。文革两年，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大赌局，最后花落谁家？这次该揭晓了。两派的主要头目无一遗漏，全部出阵。重大一共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反正王益富——就是那个喜欢唱《马房放奎》，后来当过某军军长秘书、接下来成功自杀的文革幸运儿兼苦主——去了。他是作为《8·15 战报》的代表参会的。头头们出发前已有吩咐，为了配合北京的斗争，要求家里人抓紧再掀“打倒刘张”的新高潮。

我一点儿也想不起当时具体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文革开始一年多，我确实是第一次离开“战场”这么久，看到空空荡荡的高年级学生宿舍和热热闹闹的低年级同学大字报，我有一种外乡人的陌生之感。我莫名其妙想起《钢铁是怎么练成的》书中的插图，重病初愈、死里逃生的保尔·柯察金茫然坐在海边孤独的长椅上。战争结束了，人们都变得如此碌碌无为。柯察金准备自杀。对于我来说，Z 已经不再存在，新的兴奋点也不知道遁影何处？我没有想到自杀，但是，我觉得该做点什么事情要填充自己了。

第三十章 “三一五”：四川的政治地震

《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得知我已回渝，马上托人带信要我回去续写“五评”。

正是重庆难得的晴日。早春的太阳透过薄薄的云层恰到好处地向人们播洒温暖，重庆大学满眼葱绿。李乃如带着《山城战报》全体编辑人员来重庆大学的毛塑像前面悠闲地旅游一番，然后兴致勃勃地合影留念。那一天李主编心情大好，他非常舒服地坐在藤椅上，全体编辑则众星拱月一样围在他的身后。有人对我说过，李主编是颇有一番来历的。最初在共产党地方党报《四川日报》做编辑，再以前，共产党执掌大陆政权的一九四七年，他还去过台湾——可能就因为有了这一段特殊经历，因此个人档案袋就有点儿不清不白，不知最后为什么就从党报报社被搞出来，弄到一所普通中专当了语文老师。再分析，照他这年龄、这经历、这性格（明明都四十多岁老大不小的人了，偏偏跑来社会上揽一个什么战报主编来干，实在有点不安分守己。文革的事，哪儿不是愣头愣脑的年轻人充主角？），一九五七年为何没倒霉？这很值得怀疑。莫非他也像那个不甘寂寞的罗广斌？不见棺材不掉泪？总而言之，从照片上看，主编一定感觉胜利已经在望，神情很自信的。

几篇“四川时局”述评已让《山城战报》名声大躁。前面说过，在我离渝期间，《山城战报》李主编迫不及待约请四川外语学院一位老师续写“四评”《再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其声势尤为巨大，由《山城战报》《8·15战报》《八一战报》《山城红卫兵》《星火燎原》《机关战报》六家报纸联合出版。“四评”有个副标题“兼评《对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文章中所称的“看法和建议”是指“反到底赴京汇报小组”和“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即社会上所谓“反军乱军”

搞得最为热闹时起草的一个“绝密”文件，内容当然也该是“反军乱军”一类。这份半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不知道怎么给八一五派弄到手上，以为是打倒刘张的钢鞭，于是赶在北京开会解决四川问题之前抓紧公开。

四川外语学院这位文林高手写罢该文便绝尘而去，不知所止，我接着又被李乃如“关”进交际处（《山城战报》当时已搬该处）闭门造车。从时间推算，我花了约莫两个星期把文章写成了，取名：“把刘张推上历史的断头台”。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我们认定事情应该已经到头，北京很快就要对四川和重庆动手术了。已经用不着啰嗦，不需要像中共评苏共那样一家伙就来九下子。刘张该跨台了。

文章在三月十七日脱稿，等不及文章发排，四川的政治舞台风云突变。

文章脱稿的前两天，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的晚上八点正，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四川省革筹组、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的领导。接见凡四个半小时。出席接见的中央领导众口一词，把“红成”和“八一五”几个月之“倒刘张”行动骂了个狗血喷头。康生称：“反刘、张就是给李（井泉）、廖（指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翻案。”周恩来加码：“就是刘、邓复辟。”一贯喜欢出风头而又严重人格缺陷的江青又是指示又是插话，宣布反刘张“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风。”——虽然仅仅时过一年多，一九六九年年末，刘张二人就被同一拨领导人宣布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又称之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随之又宣布“挂起来，靠边站”……但在这时，“三一五”却是得意忘形的八一五派的黑色星期五。

当时在中央学习班听闻“三一五”指示传达的反到底派领袖李木森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了他们的兴高采烈和八一五派的垂头丧气：

“最让反到底代表兴奋的是，毛主席还专门为反到底派发出了最新最高指示，特别是那一句；‘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这条“最新最高指示”在学习班里被使

用得最多，最广泛，有的反到底代表一见到八一五代表就背诵这条语录，八一五代表只得忍气吞声，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有的反到底代表像话剧演员背台词一样，一天到晚就在反复背诵这条‘最新最高指示’……”

所谓毛“专门为反到底派发出了‘最新最高指示’”的情况如下：该次接见一开始，周恩来就讲话了，他说：“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涂。”如果就事论事，仅从语法而言，这句话非常中性，不过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并没有倾向要爱谁恨谁。问题是联系整个“讲话”对于八一五派的腾腾杀气，“必胜”一文的其罪当诛，却再明白不过了。

文革那会儿的通讯条件很落后，上述让四川发生政治地震的讲话直到第三天才传来重庆。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发现：铁器的出现、火药的发明、原子能的使用……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的通讯水平能够和几十年后的今天那样发达：人人手上都捏一只手机哇啦哇啦打个不停，到处都有网吧供人发 E—MAIL、QQ 聊天，那么，一九六六年八月肇始的大动荡、大破坏、“红色恐怖”、大会造反、武斗、“八月战争”……总之，所有文革引发的灾难都将会被大大加速，变得更加惨烈，而文革本身的破灭也可能大大提前。对于一九六八年春天即将降临的灾难浑然不知的我，正非常敬业地蜗居于重庆市交际处山坡上的小屋，得意洋洋地在稿纸上宣布对立派领袖的末日。那一段是重庆最好的季节，春夜格外地静谧温馨，我几乎天天都写作至深夜。三月十七日的日记这样记录“我完全沉浸在工作中。差不多熬了四、五个夜了。通过昏暗的玻璃窗，完全看得出我明显地消瘦了。两个星期，我写了三万字。取了个名字：‘把刘张推上历史的断头台’。”第二天，我们却被人告知，该上断头台的不是刘张，而正是我们自己。三月十八日，我的日记劈头盖脑就是四个字：

“风云突变。”

几十年后，不管我怎么动脑筋，总是想不起这个消息具体是什么时候传来的？怎么传来的？为了把这段往事补叙得更加明晰，我求问过许多过来人，可谁都想不起了。当年还在八一五战报编辑部坚守岗位的黄肇炎告诉我，说只记得编辑部开了一个会，大家发发牢骚便一哄而散。他还记得编辑中只有一个人没有表态，只抿笑着一语不发，接着就走了，并且再没有回来。“当时我的印象就是，这人还挺成熟的。”他说。我打电话去成都，找到了这个“很成熟”——他刚刚从局长位置上赋闲回家。我问当时情况，他说他只是必须平静地接受这个现实，很灰心，后来就天南地北到处玩了。

事实上，当时的大学生本身就够困惑了，如已经置于斜坡的石头，反正都是要跌进深渊的，推不推它都一样。我在那则“风云突变”的日记的末尾无奈写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对于自己事业的必然胜利从来就是充满信心的。哪怕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有多么巨大的风暴，但是他们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接下来，就把三万多字的文稿毁了，然后把纸屑倒进抽水马桶，在一阵訇然而至的水声中冲了个干干净净。从那以后，我的日间一片空白，直到同年七月底。

圣光消失了。其实世界上本不存在圣光的。只是当人们习惯于信奉某种教义，习惯于期待某人赐予幸福、习惯于恐惧而非真实的灾难降临、习惯于对意图指点自己的人轻信盲从并委托其代替自己思想，人世间就造出圣光了，接下来便轻松地从神（或圣人）那儿找到自己生存的理由。其实，他们只需要稍微花费一点力气审视自己轻率皈依的、按照传统去崇拜和敬畏的对象，很快就会发现：其实神（或圣人）和自己有什么不同呢？悲剧在于，人们总是要等到完全绝望、等到被神（或圣人）狠狠给一巴掌，这时才会想到该抬起头来，不再那么胆怯地审看一下偶像和自己到底有何不同。宣告八一五派政治死刑的“三一五”指示就是这样的一巴掌。这时候他们才有可能不再那么战战兢兢——不光是对关于自己个人命运的段落，还包括他们所崇拜和恐惧过的一切——并把圣光完全剥去。

以往奉为圣典的所谓首长讲话再也不神圣了。人们甚至感觉到他

们简直就在信口开河。时过几十年，我还能记起“三一五”指示中江夫人的无厘头霸道。这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旗手”，公然非常荒唐地宣布道：“杨尚昆是恶霸地主，他的家属没有好的。”共产党中央的办公厅主任杨，不过一人开罪了最高领导，其遭遇竟有甚于封建时代的九族株连！重庆化龙桥某单位普通员工，杨家八竿子都够不着的远房亲戚，皆因杨在中央为官，逢人便喜欢吹嘘此段血源——其实他从未从中得过半点好处——江青懿诏一出，这个倒霉蛋立即被雷厉风行揪出来实施了“群众专政”。革命旗手还有一句指示尤其让人恶心，也出自“三一五”：“李大章同志，（按：李为四川省原省长，据江说延安时期曾作过江的入党介绍人）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你）要保持革命的晚节。”在显然非常神圣的会议上，恬不知耻地用几十年前两个区区烧饼来换取他人的所谓革命晚节——大学生们由此扩展开去，两年多来多如牛毛的各种“指示”“讲话”，类似无聊荒唐的东西比比皆是——如此下作的人竟执掌着八亿大国的命脉，泱泱中华，其可哀也，何有甚哉？

我不再迷信了。但我肯定什么事都不能干了，我把“五评”稿毁掉，便彻底地回学校了。

我开始为自己寻找安慰。我重新背起画夹，漫无目的地沿着嘉陵江河谷游荡，春天的阳光照耀在白色沙滩上：我再次发现它是那么宽广；水岸边光滑的岩石，在我的眼里重新变得辉煌而美丽。还有满眼春色的磁器口小镇，初绿的新树像喷泉一样生机勃勃，还有它身后透明的歌乐山，都变得和七年前我初来重庆时一样充满诱惑。我有一种久违的新奇和感激之情。我想起了古代哲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除了画画，我还莫名其妙对二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年前，为揭露“叛徒”罗广斌“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杀身亡的宣传画印得太多，胡乱堆码在编辑部角落一直未派发完毕，于是我把它们一张张裁开，用背后的白纸装订成八开大小的本子，工工整整地抄写乐谱，

接着严格地按照谱上标注的指法练习二胡演奏。我练得如此专注，以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从别人挖苦的“杀鸡杀鸭”阶段，很快进入到能熟练地把《江河水》拉得如泣如诉，把《山村变了样》、《豫北叙事曲》这类名曲拉得物我两忘。还有，我开始沉迷于摄影。留守编辑、后来在云南山区炸药厂担任总工程师的黄肇炎是一个工科天才，动手能力一流——他和我在这个领域获得了绝佳配合。我们俩成天在一起探讨照片的反差和层次、焦距和景深、契比索夫标准配方、柯达标准配方和艾克发标准配方、显影液和定影液、米吐尔和几奴尼、溴化钾和无水磷酸钠……党委办公室原来有一只大得出奇的木制花架，我们毫不留情地将它的腿锯掉，三面蒙死，一面装上门，再凿出散热孔，改造成了台放大机——比正规的放大机至少大上三倍。编辑部的资料库是不常用的，我们把它布置成一间暗房，再自制了一些称量工具之类，自己配制些显影液和定影液……一切就准备停当了。

未来炸药厂的总工程师当时还忙于准备那一段后来被证实是很失败的婚姻，成天都极端认真地把女友仅有的几张玉照用各种手段进行加工处理：不同尺寸、着色、柔光、羽化……像制造一件对国计民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业产品。十八般武艺全都耗上来，他把照片上的小美人服侍得格外周到。

正在谈情说爱的同学们也都趁机找上门来，要我们冲洗女友玉照，以及他们和女友一起的留影。热恋情人在这些照片上或搂或抱或摸或吻，毫无顾忌，表现得十分亲热——如果把时间坐标稍稍往前推移一段——比如一年——就凭照片上这些作派，把这厮戴一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政治帽子，揪上台批斗当是绰绰有余的。现在不同了，除了开几句善意而且下流的玩笑，对于同学们的类似要求，我们从不拒绝。还有人干脆把“封、资、修”书籍上撕来的男女激情图拿来翻拍复制，我们也来者不拒。这些激情画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本书的插图：云淡风清的大海上飘荡着一叶扁舟，靓女俊男正在船舷边赤裸相拥，如痴如醉。书的名字叫《海涅诗选》，好像是冯至先生译的。这位多愁善感的德国诗人据说和无产阶级革命鼻祖马克思私交甚笃，还被

马老先生大加赞扬的。复制这类东西绝对安全。其实，那时候需不需要革命导师认可已经不重要。大学生什么都不怕了。即使被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封杀的奇淫禁书，像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查苔莱夫人的情人》之类，也开始在校园悄悄流行。

学生九舍“呆霸王误入销金帐”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段时间。

九舍主要由机械系同学居住，一楼和二楼同时也杂居一些文工团同学和部分单身教师。文革开始后不久，单身教师陆续从九舍搬出，无人接管的空房就被机械系和文工团的造反派们强行入住了。四楼机械系学生房客某，不知何许人也，一人于一楼独占了空房一间。反正天下大乱，谁也管不了谁，于是某便行起了金屋藏娇的好事，中学女生某某被他私匿其中，每当夜深人静，何许人便鬼鬼祟祟从四楼潜下一楼，躲进空房与心上人行鱼水之欢。何许人行动自然诡秘，但群众的眼睛则更加雪亮。后来某日，该多情种子的阴谋终于被居住一楼的文工团员发现——文工团的好事者很快自发组织起来展开捉奸活动。好戏择日上演了。

且说某晚，何许人照例鬼鬼祟祟在夜深人静之时从四楼潜下一楼，正欲进房，突然发现走廊上有人影比他更加鬼祟，于是掉头走进一楼厕所暂避——学生九舍只一楼卫生间设有大便坑，二、三、四楼则只有小便池。因此何许人夜半深更从四楼下到一楼便有一个非常理直气壮的理由：大便。他在坑上假蹲许久，鬼鬼祟祟出来，发现走廊上的人影依旧可疑，于是上楼去了。

何许人的第六感观完全正确。文工团的捉奸志愿者当晚已精心排出阵容：谁谁谁值八点至十点班，谁谁谁值十点至十二点班，谁谁谁值十二点至凌晨两点班……余类推。上面说何许人第一轮下楼，他发现的正是潜伏既久、随时准备出击的捉奸队员，他不得不怅然回屋了。

又说，其时登徒子满腹欲火早已中烧难耐，身虽回屋，人焉能入睡？在冷床上折腾半天，又摸下楼来——走廊上的捉奸志愿者依旧鬼影幢幢——何许人再次踅进一楼大便坑假蹲许久，又回去。如是上上下下凡多回，他确认今晚好事告吹，于是死心踏回四楼安睡去了。

再说轮值志愿者廖某，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文工团二胡乐手，在一楼走廊鬼鬼祟祟巡游多时，发现目标上楼后久不下来，自个儿憋不住淫心大作，色胆冲天，干脆就来个李代桃僵。心上人的房门本是虚掩的，廖生轻轻一推便开了，摸黑走近床头，扑上去抱起女孩便欲苟且。中学女生本以为好事降临呢，发现来者原为陌生色狼，顿时大呼救命。

文工团的志愿者枕戈待动，听见小屋里一声吼，个个喜出望外，全从自个儿屋里冲出直奔事发地。灯已打开了，少女余惊未消，只顾靠在床头喘喘。众人问她流氓呢？她说跑了。认识吗？不认识。什么样子？没看清。从哪儿跑的？翻窗跑的……不需要任何侦探常识，案情很快真相大白：留在床前的鞋子，正是该时段值班员廖某的。志愿者们面面相觑，接着一哄而散。

廖果然失踪了。毕业时班上通知事主家庭，父母亲说已许久不知其子去向；后来再通知，说他的分配保留一年有效。一年后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几十年后，我遇到多位廖生同班同学，再问，依旧毫无下落。大家说，他当是在那个羞愧难言的晚上，跳嘉陵江自尽了。

这是当时大学校园里的故事。毛泽东想把年轻一代变成清教徒，事情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虽然这丝毫不影响在后来的时间里，这些大学生中诞生出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难道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只该是清教徒和伪君子吗？更何况上帝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为什么它们不能？再说，他们的荒唐本身就是对更加荒唐的时代的反叛。

下面继续说自己的故事。

第三十一章 如此中央学习班

我的摄影技术和二胡水平日臻完美，北京方面突然传来消息，说学习班追查“必胜”风声日紧，“王二麻”无法招架，急电要我速去北京候处。时间是四月下旬。记得是一个黄昏，总团派摩托车将我径直送至杨家坪山岩下的长江岸边，再用一艘小艇把我送到朝天门，绕了这么一大圈路，我猜想城里的局面一定很紧张了。后来看资料，知道当时重庆的武斗又开始此起彼伏，被“三一五”指示激怒的八一五的铁杆：重庆六中 32111 战斗团纠集若干对“反到底”的趾高气扬忍无可忍的武士，在三月下旬某天（记不起准确时间了），干脆把工总司总部整个儿端了，强迫所有俘虏高举双手作投降状，然后赶出大楼。反到底本不是省油的灯，素多一九六七年“八月国内革命战争”久经锻炼的亡命之徒。重庆八一五和反到底，这两只被中央讲话刺激得颈毛倒竖的乌眼鸡，一有动静，肯定又会打个死我活。只是那段时间我成天泡在暗无天日的冲映房，外面世界打没打？重庆交通阻没阻断？我浑然不知。

我再次乘坐轮船无牵无挂地走川江，过三峡，尽阅高山流水，再慢悠悠地换车从武汉到北京，已时近“五一”。恰恰在我上北京的旅途上，四川的政治棋局突然莫名其妙缓解。四月二十七日，像是天上意外掉下了馅饼，八一五得到一个利好消息：前述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了前述人员，又作了重要性不亚于“三一五”的讲话。

前面已经说过，三月那次讲话让四川的八二六和反到底得意忘形。某反到底领袖的回忆让人大体领略中央学习班当时的热闹，该回忆录如是说：“‘三一五指示’传达后，反到底派欢天喜地，八一五派垂头丧气。反到底派的个别代表听完传达下来，马上把八一五派和五十四军一直想要结合的辛易之（注：原市委书记处书记）拉出来，用墨汁给他画了花脸，画上乌龟相，衣服、裤子也画得花花的，把他拉到政

治学院（学习班所在地）大门旁边去低头请罪。/学习班里谈大联合时，有的反到底派代表说，八一五错完了，没有资格进入革命委员会；有的说，八一五的自己也认为他们在革委会中可以占三到四成，反到底可以占六到七成；有的说，现在反到底还在受压，还没有翻身，要等翻身了再谈联合……总之，反到底派代表普遍是趾高气扬，尾巴真的是翘到天上去了。”

八一五的后台是五十四军。五十四军的后台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还有那个调去成都不久的军区副政委、五十四军原政委谢家祥。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反到底当然急不可耐地要把背后这两家伙揪出来。想当初“九五命令”下达，梁大板牙那厮在重庆一呆就是几个月，成日价把八一五捧上天，把反到底训成龟孙子，把刘、张损得一文不值。人说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承想不过半年河东就变了河西。此仇现在不报，更待何时？全四川的八二六、反到底又开始闹起了乱子，要打谢反梁，不依不饶地要彻底翻烧饼。

毛泽东的文革已经搞得中国天下大乱，到处都势同水火，到处都你死我活，到处都按下葫芦起来瓢……北京的操盘手们对此绝对是大伤脑筋的。那时判定谁对谁错有什么真理标准？没有。有什么道德评价？没有。有什么行为规范？没有。北京不需要谁再来造反再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了，它就要你听话。谁听话谁规规矩矩谁就是左派，不听话就是坏人，就是“黑手”，就有“幕后指挥”。以鼓动造反、批判“驯服工具论”肇端的文革，时过两年，事情绕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

北京的文革操盘手们需要让八二六、反到底这帮发热的头脑降降温了。四月二十七日，发表“三一五”指示的原班人马第二次接见了四川各路诸侯并再次发表“重要讲话”，要刚刚高兴了一个多月的八二六、反到底马上刹车，立即停止“打谢反梁”行动，同时顺理成章又把五十四军及八一五派安抚一番。“重要讲话”再不褒谁贬谁了，明确宣布：两大派都要抓坏人、抓“黑手”。“两派里都有坏人，有幕后指挥，还有黑手”操盘手们宣布，现在，两大派都要发动群众，把矛头对准两派里的坏人，要抓黑手，抓后台，这样才能联合起来，建

立革命委员会。“重要讲话”当然没有忘记特别提醒反到底：“现在你们如果再去压八一五，同样要犯错误，要上敌人的当。”

一个月前八一五挨了五十大板，一个月后反到底又挨五十大板，谁也别再指望把谁打倒。双方真正的扯平了。北京已经把话已经说得 very明白，谁再捣乱谁就成为坏人，成为“黑手”。学习班秩序重归正常。那篇“毛主席批判过”的“必胜”已成隔日黄花，谁也没有兴趣继续炒冷饭。它的作者也就没必要再弄进学习班去作“无谓牺牲”了。总团安排我就住前门外一条什么胡同里的高教部招待所，当联络员。

所谓联络员，顾名思义，任务就是上传下达：每天和家里（学校）通通电话，然后准时去中央学习班通风报信，交换情报。

我们管去学习班通风报信叫“探监”。所谓“我们”，包括四川各市、各地甚至各县造反派派来京城的联络员。无论哪派，大家都把去学习班通风报信调侃为：“探监”。中央学习班位于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即原中国科技大学的地盘。离城很远，大门由持枪军人严把死守，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随便出入，可是围墙——准确说就是一排沿街的铁栏杆，功能酷似监狱探视时横隔于探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铁栅栏——各地各派联络员每天晚饭后都准时在栏杆外守候，彼此约定俗成，各占一定位置，彼此互不干涉。栏杆里面的人憋得烦腻，也常有翻越栏杆外出游玩者，彼此间也从不告密。“坏头头”们翻墙越栏次数多了，动作几近炉火纯青，让人想起蒲松林笔下那位最擅破壁的崂山道士，虽有高墙阻隔而往来自如。后来我发现有几处栏杆实际上已被暗中砸断，轻轻一抽就露开一条大缝，人从中出入游刃有余，出后把栏杆放置原处虚掩现场，谁也觉察不了。

四川两大派在政治问题上不管吵得如何天翻地覆，在翻墙问题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

挨了板子以后，两派心里都已明白，北京并不想宠一个偏一个的，两派都该是他们的乖宝宝。北京分给您多大一块蛋糕您就规规矩矩守着吃，甭想贪嘴，贪嘴只会挨屁股。宝宝们变得规矩了。彼此间的矛盾退居次要，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家得围着自己的蛋糕争大夺小。各

派内部矛盾迅速上升。

自称一贯代表正确路线的八一五派，在革委会席位问题上的争夺也够热闹。其间最具有爆炸性的事件是盛传吴庆举为了捞官儿做，公然暗中写信向“敌酋”刘、张告密。谣传起因是如后：

某日，八一五内部正在讨论推举何人为省革委当副主任为妥——周家喻其人虽然不怎么样，红疤黑迹一大堆，可是因为反到底老喜欢拿他出气，动辄就要摸他的“屁股”，知名度无人可比，推举他参选省革委当副主任几乎众口一词了——讨论正进行得好好的，突然间刘结挺发下话了，提议要吴庆举来坐居此位，提议顿时在八派中激起轩然大波。八一五内部没任何人推举过吴呀！如果不是本人告密自荐，刘结挺怎会抛出如此莫名其妙的动议？起因也逐渐有了说法，称吴在校革委的组阁中失利，“堤内”损失想要“堤外”补，有点儿汪精卫和蒋介石斗，斗输了就要投靠日本卖国求荣。八一五的驻地当天晚上闹翻了天，不管怎么说，吴庆举的知名度怎能比得周家喻？更何况告密叛变，实在可恶得很！周家喻就是个傻儿，我们也非要选他不可！

刘结挺这时候站出来发话了，既然你们内部意见统一不了，重庆的省革委副主任位置就暂时不安排了。八派不安排，对等的反到底也就不安排了。此后周家喻就只当了个省革委的常委。——后来又有了一说：原来重庆和省里都考虑的是重庆的省革委副主任分别由两派的工人代表担任，而八一五的工人代表阳增泰，却因主张重庆文革由“工人阶级”主导，想要排挤重大八一五，因此被重大八一五坚决否决，甚至传出他在武斗中有杀俘嫌疑，不让他到北京进中央学习班。这样一来，四川省革委中原有重庆的两个名额就“暂时空缺”，这一“暂时”就成了一直都不变的事实。

现在轮着吃了亏的八一五们把脏水往吴庆举头上泼了。关于吴的“叛变通敌”虽然仅为谣传，无法证实——但无法证实的谣传其杀伤力恰恰比有法证实的事实更为凶险。吴百口莫辩了，本来就满头花发的吴变得更加孤立也更加消沉。知道我来了北京，有一天“探监”时他就翻栏出来，陪我一道去了颐和园，向我倾吐了满肚子苦水。他说：

“有谁比你更了解我？你说吧，我能干那种事吗？”

他显然想从我这儿得到否认谣传真实性的结论，但我没有满足他。我不想对谣传的真伪加以判断。我说我对这些事一点儿兴趣没有。接下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几个月前我在毛塑像下对他说过的话：

“文革中这些轰轰烈烈、恩恩怨怨，不过过眼烟云罢了！我们不是马上就分配了吗？最后还不飞鸟各投林！庆举，别把官场纠葛看得那么重！”

那一天颐和园游客甚少，很清静。而且那一天我才知道颐和园还有一个后园，有一院慈禧的专用戏台。戏台院内更是渺无游人，我对着空空的舞台大吼了几声，连回声都没有。

中央学习班里似乎没情报需要传了，甚至学习班内部也没有什么值得吵闹了，反正上面怎么说，双方只能照办就是。“翻墙”进出的人更多。翻出来也就是玩儿，就是散心，就是逛大街、逛公园……凡是有人——不管哪一派——说得出来的景点，绝对都被通通一扫光，包括远在门头沟外那座衰微破败的潭柘寺。北京完了，就去天津，去塘沽，看大海，与渔民神侃，侃得对方心甘情愿把刚刚打起的生猛海鲜端出来让学生领袖们狂吃。

我想不起杨宪腾——就是在群众大会上臭骂中央领导“给老子啷个搞起的”那个《横眉》报主编——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他来北京，立即成了重大八一五这帮哥儿们的财神。他报纸没过办几期，可办报的经济核算比我强得多。我心目中的红卫兵小报从来是没考虑过钱的，都是义务宣传，杨却把账算得一清二楚：每张报纸固定成本多少，可变成本多少，发行多少份，可赚多少钱……他的经济头脑让我目瞪口呆。他利用办报之便，印了许多“大批判材料”《打倒李井泉》，反正大量公费都无偿摊消了，成本自然很低，厚厚一大本卖 0.15 元尚有可观利润。他和《横眉》另一位姓孙的编辑将这些资料长途运来北京，就是看好京城市场。我没事就帮他们卖书，学习班的哥儿们也溜出来卖书，赚了钱大家就一窝蜂地下馆子喝啤酒，统统由杨宪腾买单。啤酒喝得太频繁，《横眉》主编的肚子明显地大起来，这使他非常苦恼。

更苦恼的是：大家都找他揩油，财政窟窿太大，他向我诉苦：“以后追查起来，我一个人还起呀！”我的概念还是闹革命啊，命都赔进去了，何必愁这个？他连说你不懂你不懂！

尽管杨对财政问题忧心忡忡，但凡有玩机，他总不会错过、大家也不允许他错过。那次去天津唐沽看大海，八九个人也是帮他提着几大捆《打倒李井泉》出发的。先是在劝业场叫卖，售书款交杨后就一起直奔水上公园。去水上公园之前，还买了一大包卤猪脚去回民饭店喝酒，吓得店主人只敢在心里叨念真主，小心翼翼劝我们把吃剩的骨头收好拿走。酒喝得太多，后来在公园里开水仗就特别忘情，个个通身湿透。公园小湖中间有个小岛，小岛上原来不知是不是有座亭子被破四旧破了，反正我们去的时候小岛光秃秃的。几位来自中央学习班的学生领袖就把衣服裤子全部脱个精光，赤条条全裸上阵。我记得那天正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园内游人如织。领袖们的行动太前卫，吓得我不能不提醒他们注意一下影响。我记得尤其清楚，一位中央学习班成员回答我：

“怕什么？人皆有之！谁愿看谁看吧！”

照相术正让我迷得发热发烧，凡外出游玩散心者，我从来自告奋勇全程陪同并负责摄影留念。摄影是需要花钱的：这件事没法沾杨的便宜，就钻头觅缝找窍门，听说王府井的摄影器材商店有北影厂淘汰下来的过期电影胶片，27Din 的作 21Din 使用一点问题没有，马上跑去采购许多。商店将这些过期的电影胶片剪成五米一段处理零售，每米平均价仅为两毛一分，装进 135 相机，可以照出四十多张来，很适合穷学生的消费水平——我于是有了一项十分愉快的日常工作：制作胶卷、照相、冲胶片。装胶卷和冲底片都用被子蒙住，全凭经验进行。唯一缺陷的就是没暗房，无法洗放照片。我统计过，两个月间，仅我个人自拍的照片就近 150 张，在我此生几十年中再无如此记录。其他人的则更多：仅从照片的数量就足以说明学习班的哥儿们玩得多野。这样说吧，北京没有我们没有去过的，十三陵之类的通用景点，更被走得热门熟道，而且常常是步行出游。我们是在夕照苍凉中沿着燕山

山麓行走的，沿途多会遇到北京大学，三三两两，也作徒步之行，他们总是极其认真地扑在斑驳难辨的古石碑上，用作业纸和铅笔小心翼翼地拓碑上的字。他们工作得极认真，对我们十分友好地说明一天仅能拓几个字。再问他拓下来干什么？一位眼镜耸耸肩膀，向我做了一个首都红卫兵曾有过的高深莫测表情，说：

“您看见了不是？凡是没有被毁掉的石头，上面总会有一种永恒的东西！”

回答如此认真，好像对付老师的课堂提问，我笑了，说：“你是北大哲学系的？”

“没错。北大哲学系的人不是个个都只会写马列主义大字报。”他说，然后扑回断碣残碑，用铅笔认真地继续抹。

没有被毁掉的石头，还有夕阳中的十三陵，神道两旁孤独的石兽和石人；还有颓圮的长城；还有圆明园被兵燹焚烧留下石柱石梁……它们确实让人想起更多的永恒的东西。我们在那儿流连忘返。

两年前的“红八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中国的年轻人就轰轰烈烈破“四旧”、毁庙宇、烧字画，砸古董，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多，事情就完全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年轻人对残破的古代文化表现的热情，真是对当年自己荒唐激情的最好反讽。

第三十二章 从武汉到重庆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是六月二日成立的。四川革命委员会则在之前的五月底成立。两个大会自然都很热闹。但我却兴趣索然且毫不知情。一年以后，我已远走边疆，偶然遇到同时发配来此的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女生 P。她是我的对立派，但彼此间已完全没有派性概念了。事实上，当时被发配到边疆的四川大学生很多，八一五派、八二六派，反到底派……都有，他乡聚首，大家突然间都不识派性为何物了，虽然不久前，任何一个字眼的争论都足以让双方打个头破血流。环境的影响真大啊！人们一旦去了一个陌生之地，为了个人的生存，所有人都会捐弃前嫌成为朋友。说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盛况，说到参加演出的《四川很有希望》，这位八二六“女战士”依旧喋喋不休、激动难抑。《希望》也是一个所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配合歌颂四川省革委成立的。四川革委会当时的实权控制在八二六派手上，它的成立是八一五的恶梦。这位“女八二六”对派性十足的四川省革委所表现的深情一点也没让我反感。相反，我觉得她唱出的曲调非常优美：“金色的葫芦笙金色的歌，一人唱来万人和，凉山九十九个火把节，赶不上今天多快活哟，多快活！多快活！”如果一年前听她这么唱，我很可能会找她拼命。现在完全变了，流落边寨的外乡人全都跟着她放声高歌，像卡拉OK大奖赛上的多人组合。时间真是个好东西。让人忘记仇恨，变得豁达大度——这是后来的事。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对政治已漠然无感。从北京来到武汉，我又在姐姐家里呆了很久才启程回重庆。武汉期间我依旧每天摄影和冲洗照片。姐姐家的厕所被我用布和纸板蒙得严严实实，改造成了临时暗房。已进夏天。夏天的武汉是有名的火炉，密闭的厕所里温度更是高得可怕。我成天就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在里面折腾……直到后来实在受不了了，这才硬着头皮出发，开始极不情愿的回校之行。

重庆至武汉这一段水道在我的心中是永恒的诗意航道。大学时代第一次远行，我就是沿这儿走出四川的。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江，我完全像只会看图识字的小学生一样，虔诚地端坐甲板上，一边小声阅读刘白羽的散文《长江三日》，一边膜拜两岸扑面而来的重崖叠嶂。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玻璃一样发亮，我曾有抑制不住的慷慨激越。“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上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我差不多能够把刘白羽的散文大段大段背下来：“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啊！’……”

一九六八年夏天，当被向往已久的“革命生活”折腾得心灰意懒，这一条航道对我已经没有了半点儿诗意。船上乘客本来不多，而且那年月出门在外，谁也说不清谁是干什么的，彼此间非常警惕。整个航段一忽儿属于这派势力范围，一忽儿变成另一派管区。如果派别搞错、甚至被人点了“水”，遭遇麻烦甚至性命之虞，随时都可能的。轮船在山峡谷里低沉地鸣着号，寂寞地逆流而上。进三峡了。过西陵峡、过巫峡……一路无事。船泊巫山，到了四川省境，算是回到家乡了，气氛却陡然变得异常紧张。船在巫山码头停靠了很久，久得连傻瓜都感觉不正常：船员们在甲板、舷梯、货舱和驾驶舱忙忙乱乱，先是卸什么东西、装什么东西，接下来由开始花数倍时间在驾驶舱和机房等要害处堆垒砂袋。砂袋垒得极高，整个驾驶舱被遮掩得严严实实，像临时构筑的碉堡，仅留下几个观察孔。整条船成了准备到枪林弹雨中去冒险的活动载体。砂袋堆垒完毕，船员们很敬业也很严厉地将所有乘客统统赶下底舱，盖上铁板，这才起锚续行。透过紧闭的钢窗缝隙往外看，岸边山坡上果然不时有作战士工事划过，碉堡里的枪口炮口闪着冷漠的光，大有恶战将临、一触即发之势。

乘客躲在底舱里大气不敢出。舱位非常仄逼。正是夏天，长江河谷本是聚集存贮热能的低凹地带。中国著名的“三大火炉”重庆、武

汉和南京都汇集在长江边上。几百人被储进一只拥挤不堪的活动“火炉”里焙烤，难受滋味实在让人非常容易就想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别的什么，我想到的是殖民时代的黑奴贩运。欧洲殖民者都是将非洲人像牲口一样塞进船舱，经由海路长途颠簸而去。人贩子害怕黑奴在舱里窝得太久，起岸时腿脚不灵活卖不出好价钱，每天总要把他们从拥挤不堪的舱中赶上甲板，敲打酒桶、铁锅，逼他们胡乱跳一通桑巴舞。川江上的船员把我们赶下底舱当然是为了安全，但窝得太久，太难受了，我还真希望有人把我们赶上甲板敲打一会儿酒桶和铁锅呢。有类似想法的不光我一个。有旅客就和船员吵起架来，吵得很厉害，甚至扬言即使被打死也比闷死在活棺材里强。这类吵闹最后都以更多旅客的劝解和船员的胜利而告终。贪生怕死者始终占人类大多数。

我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航程，猜测该经过或者该到达的景点，以此打发热得直想轻生的难堪时光。离开巫山，就该过瞿塘峡了。瞿塘峡很短，我记得它仅仅只有八公里。我还记得刘白羽的文章说过，瞿塘峡的特点是险峻雄奇，“……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峡口有许多摩崖石刻，不知谁写的“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是其中最大的一幅……离开夔门，就该是奉节了。奉节码头有一溜烟高高的石阶，石级顶端有一座古城，城头三个大字“依斗门”，我一直不知道它典出杜甫的诗“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奉节过了就该是云阳了。云阳县城对岸山上有一座张飞庙，我记得庙前有“江上风清”四个大字……实在闷得难受，想着想着我就不能再坚持下去。事实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已经走到多远？走到哪儿了？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到甲板上去透一口新鲜空气。

终于被放出来，乘客们全都像迎接解放一样冲去甲板上。两岸青山处处，让人感到特别爽。好像这时才发现自己还在地球上。我突然有了得垄望蜀的意思：下一个码头，我一定上岸去，甚至一定要装模作样地用手去触摸一下岸上的土地。

终于又该靠岸了。船员告诉说，前面将船泊涪陵码头。前面我已

经介绍过，涪陵的榨菜比整个四川省的知名度还要高。每次过往船只停泊，在一阵惯有的忙乱之后，总有很多卖榨菜的农民挑着担儿涌上趸船。榨菜都用很袖珍的土坛封装，外面还套上一只小竹筐，非常精致典雅。可现在我一听涪陵心里就发怵：涪陵是有名的砸派窝点呀！我这个八一五派不大不小的知名人士，绝对不敢轻易下船，自投罗网了。

事实上，事情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刚刚船靠码头，还没停稳，一群武装人员已虎狼一般冲上甲板，像电影上搜索八路的日本鬼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驱赶，把所有人全部赶到顶层甲板上接受检查。我囫囵地往乱七八糟的队伍中间挤，这时突然想起了：我衣袋里还装着《8·15 战报》的工作证呀！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自以为这次被抓，当是凶多吉少了。一九六七年四月被沙市纱厂砸派抓获，其时武斗尚未开打，人多少还讲点儿文明。现在有了“八月国内革命战争”的血腥锻炼，杀个把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有一刹那，我简直就自暴自弃了。我悄悄对排站在我边上的同行者说了，如果我出事，你到重庆找谁找谁，帮我报个信。同行者也是我一派的，成都人，他只管安慰我别着急。

几百人先是排成几道蜿蜒长蛇阵，按顺序一个个盘查，PASS 的就站后面去。现场的混乱让我的机会主义恶性膨胀。事实上果然出现了机会。前排一被查者突然间和武装人员大吵大闹起来。好像有人点“水”，说他是什么首恶分子，将他强拖出队伍。他宣布他压根儿就是逍遥派，而且还非常强硬地宣布他认识砸派某某大人物。双方吵得热闹，本来就混乱的队伍越发混乱。我趁机溜出队伍摸到最后一排站好。后排全是通过检查的人。“日本鬼子”虽然手执武器，但人少，PASS 的人更顾不过来，于是，我趁混乱眼疾手快地将《8·15 战报》工作证掏出，扔进了身后起伏奔流的长江波涛之中。

这次历险成了一个象征：我的红卫兵小报经历，在经过最后一次劫难之后，结束了。

我现在完整保留的报纸共有六十期，即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

出版的创刊号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第六十期。第六十期是和《山城战报》合刊的。只有两版。和创刊号的气吞山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期满纸都是政治高压下的无可奈何与言不由衷。这差不多也是一个表征：红卫兵作为毛泽东时代一个畸形的政治群落，从被利用到被遗弃，其短若蜉蝣的生命已经开始消亡。60期第一版通栏标题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学习坚决拥护中央首长三一五重要指示”。下面是重庆八一五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通知：“号召全体战士坚决拥护中央首长三一五重要指示，坚决贯彻落实红十条红五条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还有就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关于坚决拥护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的声明”。第二版也只有两篇文章。其一为社论：“毛主席是舵手，八一五跟着走”；其二，两报编辑部“关于撤消《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并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的声明”。根据我当时在藏报上作的记录，这篇“撤消声明”是由我执笔写的，足见相当滑稽了。其后《8·15 战报》又出了多少？什么内容？除零零散散保存了几张外，我一概不再了然。

我所知道的只是，八一五战报的后任主编王益富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以后，就实际上全部负起了报纸的出版工作，虽然当时谁也不再关心这个，《8·15 战报》已可有可无。王以一个小县城的孩子而能出人头地、能参加中央举办的学习班，能和重庆市的最高军界人物同机飞返，这些都足以让他非常自豪的。从北京回来后他情绪极好。于是后来，他被进驻学校的军人相中，入了伍，当了军官。那时候，重庆大学最后分配出去的大学生，全部赶去攀枝花铁路建设工地接受军人的“再教育”。日日风吹雨打。在历尽了几年劫难，任何事都不再神圣的中国，那一身象征最后权威的黄军装，曾让挣扎于山区工地的同学们羡慕不置。他当然也有理由很得意。再后来，他当了军长秘书。再后来，他开枪自杀：那时文革刚结束，中国百废待兴。

第三十三章 走边疆

下面是当时的几段日记：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事情闹大了，自然牵涉到我个人：这个写“必胜”的罪魁。阶级斗争太残酷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当初我们是把他们当作无产阶级的敌人来看待，那么，他们胜利之后，也必然要把我们当作敌人来看待了。这有什么奇怪？

八月九日。到处都传抄着省革委首长接见重大八一五代表的讲话：“必胜”的作者分配到哪儿呀？“必胜”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反动的，你们知道吗？……

那段时间最喜欢来找我的是 301 的一些哥儿们，尤其采矿系五年级同学、武斗队的后勤主管陈捷。陈身坯粗壮，头大，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如果刮一个“禿瓢”，他活脱脱就成了一个时尚歌星，或者警匪片里的一号反派。那段时间他像一位末日预言者，一进编辑部就和我聊蹲监狱的事。他说：“周兄，你可抓紧多吃点饭啊！我落实啦：石板坡监狱，每天只给犯人配六两定量啊！”其时，我对那个领域一无所知，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一年后我去云南边疆了，这才听说已经分配到重庆涂山煤矿的陈捷果然被当局抓了起来。同时从天南地北抓回重庆的还有十几个同学，包括前面提到过的“尸长”郑志胜。大约因武斗血案牵连，十几个大学生真的都被监禁多年。这时我才想起，陈向我津津乐道的监狱状况，真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当时他自己的命运定然已有了明确预感，想通过和我开这类玩笑寻找些同病相怜的安慰。

陈出狱后两手空空，生活全无着落。他就去重庆大学的门前摆地摊，卖些小百货为生。他还把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指甲剪、打火机、手绢、清凉油之类的小玩艺儿摆放在一起兜售，让路人、尤其重庆大

学的老师学生不禁感慨歎嘘。

如果说“必胜”带来的厄运仅仅属于我一个人，那么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正好在那些天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灾难。就在我写下上述日记的前几天，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派出数万工人和军队官兵——后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气焰嚣张的井冈山“团派”首领不知此事系伟大领袖亲自所为，公然进行武力抵抗，于当日打死工人五名，伤七百三十一名。毛泽东大为震怒，于次日凌晨紧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冷嘲热讽地痛加批评，继而指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撰写“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文毕，毛对姚文三次作认真修改，题目定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于八月公开发表。

姚文把毛泽东用以策动文革的高等学校、即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正式斥之为“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文章毫不客气地宣布：“那种把工人当成‘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文章中有一段话尤其醒目，是毛亲自加上的：“有些自己宣布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姚文把知识分子和“那些患了近视症但还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相提并论，居高临下地加以“奉劝”、实则是一并加以申斥——从此以后以至很久，“知识分子”紧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种专政对象之后，正式列名第九，简称“臭老九”，成了准专政对象。

七十年代末，我曾在某工厂当过为时多年的电工，师傅们对大学生动辄就“老臭”“老臭”地喊得顺口。开始我心里还有一些反感，时间一久，也就习惯了。无非一种称谓罢了，何必自己找气生呢？在这

个问题上，王二麻的态度一开始就很豁达：“人家姚文元又没有奉劝我。他奉劝的是那些轻视工农、自以为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嘛！老子从来瞧得起工农兵！一看见工农兵，老子就忙不迭喊爹喊妈：爹！妈！——他奉劝我干吗？”

工宣队进驻重庆大学那天，哥儿们与其说是自发前去欢迎，不如说是去看热闹。正是吃饭时间，大家挤在校园道路两边，把手中的饭碗敲得震天价响。发现队伍中有不少女工，大家尤其兴奋，特别很多女宣传队员正值花季妙龄，相貌可人，不少同学暗暗动了凡心。

得知大学生们将和我一起倒霉的消息时，我想不起自己是不是也有过些许安慰？

八月二十八日工宣队开进重大校园前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日记都没有任何记录，大约心情太坏。到十月十六日，日记本上又开始有了些断断续续的记录：“坚强起来吧！乐观起来吧！天塌不下来的，哪怕再大的苦难，哪怕再大的风浪，你都应该经得起。”十月二十一日日记：“不管是自我欺骗，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我还是希望着，还是追求着，我愿意把我的前面看作绿柳春光，而不是黄花秋叶。往事不堪回首，我愿意它们通通死去，而后踏着这具尸体，更加稳健地向前走去。”

到十月二十二日那天，我把珍藏多年的信件全部烧了。日记上仅留了一首七绝：

缕缕火烟焚锦书
西风飒飒冬凉初
韶华如灰归去也
还望边陲叶正绿

这几则日记，估计是在我被弄进学习班审查之前写的。当时风声日紧，我需要作些准备，同时也不敢再多记什么给自己添麻烦，我的日记便到此为止了。后来，一直到工作之后，也就再也没有有了完整的

日记。

不久后，我被收审。

两派有争议的人物都被扣留下来不予分配。八一五当然多些。他们人多，干的事情多，名气太大，惹得麻烦也多。“智擒李井泉”的、参加武斗的、处理尸体的、虐待战俘的……问题随便一抓一大把，不管问题为真为假。反到底派“井冈山公社”人数寥寥，人们印象中，他们好像什么像样的事情都没干过，你能抓他什么把柄？没把柄。所以他们一个都没有揪出来。苦了的倒是一些代人受过的“右派”。一九五七年被打的年轻右派趁一九六二年政策短暂放宽之际，不少又返校复读，没承想因为同情了反到底观点，于是就被八一五揪出来陪绑，弄我们一起挨审了。某晚学习结束已经很晚，我从冷清清的六教学楼走下来，电机系四年级右派学生韩公第，一个弱不禁风的瘦高个儿，看见四下无人，赶上来将我拽住，可怜巴巴地说他挨得好冤！他向我申辩他绝无反八一五之心，皆因无辜被疑，多次被班上的同学打得遍体鳞伤，说着就撩开衣服要我看他的满身伤痕。他的痛述使我很受感动。他说我们人多势众，和工军宣队的关系又好，恳请我替他代为疏通。其时，我和他同时被审，观点相同或者相悖已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可惜我亦正为自己的检讨未能过关而焦头烂额，又何能对他援之以手？再说，不管怎么说，他是身份明确的右派，阶级敌人，而我，我依旧认为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革命左派，无辜被审，不过是一时冤枉而已，怎能与他同流合污？我对他表示了同情，至于别的，我断然回绝了。

除了个别的如韩公第者流，学习班里写检讨的，全都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有时去参加全校的大会，我们这帮人一走入会场，全场同学都会起而哄笑——称我们为新的“牛鬼蛇神队”——甚至掌声雷动。其意也，我们知道：有善意的嘲讽，也有无奈的酸楚。我们于是就友善地向全场哥儿们挥手致意。

韩公第说我们和工军宣队的关系好，这话确实没错。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军人宣传队员和工人宣传队员确实没有为难过我们谁。审查

我们，他们无非是要给老想给八一五过不去的“省分办”主任张西挺做个姿态、有个交代而已。如下一件事情可说明军代表的仁义。某同学Y因被审查，女友已分配去山东济宁，一到工作地便给他寄来绝交书一封。其书概云：到了工作岗位，她在老工人的帮助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经过了斗私批修，深感她和Y的关系是没有革命基础的，故而正式分手，云云。读罢来信，Y心中怒火不打一处来。下午整个学习时间他都心不在焉，独自个趴在桌上找一张废纸练字，就写一句话：“火可以烧死人，水可以淹死人，但水比火更可怕，因为她有一幅温柔的面孔”，这话翻来覆去地写，白纸写得漆黑一团，翻过来又接着写，直到把背面也写得漆黑一团了，再翻过来又写……军代表发现他对政治学习心不在焉，于是便点名了，专门要他发言。Y正当气头，一开口便骂娘：

“说老子炮打林彪，炮打江青，老子什么时候炮打过？现在你们查了半天，查出没有？你们问题没查出来，老子的婆娘倒搞吹了！这算咋回事呀？你说说，这算咋回事！”

军代表听罢，当即也一拍桌子，大吼：

“你婆娘搞吹了关我屁事！说明她对你不忠嘛！这点考验都经不住，这种婆娘拿来干啥？再说你婚都没结，算什么婆娘？吹了，再找一个不就完了！”

军代表话忧未了，Y却嚎啕大哭起来，哭罢，悻悻地摔门而去。这次种极不友好的行为，军代表不过一笑置之，并没有找任何麻烦。不久，Y和我们同时离开四川。他去了遥远的张家口。八十年代，他又远渡离国，成了美利坚公民。

我的问题关键是交出后台。据说上峰发话，说像“必胜”这样高水平的东西，年轻人是写不出来的，尤其工科大学的年轻人。我能有什么好交呢？该“大毒草”整个儿就是我自己的主意。虽然四个人执笔，但最后却系我个人统筹润色而成。一次交不出来后台，又继续再代；不行继续交——后来实在走投无路，便有朋友给我出了个馊主意，说《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已被揪出啦！

他问题严重得很呢！一九四八年他就去过台湾，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跑回来，很可能是潜伏特务。开始他在《四川日报》做编辑，皆因历史问题才弄下来教书的。朋友们动员我，说反正李是在劫难逃了，在他本已非常严重的问题上多加一条罪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再说，他本身就是《山城战报》主编，说他黑后台也不冤枉——我接受了这个主意。其实我一直对李印象不错，为了保我自己过关，我终于在交代材料里违心地诬陷了一位可尊敬的长者——几十年后，检讨自己一生行为，我为此深感痛悔。如果李先生健在，我愿意真心地向他表示我的忏悔。

我被放逐了。所有八一五被审查的人员几乎都先后被放逐了。四川是我的故乡，却又是个是非之地，我是那样地眷恋它又那么地仇恨它。担心夜长梦多，事有突变，我甚至来不及去信告诉父母，拿到“报到证”当晚，我便急急忙忙买车南下了。时间是一九六九年旧历岁末，春节悄然将临。我已不敢在故乡静静等待节日。那一夜，重庆火车站夜色如磐，连一颗星星都没有。我走了。

火车拥挤不堪。和我同样亡命天涯的一拨中学生在车上和我意外相遇。他们认出我，还有同时发配云南的“学习班”室友“老黄牛”黄顺义和张应田——张是冶金系五年级的毕业生，性格腼腆，一见人就会客客气气地笑。我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揭发他杀过人，并且非常冤枉地和我们一起写这么久的检查——中学生认出我们三人，马上主动上前攀谈了。当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他们不想去“广阔天地炼红心”，而八一五的“亲密战友”五十四军刚刚调防云南，中学生们想前去那儿从军。我们三个大学生，加上这一拨中学生，队伍够热闹了。大家沦落天涯，陌路相遇，夜夜作达旦之谈，丝毫不感觉困倦。

真正的寂寞是从昆明开始的。我和大家作别，继续单独驱车西向，从此各赴东西，为未知的命运奔忙。张应田去了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和我通过几封信就再无音信，后来知道他已死于工伤。黄顺义在昆明仅仅呆了半年便揪回重庆审查。而那一帮中学生——记得我乘坐的班

车从楚雄县车站继续向西出发，我突然看见他们正行色匆匆地步行前来。天还没亮，群山笼罩在寒冷的夜色里。他们跑来车窗下向我喊话，说他们没钱赶车，已经走了一夜啦！接着便消逝在熹微的晨光之中。我和他们的短暂友谊便从此、并且永远地结束了，连一个姓名都没有留下。

那真是漫长的路程啊！从昆明到边疆保山，几十年后的今天仅仅八个小时车程，而那时需要整整四天！横断山重岩叠嶂，陡峭的山路断弦游丝般在崖头飘动。车过风城下关，幽黑的苍山山头还飞着碎雪。越往后道路越加险峻了。山两旁的云团像沉疴不起的巨兽，一群一群地偃卧峡谷中。第三天黄昏住宿在一个叫大栗树的峡谷中。吊脚楼旅店就悬在倾斜的山岩上。从旅舍的窗口仰望，两边山高万仞，非至亭午夜分，不见曦月。第二天沿澜沧江峡谷续行，再翻越重重青山，终于走出山峡，终于看见了一个狭长的、满眼灰黄的坝子。牛车在土路上毫不客气地缓缓行过，辐条四射的木轮像古老的太阳化石，慢悠悠地碾着山里悠长的日子。坐我旁边的当地乘客告诉我说：保山到了。我突然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这块荒远的土地上终有一个属于我的生活驿站。面对陌生边地，我口占了一首七绝：

苍山雪岭脚下踏，
横断山头驱长车。
花街灯市何足恋，
边陲自古男儿家。

我预感到我很快又将同命运进行新的抗争。我将会遭遇更多的悲欢、厄运、成功和失败，还有我无法拒绝也无法知晓的生活故事。记录这些故事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2024年5月再校订

附文 1：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

——评四川时局

《山城战报》、《8·15 战报》编辑部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在中朝边境的延边，发生了一件叛国投敌的反革命暴乱，在呼啸的枪声中，一小撮反革命匪徒在狂吠“金××万岁！”……

在同一个时间里，我国的东海前哨——福建前线司令部被强占了……

在同一个时间里，停泊在我国南大门——广州港的满载援越物资的轮船被抢劫了……

在同一个时间里，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刮起了一股炮打革委会的黑风……

在同一个时间里，歌乐山麓、泸州城下、乌江岸边、锦江河畔，处在一片弥漫的硝烟中……

在这些铁和血的日子里，山城八一五革命派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

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在思索，在考虑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为什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向前的一派大好形势下，革命却出现了这样的曲折和反复？

为什么有人大肆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黑材料，企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为什么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他们所把持的宣传机器，

公开宣扬“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企图动摇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什么有人大肆攻击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革命委员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为什么这些反革命的政治势力，在全国的行动是这样的一致，步调是这样的统一，气焰是这样的嚣张？……

平地一声惊雷，江青同志“九一”讲话，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了！它们像红色的闪电劈开万里妖雾，驱散了七、八月的乌云。原来，在这一连串严重政治事件的后面，有一个“庞然大物”在牵线，这个“庞然大物”网罗了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用极“左”的口号，欺骗了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疯狂地向周总理夺权，向党中央夺权，向毛主席夺权，企图搞垮人民解放军，从而篡党窃国，从极“左”的方面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地位取而代之。这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这个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这个袁世凯式的窃国大盗不是别人，正是窃据中央文革要职的、被他在四川的代理人吹捧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家”的王力！

一、两个基地 几股黑线

王力是怎样来实现他的篡党窃国的反革命复辟大阴谋的呢？他是通过两个基地、几股黑线来进行的。

中央首长九月一日讲话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事实上，这个曾经因为鼓吹“三降一灭”而几乎得到赫鲁晓夫大勋章的、早就和国际修正主义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王力，他所进行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正是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紧密配合下进行的。请看他的两个基地，

拥有丰富的煤、铁、石油资源的我国重要工业基地东北，雄踞白

山黑水，北御苏修，西拒蒙修，东敌朝修，是我国反修的前哨阵地。早在解放初期，高饶反党集团就企图把东北变为独立王国，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庭抗礼。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是祖国大西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三线建设的要地，是援越抗美的桥头堡，是抗御印、缅反动派的前线。长期以来，刘、邓通过对李井泉、任白戈之流把四川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进而实现他们在全国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正因为东北、四川这样重要，王力、关锋这个企图篡党窃国的反革命集团登台以后，就看中了这两块地方，并把它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基地。由关锋插手东北，而王力则赤膊上阵，插手四川。

伸入这两个地方的黑线有三条，

- 一、“五一六”兵团以及某些卖狗皮膏药的“救世主”；
- 二、《××社》、《××日报》、《××杂志》、《×××报》的某些所谓记者；
- 三、王力、关锋之流的代理人。

而王、关反革命集团则坐镇北京指挥，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请看：

一月三十一日，王力在接见他的“好苗子”东北人大红旗司令赵××和自称“王力秘书”的林××(北地东方红干将)之后，×代会东北战斗兵团头头李××就发出“现在长春市没有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现在的组织需要重新分裂，重新大乱”的叫嚣，抛出“革命的大乱好得很”的大毒草；

与此同时，在一月二十三日，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叫嚣：“西南要统统打乱，彻底打乱。”王力的应声虫×司赴渝联格总站的头头张××不甘寂寞，破门而出，狂吠“山城八一五派必须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在“一月革命”的风暴里，二月初，吉林省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长春二总部，一举夺了吉林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在五一六

分子的煽动下，地、工、光、野便退出二总部，成立了长、东二社，公开拉起分裂主义的破旗；

与此同时，二月一日，五一六分子勾结大叛徒罗广斌和砸派坏头头黄廉之流，退出八一五派，敲起了臭名昭著的“联络站”的开张锣鼓。

二月十四日，在东北工大造大大队长以上的勤务员会上，《××日报》的记者公开亮相，支持工大造大，并提出三点意见：一、退出二总部理由不足，还必须详细占有材料；二、打军区必须注意策略；三、应该把观点公开亮出来；

与此同时，在二月十日，早在八二八时期，就大整八一五黑材料，向李井泉献媚取宠的《××社》重庆记者站的某些所谓记者，一反常态，从极右跳到极“左”，操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左左”调，抛出所谓几点“粗浅看法”，亮了一个砸相。

在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大批判、大斗争的关键时刻，关锋居心险恶地叫嚣“吉林省委又要照常上班了”，企图全盘否定东北的“一月革命”；

与此同时，王力在《××日报》社别有用心地胡说：“整个四川都翻过来了”，利用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借题发挥，妄想否定毛主席的好部队——五十四军在四川的“三支”“两军”的显著成绩，为在四川建立他的反革命基地大造舆论。

四月初，北地的“救世主”林××公然在东北宣称：“我们是王力派来的！”

与此同时，窜入重庆的北地东方红《敢把皇帝拉下马》，在渝大肆吹嘘：“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这是什么“中央文革派来的”？说穿了，就是王力派来的。

四月十七日，在关锋的支使下，长、东二社无理查封《长春日报》，在长春第一次挑起大规模的武斗；

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一日，在王力使者北地的几个小丑的煽动下，西师八三一在北碚对八一五战士大打出手，挑起重庆第一次大规模武

斗。

吉林三军一开始就支持了革命左派——二总部，本着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他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了检查，中央认为这个检查是“正确的”，“是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并号召“在吉林应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而关锋却给工大造大打电话，声称什么“部队已经公开承认方向路线错误……你们要高举拥军大旗，对你们有利。”在关锋的煽动和鼓励下，长社一小撮人得寸进尺，高叫要揪“吉林的赵永夫”，并扬言与“黑二保血战到底”；

在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红五条肯定五十四军的“三支”“两军”的显著成绩之后，王力在七月十四日接见重庆两派时说：“这不能怪同志们，不能过多的过重的责怪无产阶级革命派。”“我相信同志们给五十四军提意见还是为了五十四军好，为了部队好。”给正在“揪军内一小撮”的砸派火上加油，于是砸派“揪军内一小撮”急剧升级，臭名昭著的北地东方红黑“警司”还狂妄地向重庆警司宣战，发誓“要把军权夺过来”。

在他们“揪军内一小撮”已经走头无路的时候，他们企图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吉林提出“打军区，拉〇九(指驻吉的××军)，空军是我们的好朋友”；

与此同时。砸派在重庆提出“蓝白靠边站，唐司令员大胆干”，妄图挑拨和分裂驻渝部队的亲密关系。

在东北，长社制定了“红色五月暴动计划”，提出“六月大干，七月夺权，八月结合”，在一小撮坏人的操纵下，六至八月武斗急剧升级，在王、关的走卒东北战斗兵团的煽动下，疯狂地进行断水断电，杀人放火，私设电台，里通外国，而七月底八月初的延边叛国投敌的反革命暴乱实际上正是王、关妄图实行全面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尝试，在这场暴乱中，东北战斗兵团充当了急先锋！

与此同时，重庆砸派一小撮坏头头精心炮制的《人民战争救山城》这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宣言书在王力及其四川的代理人怂恿下出笼了，他们幻想着“奋斗的六月，决战的七月，胜利的八月。美妙的九

月”，疯狂地实行战争升级，强占国防工厂，抢劫银行粮库，用数十万发炮弹把山城投进了战争的火海，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搞反革命暴乱，而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刘张夫妻店在这场暴乱中充当了砸派的黑司令部。

所有这些事实，步调这样一致，时间这样凑巧，计划这样周密，难道不是充分地暴露了王、关之流企图以东北、四川作为反革命复辟的基地的大阴谋吗？难道不可以明显看出王、关之流的几条黑线吗？通过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关之流利用窃据的大权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大搞篡党窃国的狼子野心吗？

事实上，王力、关锋一伙正是通过这两个基地，操纵这几条黑线，向全国其他地方推进、发展反革命势力。设在四川××县的由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刘结挺之流一手控制的，由××八二六、重庆砸派、贵州四一一派拼凑威的所谓“大西南联络站”，实际上就是王力之流用来控制大西南的特务机构。臭名昭著的××八二六，自从“新生”之后，马上就拍净膝盖上的泥土，藏起了在成都大广场上倒挂过的白旗，到全国各地去揪军内一小撮，去反新兴的革命政权，为他的黑主子王力的反党阴谋立下了汗马功劳。王力的倒台，敲响了极“左”派彻底复灭的丧钟，王力的倒台，使得他在四川的代理人手忙脚乱，心惊肉跳。现在他们拼命销毁罪证，急急忙忙从四川各专县收回三十五万多册《王力语录》；他们重新挑起大规模武斗，企图挽回败局，从中捞取半根救命稻草，他们在政治上收买个别像××八二六那样的学生组织为他们充当打手，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用这一系列的反革命措施作垂死的挣扎，维持刘、张新独立王国的统治。

但是，刘、张的新独立王国的统治是保得了的吗？王、关一伙彻底灭亡的命运是救得了的吗？不行！你看，由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把整个中国都燃得通红通红！这一片空前壮丽的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已经把刘、邓的黑司令部，李任死党的皇宫烧得灰飞烟灭，今天，如果谁还

胆敢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谁还胆敢重踏刘邓李任的老路，企图在红色的中国的土地上营造自己的独立王国，那么他也就只能会和刘邓李任一样，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为一片灰烬！王力、关锋之流的下场是这样。

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刘、张之流的下场也只能是这样。

二、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上台后干了些什么？

在七、八月的反复中，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自称“最拥沪省革筹”的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刘结挺的走狗的××八二六一小撮人，竟在全国到处卖破烂，在上海支持上柴联司大反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市革委会；在山东支持山大“翻案兵”大反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省革委会；在贵州支持四一一极“左”派大反以李再含同志为首的省革委会；在黑龙江支持哈市山下派大反省革委会；在重庆伙同砸派大反以蓝、白、唐为首的市革筹……

他们的黑掌柜王力之流在全国也正是支持这些“冲派”、“砸派”、“炮轰派”、“山下派”、“翻案兵”、“麻子兵”，而独自在四川却支持××八二六大捧他在四川的代理人刘结挺，并在他的四川之行中，肉麻地吹捧刘结挺“是坚贞不屈的马列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刘、张就是革命派”，

“我们支持他是因为他代表一条正确的路线”，其肉麻完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难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都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难道王效禹、李再含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难道蓝亦农、白斌、唐兴盛也都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难道偌大一个中国就恰恰只有他在四川的代理人“是坚贞不屈的马列主义者”、“整个生命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不，事实恰恰相反，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和他一样，完完全全是一个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完完全全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上台以后一系列事

实也说明，这个小丑完完全全是王力安插在四川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刘结挺上台之后，按王力的旨意，完成了政治、军事、组织上的一系列周密的反革命部署，以便取西南的土皇帝李井泉的地位而代之，把四川搞成刘家的天下，把四川变为王力篡党窃国的反革命基地。

一、在政治上，毛主席说：“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为了配合其主子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从舆论上拼命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四川七千万人民心目中建立起的绝对权威，与此同时，却大树特树王力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绝对权威。

就是他，狗胆包天，竟然停下印刷《毛主席语录》的机器，大量印刷又臭又长的《王力语录》，并把它作为必读文件，盗用省革筹的名义发行全川，要大家“挤出时间，加紧学习，改造思想，转变感情”。试问：你们要改造什么恩想？你们要转变什么感情？说穿了，就是要把四川七千万人民、广大革命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指战员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转变为对王力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的无限迷信。

就是他，利用他的狗腿子田禾独揽了《四川日报》的大权，把党报，变成八二六的派报，变成王力、刘结挺的喉舌，仅从九月九日川报被刘张接管之后的短短两个月中，刘结挺被吹捧和报导的次数竟和川报十几年来吹捧李井泉的次数不相上下，通过这一例便可以看出，新老土皇帝，何其相似乃尔。

就是他，曾经抱着西南土皇帝李井泉的大腿痛哭流涕地祈祷，我“辜负了党和李政委十多年的教导利期望”，并信誓旦旦地说要“老老实实地”作一个农民，决不进行不利于党的活动，甚至还奴颜媚骨地“衷心祝贺李政委身体健康。”曾几何时，四年后的今天，他把这篇白书揣在裤包里，厚颜无耻地自我吹嘘“我们没有一点私心杂念，

如果有一点私心杂念，就不敢和李井泉斗争了”，恬不知耻要在他给李井泉写自白书的地方，劳师动众，大兴土木，动用三万六千元巨款，大修刘张纪念馆，为自己大立其婊子牌坊。

就是他，收罗一些御用文人著书立传，编演了《金沙激浪》、《敢把皇帝拉下马》、《人间正道是沧桑》、《敢教日月换新天》等臭气熏天的丑戏，为自己歌功颂德，尤为反动的是，这些御用文人们为了讨得黑主子半根孬萝卜的赏赐，竟狗胆包天，把刘张和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相比，称这两口子是什么“宜宾红日”，还咿咿呀呀地胡唱什么“打倒李井泉，全靠刘结挺”，真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张西挺还嫌不够，赤膊上阵，亲自伪造日记，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欺骗四川人民。

二、在组织上，刘结挺吸取刘邓反党集团和李任死党搞独立王国的反革命经验，自粉墨登台之后，就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拉拢亲信。排除异己，拼凑一个反革命阴谋的小集团。

在干部路线上，刘结挺培植心腹，安插党羽，把他们的一些喽罗爪牙统统安插在四川的各个要害部门。在省筹办和宜宾地革筹中，有李井泉的忠实走狗、三反分子、民愤极大的恶棍何允夫，有三青团员兼国民党员的双料蒋介石的走卒，现窃踞川报和川台重要职务的田禾，有大吹特捧邓小平、包庇邓小平兄弟邓自力、江安县走资派的郭一民，还有什么妻室亲朋也分侯封爵，飞黄腾达起来。为了壮大声势，刘结挺还招降纳叛，把走资派、叛徒、蜕化变质分子等统统收罗在自己的卵翼之下，拼凑所谓“红囚徒”这样的反动组织为自己充当打手。尤其发人深省的是，西南土皇帝李井泉的几乎全部秘书：杨人健、刘国真、朱学伟(原系袁世凯的秘书)、张西原(原邓锡侯的秘书)、和平(原阎秀峰的秘书)等等，也统统被刘结挺拉入伪筹办，为刘张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出谋划策。为了将李井泉的独立王国招牌换记，取而代之，刘结挺真是连一块遮羞布也顾不上要了。企图把全四川搞成刘家的天下。刘结挺和古今中外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样，惯用党同伐异的伎俩，对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无情打击，残酷迫害，软硬兼施，

文武并用，无所不用其极。在刘、张两口子的手下多少革命干部竟然不明不白地死去，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今年二月，由于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使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走向了“镇反运动”的歧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红十条”迅速纠正了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的错误，使四川广大革命造反派得到新生，这是毛主席对四川革命造反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的最大关怀，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四川的伟大胜利，可是，刘结挺这个政治大骗子，却趁此机会，唆使他的黑打手××八二六，用“全盘否定二月镇反”这个口号到全川招摇撞骗，企图贪天之功，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四川的胜利记在刘结挺的功劳账上，把新生的革命造反派对救星毛主席的无限深情转变为对刘结挺的感恩，企图在四川人民的心目中，把刘张两挺棒上普渡众生、大慈大悲的观世音的莲台宝座，从而为刘张在四川建立独立王国奠定群众基础。

王力有这样一个混蛋逻辑：“支持刘张就是革命派”，刘结挺正是按着这一旨意办事的，对敢于和他们进行斗争的红成、八一五等革命造反派就打击、追害、镇压，伪造中央文件进而诉诸武力进行围剿，妄图把革命造反派置之死地而后快。不是吗，泸州城下狼烟滚滚？不是吗，涪陵江边血肉横飞？刘张一伙，调集二十五个县市的兵力，凑成十九个半连的武装人员，纠集诸如《猛虎团》之类的牛鬼蛇神，使用了最现代化的武器，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克涪陵，西征泸州，睡在黄粱亭上，梦想一举拿下南充，再挥戈直捣重庆，然后荡平全川，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剿匪运动”，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无数铁的事实证明，刘、张夫妇自登台以后，搞的是“任人唯亲”的政策，岂止是拉一派、打一派而已，简直是拉一派、杀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刘、张夫妻店完全是全川武斗的总后台，完全是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完全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

三、军事上，配合着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革命部署，刘、张在军队内大搞破坏和分裂活动。他们挑拨部队之间的关系，他们热衷于

在武装部内制造派别，制造军队之间的对立情绪，使他们团结涣散、意见分歧，严重破坏“三支两军”的工作；他们片面支持空字〇二八部队，排斥成字六〇一部队，他们把群众组织中的派性灌输到军队中来，他们把全省各专县的武装部干部弄到成都去整训，大学王力语录，大学八二六斗争史，声称是“改造思想。转变感情”，实则是八二六化军队。企图把毛主席的支左工作变成刘家的支派活动。对这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动坚决抵制的军队干部，他们则实行威胁、恐吓、打击、斗争。南充军分区十二县市武装部长因抵制刘氏支派活动而被揪斗二十五次之多。宜宾专区武装部的部分干部因不同意刘氏武装一派屠杀一派而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战斗在三支两军工作第一线的重庆军分区因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威胁和打击。为了在全川尽快剿灭非“八二六”的“匪徒”，刘结挺一手制定了“武装内部，准备两手”的反革命的八字方针，指使某些县市的武装部把枪支发给八二六和砸派，上搞人民军队，下杀革命群众，企图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他的顶子，用头颅营造他的王宫，用屠刀支撑他的宝座。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说得好：“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武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垮台就越彻底。”这一段话，不就是对刘、张的维妙维肖的写照吗？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刘结挺上台半年以来的精彩表演和他的反革命主观愿望相反，非但没有把四川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非但没有能够动摇我们伟大的长城，非但没有使他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如愿以偿，反而把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暴露无遗。最后，他必将葬身于伟大的群众运动汪洋大海之中，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三、五十四军是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

一九六七年的五月五日，春天的山城处在大决战的激战前夜……

“叮”……

在五十四军军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的机要室里，电话铃声响了。一位正在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部队首长打来特急长途电话……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五一六分子、八二六和砸派一小撮坏头头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造谣中伤五十四军和山城八一五派，由于王力一手遮天，一个全盘否定五十四军“三支”、“两军”的显著成绩和山城八一五派的《十三条》将盗用中央名义发往全国。此时，这位部队首长从北京打回电话，语重心长地叫五十四军的同志们要作好思想准备转向。

这天夜里，警司×号会议室灯火通明，七个驻渝部队的首长根据这个电话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议一直延续了两天两夜。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五十四军支左没有错！五十四军支持的是革命左派！经过郑重考虑决定，五十四军以军部名义向最高统帅毛主席发出了建军以来的第二封“通天电报”，红色的电波带着五十四军全体指战员和山城八一五革命战士的深情厚谊，飞向北京的金山上，飞向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最高司令部……

五月八日，毛主席根据五十四军的汇报情况，指示，重庆问题专案解决。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下达了。《红五条》指出：五十四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王、关之流企图搞垮五十四军的罪恶计划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早在今年二月二十三日，王力伸向山城的黑手——×司驻渝联络站就在一次黑会上对五十四军发出叫嚣：“挑起部队打内战，让他们狗咬狗！”

早在今年四月七日，王力在重庆培植的极“左”势力西师八三一的“先驱”就发疯似地嚎叫：“勒令警司三天交出军权”。

早在今年四月十八日，反动组织五一六分子——北地东方红《敢

把皇帝拉下马》也在山城狂吠：“揪出警司中一小撮镇压群众的刽子手。”……

王力为什么这样仇恨五十四军？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把五十四军置于死地？

因为五十四军是毛主席在井冈山亲自缔造的英雄部队；因为五十四军跟着最高统帅毛主席，踏过了二万五千里的革命征程；因为五十四军在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在西藏平叛、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等一系列战役里，为党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王力仇恨五十四军，还因为五十四军从五八年入川以来，屹立蜀水巴山，与李任死党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粉碎了李任死党妄图把四川变为独立王国，变为刘邓反革命复辟基地的大阴谋。正因为如此，多年以来，英雄的五十四军，就像毛主席手中的一柄倚天长剑，斩断了刘邓伸向大西南的黑手！

英雄的五十四军巍然屹立四川，这是四川人民的幸福！

英雄的五十四军巍然屹立四川，这是一切国内外反动派妄图把四川作为中国反革命复辟基地的最大障碍！

英雄的五十四军巍然屹立四川，这是毛主席最天才的预见！最英明的决策！最伟大的部署！

正因为这样，王力这个窃国大盗，为了实现他篡党窃国的阴谋，也就必然地和刘邓李任一样，把英雄的五十四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他一跳上台，也就千方百计地企图把五十四军搞垮。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窃国大盗王力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家伙。红五条宣判了王力企图搞垮五十四军的阴谋破产，但是他并不甘心失败，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他又和他的几个喽罗爪牙向五十四军展开了新的攻势。

一、继续盗用中央名义向五十四军进行威胁，要他们左转向，八月初，王力利用七二〇事件中贪天之功捞取的一笔政治资本，企图在全国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黑风，就在这时，他得意忘形，公然对抗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红五条”，背着中央向五十四军

施加高压：“五十四军的支左感情必须转过来，支持反到底派（即杂砸派）。”

二、配合他在全国刮起的“揪军内一小撮”反革命黑风，王力通过刘结挺，五一六兵团等几支黑手，继续在山城煽动砸派大揪“五十四军一小撮”。

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山城砸派，是靠“揪军内一小撮”起家的大杂烩，是极左思潮在山城的代表。在红五条下达之后，他们由于政治资本输得精光，已经风雨飘摇，面临着彻底崩溃的边缘，就在这时，刘结挺跳出马门，给这个大杂烩授了一连串的锦囊妙计。

刘结挺六月二十三日，在接见砸派时说：“不要在报刊上写打倒白斌、蓝亦农，这样不策略”。

七月初，刘结挺在对砸派的一次训话中又说：“我们支不支持你们，你们是明白的，大家心照不宣，但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讲策略”。

八月初，刘结挺对清华井冈山赴泸学生说：“五十四军是罪魁祸首，五十四军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寥寥几例，刘结挺企图搞垮五十四军的反动嘴脸不是已经统统暴露无遗了吗？

刘的“亲密战友”张西挺在一次会上竟然还大耍其政治破鞋的手腕，对砸派公开造谣说什么“警司一小撮肯定是有，白斌就不姓白，而姓杨，叫杨白斌，是杨尚昆的弟弟。”在刘、张之流的煽动下，山城砸派“揪五十四军一小撮”的反动气焰在红五条下达之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升级，从狂吠“绞死匪首白×、蓝××”一直到枪杀解放军指战员，到武装攻占市革筹组，反动气焰何其嚣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张黑主子王力在七月十四日亲临重庆登台表演，用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给砸派火上加油，竟然关怀备至地把这个极“左”派、保守派、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大杂烩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什么砸派企图搞垮五十四军的反革命行动是“为了五十四军好”、要革命派同志不要“过多的，过重的”责怪他们。

主子既至，奴才当然也不甘落后，七月二十五日，刘结挺也学着

王力的腔调，说砸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难怪山城砸派不打自招地在报纸上供认：“王力同志对我反到底革命派作了十分亲切的指示，特别是对我们如何掌握政策，掌握策略方面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对我反到底革命派更加指示了前进的方向。”

王力给他的走狗指示了什么“方向”？砸派一小撮坏头头用他们的累累罪行和血淋淋的屠刀给我们作了最好的回答：

这就是，继续揪五十四军“一小撮”，用最新式的武器枪伤枪杀了数以千计的解放军指战员，其中包括师级干部两名，击沉解放军快艇一艘，被抢劫的军用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这就是，把重庆市的文化大革命搞成武化大革命，变成了最现代化的战争，砸派的数以万计的炮弹，把山城的高楼大厦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

三、王力除了通过刘结挺和五一六分子在山城砸派一小撮坏头头胡作非为之外，还直接通过当时被他操纵的××社和××日报从舆论上不断地对英雄的五十四军施加压力。

今年七月以来，××社和××日报对于在四川支左的部队进行了多次的报导，而这些报导中却偏偏没有毛主席曾经在今年八次表扬过的五十四军！七二〇反革命事件发生之后，英雄的五十四军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为什么××社、××日报仍旧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呢？（最后，五十四军以军部的名义向中央发了报告，××社方才对此事作了简单的报导）。

而与此同时被刘结挺称为支左模范的“××武装部”却得到王力的青睐，被××社不厌其烦地大肆吹捧。知道内情的人，这面红旗，竟然是武装屠杀泸州革命群众的急先锋（在武装围剿中，这面红旗还丢了三条轻于鸿毛的打手性命）这面红旗竟然在他们所控制的党报“红××报”上赤膊上阵，公开叫嚣什么“蓝白一小撮步陈再道后尘”决没有好下场的小丑。这是什么红旗？明明是一面大书“刘”字的杏黄旗！

四、在前面的一系列阴谋都没有得逞的时候，王力和他的刘奴才

结挺川驴技穷，使出了最后的看家本领，妄图把五十四军赶出四川。七二〇事件发生之后，王力窜回北京大捞政治资本，得意忘形之际，竟图谋不轨，企图强行调走五十四军，在遭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决反对之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利用他的小保宝××八二六和砸派一小撮环头头在川内大造舆论，声称什么“三十八军十一军入川支左”云云，混淆视听，煽惑人心。

对于王力、刘结挺之流的这一系列软的和硬的反革命围剿，对于这一切来自右的和极“左”的反动政治势力，英雄的五十四军给予了有力的抵制和坚决的回击，如果说，在今年二、三月份，五十四军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话，那末，在红五条下达以后半年多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英雄的五十四军完全顶住了王、刘一伙企图搞垮伟大长城，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变为剿匪运动的反革命阴谋！英雄的五十四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中，为四川人民，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新的不朽的功勋！五十四军不愧为毛主席的好部队，不愧为人民的优秀子弟兵，不愧为四川人民的骄傲！

正因为如此，当四川广大革命群众识透了王力、刘结挺妄图搞垮五十四军，把四川变成复辟资本主义基地的反革命阴谋之后，也就自然而且必然地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五十四军更加热爱，更加信赖，更加拥护！

也正因为如此，英雄的五十四军也就自然而且必然地在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越来越发挥出的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衷心祝愿毛主席的好部队五十四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向英雄的五十四军致以八一五战士最崇高的战斗敬礼！

四、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

红旗，在蓝天里飘扬。

战歌，在山野里回荡。

十一月的山城，高高的红岩屹立在初冬的大气里，经过一场又一场严峻斗争的洗礼，她变得更加鲜红，更加灿烂。

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毛主席还指出：“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乱了哪些敌人？

乱了王力、关锋、林杰之流，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曾几何时，这一小撮历史上的小丑，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他们操纵全国的极左派，企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下，他们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王力的垮台，使全国的极左势力的阵线开始全线崩溃！

乱了五一六这样的反革命组织。曾几何时，他们打着“中央派来”的金字招牌，钦差大臣满天飞，把黑手伸向全国的各个地方，纠集各个角落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帝修反特务，极左分子，结成反革命神圣同盟，大整敬爱的总理和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在全国到处揪赵永夫、陈再道，妄图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妄图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曾几何时，他们跑江湖，卖膏药，发声明，到处招摇撞骗，唯我独左，妄图把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为“新老保”“右倾”

“上中农”等等，曾几何时，他们一面抱着大毒草《红岩》的炮制者，大叛徒罗广斌的大腿，一面又在全国兜售破烂，把山城八一五革命派打成“叛卖集团”。可是，在无情的历史面前，这些响当当的“救世男女”终究和他们的黑主子王、关一伙，被革命的人民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乱了刘结挺、张西挺之流的小丑。曾几何时、他们学着赫光头的模样，厚着脸皮到处发臭演讲，卖假日记，当婊子，立牌坊，跃跃乎忙得不可开交；曾几何时，他们和砸派的一小撮坏头头眉来眼去，“心照不宣”，大揪五十四军一小撮；曾几何时，他们拉一派杀一派，对四川的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武装镇压，把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变为剿匪运动，可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群众运动面前，他们的反革命嘴脸，终于统统暴露无遗！

乱了八二六和重庆砸派中的一小撮坏头头。曾几何时，他们肉麻地吹捧他们“最信任的”黑主子王力“是我们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家”；曾几何时，他们用高八度的音调为和他们“心照不宣”的“海军第一政委”“好干部”刘张一伙大唱赞美歌：“刘、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紧跟刘、张奋勇前进”；曾几何时，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把无数的援越物资变成屠杀革命群众的屠刀。树倒猢狲散，今天，王力的倒台，刘张的“亮相”，已经使他们风雨飘摇，全线崩溃。

周总理九月二十六日指出：“砸派是一种社会思潮，他要表演一番。青年人好动，搞打、砸、抢，今后他们大多数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你们也要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这是个过程，不付予一点代价是不行的”，总理的这一席话，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山城砸派作出了历史判决，他们的末日就要来到了！就在反革命的阵线乱得分崩离析，濒于彻底瓦解的时候，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调查组，来到了山城，他们经过三个多月周密调查，指出，五十四军向中央反映的情祝是完全属实的，中央调查组最公正的结论，使“挺记”伪筹办所苦心经营的搞五十四军的黑材料在铁的事实面前，统统变成了白纸黑字不容抵赖的反革命的罪证！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梁司令员从毛主席身边来到了凯歌入云的山城，带来毛主席党中央对英雄的五十四军，山城八一五革命派和山城四百万人民的最亲切的关怀和最巨大的鼓舞。梁司令员来渝后的鲜明态度，已经使那些装腔作势地高呼“张梁刘张好干部”的砸派歌

手们哑巴吃黄连，只好悄悄地带上黑材料，到北京告梁司令员的状去了，那些以省革筹“当然卫士”自居的癞蛤蟆们这几天也默不作声，只好偷偷地躲进阴沟里咀咒几声：“梁兴初拉一派打一派绝没有好下场。”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巴山蜀水，从四川的各个专县来到英惟的山城向中央调查组和梁司令员，向五十四军汇报情况，和山城八一五革命派交流革命经验，他们“字字血、语语泪”的控诉，像一排排怒吼的炮弹，把刘、张两挺刚刚奠基的独立王国的黑宫殿震得风雨飘摇！

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胜利的日子来到了！

但是，历史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刘结挺、张西挺一伙，在他们的黑主子王、关倒台之后，在他们自己即将彻底覆灭的前夜，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又开始策划着一场新的反扑了。

挺记川报双十一的黑社论打着红旗反红旗，破门而出，为刘、张的反革命大反扑打响了第一炮！

刘、张两挺感到末日的到来，于是以攻为守，大骂五十四军派往省革筹的干部是袁世凯张国焘二世，妄图挽回败局。在刘、张的一手策划下山城砸派又蚁聚蓉城，秣马励兵企图重演“八月战争”；

南充的“指挥棒”又将兵卒屯集南充专区唯一的砸派据点岳池，准备配合合川砸派，攻占华蓥山；

省筹办的一位刘张信徒对着红成的群众发出绝命的嚎叫：“就是刘结挺该杀头，也要你们的头先落地！”重庆砸派中的一小撮也跪在王力的十字架前立下山盟海誓：“刘张坐牢我坐牢，刘张砍头我砍头”……

反扑的阴云，已经随着猛烈的山风，在四川晴朗的蓝天里游荡，暴风雨就要来了！

革命，这是无产阶级的节日。对于刘、张的大反扑，我们面无惧

色，含笑相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七月的围剿，八月的战争，我们都统统顶住了，刘张临死前的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又何足惧哉！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对于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其结果只会加速自己的失败和灭亡，刘张两口子也无法逃脱这历史的辩证法！

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样的思潮，总是要登台表演一番，各人要走什么道路，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选择，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历史必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前进，必将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

让王力企图把四川作为篡党窃国的反革命基地的阴谋见鬼去吧！

让刘张两挺企图把四川变为刘氏独立王国的黄粱美梦见鬼去吧！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全川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王力，打倒刘张，让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永远照耀着巴山蜀水！

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胜！毛泽东思想必胜！

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革命的暴风雨，迎接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吧！

新四川是我们的！

附文 2：郑思群之死和重庆的八一五运动

周孜仁

郑思群，广东潮汕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中共，曾任著名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秘书，抗战期间在延安任“抗大”某分校教务长，解放后则一直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行政七级干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郑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重庆市委正式点名批判，市委工作组对其进行了多次内部批判围攻之后，于七月十九日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时值山城酷暑，路地焦烫灼人，据目睹现场的同学说，老头乱发覆额，形容憔悴，被人押解赤足而行。十天后，即七月三十日，工作组公布郑的“十大罪状”并正式划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再三天后，即八月二日凌晨五时，郑在监护地用半片剃须刀割喉自尽，颈动脉血喷如注，将白墙壁涂染得鲜红狼藉。事发，工作组匆匆清洗现场，殓尸火化；再次日，即八月三日，重庆市委宣布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将其开除党籍。是日晚，工作组紧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市委副书记鲁大东亲自到场宣布该决定并强令师生批判之。

第二日，校园内就出现了大字报，质疑市委并公然为郑思群鸣不平。嚣声既起，重大校园里压抑既久的愤懑之情便如火之燎原、水之决堤，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

又十一天，即八月十五日，重庆大学便爆发了轰动全川的“八一五事件”，并由此而在云诡波谲的四川文革舞台演绎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闹剧。

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夏天是令人激动又让人心悸的。数不清的“红卫兵”、“造反派”因为反对校领导、因为打倒老师和“学术权威”而在全国各个角落呼嚣而出。而为一个冤死的大学校长鸣不平并起而造反，重庆大学的“八一五行动”，是一个特例。

笔者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以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记下来。

郑思群之死是八一五事件的导火线

文革初期，重庆市委及西南局要将郑思群无端揪出来批判打倒，这件事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对政治游戏的秘诀已稔熟于心的国人来说，应该说是再平常也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文革肇起，其势汹汹，要打倒这样横扫那样，西南局和重庆市委不主动揪出一两个“黑帮”批判打倒，何以交差？再说，据知情人事后介绍，郑思群孤高自傲，很不合群，且又在无碍政局的教育部门为官，抛出他来确属轻而易举。郑自然成了政治牺牲品的最佳人选。

遗憾的是，一九六六年重庆大学的热血青年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对共产党崇拜备至，对共产党的干部崇拜备至：尤其郑思群。郑不苟言笑，身材瘦而高，爬满额头的皱纹记录着令年轻人羡慕不已的光荣历史，活脱脱就是一个典型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问题又偏偏在于，这位身居高位的老人对年轻娃娃平易得异乎寻常，从不摆架子，不骂人，嘘寒问暖，和老父亲一样和蔼可亲。上课时，同学们常常会看见他悄悄坐在后排听讲，有时还掏出手绢擦拭玻璃窗上的灰尘。到食堂巡视，他甚至当着学生的面，把掉在桶边的饭粒儿从地上捡起来吃掉。电机系六七级有位同学叫郑志胜，家穷，没钱买鞋，就赤脚去上课，正好遇上校长了：是在五教学楼的阶梯上。校长问他为何不穿鞋？问他在哪个系？哪个班？第二天便发生了奇迹：一位十分和蔼的陌生人悄然来到郑志胜的寝室，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他很快知道了：这位陌生的送鞋人，正是校长秘书。文革中，郑志胜因多起血案牵连而被监禁十余年，出狱后两鬓斑白，万念俱灰。我曾问他：当年，你何以要如此铁心死保郑思群？如此狠心毒打市委工作组长余跃泽？并最后参加八一五造反？他眼神木纳，沉思良久，极其认真地回答：“就为了那一双鞋呀！”

郑思群在少不更事的娃娃心目中既然创造了如此形象，他的冤枉和屈死对大学生的神经中枢将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刺激和反应，就不足为怪了。

从六一七到六一九

重庆大学的文革和全国同步。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为发端，全校“停课闹革命”，半月多混乱愈演愈烈。六月十七日这天黄昏，正当学生们在校园热热闹闹张贴大字报，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和与之对应的本校意识形态主管：校党委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学生三宿舍门前突然出现了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该大字报在提出几个捕风捉影的疑问之后断然宣布：《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文章既出，很快便被惊诧万分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余国华，趁机跳上三舍前一棵榕树的石台上大发演讲，重复大字报上那几条的捕风捉影的疑问，反复号召大家对“郑思群黑帮”，要“狠狠地打！狠狠地打！”余，四川遂宁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四川乐山大渡河钢厂，后官至该市市长、四川省经委主任。据和他共过事的同学说，几十年宦生涯，权力所及，他对校友们很够义气的：包括文革当年反对过他的同学。他说话舌头有点大，口齿不清，“打”字总被他说成“假”。笔者挤在外围，只听见他不停地喊叫：

“狠狠地假！狠狠地假！狠狠地假！”

这份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虽然纯系空穴来风，但事情发生在全校学生均处于群体无意识的背景下，其煽动效果却是很可观的。那一夜，整个学校被搅翻了天。有人认为，既然校长都是黑帮，整个学校岂不已危若垒卵？于是一群一党地冲去校武装部，要夺取枪支保卫学校；动力系食堂门前，学生们扛出饭桌搭成高台——笔者去时，正见该系六七届一位周姓学生站在台上痛心疾首地发表演讲，他反复号召：“同学们哪！大家快回到自己的系班去呀！你们看这么乱糟糟的！怎么搞

文化革命呀！”那动作和口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抗日时期北平的救亡青年。机械系二年级七个学生还连夜徒步进城，要求市委书记任白戈接见。

那天晚上，重庆大学真正的舆论热点是余国华所在学生五宿舍。几乎各系各班都有学生涌去他房间要求公布“郑思群黑帮”的确切材料。人太多，以致该宿舍的学生不得不派人举着棍棒把守大门，问明来人身份和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党员或者团员）方可放行。

文革开始以来，这个第一次把校园搅得如此热闹的事件，叫做“六一七事件”。

“六一七事件”很快就露出了许多破绽，余国华当晚即被前来走访的同学追问得无以对答，只能无可奈何地搪塞道，说四十八小时之内，保证向大家公布郑“黑帮”的“钢鞭材料”。其次，有人发现，大字报的五个作者，全是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的干部，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这篇大字报的出现，是不是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金蝉脱壳”？为了保自己而让余国华等人写出该大字报以将祸水他引？

最先提出疑问的恰恰是余国华的中学同学、后来八一五风潮的主要发起人吴庆举。吴也是遂宁人，机械系四年级学生、时任校文工团乐队队长。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非常重视文体工作，故而让各系各班的文工团员和体育队员全部集中居住。正常年月，校内学生彼此之间交流很少的，而文工团员和体育队员的集中居住从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可能：将全校的信息在这儿迅速集中并加以发散——重庆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多出在文工团和体育队，就顺理成章了。六月十七日晚，吴庆举到冶金系宿舍质询余国华归来已是深夜。他满面潮红敲开我的门——当时我在美术队任队长，与吴隔壁而居——吴告我说大字报肯定是个大阴谋。他说等到四十八小时拿不出东西，我们必须起而揭露之。他的分析让我佩服无疑，夤夜便起草了一则大字报稿，题目是：《千万，千万，千万警惕更大的阴谋》。

对于吴庆举和我，六月十八日是非常漫长的一天。我们跃跃欲试，急于向全校同学公布我们的新发现，可我们又必须等待四十八小时的

到来。更要命的是：余国华的大字报事实上已经把大学生们革命的歇斯底里触发起来，晕眩而激动的年轻人整日价惶惶串联，整个学校躁动不安。月初，市委曾派有一象征性的工作组进校“协助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六月十八日当天中午，为稳定局势，市委急急忙忙宣布直接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此举顿时让舆论大哗。是日晚，无线电系学生在一教学楼前自发集会，宣布校党委和工作组一样：通通都是黑帮，必须通通打倒、赶走，由学生自己闹革命。大会派人去邮局及当地驻军联系向北京发电，请求中央直接派工作组来校，均遭发电人拒绝，于是数千人在校内连夜示威游行，汹涌澎湃几至天明乃止。

那一晚，我、吴以及文工团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学生也通宵未眠。我们看见无线电系的同学在宿舍外喧嚣而过，心情极其复杂紧张。余国华承诺的四十八小时早已过去，他的“钢鞭材料”显然是子虚无有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目前气氛下贴出大字报为郑开脱，显然是逆流而动，很可能将立即遭到全校同学的反对甚至围攻。年轻人的偏执和自尊使我和吴别无选择。我们只求有更多人和我们共御风险，携手同行。游行队伍在校园里汹涌澎湃，我们却秘密地拿着那份“警惕更大阴谋”的大字报征集签名，开始只在文工团内部秘密进行，接下来，后来在四川理工大学担任教授的美术队队员代玉松自告奋勇，主动回到他所在的电机系宿舍挨户敲门，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宣传观点，寻找同志。代，四川成都人，忠厚本份，口齿木讷，但那一晚他竟然很快为我们征集到几十个同盟者，使人对他刮目相看，也使我们信心大增。天将破晓，我们壮着胆将大字报贴上一块木板，然后横架于九舍和二、三舍之间的路的正中：这是学生们吃早餐必经之地。我们躲在房内窥视动静。

不久曙色放明，打早餐的同学果然很快聚集在木板前叽叽咋咋，不少人还当场取出钢笔批注：“坚决支持你们的观点！”“我们受骗了！”

“找余国华算账去！”我们于是终以胜利者的身份从宿舍里走出来，在大字报前得意洋洋公开了自己的观点。

整个学校局面又转向了。被嘲弄了的同学再次纷纷走访余国华——冶金系那一间斗室再次成了整个大学的新闻热点——余国华却逃遁了。若干年后，吴庆举告诉我，余是他帮助藏匿的，地点是废弃的校办钢厂的楼上。余的室友无法招架纷至沓来的质询者，睡觉时候也不得不在自己的身上盖一张纸，上书：我不是余国华，请不要叫醒我！

既然大家已经认同倒郑事件是宣传部和校团委合谋的一桩诡计，水落石出，顺理成章的结果当然是大家重新回过头来，继续对邓时泽和刘稚民进行“革命大批判”。当时，我刚好以优异成绩作完毕业设计，心中曾经窃想：这下好了，等到邓、刘倒台，重大的文革就该胜利结束，我们也就该桃飞李散，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岗位去报效祖国了。

我根本不知道，动乱才刚刚开始呢。

市委想借刀杀人 没想到反而引火烧了自身

“六一七”和“六一八”的同学上访，使重庆市委得到一个错误信息，他们显然认为此时对郑动手，该是水到渠成了。六月二十一日，

《重庆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重庆市委关于让郑思群停职检查并派工作组进驻重大的决定。二十二日，以副市长余跃泽为首的高规格工作组开赴重大。余在全校大会上踌躇满志地发表演说，声称这次他到重大，就是来支持革命师生，来揪“郑思群黑帮”摸“郑老虎”屁股的。余跃泽在市里分管财贸商业，工作干劲和敬业精神很有口碑，市委安排的事情他从来干一件成一件。余营养良好，胖，说起话来中气极足，一付志在必得的神情。他根本没想到，风景秀丽的重庆大学，恰恰成了他、还有重庆市委的“滑铁卢”。

余的姿态把学生们再次搞懵了。不是才弄明白所谓“郑思群黑帮”是某些人的阴谋吗？为什么工作组偏偏跟着起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市委工作组下车伊始，什么情况都没有调查，为什么就匆匆忙忙宣布郑思群是“黑帮”，这中间莫非又有什么阴谋？于是，质问《重庆日报》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再次蜂拥而至。在报纸上表态拥护市委决定的“左派”学生（这些学生后来一直成了工作组倒郑的中坚分子）受到普遍奚落。工作组驻地成了同学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办公室主任孟凡均显然是个精明能干之辈，但每天面对满屋子能言善辩、把毛泽东语录背得滚瓜烂熟的大学生，他除了用一些历史暗示对无知的年轻人进行威胁恫吓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工科学生在工作组大门口贴了一幅对联非常有名：

曲率半径处处相等
摩擦系数点点为零
横批：又圆又滑

工作组一再要求学生们把斗争矛头对准校、系两级领导，而到目前为止，学生们的矛头偏偏对准了市委及其工作组本身了。工作组员都是些“老江湖”，他们有理由相信文革不过是过去某次政治运动的翻版而已，面前这些个跳得很高的糊涂虫，很快就会明白什么叫“阳谋”、什么叫“引蛇出洞”、什么叫“后法制人”，到时候他们哭还哭不过来呢。按照一贯的经典做法，他们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七月四日，余组长召开全校团干部及“左派”学生的秘密大会，再次重申必须集中火力对准校系两级干部，同时大义凛然地宣布：重庆市委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书记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经过考验的好班长！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演讲说到激昂处，他拍案而起，险些把茶杯震翻在地。

余当时肯定确信他的恫吓足以大收奇效。不料北京偏偏马上和他开了个玩笑：秘密会议第二天，即七月六日，全国各地党报同时转载《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机会主义的口号》。文章在两条注释中定义：任白戈是“大黑帮”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毫无疑问，这篇文章对感觉良好的重庆市委不啻是当头棒喝，同时也是对“一小撮右派学生”的极大鼓舞。反郑和反市委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再度出现新的平衡。要想速战速决，把大学生们发动起来大张旗鼓

“批郑”显然已经不再可能。工作组只好退而求其次，一边继续依靠左派学生向右派学生施压，一边组织最可靠的精兵强将对郑思群实施闭门批斗，轮番围攻。以后的事实披露，这篇文章下来不久，和任白戈关系极铁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即将其以“海外侨胞”的身份隐匿乡下去了——这是另一个故事。

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老于世故的市委领导和年幼无知的学生娃娃一样，都是一群白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了一番长江之后回到北京，次日，七月十九日便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说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接下来，毛精力充沛地听汇报、发指示，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造反，甚至直接写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面对咄咄逼人的政治形势，刘少奇只有节节败退一法。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毛指示：撤消工作组。刘少奇灰溜溜地在会上承认错误，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革命怎么革？我老老实实回答你们，我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山雨欲来，重庆市委应该有感觉了，他们显然想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工作组打一个完美的句号，然后体体面面打道回府。对郑的迫害开始提速。工作组调兵遣将，新增队员二百余，确保每个班均有人严守死守，督师批郑，他们放出风声：“谁还对郑思群抱有幻想，谁就是立场问题！”。其时，郑已被押赴松林坡顶原苏联专家招待所看管，日日由左派学生批斗，行前全身被搜，赤足而行，仅容带《毛选》一册。郑恰恰将半片剃须刀夹带其间，上山了。

二十八日，工作组正式公布《关于郑思群同志的材料（初稿）》的审查材料，发全校革命师生批判。该材料采用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手段为郑罗致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十大罪状”。五十年代来校任教的苏联教授离渝返国，学校按礼赠送校园风景照一册，亦被认定为“里通外国”间谍铁证，其余“罪状”之荒唐，可见一斑了。这样

的材料理所当然又在学生中遭到质疑。只是“左派”当道，满校高压，喏大重大，已没有多少人敢发杂音了。

郑思群是八月二日晨五时自杀的。学生们得到消息已是晚饭时分，采矿系同学李远旭冲进我们寝室大呼：“郑校长自杀啦！”全室顿然惊骇，同学们当即将碗盘一砸，或慨然无言，或仰天长叹，甚至掩面痛哭……年深日久，笔者已无法准确记起那一晚学校发生的所有细节，而我自己干的事情却清晰依旧：那一夜我通宵无眠，待同学们酣然入睡，我独个儿愤激难平，匆匆给西南局及书记李井泉写了一封状告重庆市委及工作组的信。信毕已近子夜，我又急急敲醒了临屋的吴庆举。我满以为他会起而应合，义无反顾的和我从容前行，与工作组血刃相博。出乎意料，吴看完信稿，紧张地退还我，说：“快收起来！快收起来！这样做太危险！”

我无话可说。回到寝室，难以入眠，画了一张水彩画以为纪念。



第二天，我一人上街，把信付了邮。

这已是八月三日的事情。那天校园里特别清静，有点暴风雨前的

感觉，整个学校都停了摆。重庆市委仿照北京规模，在市中心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毛的指示，还有刘少奇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果然，闪电很快挟狂风骤至：开会的代表还没有回来，消息先到学校了。

午饭刚过，火炉山城毒日当头，走在水泥地面如行炮烙。我们美术队几位学生憋不住激情如沸，全都光着脚丫跑去宿舍前的马路地上写标语，就四句话：“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标语的轰动效应没维持多久。开会代表回校，所有谜底便已揭晓。重大的文革故事应该翻到新的一页了，只是固执的工作组——拿当时流行的话说——还不想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场莫名其妙的斗争注定还要演下去，而且愈演愈烈。

八一五风潮山雨欲来

八月三日晚，吴庆举非常着急地找到我，问：“你那封信的底稿还在吗？”我说在。他说行，“时机成熟了。抄成大字报，公布出去！”

大字报题目是：《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由吴和我联合署名。文章张贴出去已过熄灯时分。学生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兴致勃勃地用手电筒照看、议论。无数黄色光影像节日夜的探照灯光柱，在大字报上你追我逐，刹是热闹。第二天一早起床，二舍和九舍之间的路边已一字儿排开体育队好几份杀气腾腾的响应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我还记得清楚：“我们要怒吼一声：郑思群事件必须重审！”接下来，各系各班的大字报也如潮再起，直扑工作组。

市委马上还以颜色。当晚，工作组紧急召开全校声讨大会，由市委代书记鲁大东代表市委宣布开除郑思群党籍，接下来将所有学生领回各自班级强行表态。同时连夜组织“左派”学生赶写拥护市委决定的大字报。

其实，这些努力已属徒劳，无非再给大学生对失败者的嘲笑增添

一些笑柄而已。大学生已经不满足于在工作组驻地来几张漫画、几副对联或者打油诗，不满足于把余跃泽、孟凡均弄出来围攻挖苦一通。有好事者从松林坡现场侦察回来，突然暴出一大堆只有福尔摩斯才能够解答的疑团，推论是：郑思群不是自杀，而是：他杀！罪魁祸首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工作组！

于是同学们纷纷涌向松林坡，在专家招待所附近的墙壁、草坪和石阶上到处查找疑点，有人爬上围墙，说是发现了血迹，于是把长满青苔的砖头撬回去，用报纸小心翼翼包好，准备送北京交党中央备查。为保护自杀现场，同学们完全不经意地便形成了某种组织，松林坡成了重庆大学的“斯莫尔尼”。大家自觉地昼夜轮流值守，并派出人员与市委、市公安局进行交涉，同时做些筹款之类的工作以备不时之需。这个行动的领头羊，就是吴庆举。吴后来成为八一五事件的发起人，算是水到渠成了。那些天，随时都会从松林坡上传下些耸人听闻的新进展，每一条新消息都足以把重庆市委推上断头台。工作组虽然根据市委指示还在重大赖着不走，但对于学生们日复一日浪潮似的猖狂进攻，完全一筹莫展。

这儿，笔者有必要补充一件几十年一直沉积于心的往事。正是大伙儿在松林坡钻头觅缝搜索工作组实施谋杀计划的蛛丝马迹时，八日下午，我和采矿系学生蔡增其秘密潜去市委党校走访了郑思群夫人、该校副校长吴耕书。吴听说来人是重大学生，称病不见，而我们则坚持不见不走——僵持许久，她妥协了。秘书把我们领进她的办公室，吴非常谨慎地把门窗严闭，这才开始同我们对话。我首先出示了郑思群“十大罪状”的抄写件并自报家门，迫不及待地说明我们的观点及同学们保郑的凛凛决心。年轻人的幼稚和真诚显然把老太太征服了，那天下午，她公然向两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说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话。这些话如被告发，她的政治前途将十分可怕。

我们当然希望她能证实他的丈夫死于谋杀，因为工作组公布的材料中曾提到：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前，曾让他们夫妻有过一夜团聚。而八月二日上午，工作组通知吴回校告别丈夫遗体，却被吴明确拒绝。

我们认为，老太太对郑的死因一定有足够的判断依据。不料老太太非常肯定地对回答，听工作组通知郑自杀身亡，她就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杀了。”她说。

这个武断的结论令我们大失所望。不用再追问，她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和郑诀别那一夜，他俩都彻夜未眠。郑对她发了很多牢骚。郑说他把政治看透了。郑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战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我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还说了苏联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和其它一些党史上让人齿寒的、我们这两个刚刚走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听闻或不曾听闻的故事。末了，她劝我们：你们还年轻，政治斗争复杂得很呢！你们就少过问吧。那些日子，大学生目空一切，头脑发热，以天下事为己任，可面对老太太此番惊世骇俗的教导，竟无话可说。我和蔡相约：为了保护老太太，也不至于给学校里对工作组的斗争带来影响，我们把对吴耕书的访问以及她的谈话瞒下来——一瞒就瞒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们自己都已年迈。

事实上，运动到了那一步，郑是自杀还是谋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仇恨已被激化，狂热已被点燃，动乱已如流水下滩，不可阻挡。八月八日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广播里宣布，校园一片欢呼。更大的动乱正式开始了。原来，市委曾通知工作组于八月五日晚二十四时撤除，后不知何故又宣布无休止延期，只是将办公地从党委小楼撤到七教学楼，致使七教楼又遭到学生们好些天的奚落和围攻。十六条公布当天下午四时，工作组却悄然遁走，撤了个精光。

学校已成权力真空。学生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和自由。他们可以大闹天宫了。

清华附中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论”“再论”“三论”的传单在校园里四处挥洒，造反歌大行其道。批判邓时泽和刘稚民的文章当然要继续做下去，只是他们已经毫无还手之力。更重要的是，欺负学生近两月时间的工作组及其后台：重庆市委，他们有那么多极具刺激性的事情等待学生们去凑热闹哩。而要解决市委的问题，单单靠重

大一个学校显然不行。于是六月十八日晚上无线电系彻夜游行时提出过的命题重新被提出来，那就是：杀出校门，打向社会！毛泽东不是教导过吗：青年学生不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只会一事无成。

十二日晚上，已经初尝领袖滋味的吴庆举又找到我，商量到外校串连的事。重庆的大专院校，离重大最近的是建工学院，当然该第一个去串联。于是定下来，让我连夜起草一份大字报。大字报摘要如下：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多么幸福，多么振奋啊！

我们最最敬爱的党中央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首都会见了革命群众……

这一切啊，怎么不叫人欣喜万分，热泪横溢，斗志高昂！让我们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目前，我们学校“万马齐喑”的局面打破了！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同志们站出来了！千万张大字报，像狂暴的旋风、怒吼的排炮，在揪出学校牛鬼蛇神，深入揭发校系两级的同时，对于以余跃泽为首的市委工作组一月多来的许许多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对于三十年代周扬的积极追随者任白戈在六十年代兜售的大量黑货，对于《重庆日报》1962年纷纷出笼的大批毒草，进行了无情的轰击和严肃的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要革命！！要造反！！那就顾不上几个坛坛罐罐。老一辈打天下，抛头颅，洒热血，咱今天为无产阶级保江山，就要敢于迎困难、担风险！有毛主席领路，有共产党撑腰，还怕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力量。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面前，他们越抵抗，他们就只能完蛋得更快！失败得更惨！是革命的海燕就要敢于顶风冒雨展翅高飞！是痞种，是混蛋，就钻进你那个人主义的蜗壳里去吧！……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高职务，多大的权威，多老的资格，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批判！都要打倒！！毫不留情!!!一个都不例外!!!

……让我们永远永远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稿子拟好，又让文工团戏剧队毛笔字写得最棒的刘锡玉正楷抄好。题目是：“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在群众组织编写的“文革大事记”上，这份公开信曾被吹捧为“轰动山城第一炮”“重庆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来开会游行，有好事者还把它抄得老大，抬在队伍前面开道。8月12日晚上，我们对此全无所想。

第二天吃毕早饭，大字报就由戏剧队、舞蹈队和美术队的一些热心分子拿去铺在三舍门前的路上征集签名。大字报后的空白处签满了，又接一张纸继续签，完了，又继续铺纸。签名的人太多，纸张从三舍门口铺去，一直到民主湖还在继续延伸，足有百米以上，签字的人数很快上升至数千。事前，我们只是打算几十个人到建院把大字报贴上就完事，没想到声势一搞就这么大，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

好在，那几年政治活动多如牛毛，开会游行多如牛毛，好些年级的学生还去部队作过为期不短的军训，开展大型活动的纪律准备和道具准备完全没有问题，于是有人提议：让乐队的同学把铜管乐器统统拿去广场耀武扬威地吹起来！所有签名的人一齐开出去！

这一招真灵！几千学生很快就举着毛的画像和语录牌从四面八方涌来，按系按班整齐有序地排好了队伍，文工团的学生临时又赶写了些“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类的大标语，整个排场就很像一回事了。这就开出去，开进了建工学院的校园。

建院毫不设防，重大学生如入无人之境——确如无人之境：该院的工作组还把学生关羊一样全关在房间里学文件。对这一帮天外来客般的不速之徒，循规蹈矩的学生只敢把头伸出窗外去偷窥片刻，作一番无奈的感叹。重大学生在兄弟学院顺顺当当走了一圈，只在建院广场草草举行个仪式，自拉自唱地把公开信念一通，便得意洋洋地打道回府了。回得重大，余兴未尽，顺手捎带又把邓时泽、刘稚民无辜地带一回高帽游一回街侮辱一番，串联行动胜利结束。

这就是所谓的重庆 813 革命行动。八一五行动的预演。需要补充的是，事件当天下午，在文工团戏剧队的房间里，由吴庆举召集了一个总结会，各系都派代表参加了。笔者还记得的，体育队有周家喻、冶金系有熊代富、查正礼：这几个人，后来便成了声名显赫的八一五战斗团的主要领袖人物。

八一五事件记略

813 第二日是星期日，闹事之后，正好美美睡上一天。事情当然不可能这样。拿当时林彪的话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813 当天晚上，建院一个叫何德林的学生就颤颤巍巍潜来重大对我们表示感谢还要我们帮忙转交告状材料（何现为云南省设计院高工），好像我们这么一闹，就已经升格为党中央代言人。对方寻找地下党一样的急切和巴望使我们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第二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干脆来了一帮。他们自称是该校惨遭党委压制的两个战斗队“排炮”和“轻骑”的代表，要求我们声援。我和吴庆举是在九舍门外的地坝里和他们进行座谈的。对方为首的唐忠明是该校中文系学生，口才极好，后来成了该校造反派的一号领袖。座谈会后吴马上把前一天总结会的各系代表约来文工团议事。有 813 经验，搞这种活动应该是轻车熟路了，很快制定好第二天行动计划，然后便各自回系分头行事。

我的任务是去师专和校当局联络，安排场地茶水诸项事宜。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士，姓名已不详，是师专所谓“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女强人态度强硬，拒不接待，我方挟势凌人，胡搅蛮缠，吵架至深夜，最后不欢而散乃归。回校后接着抄写大字报、印传单，又把那份后来被称为“轰动山城第一炮”的“公开信”抄写一遍，事毕已东方既白。原先估计事情与 813 不会有何差异，无非游行一通就万事大吉。怠倦难支，我干脆卧床恹恹地酣睡起来。

待中午一觉醒来，发现同学一个都没回来，知道出事了。匆匆赶

去师专，没进门，就觉情景不祥。原来，对方既已知道我们将前往闹事，也连夜作好准备。学校大门口的马路上，用石灰水写满杀气腾腾的大标语：“我们不要救世主！”“重大一小撮右派滚回去！”“誓死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云云。校园内更是喧声如沸，混乱非凡。操场中间红旗标语乱摇一片，重大学生窜动其中，歌声吼声雷涌爆响。场地四周则全站满师专的学生和不知哪儿请来的工人，一派虎视眈眈，冲突随时有一触即发之势。山城八月，气温达38摄氏度。大家在烈日暴晒下对峙数小时而毫无退意，其情势之爆裂，现在想来，尤让人歔嘘！



上图为重庆师专发生“八一五”事件当天的现场情景。

先是，师专曾企图阻止闹事学生入校，可毕竟重大人多势众，阻止不得，只好退守回去，围在操场四周起哄，并多约些工人前来助威。我开我的会，你起你的哄，本也可相安无事，后来就出了一件小事：那时候，双方本来就都想寻事，任何一点火星都足以惹得大火燎原，这小事情自然马上就闹成大冲突了。情况是：操场前面一幢办公楼正在修缮，重大学生就想把毛主席像挂上楼前的脚手架，师专方当然反对，施工工人遂被人驱前阻止，于是冲突在脚手架便开始发生，全场由此大哗而且双方的争辩对骂很快提升到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感情、政治立场的高度。攻击愈演愈盛而显然不

可能有结果，党中央太远，只好先找市委断个公道。当天下午，闹事学生派出由张洪济为代表的多批代表进城情愿，张系动力系研究生，做事风风火火，胆大心细。市委人员以礼相待，客客气气让学生代表坐在大厅休闲，还请吃馒头喝开水之类，只是领导坚辞不出。事情就一直僵持下来了。这就是我赶去师专时发生的情况。

事情一直到晚上，双方学生还不依不饶。已是下班时间，前来看热闹的工人和市民如赶庙会，越聚越多，如果市委不解决，局面将更难收拾。市委副书记辛易之临危受命，硬着头皮来了。重大学生当然要他宣布这是革命行动，师专当局当然要他表态为反革命行动。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市委副书记当时也绝对蒙在鼓里，他能表什么态？装聋作哑顶牛顶了几个小时，顶得重大的学生们实在没耐心了，行动只好无果而终，各自打道回府。

队伍撤回学校已是深夜，而重庆大学却无人入睡。《辛易之是屠杀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打倒重庆市委！》之类的大字报，从那一夜开始，就开始向偌大山城，铺天盖地地蔓延而去。其后十年，重庆再无宁日了。

(全文完。本 PDF 电子书由巴顿将军编辑、制作)

